一顆頭顱的歷史

從戰場到博物館，
從劊子手到外科醫師，
探索人類對頭顱的恐懼與迷戀








法蘭西絲・拉爾森
FRANCES LARSON
徐麗松——譯

SEVERED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AND HEADS FOUND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一顆頭顱的歷史

從戰場到博物館，
從劊子手到外科醫師，
探索人類對頭顱的恐懼與迷戀













法蘭西絲・拉爾森
FRANCES LARSON
徐麗松──譯

SEVERED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AND HEADS FOUND

推荐序
关公人头的几重意义作家/张国立

中国歷史上最珍贵的人头是关羽，关圣帝君的。他的人头述说出不仅三国时代惨烈的攻伐，也包括险诈的人心、温暖的友情、政治的现实。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一九年的年底，寒风雪雨中，蜀汉五虎上将之首、汉献帝册封的汉寿亭侯，在距离今天湖北襄阳不远的临沮，被东吴大将潘璋斩杀，随后割下人头，孙权派专人送给曹操。

首级并未如以往那般传阅众军，也未挂在城门示众，曹操将关羽的人头「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当然，孙权送去的是头颅，曹操葬的「尸骸」指的便只是人头了。

先说繫在人头上的友情。

建安五年曹操打败刘备，刘军四散逃逸，刘备投靠河北袁绍，关羽则被活捉，曹操爱惜人才，封他为偏将军，关羽也不负所望，一战刺袁绍大将颜良于万军之中，《三国志》里这么写：

「斩其首还」。

杀死颜良后，割下颜良的脑袋，关羽才带人头回曹操营，证明他的能力。

不过曹操始终觉得关羽心不在曹营，派大将张辽去探口风。张辽原是吕布的部将，刘备一度和吕布结盟，关羽便在那个时候认识张辽，结为好友。当张辽奉命拜会关羽时，老关明白讲，他不忘与刘备间的感情，只要知道刘备在哪里，必然赶去追随。

这话让张辽一时不知该怎么向曹操回报，万一曹操不高兴，宰了关羽，张辽岂不是对不起好友？《三国志》引述《傅子》一书里的张辽说法：

「公（曹操），君父也；羽（关羽），兄弟耳。」

说明张辽内心的挣扎，最后仍不得不将关羽的话如实向曹操报告。按理说曹操该当即杀了关羽或至少判个二十年涉嫌谋叛的有期徒刑，但反而重金赏赐关羽，希望能打动关二爷的铁石心肠。黄金攻势无效，等

关羽知道刘备的下落，逃出曹营时，曹操也没派兵去追杀，他说：

「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关羽果然各为其主，建安二十四年率兵攻打樊城，斩曹操大将庞德，活捉于禁，曹操被吓得要从许昌迁都，司马懿和蒋济劝阻，说孙权对关羽的胜利一定不高兴，不如派人劝孙权攻击关羽的后方。果然孙权怕关羽势大，派兵抄了关羽的大本营，潘璋斩杀关羽。

司马懿与蒋济利用人心的险恶，假孙权之手杀关羽。

孙权割下关羽人头送去许昌，表示归顺。曹操没有报復性的示众或剁尸，以厚礼埋葬关羽的人头，似乎说明尽管关羽对刘备义薄云天，曹操对关羽，也够义气。与孙权两相比较，孙权实在有点……下品。

一一四一年，另一名被后世尊为武圣的岳飞，在宋高宗以「坐观胜负，逗留不进」的叛逆罪判死刑。一般的说法，岳飞被毒死，或者死后再砍下脑袋，不过既然皇帝已明令下诏赐死，以宋高宗痛恨岳飞的情绪来看，非得割了头示众，表明决心不可。

回头看公元前二○二年，西楚霸王项羽被追杀到乌江边，前无退路，后有追兵，他见汉军中有一个将领是他以前的部下，乃洒脱地说，我的人头送你去请功领赏吧。

人头是有价值的，那个时代没DNA，非得用人头证明某人的确死了。

公元十七年，绿林军攻入新王朝的首都长安，王莽于混乱中被商人刺死，割下的人头，据说涂了漆防止腐败，送各地传阅。而六一八年隋炀帝面对天下的乱局已无能为力，对着镜子说：

「好头颈，谁来砍之。」

人头更是种仪式，王朝更替、英雄气尽、天日照你不照我，尽在数不尽的人头里。

十七世纪初，巴洛克派大画家卡拉瓦乔画的《莎乐美与施洗者约翰的头颅》最令人印象深刻。《圣经》故事里，莎乐美的母亲先后嫁给一对堂兄弟，施洗者约翰公开指责这么乱嫁，不合乎伦理。某次莎乐美在继父面前表演，经母亲的怂恿，要继父拿约翰头颅做为给她的奖赏，就这么约翰不明不白地被杀。

画里四个人物，刽子举着约翰的人头，莎乐美撇开脸但双手拿盘子

接过人头，背后则是侧脸的指使者莎乐美母亲。

画里的人头闭眼呈睡眠状态，算得上安详，不像少年大卫割下巨人歌利亚的人头那么血腥。

人头还是择善固执，进而坚持理想的象徵。

《一颗头颅的歷史》讲述各种各样的人头，与它们背后的文化演变，以认真的考证揭开人类不敢碰触的阴暗，读起来惊讶胜过惊悚，知识多过恐惧。接下来，看看更多的人头……

推荐序
从一颗头颅看世界作家/阿泼

尽管近年来台湾本土出版内容趋向多元，但有一种题材的耕耘却是远远不及西方，即是「微物史」，英文为Tangible Things。这类被归类为「微物史观」的书写，是以一具体的物事或人物为主轴，上天下地东拉西扯，雕塑出观看歷史或世界的独特面向，例如乳房、情妇、纸张、巧克力，或台湾人比较容易读到的「茶」，这些人类事物虽小，但其在文化、科学、社会与歷史上却往往扮演重要角色--或者该说整个世界赋与它极关键的地位--却往往遭到忽略。

《一颗头颅的歷史》便是最好的例子。作者法兰西丝．拉尔森在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研究博物馆的歷史时，被引领到馆内三百多颗人类头骨的探索，她从这些文物类型的分类中受到启发：「这种条理世界的方式彷佛是将世界视为一组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迫使我们思考，在看似无穷尽的变化表象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类之所以为人？」像是需要火的时候，人类会以各种方式取得火，每个人类的群体都可以找到从事各种活动的理由，「我隐约觉得，每个文化都曾经找到展示人头的理由。」

然而，这本书谈的不只是「展示」。全书一开始是克伦威尔的故事，他是英国歷史中的英雄，然病逝后两年，却遭保皇党掘坟，头颅惨遭示众。他的头颅被高挂在西敏寺之上，而后被风吹落，流落民间，轮番在一个又一个收藏家手上展示，成为一个最有有名的头颅。「一个人如果有办法使别人感到惊愕，他就拥有某种权力。」作者说。

我想起，研究足球的歷史时，看过一个故事：盎格鲁撒克逊首次举行的「足球赛」，就是在战胜丹麦的庆祝活动中，将敌人的头颅作球踢，是战争的仪式。头颅，在若干文化中，确实是某种权力的展现，也是仪式。如我们熟知的，台湾原住民族的猎首文化，十七世纪初，明朝文献〈东番记〉中便描述原住民「所斩首，剔肉存骨，悬之门；其门悬骷髅多者，称壮士」。这类的头骨展示的文化不需多言，直到日本殖民时期，以「野蛮」禁止，然而，仔细研究原住民猎首文化，甚至丈量台湾原住民头骨的，却也是日本人类学家伊能嘉矩。

法兰西丝．拉尔森没在书中提到台湾原住民，但也不需特别提，许多地区的原住民族都有类似的文化，像是他工作的皮特．里佛斯博物馆里存放的南美洲舒阿尔人的头骨，这个族群会制作「干缩人头」，而这

据说能撷取死者的灵魂。她还提到毛利人与婆罗洲的原住民族，后者我曾经亲歷听闻耆老诉说自己如何猎取敌人首级，于是换得占满身体的纹身—他砍下的是日本人的头颅，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时，日军即是婆罗洲的敌人。

战争，也成了此书的主轴。不论欧美国家如何宣称自己的「文明」，战争却暴露人类「野蛮」的一面，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军即将日军首级视为战利品。这让我想到，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印尼发生的诸多暴动中，也将猎取人头当做胜利的展示。

「我们不能只把切断的人头扬弃于野蛮的过往，或归诸于那些原始的『他者』。相反地，猎头的歷史就存在于那里，就在我的眼前。」作者在文中强调。

但此书并不只是限缩在这类的诠释中，从如何制作头颅开始，到犯罪宗教和断头台、乃至医学科学生理与头颅的关系，方方面面都有颇析，这正是我开头所言，「微物史观」可以尽其所能的深入，尽其所行的广泛。虽然作者谦称「撰写一本关于断头的书，俨然是一种针对它所描述的各种策略所做的练习」，但经过许多外在框架，隔着它检视内容，保护自己，并且制造安全距离的这种「断离」意识，其实会阻断我们真正的理解与认识。头颅虽然很恐怖，但正视它，面对它在我们心理激起的情绪，或许才是检视人性疆界的所在。

读这本书，让我想起研究所一年级时，和室友伴随着一个考试用的头骨睡觉的感觉。为了认识而拥抱，会让自己更具知识的力量，更无惧。

「我是人，人之所以为人于我毫不陌生。」

—泰伦提乌斯（Terence），《自我折磨的人》（Heauton Timorumenos）

献给葛雷格（Greger）

序幕
克伦威尔的头
OLIVER CROMWELL's HEAD



乔西亚．魏尔金森（Josiah Wilkinson）喜欢把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的头颅带出场，联袂参加早餐聚会。一百六十年前在泰伯恩（Tyburn）2用来插进克伦威尔头颅的那根金属长钉虽然早就断了，但却成为方便的握把，宾客可以用它轻松提起头颅，在香料羊腰子（devilled kidneys）3上方检视这个具有皮革质感的遗物。一八二二年，他的一名宾客写道：「那是颗吓人的头颅，跟其他木乃伊一样，上面覆盖着干透的黄色皮肤，栗色的头髮、眉毛、鬍子都保存得极其良好。」这是魏尔金森的珍贵财产，他把它存放在特别为此制作的橡木箱中。每当友人对这颗头颅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就会用手指出克伦威尔左眼上方那个非他莫属的特徵—肉疣。

一个人如果有办法使别人感到惊愕，他就拥有某种权力。在聚光灯下，魏尔金森兴致勃勃地讲述克伦威尔的故事，以及他的头颅从一六六一年被切断以后陆续经歷的旅程，藉此娱乐嘉宾。那确实是克伦威尔的头，长期以来，接连有许多喜欢炫耀的人藉着它的魔力譁众取宠，而魏尔金森是其中最后一个。他非常清楚众人总是想近看这颗头颅，他们之所以受到吸引，是因为被切下的克伦威尔头颅是个已成定局、恐怖而新奇的物件，名满天下却也恶名昭彰，并带着某种私密性质。

克伦威尔的头本来就是用来展示的。他本人死于一六五八年九月三日，死因是高烧復发。两年半之后，在復辟政府针对「弑王者」的激烈报復活动中，这位护国公（Lord Protector）经过防腐保存的遗体从西敏寺的墓穴中被挖出来，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吊上泰伯恩的行刑架让喧闹的群众看个高兴，然后尸体被斩首。几天以后，他的头颅被插在一根长二十英尺的桿子上，安装在西敏堂（Westminster Hall）的屋顶，供伦敦全城民众欣赏。尖锐的金属桿钉进那颗头颅时因为力道过大，结果从头盖骨顶端刺了出来。自此尖桿与头骨难分难捨—克伦威尔在死后两年化身为国王的傀儡，回归公众舞台。

当时最杰出的两位日记作者艾夫林（Evelyn）和沛皮斯（Pepys）对局势转折感到错愕。「一名英勇过人的仕绅竟遭受此等侮辱，」沛皮斯写道：「这确实令我忧烦，尽管他或许有可议之处。」艾夫林则在成千上万民众目睹护国公从「君王环伺」的墓中被拉出来、眼看他的遗体被丢进泰伯恩那个「声名狼藉的致命建造物」底下的坑洞之际，不禁对「上帝莫测高深、令人错愕的判决」感嘆不已。虽然这两位作家都没有亲临事件发生的现场，但他们看到了克伦威尔的头，因为那颗头颅在接下来四十年间一直装点着西敏堂。一直要到一六八一年进行例行的屋顶整修时，它才暂时被取了下来。

西敏堂是祭出此等奇观的最佳舞台。过去西敏宫（Palace of

Westminster）4的三个主要司法庭都在这栋建筑物内开庭，而且在数世纪间，这里一直是举行加冕庆典、国葬及庄严演说的场所。西敏堂象徵合法的权力交接，王室和国会的权威，以及英国内战后这两者之间脆弱而致命的连盟关系。一六四九年，查理一世被带到西敏堂受审。四年后，克伦威尔则到这里就座，在市长大人（Lord Mayor）身前接受护国公的头衔，然后在一六五七年，他重新走进西敏堂参加他的授职仪式，于加冕典礼时享有与国王相同的排场。现在，他那遭到蹂躏毁坏的头颅安静无声，空然凝视着各路嘉宾于一六六一年前来参加国王查理二世的加冕盛宴，此后续于数十年间俯视国王的治理活动。终极叛徒克伦威尔是在死后遭到废黜。他被切下的头颅跟他的共和理想一样，早已空洞、死亡，而只要它待在西敏堂屋顶上扮演国王的傀儡一天，就没有谁可以忘记这件事。

据说在十七世纪末期的某天夜里，一场暴风雨把克伦威尔的头从西敏堂屋顶吹了下来，不久后，它便出现在博物馆展示柜中。十八世纪期间，这颗头颅转入私人手中，变成一个古玩、一个珍贵文物，并且可以创造赚钱的机会。

不同的人陆续把克伦威尔的头拿出来展示。首先是一名来自瑞士的印花布商克劳迪乌斯．杜普伊（Claudius du Puy），他把它陈设在他在伦敦经营的博物馆中，与异国花草和稀有硬币一同展示。一七一○年，一个前去参观的德国人非常好奇何以「这颗丑陋的头颅还能让英国人觉得珍惜而且有价值」。然后是萨谬尔．罗素（Samuel Russel），这个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演员在克雷尔市场（Clare Market）的肉品区设置了一个简陋的摊位，拿着头颅表演，娱乐到市场买菜购物的民众，并且经常将那颗头递给好奇的人仔细观赏。后来罗素把头颅卖给詹姆士．寇克斯（James Cox），这个人之前开过一家非常赚钱的博物馆，一眼就能看出某个物品有没有价值。寇克斯在私人场合把头颅展示给精挑细选过的贵宾，靠这个活动赚了一大笔钱。十二年后，他决定把它卖给休斯（Hughes）兄弟，这些人在他们举办于老庞德街（Old Bond Street）的「克伦威尔什锦」（Cromwelliana）展览活动中让克伦威尔的头成为最大的噱头。

十八世纪期间，克伦威尔的头就这样在展演经营者之间陆续转手，每次转手都带来一笔利润。但唯一的问题是毁损。在某个时间点，或许早在克伦威尔被挖出来送到泰伯恩那天，他的头上就已经少了一只耳朵和几颗牙。他的鼻子逐渐塌垮，头髮变得稀疏，干透的肉体积减小，皮肤则呈现黄褐色，皱缩后被骨骼拉撑，看起来活像皮革。这个坚硬、干燥物体的诡异外观使它成为效果最强烈的死亡提醒标志，因为任何人只

要接触到这颗头颅，不禁都会思考起人终有一死的事实。克伦威尔的头正是死亡的样貌。伟大统帅克伦威尔现在顶多不过是一团物质，它必须指望付费观众的兴致，它无以抵御自然力量的侵袭。

乔治国王时代的科学家们达成结论，表示这颗头颅只能算是个珍奇小物，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极不入流的人造品。一八一三年间，有人请曾经跟随库克船长首次航向澳洲的杰出自然学者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检视这颗头颅，但他基于政治因素加以拒绝。他说他无法允许自己检验那个「共和派老恶棍」的遗体，因为「光是提到那个名字，他的血液就会因为愤慨而沸腾」。同一年，在伦敦皮卡迪利（Piccadilly）的埃及馆展示收藏品的古董商威廉．布拉克（William Bullock）考虑把那颗头买下来，好收进他博物馆的典藏中，不过「只是当做小古玩」。结果，首相以非正式管道劝诫他不要对付费民众展示人类遗骸，因为这样非常不得体。

这项决定俨然像是一个改变的讯号。克伦威尔的头在一八一四年乔西亚．魏尔金森买下它时转入私人收藏。现在它瞄准的对象变成较为顶层的观众，以及那些可以在受控管条件下评鑑其价值的人。魏尔金森或许无法抗拒在餐宴场合，秀出他那颗赫赫有名的收藏文物以娱乐嘉宾的冲动，但这颗头颅再也不会流落在伦敦的街头市集。

围绕着这颗头颅的过往，相关故事愈来愈多，许多人则开始质疑它的真实性。好几颗不同的头颅开始流传于世：另一颗克伦威尔头颅被展示于牛津的艾许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但魏尔金森相信他握有的头才是真品，只是其他人对此不是那么肯定。举例而言，着有《奥利佛．克伦威尔的书信与演说》（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一书，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重新引发一股克伦威尔热潮的作家兼歷史学者汤玛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就认为，魏尔金森的那个古玩只是个「诈骗的幌子」，并且拒绝亲自加以检验。

问题正式浮出檯面，现在不得不透过科学方法验证。专业学术界人士踊跃地对这颗逐渐变黄的头进行检验：包括一位纹章专家、一位大英博物馆的古币专家、一位颅像学会的领导人士、一位知名雕刻家、一位牛津大学生理学家、多位皇家考古研究院的院士，以及两名医学统计学家。这些人各自将自己的学养应用在克伦威尔的头颅上，而所有人的检验结果都为魏尔金森提供背书。

在一九三○年以前，已经有无数测量仪器量度过克伦威尔的头，数不清的显微镜聚焦研究它，相关研究文献不下数百页。在那个「稍嫌丑恶」的物体上，每一个凹凸、每一道沟痕都获得详细检查与描述。不

过，研究克伦威尔头颅的那些科学家也纷纷臣服在它的魔力之下，他们的观看目光愈是专注，就愈能反映出这个逐渐腐坏的物品在成为私人财产两百年之后，依然能展现强大的力量。此时，已经连续四代拥有这颗头颅的魏尔金森家族虽然尽可能远离媒体，但有时还是会被媒体拉回聚光灯下，因为那些记者发现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希望写文章探讨它那不可思议的歷史。

二十世纪中期，乔西亚的曾孙霍瑞斯．魏尔金森（Horace Wilkinson）博士开始感觉，照顾这颗名声不好的头颅是个太沉重的财务负担。他决定，该是让克伦威尔安静休息的时候了。于是，在一九六○年间一场小型私人仪式中，克伦威尔的头连同承装它的橡木箱一块被埋到剑桥大学席尼．萨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教堂西侧门厅的地板下。剑桥校方对确切的埋藏地点一直严格保密。一块标牌上写着：「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学院校友（一六一六至一六一七年），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联邦护国公奥利佛．克伦威尔的头颅被埋葬在这个地点附近。」

接下来不会有法医鑑定和DNA检测：在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中，科学并没有最终的发言权。当然，这并不妨碍民众亲自前来目睹这个地方。克伦威尔的头虽然终于获得安息，但它依然能够吸引游人来访。

1　译註：奥利佛．克伦威尔（一五九九至一六五八年）是英格兰军政领袖，英国内战期间，他征服苏格兰与爱尔兰，出任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暨爱尔兰联邦护国公，领导第一个英伦共和政府。一六五八年病死后安葬在西敏寺，但一六六○年保皇党復辟成功，他的尸体被人挖出来凌辱。

2　译註：泰伯恩是从前伦敦郊外的一个小村庄，设有着名的泰伯恩行刑场。该地点位于现今伦敦海德公园东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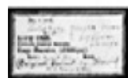
3　译註：香料羊腰子是将羔羊肾脏煎香置于香料酱汁中炖煮而成，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早餐典型菜色，但现在主要在午晚餐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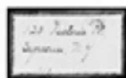
4　译註：最初的西敏宫是王宫，始建于十一世纪，十四世纪起也成为英国国会所在地。一五一二年发生火灾，大部毁坏，改建后除原有的国会，也在此设置皇家司法庭。一八三四年再度发生大火，西敏堂是少数倖存的中古建筑物之一。此后重建的西敏宫是英国国会（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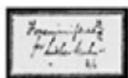
引言
令人难以抗拒的头颅
IRRESISTIBLE HEADS









本书的主题是被切断的人头。人类的歷史中充满这种东西。「猎头」一词让人联想到那些远离文明、奇异而危险的异国世界，但事实是，人头在长久的岁月中一直在所谓的文明世界中被大肆展示。就猎头而言，我们有我们的特殊传统，千百年来，人头装点着文明社会的几乎每一个面向，从死刑台到大教堂、从解剖室到艺廊，可说是无所不见。斩首的传统根深柢固，即便在今天依然挥之不去，尽管只是在某些被默许的情况下。

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极为特出，不仅是因为它近乎原封不动地被「存活」了三个世纪，也是因为多年来，它被重新塑造出各种不同身分。克伦威尔的头曾经挂在绞架上，被当成叛徒的头叉起来公开示众，几十年后却成为博物馆展示品。它陆续被视为战利品、珍贵文物、死亡提醒标志、资料集。它的价值依据不同时代的观念变迁而不断变动，它足以代表千百年来那些装饰着司法、科学和休闲娱乐等不同领域的数以千计人头。就这样，透过它的系谱和它的长存，它为本书中的许多故事带来某种清楚的连结。

尽管克伦威尔的头有其非比寻常的特质，但它终究只是来自遥远过去的众多头颅之一。今天，对于被切断的人头，我们有一些极普遍的假设，而它具有其中的两项：其一，这种头颅很不寻常；其二，它们年代久远。偶尔我们会在报章头版看到某个知名人物的头颅失而復得的故事。不久前科学家针对奈德．凯利（Ned Kelly）5的头骨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经过防腐保存的头颅分别进行检验；每逢考古学者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6冥诞，媒体依然要报导他在一九四二年去世时把自己的头捐给皇家外科医师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这个已经被说烂了的故事。克伦威尔头颅的故事之所以令人惊异，是因为它揭发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底蕴中一个鲜有人知的面向，而且那可能就是人性的一部分。

被切断的人头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具有某种价值或地位，尽管那种价值具有争议性或令人感到不安。过去，在某些情况下，人头被拿来以科学、战争、宗教、艺术、司法、政治等名义展现于世人眼前，甚至现在依然如此。士兵会把人头当成战利品，这不只是千百年前的事，也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年代中。近年来，恐怖分子和杀人犯会把斩首影片上传到网路，数以百万计的欧美民众则会在自家下载这些影片来观看。医学院学生必须面对被切断的人头的解剖任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觉得那是一个深具启发性的经验。朝圣者负笈远方，到欧洲各地的教堂观看展示在那里的圣人头颅。艺术家在解剖室和太平间凝视其他人的死尸和断头，藉此寻找灵感。有人申请在死后让人切下自己的头，并加以冰冻保存，

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科学家有可能将自己的头移植到另一具身体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恢復生命。而在现代文明的庙宇—博物馆中，无数人头被装进瓶子里，保存在药剂中当做展示品；这些头颅皱缩无妨，失去皮肉也罢，民众还是看得兴致勃勃。

人会夺取人头、会捐赠自己的头；人也会展示人头、观赏人头。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被切断的人头就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其中数目最大的收藏位于世界各地博物馆存放室的架子上，那里有数以千计的人头，偶尔甚至可以看到保存完好、肉质饱满的头颅。在这些黑暗诡密的地方，成排人头静谧地见证着我们祖先的猎头传统。大型国家典藏—例如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或华府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保存了数以千计的人类头骨，而多数地方级博物馆，特别是那些以考古或科学典藏为宗旨的馆院，也会有规模比较小的收藏。我开始对人头产生出乎自己意料的兴趣，是在我任职于皮特．里佛斯考古人类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的时候。这家博物馆隐身于牛津大学内的科学系所间，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文物，典藏内容非常惊人。

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的名声颇为响亮。当我告诉别人我在哪里工作时，他们常会说：「喔，妳是指那个收藏干缩人头的地方？」这是因为博物馆展示了六颗南美洲的干制首级，尽管在展示柜中琳瑯满目的文物之间，它们并不特别显眼。几年前，一位美国出身的艺术家泰德．迪万（Ted Dewan）表示要把自己的头捐给皮特．里佛斯博物馆（当然是在他往生以后）。他很担心如果该馆工作人员决定把那些干制首级送回南美洲，牛津就再也没有这种人头了。迪万还给了承诺，说他会留下足够的钱，用来支付干制他的头及后续保管所需的费用。馆长婉拒了他的提议，并表示希望看到迪万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能够经常来造访博物馆。

当时我正在研究这座博物馆的歷史，特别是它在十九世纪末期与牛津大学解剖学系之间的关连。这项研究带引我探索馆内典藏的三百件人类头骨。我很快就发现，牛津的人体解剖学系也有非常可观的人类头骨收藏。一份撰写于二次大战爆发前夕的报告指出，收藏那些文物所需的保存条件：「骷颅头约有三千个，占据一百五十八平方英尺空间、总长一百一十八英尺的架位，以及一共占地一百四十四平方英尺、堆到六英尺高的储存箱。总占地面积是三百五十平方英尺，不过加上适度穿梭在这些典藏品间所需的活动空间，一共就需要三倍左右，也就是一千平方英尺的面积。」我翻阅牛津大学那些用皮革装订，古老的新增藏品登记册时，看到每件新的文物都是用钢笔以美丽的草体详细登录，典藏品的

取得作业程序显现出一种令人屏息的勤谨精神。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可敬的科学家们把人们的头骨送来牛津，某人从甲地寄送一两件，某人又从乙地运来一两百件。

在成排的骷颅头和那些带有眼睛、耳朵、头髮的干制首级之间，似乎无法立即看出明显关连，不过在我任职的这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分类方式相当不寻常，而这都要拜博物馆创办人奥古斯都．亨利．雷恩．福克斯．皮特．里佛斯（Augustus Henry Lane Fox Pitt Rivers）将军的严谨要求所赐。里佛斯将军以「不列颠考古学之父」的称号名留后世，他以近乎偏执的热情收藏一切具有考古学和人类学价值的物件。当他在一八八三年同意将他的收藏捐给牛津大学时，他提出的条件是这些文物必须依据类型学进行分类─这种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类学收藏分类法就是里佛斯发扬光大的。一般人会期待在人类学博物馆中看到展示品按照地理区域陈设，这样就可以在欣赏完非洲文物后，转而探索亚洲、太平洋岛屿等不同地区的文化。按照时间顺序来陈设也是一个典型的做法，例如英国文物典藏可能会先从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早期工业开始，逐步进入罗马殖民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曼人统治时期，然后一直到现代。这些安排方式都符合，或甚至强调了一个原则：人类社会是各自独立的整体，大致上可以按照空间和时间的界线加以定义。

可是，在皮特．里佛斯博物馆，典藏文物的分类标准是每个物件的造形和功能。因此，所有篮子都被收集在同一区，鼓、枪砲也各有其所；馆内的某个大箱子中放的都是舞蹈面具，另一个箱子中存放的都是模型船只，然后还有专门放纹身工具的箱子。每一类文物都包含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物件，但这并不是说不同文化间的区别被忽略，而是代表文化比较的出发点略有不同。起初这种分类法可能显得违背人们的直觉，特别是对我这种考古学者而言，因为我们受到的训练是将每一个文化群体视为具有自主性的整体，值得我们单独针对它进行研究。但是，在我任职于皮特．里佛斯博物馆期间，我开始体会到，从类型观点探索文物自有其强大的力量。

这种条理世界的方式彷佛是将世界视为一组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迫使我们思考，在看似无穷尽的变化表象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类之所以为人？举例而言，我们都是会制作器具的生物。需要用火时，某个人可能会伸手找火柴，另一个人可能会把两根木棒互相摩擦几秒钟，藉此点燃一小束树叶火媒，但重点在于我们都能找到取暖、生火、煮食的方法，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持续前进。每个人类群体都找到从事各种活动的理由，无论那是挖掘土地、捕猎其他动物、装饰身体、储存财物、创作音乐或分享食物。

我隐约觉得，每个文化都曾经找到展示人头的理由。当时的我们还在做这件事。尽管皮特．里佛斯博物馆致力阐明典藏理念，但人头展示终究是它名满天下的原因之一。那个收藏干缩人头的地方……馆员忙不迭地指出，舒阿尔人（Shuar）和阿丘阿尔人（Achuar）等南美洲民族已经不再猎头，可是这些馆员的祖先们当初带回来的头颅有些却依然在为前来牛津参观的人提供娱乐。展示人头的行为与二十一世纪城市生活之间的距离，绝不像我们自以为的那么遥远。我们不能只把切断的人头扬弃于野蛮的过往，或归诸于那些原始的「他者」。相反地，猎头的歷史就存在于那里，就在我的眼前。那一切都令我不禁思索这个令人不安但却极为根本的问题：从这种人性阙如的终极意象中，我们到底能学到什么关于人性共通的道理？

我开始撰写一本关于人头的书，将人头视为物件，描述那些整齐存放在博物馆中的成排头骨，并以策展人的眼光思考它们是用什么方式被存放、观看，以及应用于我们的社会。但在那些骷颅头的背后，经常都有这样的故事：某个男子（那些人清一色都是男性）切断另一个人的头颅，然后着手清除肉质部分。博物馆里的人头都已经过「清理」，而清理那些人头是一件污秽的事。对门外汉来说，不管是干制首级、战利品首级，或为了进行科学研究而被解剖的头颅，都是一种不但惊人，而且经常非常吓人的物品，它的存在证实了创造者的十足胆量。无论是在生前或死后遭到斩首，那些「标本」震撼人的力量大都源自斩首这个行为本身，以至于我不禁想展开下一步研究，探讨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残暴才能切下某个人的头颅，以及这种暴力在哪些条件下会如脱缰野马般被释放出来。

以下某些章节谈论的既是砍头的行为，也涉及被砍下的头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的文化力量—尤其是关于头颅做为战利品的那个章节，以及关于被解剖的头颅那一章：前者探讨士兵在战场上取得的头颅，后者则为我们开启进入医学解剖室的大门。无需赘言，砍活人的头在今天已经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但即使在当今的人类社会中，某些平凡人依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以通常不被认可、经常不为人见的方式，对人类的躯体进行处置、肢解。切下某个人的头颅需要多大程度的残暴，这要取决于那颗头的性质。砍头杀人是残酷野蛮的暴力行为。以断头方式处决人犯的司法处置被视为无法接受。在战场上搜猎恐怖纪念品、把刚阵亡的士兵肢解等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名誉，而盗取人体部位进行科学研究同样可耻。可是，如果一个人是在几百年前死去，或他以书面方式同意在死后把头颅捐给医学界研究，那么切下他的头颅就可以被社会接受。

与此同时，歷史告诉我们，人类有能力做出或接受砍头的行为，甚

至可能透过观赏砍头情景而得到乐趣。断头仪式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力量到今天依然迴盪在一些日常用语、手势或笑话中。我们可能正在设法「保持我们的头」（keep one’s head「保持冷静」），或设法不要「失去我们的头」（lose one’s head「不知所措」）；用言语「咬下某人的头」（bite someone’s head off「气呶呶地对某人说话」），或用肢体「敲下某人的头」（knock one’s block off「把某人打倒在地或击昏」）；「把头笑到掉下来」（laugh one’s head off「捧腹大笑」）、「把头部保持在旋紧状态」（keep one’s head screwed on「保持明智」）；「在某人的头上标价」（put a price on someone’s head「悬赏某人」）、「为了某人而把自己的头摆在垫木上」（put one’s own head on the block for someone’s sake「为某人甘冒危险」）；因为某人犯了什么错而「要他的头被端在盘子上送来」（want someone’s head on a platter），或希望「看到头颅滚落满地」（watch heads roll）等等。这些成语把过往歷史带进现在，把恐怖转换成幽默，为砍头情景的强大张力赋与新的存在感，充斥在语言使用中。

如同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7于一八四○年观察库瓦吉耶（Courvoisier）被吊死时所见，千百年间，各种形式的政府处决为社会中「所有阶级与地位」的人提供了通俗的娱乐方式：「扒手及其同类，各个都受此情此景所撩拨，他们体内都潜藏着嗜血因子，而这种因子影响着全人类。」许多科学家直到二十世纪期间，都还为了他们的求知欲而从事蒐罗人头的污秽勾当。今天，外科医生经常切开别人的头骨，以便植入探针或切除肿瘤，有时还会一边探索病患的头，一边跟他们说话。医学博物馆的典藏人员细心保管馆内那些被装进瓶罐、漂浮在药剂中的人头，有时必须更换药水，必要时还得调整保存条件。时间不同、地方不同，「可接受行为」的界定方式也会不一样。

即使一颗头颅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被切下来，这个行为依然具有骇人的力量，而那种恐怖有一部分是因为被切下的头颅引人无比遐思。死人的脸彷佛一条美人鱼，虽然危险却令人无法抗拒。我在一些医学博物馆中看到过被斩断的婴儿头颅。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时代、一百年前的婴孩，现在他们扭曲的残骸悬浮在防腐液中供教学之用。我从资料中读到他们死去的状况─弑婴、堕胎、疾病、畸形。对于他们，对于我自己的黯黑欲望，我既麻木不仁却又心知肚明地屈从了。我不禁思考，自己是否玩得太过火，会不会做恶梦，但我却无法抗拒他们那被迫骤然停格的凝视。他们是从十九世纪来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光旅人，他们是活人与死人世界的居民，他们没有生命但却栩栩如生。他们的脸孔─脸部是人体中最具表达力的皮肤和肌肉组合形态─既使我无法自已地想努力建立连

结，也成功地让他们以超乎所有其他馆藏「标本」的程度，坚实驻居于生命世界中。在展示于整个墙面的人体部位–肾脏、肝脏、手、脚–之中，是那些脸孔在深深吸引访客，诱使访客们探索自己的震撼感受。

一旦我们与另一个人的头面对面，必然会发生某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面对另一张脸孔时，我们也窥探了自我。我们很本能地会对对方的脸部表情做出自发性的无意识反应。当我们看到某个悲伤、快乐、愤怒、悲怆的脸孔时，我们会经歷一种自动而快速的神经反应，导致我们无意识地模仿那个表情。当那是一个没有身躯的脸孔，我们的身体反射动作–那种本能的交感性–与我们知道那个人必然已经死亡的事实产生了冲突。归根究柢，缺失的部分与剩下的部分同等重要。那个人消失的躯体因为不在场而益发紧扣人心，一如那颗头颅虽然在场却宛如缺席。

从死去的敌人头颅经彩绘后成为军营中的烛台，到捐赠者的头颅经防腐处理后从双眼之间被锯成两半、包在纱布中，然后贴标籤存放在医学解剖室的置物架上，被切下的人头颠覆了我们的简单分类方式，因为它同时是人也是物件。他要不是同时是这两者，就是两者都不是。两种状态不是相互确证，就是相互否定。它既在此与我们同在，却又全然异质。被切下的人头有一种扣人心弦–而且恐怖–的张力，因为它否决了我们为了理解所处的世界，所採用的最根本的二元分类法：人和物件的定义是建立在相互对立的基础上。但断头却把一种原本不可能的二元性呈现在我们眼前。

被切断的人头可以是各种不同的东西：挚爱的人、战利品、科学资料、犯罪证据、教具、宗教圣物、艺术冥思、恶作剧……它可能是交易物品、通讯辅助物、政治抵押品、传家宝，它也可能同时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它的定义不断变化，经常出现戏剧性的摆盪，人类遗骸之所以具有搅乱人心的力量，这正是其中一个原因。人类的遗骸会震慑、挑战我们既有的假设，而能够与我们四目相对的人头更是如此。

被切下的头颅无论是完整保存或仅剩头骨，都是从人们终究要去报到的另外那个世界观看着我们。它把死亡加诸于生命之上。在一个经典格言中，骷颅头说：「昔日之我正如今日之你；明日之你将如今日之我。」而那已经完全骨骸化、僵硬不动，彷佛永远在微笑，却永远无法真正笑的脸孔，更强调出这个讯息。舞台上最着名的骷颅头–忧里客（Yorick）8看起来在露齿而笑，但他已经不可能再笑了。「垂头丧气」（chop-fallen）的他早已在死亡之际丧失他的个人特质。

由于每个从地底下被挖出来的骷颅头在哈姆雷特眼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如此绝对」–他只能冥想各种可能性：那是某个政治人

物、朝臣，或者律师？死亡让所有伟人变得平等，在这个场景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则发现自己跟掘墓者平起平坐。一场关于分解速度和腐坏的讨论让他回归实际。这里不谈天堂和地狱，只谈一些肉体面向─腐烂、皮革般的皮肤、臭味。死亡的无区别性似乎无法超越，哈姆雷特却冲动地想让他的朋友忧里客復活：他的嘴唇，那「欢乐的闪现」。故事开始时这人早已死去，但他却在哈姆雷特手中起死回生。骷颅头活了起来，忧里客又成为一个嗜赌的笑匠，在短暂时间中对着舞台说话，且有唱歌的小丑和满天飞舞的骷颅头陪衬。

在莎翁笔下的坟墓中，哈姆雷特和这些绝不可能替换的骷颅头面对面，一如所有凡人，他与时间及死亡对峙。死亡不做差别待遇，然而，忧里客却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把忧里客的角色从传统的死亡提醒标志转化成一个死去的人，于是这个出土物件再度成为喜剧演员。或许那些欢乐的闪现只是为了凸显哈姆雷特手中那颗骷颅头没有生命的事实，但这正也是重点所在。这个物体和它所对应的个人具有相互强化的关系。与忧里客的顽皮有关的记忆加强了他予人的无生命意象，反之亦然，因为在许多方面，骷颅头确实是活人脸孔的反命题。

千百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受到骷颅头的吸引，因为它们等于是方便而易于收集的人。被客体化的人成为物件，可以轻松地载运、存放、测量、分析。然而，如同莎士比亚，我们也会试图为它赋与生命的样貌，彷佛要把它从死人的世界带出来一样。毕竟在我们所有人的体内，都有这样一个头骨。有某种力量会驱使我们设法恢復这个遗留物的生机，因为在一颗被切断的头颅的外观─彷佛一个真人─以及它的行为方式─有如一个物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矛盾。一个人的生命力似乎主要驻居于他的头部，而非在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从人类头部具有惊人的物理性质这个事实看来，这或许也无可厚非。

世人之所以觉得头颅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甚至诱人将它移除，有许多很好的生理学原因。人头是一个强大的生物动力室，在视觉上也非常迷人。它容纳人类五个官能中的四个：视觉、嗅觉、听觉和味觉都在头部运作。头骨包覆着大脑，那是人类神经系统的核心。头部负责吸入人体所需的空气，也负责递送出我们要说的话。演化生物学家丹尼尔．李柏曼（Daniel Lieberman）写道：「几乎每一个进入人体的微粒，无论那是滋养你或为你提供外在资讯的东西，都是经由头部进入，而几乎每一种人体活动都牵涉到发生在头部内的事。」

为数众多的不同组件匯集在我们的头部。人类头部包含二十多块骨头，多达三十二颗牙齿，一个硕大的脑部，数个感觉器官，数十块肌肉，以及数不清的腺体、神经、静脉、动脉、韧带。这些「零件」都以

紧密的方式组构在一起，高度集中整合在小小的空间中。人头还有一个特点：好看。人类头部具有生物世界中最具表达力的肌肉组合之一。它有各式各样的装饰性特徵加以点缀：头髮、耳朵、鼻子、嘴唇。末梢神经的惊人集中程度，以及无与伦比的表达运动能力，都使我们的头部以超乎任何其他身体部位的程度，把我们的内在自我与外在世界连结起来。

这个不可思议的引擎室动力充沛、结构紧密、具有显着特徵，而且它「高高在上」，让所有人一眼就能瞧见。人类双足直立的身体形态使我们得以把略呈圆形、宽阔、粗短的头部，风光地展现在相对纤细且几近垂直的颈部顶端。多数动物的颈部都比较宽大、粗肥而且富于肌肉，因为牠们的颈部必须能够把头部往前撑在身体前方。但人类的头部因为位居嵴柱顶端，因此颈背部分需要的肌肉比较少。由于人类颈部肌肉不多，我们很容易就可以隔着皮肤摸到血管、淋巴和嵴椎。简言之，比起鹿、狮子或其他任何经常被视为捕猎战利品的动物，砍断人类的头要简单得多。

但这并不代表砍头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人类的颈部跟其他哺乳动物相比，确实较为脆弱，但将头部与身体分开依然是件困难的工作。许多故事可以证明这点，死刑台上砍头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尤其是在像英国这种斩首相对罕见、刽子手经验不足的国家。若要将一个活人的头部迅速斩断，需要精准且强而有力的手法，以及锐利且厚实的刀刃。这也难怪被斩下的头颅会成为终极的战利品。就算刽子手的经验丰富，而且被害者被五花大绑，还是有可能要砍了好几刀才让人头落地。在一七六六年的法国，眼睛被蒙住的拉利伯爵（Comte de Lally）静静地跪在地上，等待刽子手的斧头落下，但刽子手却无法一次就达成任务。伯爵往前倒下，必须重新调整身体的姿势，但即便是这样，刽子手还是再砍了四五刀才把他的头斩断。另一个有名的例子发生在一五八七年，刽子手花了三刀才砍下苏格兰玛丽王后的头。第一刀砍到的是她的后脑勺，第二刀砍完以后还是留下一小条肌腱，刽子手最后只好用斧头的刀刃部分把它切断。即使是砍死人的头，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当克伦威尔的尸体在泰伯恩被斩首时，执斧人一共砍了八刀，才终于穿透厚厚的裹尸布，完成工作。

尽管有各种无法预测的因素，当施刑者技术高超、被害者顺从不反抗，斩首确实是可以快速致死的方式，虽然我们不可能知道到底有多快：因为没有人被砍头后还能够长时间维持意识，为我们提供答案。有些专家认为，由于脑部血压急速降低，人在两秒内就会失去意识。其他一些专家则指出，意识是在脑部耗尽所有可用氧气之后才逐渐消失，因

此就人类而言可能长达七秒─对一个刚被砍头的人而言，七秒钟无疑极为漫长。斩首或许是最不折磨人的致死方式，但一般认为它还是会带来痛苦。许多科学家相信，无论执行速度有多快，斩首一定会在一或两秒钟之内造成剧烈的痛楚。

大刀挥下、人头落地，这个画面隐含的文化性力量源自那个动作的无比迅捷，而这种身体技艺所展现的威力，挑战了死亡那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当下，因为这样的死亡方式被表述为立即发生，即便斩首的实际机制对科学家而言基本上依然成谜。法国歷史学者丹尼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曾经这样描述断头台这种把斩首变成效率典范的工具：「（断头台）在死亡发生的瞬间将死亡的不可见性展现于我们眼前，精准而又无法辨识。」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在思索死亡的神祕时，很容易就会忘记砍头绝不是一件不可见的事。斩首是非常血腥的活动，这是西方国家不再用这种方式执行国家处决的原因之一，尽管它是已知最人道的致死方式之一。斩首比绞刑、致命注射、电击或毒气更迅速，它的结果也更能预测，但那种景象太过残酷恐怖，我们的情感难以承受。

斩首可说是个自相矛盾的词语，因为它虽然残暴却又有效。斩首是一个凶狠而藐视人性的野蛮行为，虽然人头之所以成为吸引人的战利品，自有其扎实的生物学原因，但斩首所蕴含的文化力量，一部分却是源自我们无法转身移开视线的事实。就算在最民主、最都市化的文明社会，永远都会有人想观看这种场面。同样地，被切下的头颅经常驱使众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些情感强烈的情境中凝聚他们，而不是─或说至少不只是─让他们感到嫌恶。斩首象徵终极的暴行，但它也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因为斩首虽然残忍无比，却能制造出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物件，无论我们喜不喜欢，那种力量异常惊人，能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注意那个物件。

就连施刑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有令人惊讶之处，因为有时那种互动除了单纯的残暴，还蕴含某种奇特的亲密性，有时甚至荡漾着一丝幽默感。每当我们碰到一颗被截断的头颅，无论那是在战争、犯罪、医学或宗教的脉络中，我们对那个行为本身都会有一番新的体认。世人发展出无数的方式，设法合理化断头的恐怖吸引力。断头对在世者施与的力量很可能具有普世性质。即使被截断的人头在本质上阴森恐怖，但却能带来灵感：它会激发世人研究、祈祷、开玩笑、写作、绘画；导致他们转身离去，或促使他们更进一步观看，并带引他们思考人性的侷限。断头的这种令人难以抗拒的本质或许很容易遭到不当利用，但忽略它却是一件危险的事。这本书谈的是一个令人惊骇的故事，但它终究是关于

我们的故事。

5　译註：爱德华．「奈德」．凯利（一八五四至一八八○年），澳大利亚丛林大盗、「凯利帮」首领，四处烧杀劫掠，后来被捕并被处以绞刑。但在澳洲民间传说乃至书籍、电影、艺术作品中，他却一直是受澳洲人景仰的英雄人物。

6　编註：弗林德斯．皮特里（一八五三至一九四二年），英国着名埃及学学者，一八九六年在底比斯发现麦伦普塔赫法老石碑（The Merneptah Stele）。

7　编註：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一八一一至一八六三年），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齐名的英国小说家，着有《浮华世界》（Vanity Fair）。

8　译註：忧里客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Hamlet）中的角色。奥菲莉亚（Ophelia）身亡后，掘墓者一边挖墓穴一边讨论她的死因。哈姆雷特抵达，看到掘墓者挖到他幼时看过的弄臣忧里客的骷颅头。哈姆雷特举起骷髅头，说了一句「哀哉！可怜的忧里客」，然后开始沉思凡人皆会死的道理。

第一章
干制首级
SHRUNKEN HEADS



我到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看干制首级时，是独自一人前往，并且正在思索这本书的撰写架构。那种孤独带给我一个冥想的时刻。首级在玻璃柜中用绳索悬吊展示，它们的五官是固定的，眼睛是闭合的，长长的头髮静静地往下垂盪。那里面一定很安静。那些首级保守着它们的祕密。凝视它们时，我觉得自己彷彿是个粗俗的入侵者，但我仍旧伫立在那里凝视。我设法在它们的血腥歷史和眼前毫无生命的存在之间找到妥协。

参观民众在我周遭来来往往，他们跟家人朋友站在展示柜前方时，我听到他们的反应。成群的小朋友表示他们觉得那些头颅「很吓人」、「很酷」，许多大人则说「很噁心」或「很恐怖」。所有人都想知道同样的事：这些头是真的吗？是怎么做的？我们都想设法弄清楚这些东西的来歷。一个物品若要能超越其创造过程的实务面向，就必须加持某种魔法才可行，而令我们感到眩惑的，正是那些头颅从人变成物品这个转化过程的本质。

皮特．里佛斯博物馆典藏的干制首级大约是一百年前由舒阿尔人制作而成。舒阿尔人居住于南美洲安地斯山雨林地带，以及祕鲁和厄瓜多尔境内的亚马逊河低地区。他们是以「干缩法」制造这些他们称为「参萨」（tsantsa）的人头，首先将死者的头骨取出，移除皮肤底下的所有肌肉和肉质部分，然后在里面放满烧热的小石块和泥沙，多次重复这个操作步骤，直到头部皮质缩到只比男人拳头略大的程度。对舒阿尔人而言，这些操作的目的是为了撷取死者灵魂的强大力量，而且也是他们歷史悠久的复杂仪式中的一部分。但今天的访客前往牛津近距离观赏展示于玻璃柜中的干制首级时，他们看到的经常就只是那些实际制程本身。

这座悬挂展示「参萨」的博物馆专门典藏世界各地的人制作和使用的物件，展品可谓包罗万象。这些物件置身的环境会引人注意它们的物质性，但在它们的实际制作过程中，物质性却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一旦舒阿尔人为自己的族群成功撷取到「参萨」的力量，他们就可能埋掉、丢弃那些人头，或卖给生意人。现在，这些干制首级来到牛津，不可能再被丢弃。事实情况正好相反–它们已经成为来访者注目的焦点。

在仪式刀具、悬锤、环锯工具之间，干制首级远比其他展品更能吸引参观者的目光。我在那里时，一位展馆服务员神情骄傲地把一名神情困惑的年轻女子带过来，并告诉她：「这是本博物馆最令人惊奇的文物之一，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到这里来看这些干缩人头。」媒体经常把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简单称为「干缩人头博物馆」，来访摄影师总要冲到干制首级那里拍些吸睛的照片，博物馆的媒体负责人对此几乎是莫可奈何；他们也无力阻止报章杂志的「週末活动」资讯在提到这座博物馆时不断使用「令人毛骨悚然」、「异国风情」、「诡异」等陈腔滥调的字眼。

这座博物馆因为典藏人体部位而有名，但这却使它的处境非常尴尬，员工也不断讨论到底该拿这些干制首级怎么办。有些人认为应该停止展示这种文物，因为把死者当成珍奇古玩让陌生人观看是对他们的不敬。尽管展品标示详细说明了干制首级的缘由和制作方式，参观民众依然经常用「怪异」、「野蛮」等字眼形容它们，这种现象对谁都没有好处。

干制首级是「处理敌人遗体」这个展示类型的一部分，这类型展品包括来自印度、太平洋岛屿及南美洲的装饰头骨和祭典服饰等。文字解说板上的说明指出，许多文化都有展示敌人头颅的习俗，包括英国本身在内；一块镌版画描绘一六○六年时的「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9策划者的头颅被插在木桩上展示于伦敦的情景，强而有力地证明这点。来自南美洲的人头被展示在它们的文化与歷史脉络中，解说内容也述及它们在仪式上的重要性以及欧洲收藏家对它们的青睐。

尽管如此，舒阿尔人的技术成就所展现的力量可谓是坚如磐石。人头被深不可测的时空距离剥离创作情境后，对旁观者而言显得不真实。看到这些人头的参观者有时会提到电影–比如宣称「那颗就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里面的人头……」（事实上并不是）–彷佛它们属于一个我们创造的幻想世界。

博物馆典藏专家们非常清楚，这种反应只会使民族刻板印象的问题持续下去。于是舒阿尔人逐渐被外人称为「那个南美洲的猎头民族」。

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的身分被等同于它所典藏的干制首级已经相当离谱，与此相较，一整个民族因为这类的博物馆展示而被贴标籤的现象更是不应该。

参观民众说：「是真的干缩人头呢！哇！是怎么做出来的？把皮肤切开来，拿掉头骨和脑部，然后用热沙去蒸它？好噁啊！」可是没有人会问：这些人头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会这样被吊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座大学博物馆？一旦我们开始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干制首级不只是某个古老部落习俗的产物，也是欧洲人的好奇心、品味取向和购买力共同造成的结果。现在我们应该开始让聚光灯转向，把焦点投射到你我的身上，投向我们的祖先，因为是他们把数以百计的人头带进博物馆和老百姓的家，而且从中得到跟它们的原创者一样多–甚至更多–的快乐。总归一句话，来到这座牛津大学附设博物馆的展览室，把鼻子贴在玻璃柜上紧盯着干制首级的，并不是舒阿尔人。

舒阿尔人的猎头习俗在十九世纪末期达到高峰，而这是干制首级交易在国际上蓬勃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当时舒阿尔人大约每个月会发动一次夺取头颅的袭击行动，参与者多达数百人。在欧洲和美洲的城市，来自南美、印度及太平洋岛屿的干制首级出现在商店、拍卖公司、博物馆以及一般民家。这种商品的销路一直很好，需求不断提高，于是供给也随之增加。这个道理很简单：欧洲人需求舒阿尔人制作的干制首级，舒阿尔人则需求欧洲人生产的刀枪。我们的博物馆典藏的干制首级，并不真的是某种未经外界污染的野蛮生活方式所遗留下来的东西，而是殖民扩张时期的经济运作，以及关于「野蛮文化」的幻想力量所共同创造的产物。那些最有名的猎头文化绝不是被冻结在时间轴线中没有往前发展，而是在回应外国人的特殊嗜好。

一八八○年代，随着橡胶及金鸡纳树皮–这种材料提供制造抗疟疾药物「奎宁」所需的活性成分–的贸易活动扩展到厄瓜多尔，愈来愈多欧洲殖民社群来到这个地区。殖民者跟舒阿尔人以物易物，用布料、大弯刀、钢制矛头、霰弹枪等交换当地的猪、鹿、盐和干制首级。但当殖民者开始自行饲养牲畜，食用自己生产的牛肉，他们对舒阿尔人的猪和鹿的需求逐渐减少，到最后，殖民者感兴趣的东西只剩下干制首级和舒阿尔人提供的劳力。舒阿尔人如果想要布料、大弯刀之类的商品，他们会跟当地的传教士交易，因为传教士开出的售价低于交易商，不过传教士从来不卖枪枝。因此如果想买枪，唯一的办法是卖人头，于是「以头换枪」的交易形态在南美洲建立了起来。

参观民众到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看干制首级时，他们真正看到的其实是白种男人的枪的故事。枪不只为舒阿尔猎头队提供经济诱因，更成

为夺取人头的最佳工具。比起木材和石头制成的矛，枪和钢刀是更有效的猎头武器，使舒阿尔人在猎头袭击行动过程中享有显着优势。欧美人在买人头的同时，也提供舒阿尔人得以更快猎取更多人头所需的装备。枪被用来夺取人头，然后人头又可以用来交换更多的枪。进入二十世纪一段时间之后，一颗干制首级的价格普遍被认定为相当于一支枪。有一个故事提到，一名舒阿尔族领袖用一些人头换得一批枪，然后立刻用那些枪伏击另一群舒阿尔族战斗队，然后再用猎得的人头交换更多的枪枝。

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舒阿尔人的猎头传统至少可以回溯到十六世纪，但我们对舒阿尔人猎头行为的认知大都来自十九世纪末期，那时干制首级的制作在传统上属于一些复杂文化仪式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撷取舒阿尔人死后的灵魂所蕴含的强大力量。那些人头并不是一般定义中的「战利品」，因为有猎头风俗的舒阿尔人和阿丘阿尔人大都和平相处，他们重视的并非实质的人头，而是驻居其中的灵魂力量。人头不是在战争期间夺取的。他们会特别组织以夺取人头（「参萨」）为目的的部落袭击行动，因为「参萨」是充满力量的东西，拥有「参萨」的人才有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舒阿尔人心目中，夺取人头是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

袭击行动成功后，民众会举行盛大餐宴，欢迎猎头勇士返家。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庆祝活动，透过这种活动，驻居在「参萨」中的力量被转移到家庭妇女身上，确保一家人享有丰饶的食物生产。数年期间，他们一共举行了三次欢庆餐宴，但庆祝结束后，「参萨」就不再有什么公共价值，因为—不同于购买这些干制首级的商人—一旦灵魂的力量被成功转移进掳获方的群体，舒阿尔人就对人头本身失去了兴趣。有些舒阿尔人会把「参萨」留着当纪念品，有些则会把它丢掉，不然就是卖给行旅人或殖民者。事实上，舒阿尔人之所以不会展示这些人头，并不是因为它们神圣，而是刚好相反—因为它们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就像重要信件取出后留下的信封。

然而，随着与外国人的交易蓬勃发展、「以头换枪」的生意日益巩固，夺取人头的精神意义—设法控制牺牲者的復仇灵魂，撷取其中的力量并将之转移到活人世界—逐渐淡化，干制首级于是经常变成只用来买卖的物品。干制首级不再是力量循环的媒介，而是货物累积的一环。「参萨」失去它的精神力量，成为商品；有些舒阿尔人为了卖人头，甚至不惜杀害他人。欧美国家的人民就这样催生出胡乱杀人的嗜血猎头客，而这正是他们在想像中预期会看到的事。随着需求增加，舒阿尔猎头者变得更加不分青红皂白。过去，只有男性的头颅会被夺取，因为只

有男人才有能被关进头部的復仇灵魂。但现在为了做生意，舒阿尔人开始猎取女人和儿童的头，即便这些人头没有任何仪式上的文化意义。

于是，女人和儿童的头被欧洲制造的刀具切下，辗转来到南美洲各地城镇被当做纪念品贩售。基本上这是一种阴森恐怖的观光艺品生意，那些观光客无疑以为他们买到的「参萨」来自原始战士的发源地，是货真价实的传统文物，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想到那是特别为市场制造的干缩人头。更离谱的是其中还有一些殖民者和南美洲居民的头，这些人跟猎头者毫无关系，一辈子可能都生活在城市中，但因尸首落入动物标本剥制师手中，于是他们的头颅被切下，成为干制首级流入市面。动物标本剥制师是赝品「参萨」的重要来源，他们知道这种工作可以赚些外快，于是跟当地医院太平间的员工串通，请他们提供「原料」。一些无人认尸的穷苦人就这样在死后成为牺牲品，满足欧美民众对异国珍玩的欲求。

市场对干制首级的需求高到有时没有足够人类尸体可用，于是投机分子转而把歪主意打在猴子和树懒的身上，这些动物的头颅一旦经过干缩和「重塑」，经常可以骗过那些珍玩搜猎者。美国工程师及旅行家弗里兹．厄普．格拉夫（Fritz Up de Graff）曾经指出：「在巴拿马，观光客创造出对这种野蛮珍玩的活络需求，他们可以订制人类或猿猴的头颅，或以每颗二十五美元的价格购买现成品。」假造的人头以山羊皮、木材、树脂或橡胶为材料。即使后来当地立法禁止买卖「参萨」，但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仍有许多干制首级被偷偷卖给观光客。

这一切代表了一件事：博物馆典藏的舒阿尔干制首级大部分可能是赝品。其中许多根本不是人头，就算是人头，很多也与舒阿尔人几乎毫无关系，以至于所谓「纵横古今的舒阿尔猎头族」的概念更可以说是源自于欧美的建构。参观者看到这些文物时，可能会把它想像成某个未经文明玷污的野蛮民族的骇人战利品，但实际上他们欣赏到的是「西方人对『未经文明玷污的野蛮民族』的概念的偏执迷恋」所带来的骇人战利品。

在皮特．里佛斯博物馆展示的十个干制首级中，有两个是树懒的头，两个是吼猴的头，而在剩下来的六个人头中，三个是专为市场制造的赝品。因此，皮特．里佛斯博物馆其实只典藏了三个真正的人类干制首级，这些文物幽微地诉说着一个关于谋杀行为的故事，那种行为在制造这些首级的社会中获得宽宥，它们具有深刻的精神意涵，在世代的生命轮转中扮演过它们的角色。其他那三个赝品诉说的则是一些无名死者的故事，那些被社会摒弃的穷苦人在死后成为异国情调收藏品交易的牺牲者，跟亚马逊丛林原住民的在地信仰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当我们投入研究其他一些着名猎头文化的歷史，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模式浮现。其中一个例子是纽西兰的毛利人（Maori）。不同于发动猎头袭击的舒阿尔人，毛利人传统上是在部落间发生战争时拿取敌人的首级。毛利人不对战利品首级进行干缩处理，而是把头骨留在里面一起保存。防腐保存专家经常也是部落酋长，他们会把脑部、眼睛、舌头移除，然后把亚麻塞入鼻孔和头骨内，再把头颅跟灼热的石头一起掩埋，让头颅在蒸热或燻制的过程中逐渐干燥。这种称做「妥伊摩科」（toi moko）的纹面头颅通常会被插在短木桩上展示于酋长住家周围，不过最初造访纽西兰的英国人─他们在一七七○年代跟随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一起抵达那里─几乎没有看到什么战利品首级。

第一个取得毛利人首级的欧洲人是约瑟夫．班克斯。先前提过，这名自然学家参与了库克船长的第一次南太平洋探险航行，若干年后，他在伦敦拒绝检查克伦威尔的头颅。在纽西兰期间，班克斯成功说服一名不情愿的毛利耆老把一颗经过防腐保存的人头转手给他，交换条件是一组放家用织品的抽屉。起初老人家收下抽屉，却不肯交出人头，但当班克斯拿起火绳枪「加强恫吓效果」，交易就搞定了。库克船长于一七七○年间两度返回纽西兰，虽然他和手下在当地居留了好几个月，但他们一直没再看到其他防腐保存的人头。

不过慢慢地，随着毛利人与猎捕鲸鱼或海豹的欧洲人接触日益频繁，防腐保存人头的交易开始发展起来，而且跟南美洲的情形一样，毛利人在十九世纪初期对枪枝普遍产生兴趣，于是人头交易迅速勃兴。不久后，专业掮客就从澳洲被派过来挑选最好的人头，雪梨关税局开始把这种进口品列在「烘烤头颅」这个项目下。库克船长初访纽西兰五十年后，人头交易已经高度发展，部落战争随之变得勐烈兇残，当时许多人甚至相信毛利人会因此灭族。

这种人头之所以特别吸引欧洲人，是因为毛利酋长脸上那些精巧的刺青。班克斯曾经提到那些充满螺旋和花式图案的刺青「雅致而精确」，「有点类似凿刻在金银器皿上的枝叶图案；这一切都以大师级品味和工艺水准制作而成」，使用的工具却只有骨凿和烧过的树胶。就欧洲人而言，最好的首级是那些强大酋长的头，那上头的纹面图案最繁复精美，但这种首级也最难找到。

十九世纪初期，市场对纹面首级的需求已经高得离谱，毛利酋长们干脆强迫帮奴隶纹面，然后杀害他们，贩卖他们的首级图利。有些酋长甚至可以让交易商亲自挑选活人，选定之后就替他们纹面，然后杀害并按交易商的需求进行订制作业。毛利人的刺青曾经是一辈子逐步创作而成的精美艺术品，而且见证着男人的勇气、荣耀和社会地位，但自此以

后，它却变成只是以取悦—或愚弄—外国消费者为目的而设计的装饰品。

在纽西兰的欧洲人有时也会遭到杀害，他们的头颅经过纹面处理后，被卖给不知情的母国同胞。有些故事描述先前提到的那些交易掮客，他们从澳洲被派来纽西兰蒐罗最好的人头，结果却遭到谋杀，他们的头经过保存处理后，再以「毛利战士」的名义被卖回澳洲。这一切代表的是，到一八三○年时，被运到雪梨关税局的「烘烤头颅」除了真正战死沙场的毛利酋长以外，很多都是专为欧洲人订制的人头，甚至是欧洲被害者的头。

一八三一年，新南威尔斯州长劳夫．达凌（Ralph Darling）决定採取行动。他立法禁止交易经过保存的人头，因为如他所言：「我们有扎实的理由相信，这种令人作呕的交易，倾向于大幅助长那些以不尊重人命而恶名昭彰的野蛮人进一步牺牲人命。」他制定高达四十镑的罚锾，处罚所有被逮到贩卖这种人头的人，于是忽然间，取得毛利人头变得极为困难（虽然不是不可能）。十九世纪收藏家霍拉修．罗布利（Horatio Robley）曾经指出，人头交易到那时已经使欧洲的博物馆充斥这种收藏，但也「导致纽西兰人口显着减少」。

我们很难否认十九世纪的收藏家非常伪善，他们一方面谴责猎头是野蛮的行为，一方面却又积极蒐罗人头在自家展示。此外，并不只有商人涉及这种阴森恐怖的生意。十九世纪末的其他一些人—尤其是科学家—也被非常明确地鼓励去收集人头及其他人体部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猎头俨然成为一种专业职责。

我举《人类学解说及相关议题》（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这本书为例，这是当时在这个领域工作的英国人类学家使用的标准参考书。一八七四年发行的第一版，提供给收藏家的指导建议中提到，原住民的骨骼及头骨「应该尽可能带回英国」供专家分析研究。此外，如果「在一场战争或其他形式的杀戮之后，能够取得内含软质部分的原住民头颅」，那就应该把它放进瓶子，用酒精或滷水浸泡，然后寄回英国。一八九二年发行的第二版提供的建议更彻底：「一般旅客也可以为科学研究带来显着贡献，若能收集骨骼、毛髪，甚至身体部位，例如手、脚、大脑，乃至整颗头颅，并将其寄送至实验室或博物馆，由专业解剖人员对其性质进行分析，这样就有助于提升［这个领域在］较具技术性的层面上的相关研究。」

这本吁请收集人体部位的书籍是在英国两个地位崇高的学术机构支持下出版的，因此学术界当然乐于照办。科学界似乎愿意原谅各式各样的罪行，特别是当「研究对象」是穷人、犯人或被视为原始的人。收藏家在国外旅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国内恐怕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有些到外国做研究的科学家会趁月黑风高时盗窃古墓。还有些人会到医院太平间偷死人，把尸体从监狱偷渡出来，以货品跟民众交换亲属的遗体碎块，或在发生战事或袭击行动后礼貌地请当地人提供敌人尸首的各个部位。

这种病态的贪婪行为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劫掠行为」本身，因为我们的博物馆中充斥着学者（包括女性学者）骄傲地送回英国本土做进一步研究的死尸。每个新增文物—头骨、人体骨骼、干制首级、干燥皮肤块、保存在瓶罐中的器官—被运到博物馆时，典藏专家都会精心记录，然后决定是否公开展示。翻阅那些登录册是个发人深省的经验，因为那无数页面都是一个个人类生命被化约为文物收购登记表的结果。

- 来自北婆罗洲中部坦加隆的三颗头颅，山打根总督克雷伊（C. V. Creagh）提供。

- 一个以人工方式加以变形的「平板头」头骨，麻萨诸塞州沃斯特克拉克大学法兰兹．波亚斯（Franz Boas）博士提供。

- 一名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的耳朵，乔治．赛恩（George Thane）教授提供。

- 一副由麦克曼恩（C. MacMunn）提供的人体骨骼。

- 一名安达曼岛民的头皮，由安达曼群岛行政总长卡德尔

（Cadel）上校提供。

这份列表取材自皮特．里佛斯博物馆。在欧美各地博物馆的馆藏资料中，都可以找到这种长长的登录表。例如，随意翻阅剑桥大学考古暨人类博物馆的目录，就会看到一块毛利人的脸部皮肤，数颗来自索罗门群岛的人头，一颗保留了头髮的砂拉越（Sarawak）10战利品首级，「一颗经过保存处理的马来人头颅」，五名南美洲人的干制首级等。

在这类登录册中，无以数计的人在死后被转变成科学研究物件。令人心惊的是，收藏者的身分被记载的精确程度远超过他所收集的死人。那些死人的真实名字早已被忘记，但死人被运抵博物馆后，会获得新的名衔，例如「蒙古人种」、「衣索匹亚种」、「短头型」（圆头型）、「长头型」、「纤细体型」、「粗壮体型」等。他们被量度、清洗、贴上标籤、黏合、涂上颜料及亮漆；有些被固定起来展示，有些则被切割送去研究。他们被挂在玻璃柜中、摆在桌上，让人描绘、描述，或被装箱运到演讲现场，让一群衣冠楚楚的人搬过来挪过去，互相辩论人类演化理论的细节。随着年月过去，学者们经手的「样品」数目逐渐多到无法计算。

假如把博物馆比拟成科学界的新型大教堂，这些圣堂内的尸骨贮存所无疑迅速地被填满。十九世纪期间，由于考古学者、医学人员、人类学家急于找到扎实的证据来佐证他们的理论，不断到各地蒐罗愈来愈多的资料，造成博物馆收藏的人类遗骸大幅增加。那些人蒐集到数以千计的人类遗骸，而今天的博物馆典藏专家持续照护那巨量的文物。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英国各地文化机构典藏的人类遗骸总数超过十万具；而在美国，获联邦资助的机构光是美洲原住民的遗骸就收藏了超过二十万具。这个文化遗产是名副其实的庞大。

在维多利亚时期这种孜孜不倦的蒐集大行动中，科学家的举动只有在极少数时候会受媒体注意，然后引起公愤，使人质疑科学活动的合法性。一八九○年代期间，一个这样的故事成为报纸头条，主角是詹姆士．詹姆森（James Jameson）。他是一名收藏家、大型动物狩猎者、科学家、探险家，在此不久之前刚辞世。詹姆森曾经以自然学家的身分参与亨利．史坦利（Henry Stanley）万众瞩目的「赤道非洲艾敏帕夏救援远征」（Emin Pasha Relief Expedition to Equatoria）11，他盼望能在刚果地区採集到各种动植物样本，不过远征生活的艰苦现实很快就使他的梦想触礁。他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长距离奔走，设法协商聘雇当地挑夫的事宜。根据后来出现在报章中的一些报导，以及目击证人经过宣誓的佐证，有一次他为了替单调乏味的宿营生活制造点乐子，不惜採用最残酷的娱乐方式：詹姆森被控付钱给非洲士兵，请他们在他面前

杀害一名女孩，加以肢解，然后把她吃掉。

据说詹姆士．詹姆森坚决要亲眼看到食人行为，而且他在目睹那个过程时，手上还抓着素描本。他对残忍行为的高度兴趣不仅止于此。据说他还曾把一名非洲男子的头颅送回英国—不只是「单纯的头骨」，而是经过填塞的头部和颈部，包括完整无缺的皮肤和头髮—然后把它装在玻璃柜里展示于自家。那颗头颅应该属于某个远征队员熟识的人，他后来遭到「一个阿拉伯人」杀害。詹姆森请人砍下那个人的头，放进盐包中，然后装箱运回英国。回到英国以后，他委请罗兰．沃德（Rowland Ward），在伦敦名号响叮噹的皮卡迪利标本制作公司12把它做成标本。但这家公司显然比较擅长制作大型动物战利品标本，对人头这个新的业务领域可能比较不在行，在技术上难以尽善尽美。总之，詹姆森夫人曾经抱怨在某些天候状况下，那颗头颅会散发出令人不舒服的味道。

此时詹姆森已经不在人世，因此无法亲自辩驳那些针对他所做的指控。他在非洲死于热病，他的手下后来才跟史坦利的远征队一起返回英国。现在他只能靠夫人负责反驳报章中提出的控诉，于是夫人决定把丈夫的书信集结出版。詹姆森在信中提到自己相信食人表演的提议只是个玩笑，但这个说词的力道非常薄弱。詹姆森为了观赏这个表演，确实付了六条手帕的价钱，显然他并没有採取任何行动阻止那名女孩的死亡（「我这辈子亲眼见过最恐怖的景象」）。而虽然他没有把现场情景逐一画出来—他说他没办法画图，因为当时他手中并没有素描本—不过当晚稍后他还是在营地里画了六幅画，描绘女孩之死。此外，詹姆森夫人对那个头颅标本的问题一直保持缄默。

詹姆森的故事被公布在一八九○年十一月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各界在惊恐之余，一片愤慨。那年四月，史坦利才以民族英雄之姿载誉归国。他以远征为主题出版的《在最黑暗的非洲》（In Darkest Africa），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他荣获各种奖项、四处演讲、出席盛会、获颁荣誉学位。如今却彷彿风云变色。史坦利的「后卫纵队」被控淫乱、缺乏组织、叛逃。消息指出他的副指挥官艾德蒙．巴特罗（Edmund Barttelot）在介入一场当地庆典时遭到枪杀，其他团员则四散奔逃。随着「刚果暴行」公诸于世，詹姆森的荒唐行径成为暴行的象徵：鞭笞、限制进食、屠杀当地人的故事持续传播了许多个月。一名《泰晤士报》特派记者沉痛地做了以下思索：「确实，《在最黑暗的非洲》中那些行旅人的行为黑暗得无以復加。」为了满足变态、残忍的好奇心，詹姆森滥用了职权。

詹姆森的病态兴趣引发一些令人不自在的问题，质疑「原始」和「文明」这个简单二分法的合理性。我们看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

堂堂的科学家，他参与一场高规格远征探险，其宗旨在于声张欧洲对愚昧无知而又难以驾驭的非洲人民的控制权─那既是在执行一项战略任务，也是在演出一齣剧码。结果事实证明他是个恶魔。在兴致勃勃的欧洲收藏家手中，战利品首级似乎暗示着一件事：所谓文明人和所谓野蛮人之间终究存在着各种令人不安的共通性。

史坦利的另一名部属宣称詹姆森当时曾经公开谈论那件事，一直要到很久以后，他才开始明白该行为的「严重性」。「在中非地区，生命非常廉价……詹姆森先生忘了国内民众对这件可怕的事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詹姆森这个「热血的自然学者」居然需要别人提醒，才明白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个人。

詹姆森凑巧对狩猎兴趣浓厚，他毕生收藏了许多大型动物标本，一八八八年他去世后不久，那些战利品就被拿出来在伦敦展示。展品除了他打死的羚羊、鹿、白犀牛、野牛的头，还有他在刚果获取的「战利品」，包括祭典用的匕首和刀、一个「令人反胃的」用完整的人类头皮制成的头饰，以及一条用人类牙齿串成的项鍊等。负责展示这些收藏的是罗兰．沃德公司（就是后来被发现曾经帮詹姆森制作人头标本的那家公司），当时《泰晤士报》介绍这个展览时，还说它具体见证了詹姆森对科学的伟大贡献。从以上叙述看来，人头的来源不同，显然就会被认为本质也不同。收集其他人用人头制作的物品（尤其是当那些其他人是「低等野蛮人」时），跟亲自委託别人把人头制成工艺品是两码子事。前者被视为文化上的好奇心，后者则是滥用权力、侵犯道德。

詹姆士．詹姆森的野蛮行径之所以分外令人惊愕，也是因为它把一般人对原始民族的兴趣带向无比恐怖的极端，尽管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詹姆森的残暴源自他的好奇，而许多英国人也同样有那种好奇心。确实，《泰晤士报》特派员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听到詹姆森的罪行时，都不禁「惊恐万分地抬眼问苍天」，但当媒体宣布西敏水族馆举办表演，请「一群来自中非的食人族杀害一个同类生物并将他吃掉，一天两次」，那些人中又有多少人会忙不迭地抓着一先令钱，挤向街头朝那里奔去呢？

这并不是个夸大其词的问题。在当年的国际展览和巡迴表演中，展示活生生的「野蛮人」给付费民众观赏是司空见惯的事。位于席登汉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13就是一个向民众展示「土着」的热门地点。这种展演活动都经过精心策划，务求让那些土着表演一些「典型」的活动，例如狩猎、跳舞、制作陶器，乃至更戏剧化的战争、食人、猎头等情景。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期，也就是詹姆森的故事成为头条的年代，主办单位为了增加收入，开始推出一些更惊人的表演，其中许多纯属幻

想的产物。一群于一八八○年代中期造访英国的澳洲原住民是这样被介绍的：

澳洲食人族男女（由康宁汉指导）。这个奇异、野蛮、面容损毁、残暴至极的族类生活在遥远的内陆荒野，他们在那里进行无止无境的血腥厮杀劫掠，并取对方的肉大快朵颐。他们是最低等的人类，他们的奇特无疑也最值得我们观赏。现在我们将为国内民众带来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捕捉到的这个族类。

他们声称演出具有教育意义，但这种表演只是在满足并延续欧洲人的偏见。虽然有些表演者乖乖接受他们被迫扮演的角色，但许多人决定反抗；有些人逃跑，有些人遭到虐待，还有些人在这片异国土地上感染疾病死亡。但就连死亡也不能保证获得解脱。土着的骨骼、身体部位、铸型、塑模非常受民众青睐。一八二○年间一名毛利男子于欧洲巡迴演出期间忽然死亡，他的头被保存了起来，并固定在他的身体模型上，于是他可以继续说服民众「他真的吃过人，因为他看起来确实就是那副模样」。至于欧洲人展示「猎头者」的头这种充满矛盾与讽刺的行为，却没有人特别留意。

尽管《泰晤士报》的读者想到詹姆森在自家展示人类头颅标本时会觉得噁心，商店及拍卖公司却经常把来自厄瓜多尔、印度、纽西兰的人类首级当成异国珍玩销售。美国工程师弗里兹．厄普．格拉夫写过一本内容暧昧的畅销书，描绘他在厄瓜多尔的生活。他在其中一段文字中宣称他曾加入一场猎头袭击行动，期间他把自己的大弯刀借给身边那「一大群嗜血而淫荡的疯狂恶魔」，让他们用来杀害一名女子并夺取她的头。这样的内容不但没有为他带来争议，他的出版商甚至骄傲地宣传「本书作者亲身经歷过猎头行动，以及其他种种大胆、独特的冒险」。学术界也针对这个主题出版了不少论文，例如人类学家艾弗瑞德．寇特．哈顿（Alfred Cort Haddon）于一九二三年撰写的〈新几内亚人头标本〉（Stuffed Human Heads from New Guinea），文中针对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八个人头标本进行鉅细靡遗的比较，然后对那些标本的意涵做了简单的论述：那是战利品、纪念物，抑或是响具？报纸上没有出现关于这些人头标本的论战。

哈顿收集头骨时没有实际杀害任何人，但他是个经验老到的人头收藏家，而他的活动并未受到学术界或媒体的谴责，因为那些人头一点都不稀罕—大多数的人类学家都说得出几个自己在国外「猎头」的事蹟。哈顿被视为英国人类学的开山祖师之一，因为他在一八九八年组织了第一次专业人类学田野调查之旅，目的地是托列斯（Torres）海峡14及婆罗洲。那次远征探险期间，哈顿「非常焦急地希望取得一些人类头骨供

剑桥收藏」，于是他无论到哪里都会问有没有人头可拿。在托列斯海峡中的梅尔岛上时，居民不肯顺从哈顿的要求，因此哈顿不断用洋泾滨的英文跟他见到的所有人说：

我的好朋友，假如你帮我找到死人的头，我不会说。假如你抓到他，我不知道你抓到的他叫什么名字，那是你的事。我何必给你制造麻烦呢？

哈顿提出的价码是每颗死人的头六便士，后来他还算顺利地买到一些人头。有一天发生一件他觉得很好玩的事：一名年轻女子碰巧听到其中一件交易的细节，当她听见那名死者的名字时，她「露出相当诡异的神情」，后来哈顿得知那个骷颅头「原本属于那女孩的叔叔！」这名白种男子就是这样猎取人头的。

哈顿在托列斯海峡和婆罗洲旅行期间不只是买人头，他也买了所有跟猎头有关的道具：他买当地人用来把头切断的刀子、用来吊人头的绳子，以及把人头扛回家时用的吊索。他经常提出关于猎头的问题：为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事？他们上次猎头是什么时候？他们是怎么进行的？有心监管这类习俗的殖民官员也都会问这类问题。哈顿也花很多时间把当地人集合起来，测量他们的头—记录人头大小是让当时的科学界特别着迷的一件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想而知那是相当令人神经紧绷的经验。

哈顿造访婆罗洲时，当地王侯和治理他们的殖民政府已经因为猎头行动的事互相纠缠了好几十年。许多时候，政府为了获得政治及军事支持，会对当地人的猎头行为表示宽容。与王侯结盟的部落可以获得猎头的机会。举例而言，一八五七年婆罗洲伊班（Iban）族协助王侯镇压古晋的华人叛乱，于是他们就可以大喇喇地在镇上的市集里干燥处理人头。一名欧洲观察者写道：「蒸煮人头是这整件事里最令人作呕的部分，而且它让我们非常强烈地感觉，这一切都只是一群野蛮人被叫进来处罚另一群野蛮人。」这段话足以描述接下来整个十九世纪的殖民统治：猎头是被禁止的行为，而且会遭到严厉处罚，只不过事实经常并非如此。一八九四年，原住民族群与殖民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猎头视为非法行为，但间歇性的袭击行动及部落战争依然持续发生，直到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和平典礼在砂拉越举行为止。

在此之前，殖民政府官员一直无法根除猎头行为，而且经常被迫搓入族群间的政治冲突。负责在哈顿居留婆罗洲期间接待他的殖民官查尔斯．荷兹（Charles　Hose）记得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他在一八八○至一八九○年间如何设法在猎头族群之间维持法治。当一名无辜的

华裔商人无端遭受攻击并被杀害，而且头颅被夺走，荷兹觉得他必须採取行动。被控攻击的男子名叫廷宜，他接到传唤但没有出席，于是荷兹请邻近部落的人把他和他的同伙找出来，设法把他们活捉到案，但「如果无法顺利这样做，那就直接把他们处死，再把他们的头带回来」。

我们不清楚荷兹要廷宜的头是为了个人理由，为了证明正义已经达成，还是他对当地习俗表示认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提供某种奖赏给跟他配合的族人，也就是让他们猎取那些头颅。无论原因何在，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殖民政府官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煽动或饶恕猎头行动。问题在于—如同荷兹后来所言—「如何让贤明的压制作为和领土的自由发展兼容并蓄」。殖民官的权力有实际上的侷限，他被迫捲入当地政治，不得不尽力玩好那场游戏。不久后，廷宜被人找到然后枪毙（用的是荷兹提供的枪）。刷！刷！他的头被切了下来。

廷宜的死几乎点燃不同伊班族群间的全面战争，不多时，荷兹居然成为一支五百人战斗群的一员，他们执意要猎取人头。这次他成功避免流血情况发生，因为敌人顺利逃进了丛林，但无可讳言的是，猎头构成当地族群间关系动态的一环，他身处于那种文化中，必须不断努力设法达成自己设立的目标—建立法治社会、抑制猎头袭击的行为。反讽的是，他致力于处分猎头者的结果，反而很容易导致暴力攀升。

荷兹自己也透过婆罗洲的猎头袭击行动，累积到相当可观的私人人头收藏，其中一百一十二个目前是剑桥大学达克沃斯典藏（Duckworth Collection）的一部分。像荷兹和哈顿这样的男性（以及少数一些女性）是以理性知识的名义收集人头。他们对人头进行测量、比较、建立档案资料，这些活动在当时都被视为合理而且值得赞扬，因为他们正在用一种他们无法用来理解自己的方法去设法理解原住民，而上述工作是这种方法的首要步骤。许多早期人类学家出自医学界，他们原本就很习惯处理尸体，以及把尸体视做科学标本，供比较之用。哈顿和荷兹都有动物学的背景，他们在文化方面的研究可说是从他们对自然史的兴趣延伸出来的。他们正在对一门「人类的科学」贡献一己之力，并且对他们的研究主题产生了专业的执着。

当猎头习俗被用来定义「原始人类」的低劣状态，收集其他人的头颅却强化了「文明人类」的文化优势。就某些方面而言，原始人和文明人驻居于不同世界，即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比邻而居。殖民者回到祖国以后，必须把他们的经验转译成同胞能够理解的故事。就连哈顿和荷兹这种名声显赫的人，有时也无法克制地把自己在国外的生活描绘得彷彿像出自《男生冒险》（Boy’s Own）15的故事情节：刷！刷！廷宜那小子就这样人头落地！

当然，收集猎头战利品和制作这些东西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些英国科学家都不曾自己动过刀子，就连詹姆森也不例外。斩首行为的极端残暴使「他们」与「我们」截然不同，于是这便成为某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文化差异符徵。猎头行为高度体现「野蛮社会」的道德侷限。猎头者在媒体中被定性为情绪化的人，无法或不愿承认他们的行动牵涉到的伦理意涵。部落民族受到卑劣的好战本能驱使，那种本能强大得令他们无法招架，他们甚至可能在自相残杀中面临灭绝的危险，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自身先天冲动的牺牲品。与詹姆士．詹姆森不同，他们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才是好的。

猎头的意象促成一种更深层的二元切割：「野人」和观看他们的「高雅」民众。这种二分法在十九世纪后期甚嚣尘上。一种深植人心的贬低性偏见，在数百年间一直形塑着欧美人呈现外国文化的方式，造成那些参观博览会或博物馆的人，习惯以对立的方式将自己与他们去看的那些人区别开来。以安全距离—在表演台上，在书册杂志的页面中，在玻璃柜里，或用绳索围出护栏—被展示于众人眼前属于「原始野蛮人」的幻想奇观世界，它体现的是不属于中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虽然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现在的我们在观念上已经比那时的人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或许我们还是应该稍微回头看看皮特．里佛斯博物馆中陈设的干制首级。今天我们跟博物馆中的「参萨」相遇时，那个过于随便的二分法依然迴盪在我们的周遭。

二○○七年间，媒体上出现错误的报导，说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考虑停止展示干制首级，民众看到消息以后立刻表示不贊成。「皮特．里佛斯博物馆之友」协会发言人表示，干制首级是该馆「头号展品」，而且深受儿童喜爱，如果被撤下，小朋友们会很伤心。以皮特．里佛斯博物馆为灵感创作的童书《魔法神刀》（The Subtle Knife）作者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也希望那些人头继续公开展示。有趣的是，菲力普承认展出人头可能被认为很「残忍」，但他同时也相信那些人头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物件，而非塑胶复制品。如笔者在引言中所提，几个月之后，艺术家泰德．迪万提议把自己的头送给博物馆做干缩处理，并希望它能成为「家庭友善」的展品。「对我而言，皮特．里佛斯博物馆是个激发无尽灵感、奇妙而神圣的地方，」迪万写道：「做为一个具有伦理敏感度的机构，它荣耀了各个原住民族的信仰体系，包括那些最不为人知的族群，因此我深信贵馆不会以差别态度看待我的信仰体系。」

迪万的提议被馆方婉拒了。但是，假如迪万的头真的按照他的希望被干缩处理，展示在皮特．里佛斯博物馆中，我们会有什么感觉？那些

携家带眷到牛津欣赏干制首级的人，假如他们看到博物馆展出一整柜年代不超过一个世纪的欧洲人首级，他们会有相同的反应吗？如果他们的反应不一样–如果一整柜欧洲人的首级令他们难以承受–这可以为展示南美洲人的首级在伦理上的意涵下什么样的註脚？博物馆毕竟是个以文明自居、以教化为宗旨的机构。它对它所代表的人，对它照顾的人负有责任，必须为他们创造充满敬意与教育意义的展示方式。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说展示干制首级是不文明的事，这样做必然属于野蛮行为，这种说法也太过简化。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确实有很好的理由将它的人头收藏妥善陈设在玻璃柜中。舒阿尔人或阿丘阿尔人并未要求馆方撤下那些首级，或将它们归还给南美。事实上，舒阿尔人参观其他一些博物馆–特别是纽约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时，从未表示有兴趣把「参萨」要回去。他们–至少是上述这些舒阿尔访客–反而觉得典藏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参萨」，可以为他们的族人与纽约市的居民建立起重要的连结。如果舒阿尔人不介意看到那些干制首级被展示在博物馆，那么或许我们也不应该介意。出问题的可能不是「参萨」被展示出来这件事，而是它向前来观看的民众发出什么样的讯息。

当然，舒阿尔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原始野蛮人」，他们从来不曾这么认为，因为那是一个来自外国的标籤，一个来自外国的建构。就某方面而言，它与舒阿尔人无涉，而与我们自己完全相关，也就是我们是怎么看待他们，以及我们是怎么透过与他们的相对关系来看待自己。今天，许多舒阿尔人以养牛、经营牧场维生；从前的舒阿尔人则是男性出外打猎，女性在自家农园种植蔬食。二○○三年前往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参观的舒阿尔人是在纽约市生活、工作的移民。当他们看到博物馆中展示的「参萨」，他们不是把「参萨」想成自己的一部分，而是把它想成不是自己的那个部分，因为猎头者当然不是现在这些已经是纽约居民的舒阿尔人，而是他们的祖先。舒阿尔人的猎头袭击在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受到全面压制。对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干制首级代表了舒阿尔人，但对舒阿尔人而言，干制首级却只是他们的民族歷史中的一小部分。

博物馆有责任说明死者的故事，并以理性、有意义的方式呈现其他文化，将其视为同一个全球化现代社会的组成元素。考古学者梅兰妮．贾尔斯（Melanie Giles）曾经提到，她在研究铁器时代「泥炭沼尸」（bog body）16时领受到一种道义感。那些沼尸有一部分也是被斩断了头。她写道：「只有设法臆想那些暴力事件的歷史与环境脉络，我们才能开始将其理解为不是化外或野蛮的行为，而是富于意涵–即便残暴–的策略，那是人在社会出现危机时採行的办法。」与其维持那些老旧的殖民时代分野，继续把自己摆在安全护栏之外，我们应该探索那些「参

萨」开启的种种空间。

舒阿尔人首级以及其他展示于博物馆中的人头依然在活人身上施展力量，依然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可以让人再度停下脚步思考。这些干制首级有助于打破刻板形象，挑战人们对所谓原始风俗的假定。「参萨」并不是它们表面上的样子。它是源自欧洲／北美人与南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而它既与舒阿尔人和阿丘阿尔人的歷史有关，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歷史。如果「参萨」要继续留在牛津展示，这就是它应该发挥力量之处。它能帮助我们面对数百年间外国势力与南美洲文化交手的复杂情境。它也可以用来打破一般人认为这种文物是战利品的迷思–因为「参萨」确实并非战时掳获的战利品。此外，它还有助于矫正一个长年的错误观念，认为当我们在英国的博物馆中隔着玻璃观看干制首级时，它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上述讨论的末尾，我们可以思索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民众对外国人又有哪些刻板印象呢？「他们」心目中的「我们」是什么样貌呢？无庸置疑，他们把我们视为猎头者。由于欧洲和北美收藏家在旅途中花了很可观的时间寻求人头，其中许多人甚至不辞辛劳、披星戴月地挖开坟墓，盗取死者头颅，「白人」在某些地方荣获猎头者的名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在印尼某些地区，「外国人」会让人联想到危险和邪恶势力。一百多年来，婆罗洲、爪哇、苏拉威西各地村庄中谣传着一些故事，说夜里有人会偷偷摸摸地四处搜寻人头，或政府会派一些外国人绑架儿童，然后把他们的头埋在新建道路或桥梁底下加以巩固。在二○○六年五月间，一家石油公司在东爪哇钻探天然气时意外导致泥浆爆发，当地随即开始传言说政府在蒐罗小孩的头颅，要把它们丢进喷发口，以阻止泥浆继续喷涌。民众说政府需要数以千计的人头。有些传闻指出田里和医院里有许多无头尸体，还说许多小孩从摩托车上被绑架或抢走。有些民众干脆不让小孩上学，或决定天天陪他们上下学，不让他们独自在外面行走。

这种谣言并不是新鲜事。一八九○年代，马来西亚砂拉越地区流传一些故事，说政府派干员夺取人头，埋在一座新水坝的地基里，而这些猎头者中有些人被吓坏了的村民杀死。随着政府到处兴建道路和桥梁，类似的吓人故事在二十世纪期间也一直非常普遍。印尼弗洛勒斯（Flores）岛的老一辈居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在汽车非常稀少的一九五○年代，他们只要听到汽车的声音，就会赶快冲进屋子里，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过他们，汽车里载的都是些四处蒐罗小孩头颅的猎头族。

欧洲人三不五时就会被描绘在这类故事里。传教士经常发现自己成为当地人猎头恐慌症的核心因素。有人说神父会拿药给民众吃，让他们死掉，然后挖出他们刚被埋掉的尸体，砍下头颅。一九六○年代，一名在弗洛勒斯岛服务的神父习惯坐在教堂里一直祈祷到深夜，但当地居民以为他是在等待被害者出现。于是他们不但不肯上教堂，还开始传说有人在三更半夜看到神父提着小孩的头颅在村子里走动。最后那位神父被调到另一个教区，他的继任者则被告诫说最好不要那么虔诚。后来的神父也被告知不要在夜间单独行动，就算非不得已，也要记得提灯笼、高声唱歌，以免被误会为恶灵。

直到今天，在印尼东部的松巴（Sumba）岛，仍然有人传说外国人会携带金属盒，开白色货车，里面装满婴儿的血、脂肪、头颅和身体部位，他们用这些东西发电。七、八月份的外来入侵者最让人惧怕，因为那段时间既是观光旺季，也是传统上举行猎头袭击行动的时候。最近二十年来，「冒险型」背包旅游愈来愈受欢迎，电力也日益普及，因此外来游客人数逐渐增加。讽刺的是，外国人到松巴岛旅游度假是为了体验传说中那个既原始又遥远，而且具有潜在危险性的部落文化，而与此同时，松巴岛民却认为外国访客看起来像勐兽、他们的毛髮散发独特而难闻的气味，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会用他们的「金属盒」（相机）装着小孩的血液离去。

无论过去或现在，猎头的概念一直是印尼民众用来理解外地人的方式之一，特别是那些会让他们联想到技术（例如汽车、相机、电力、道路、桥梁、机械等）的外地人。这些外国人有钱，有时他们会施展「奇蹟」，但这也代表他们具有潜在危险性。人类学家的理论是：「外国猎头者」的概念是对国家力量入侵、政治自主丧失的一种反应。在殖民时代，外来殖民者取得对传统猎头行为的控制权，并为自己赋与实践这种行为的权利。现在，这些殖民者化身为猎头族。他们有权使用武力、处罚、治理，甚至随心所欲的夺取头颅。因此，猎头已经成为外国支配原住民文化的象徵，也是村庄的力量被挪用来强化国家统治的方式之一。

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学者及政府官员设法说服原住民臣民，说他们的故事没有根据。但这种谣言无处不在，非常难以扑灭，特别是当歷史证据对那些外来者不利时。猎头透过它的所有存在形式，不仅形塑了受殖民统治者的歷史，也塑造了殖民者本身的歷史。

9 译註：火药阴谋是一群英格兰天主教极端分子于一六○五年策划的一场攻击行动，他们试图炸毁英国国会大厦，杀害正在其中主持国会开幕仪式的詹姆士一世、他的家人，以及众多新教贵族，但计画并未成功。

10 译註：也常译为沙劳越，位于婆罗洲北部，曾是英国殖民地，现为东马的一部分，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邦。

11　译註：一八八六至一八八九年的「赤道非洲艾敏帕夏救援远征」是十九世纪欧洲最后向非洲内陆发动的远征探险行动之一，主要目的是救援当时受到伊斯兰马赫迪派（Mahdist）部队包围的英属赤道地区（Equatoria，现今苏丹南部及乌干达北部）总督艾敏帕夏（一八四○至一八九二年）。艾敏帕夏是一名鄂图曼–德国医生及自然学家，一八八六年获鄂图曼帝国授与「帕夏」（高级文武官）称号。

12　译註：由当时的知名标本制作师、自然史书籍出版商罗兰．沃德（一八四八至一九一二年）所开设。

13　译註：水晶宫是一栋以铸铁和玻璃打造的大型建筑物，一八五一年建于伦敦海德公园，做为当年举行的第一届万国博览会的主展馆，高度象徵工业蓬勃发展的英国国力。由于大面积使用玻璃，空间通透明亮，故名水晶宫。赴英考察的清国官员曾赞嘆：「一片晶莹，精采炫目，高华名贵，璀璨可观。」博览会结束后由财团移建于伦敦南郊的席登汉，一九三六年毁于大火。亲临现场目击火灾的邱吉尔首相表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14　译註：托列斯海峡位于澳洲昆士兰最北端与新几内亚之间。

15　译註：《男生冒险》是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英美地区一些报章杂志的名称，这些刊物锁定男性青少年，以阳刚冒险故事为主，旨在提供娱乐并培养男性气概，是性别特定刊物的始祖。这个概念衍生自一八二八年出版于伦敦的《男生自己的书：男孩及青年运动、科学、休闲等娱乐活动百科大全》（The Boy’s Own Book: A Complete Encyclopedia of all the Diversions, Athletic, Scientific, and Recreative, of Boyhood and Youth），该书有别于早先强调伦理道德的青少年养成书籍，甫推出即令英美年轻人趋之若鹜。

16　译註：泥炭沼尸是指在泥炭沼泽中获得天然保存的人类遗体，已知实例包括一万年前到二次大战时期的尸体。多数沼尸为欧洲北部出土的铁器时代尸体，据研究主要可能是人祭仪式中的牺牲者。

第二章
战利品首级
TROPHY HEADS



一九四五年，猎头行为在印尼婆罗洲中北部山区短暂復甦。这次人头被猎取不只是因为古老的部落传统，而是藉由全球性现代战争的名义。

日本在一九四二年初开始占领婆罗洲。一九四五年六月，澳洲部队准备对日军发动最后攻击时，困惑地看到当地部落居民将日本人的头颅送到他们的营区当做献礼。一名澳洲士兵在日记中写道：

一名迪亚克人［部落居民］从图通河地区来到C连队，他报告说几天前一支十八名日本鬼子组成的队伍去到他们村庄，请他们派嚮导带他们到图通。结果有三十六名迪亚克人和十八名没了身体的日本鬼子抵达了目的地。迪亚克人提议把人头送给C连队，不过他们说希望先把那些头留着，因为他们有庆典。他们获准保留人头。

我们可以推测，那些澳洲人相当高兴可以不必收当地人用来表示支持的特别礼物，不过他们也不打算拒绝迪亚克人的协助，不管那些人採用的方法多么令人嫌恶。殖民政府在几十年之前就已经把猎头明订为非法活动，也已经在二十年前成功将它根绝。但忽然间，迪亚克人又开始夺取人头。澳洲部队不知道的是，那些猎头者之中，有许多人的武器都是由在丛林地区祕密作业的英国和澳洲特工所提供的。

三月和四月间，三组同盟国情报工作人员靠降落伞进入婆罗洲中北部丛林地区，他们不太知道到底会在那里发现什么。这项「瑟慕特行动」（Operation Semut）的任务是蒐集日军在婆罗洲驻扎地点的资讯，以及取得原住民对同盟国军事行动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地居民已经忍受连续三年的粮食短缺及日本人的重兵宰制，因此他们急于报復。他们热烈响应瑟慕特行动，于是这项情报作业很快变成游击战，由原住民战士充当游击队员，同盟国人员则在某种程度上负责提供武器和指挥协调，目的是骚扰及攻击敌方。

瑟慕特特工分成小组作业，他们会在日本人从事日常活动—例如在营区烹煮食物、在森林中行进，或在河边把补给品装上船—时发动伏击。一名英国士兵记得，当时日本人根本来不及在丛林中就防御位置，游击队员就会忽然从树丛中冒出来砍掉他们的头。游击队使用的武器是他们自己的「帕朗」（剑）和「松皮特」（吹矢枪），因为同盟国的武器迟迟不到，弹药也非常缺乏；况且，短短几个小时的训练不足以让那些迪亚克战士成为技术高超的枪手。他们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砍人的头，而且有些军官明令禁止猎头的行为，不过在部分丛林地带，猎头成为同盟国抗日行动的一环。

有些同盟国士兵顶多只能旁观当地战士的热情投入。据说有时同盟国的指挥官都还在基地计划攻击行动，部落战士就已经展开猎头袭击，他们热衷参战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比尔．苏崇（Bill Sochon）上尉记得以下这个情景：「我们正在设法了解那些热血沸腾的土着，这时更多的迪亚克人从丛林中现身，其中行事比较低调的会客气地把那可怖的战利品收进袋子里。那些东西是他们战力威勐的证据，当他们把袋子翻过来一倒，人头就哗啦哗啦滚落一地。」

在这类情况中，指挥官很难劝导士兵不要拿人头，况且有时他们也不适合这么做。许多同盟国士兵可说是猎头袭击行动的同谋，即使他们自己并没有挥「帕朗」砍头。部落战士夺取人头时，他们是负责领军的人，因此他们亲眼目睹了日本战犯和伤兵被砍头的景象。如同C连队的澳洲士兵，他们也接受用人头宣誓效忠的做法。有些士官兵会以贵宾身分受邀参加突袭行动成功后举行的传统猎头庆典；有些人会把人头当礼物送给邻近部落，藉此建立联盟；还有些会喜孜孜地拿着被烟熏过的敌人头颅摆姿留影。在某些丛林地区，人头成为一种战争货币，可以用来结盟或提高士气，于是殖民政府在数十年间对这种「原始野蛮行为」的严厉管制暂时被抛在脑后。

土着的残暴行为使某些同盟国军人惊恐万分（例如有次一名澳洲军官看到一具马来犯人的无头尸体被摆在地上，他差点没昏过去），因此他们会坚决禁止猎头行为，但有些人似乎接受它是军事任务中无可避免的一环。而且会这么认为的不只是他们。二次大战期间，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盟军对于战利品首级可说已经无感。在许多情况中，夺取日本人头颅的并不是岛屿原住民，而是盟军自己。

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事期间，不难看到人头被展示的情形。在新几内亚及索罗门群岛，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侃侃而谈骷颅头或被切断的首级。骷颅头会被挂在公告栏上，或绑在美军的坦克或军车驾驶舱前方，当做阴森版的公仔。

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岛17上，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开车经过一条美国人盖的新公路，路旁是成排的木桩，上面插着日本人的头颅。那些头是在推土机开挖出浅层坟墓以后被取出来放在公路两旁。根据美国战区记者麦克．莫里斯（Mack　Morriss）的记载，在瓜达坎纳尔（Guadalcanal）岛18上，一处工程帐篷中央摆了一个骷颅头，骷颅头被固定在竿子上，上面戴了一顶钢盔，钢盔正面用英文写了一排字：「东京制造」。

我们很难知道太平洋战争期间有多少人头被当成战利品。根据一份法医鑑定报告的估计，在一九八四年从马里亚纳群岛运回日本的一批日本阵亡将士遗体中，百分之六十没有头。一名在二战结束后数十年间定期前往硫磺岛为死难者举行慰灵仪式的日本教士也曾指出，许多遗体的头都已经不见了。撷取战利品的行为相当普遍，以至于美国海军的指挥官早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就威吓士官兵，假如他们拿任何敌人的身体部位当纪念品，将遭致「严厉的纪律处分」。在美军返国的门户—夏威夷，海关人员会例行性地询问士兵他们的包袋里是否有骨头，而且海关人员不只一次在搜查过程中发现这类战利品，包括两个「绿色」的日本人头

骨。士兵上战场时大都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并且把它视为那种特殊情况下无法避免的事。参战几个星期以后，他们都看过更可怕的东西。

「搜猎纪念品」或「战地洗劫」的行为无所不在。「如果日本鬼子以前不知道，现在他们一定知道美军是为什么而打了—为了纪念品，」一名美军向莫里斯开玩笑地说：「他们会在空中向日本人射击，然后日本人往下跳，不过他还没正式落地，大兵们就已经忙着上下其手，从他身上搜刮纪念品。」这不是胡诌，有时候美军等不及被害者断气，就开始搜刮他的口袋和包袋，把枪、刀、旗子、头盔、照片、身分识别牌等统统拿走；这还不打紧，他们拔出他的牙齿，有时还会切下他的耳朵、手指，偶尔甚至连头颅都不放过。曾经在贝里琉（Peleliu）19及冲绳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尤金．史雷治（Eugene Sledge）写过一本极为着名的战争回忆录20，他在书中描述士兵在战斗结束后「洗劫」被害者时多么有效率：他们会「互相炫耀、比较，经常交换战利品……那不单单是纪念品搜猎或掠夺死亡敌军，那根本就像印第安战士在剥人的头皮」。

一直以来，战场上都会发生形形色色的战利品猎取行为，而「收割」牙齿和手指是其中的一个极端。比较常见的战利品是取自死者身上的钮釦、肩章、徽章、钢盔等。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人对日本纪念物的需求很大，不光是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军人，美国境内的民众也一样。有一名军人记得他的工作是「材料督察」，他的职责是每星期走访驻扎地区的所有军事单位，收集纪念物运回美国。有些在前线搜刮的军人特别会打赚钱的主意。一名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的狄恩．莱德（Dean Ladd）表示，他曾看到一艘载满陆战队员航向夏威夷的舰艇摇身一变为「海上工厂」，大兵们忙着制作小型日本国旗，或用柳橙箱的木头制作假的日本军人兵籍牌，然后运到美国贩卖。

日本国旗及身分辨识牌比阵亡将士的身体部位常见得多，不过军人收集敌人牙齿的举动也不稀奇。夺取人体战利品的行为在太平洋战争，以及后来的韩战和越战期间大行其道，因为小型巡逻队在林相茂密的战地中特别有机会搜刮到东西。人体战利品的存在也透露出那些军事冲突的具体样貌，暗示着短兵相接、面对面厮杀的战况，在那里，胜利者必须具有过人的体能和精神力量。胜利者的经典形象是在战场上高举敌人头颅，这个画面呈现的张力源自于它反衬出战斗的激烈性质，因为敌我面对面实际交战的结果不见得会跟这个意象一样。在战争中，丛林迫使士兵和同袍们分开，让他们跟敌人近距离接触，而如果他们大难不死，他们会把牙齿、头颅这类战利品拿到营区炫耀，或寄回家乡给亲爱的人，证明他们到过那里打仗，而且成功生存了下来。那些遗体残片以极端露骨的方式提醒我们，战斗是多么激烈且近在眼前。

另外也有一些实务面向上的考量。牙齿很适合收藏，因为它体积小、重量轻，而且相当容易拔取、清洁。手指、耳朵和头颅就不一样了，除了必须费劲剁下来，而且又脏又臭，这些现实因素足以使多数人却步。一九四四年初，一群从前线返回的美军陆战队员挖出一具日本军人的尸体，把他的头砍下来，因为「老子我就是要日本鬼子的头」，但他们没法干净俐落地割下那颗头颅，下巴被切坏了，而且臭气熏天，结果大兵们决定取走三颗金牙了事。飞行员林白也说过类似的故事，有个大兵试图让蚂蚁清理一个日本士兵头颅上的肉，可是现场实在臭得离谱，于是他的同袍们赶忙把头颅抢走丢掉。麦克．莫里斯则看过一只耳朵在某个师里被传来传去，不过他说那些大兵都显得小生怕怕。

话虽如此，还是有少数人无惧于剥除人类头颅的皮肉这种恐怖任务。一九四三年十月，一些媒体报导让美军最高指挥部拉起警报。报导指出一名士兵「刚从西南太平洋战区返回国内，他身上带了照片，显示『蒸煮日本人头颅、刮除皮肉，以便做成纪念品』的各个步骤」。今天，我们很容易在网路上找到这类影像：盟军士兵在旧燃油桶中用开水蒸煮人类头颅，以便去除肉质部分；或被斩断的日本人头颅挂在树上的画面。不过这些收集日本人头颅的军人大都是在废弃的战场上搜刮到，或在丛林中偶然发现那些人头，此时热带地区的环境早已帮他们完成这件工作—头颅被清理到只剩下骨头。一般来说，以战利品而言，已经干燥的骷颅头比起正在腐败的人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而且比较好处理。

一九四○年代期间初次抵达太平洋岛屿的军人必须设法调整心态，来面对无所不在的战利品和纪念物，而至少在一开始时，新兵会对一些袍泽的行为感到震惊。狄恩．莱德再过一个月就要满二十三岁，他刚降落在西南太平洋瓜达坎纳尔岛沙滩绵延、植物茂密的酷热海岸，准备投身到太平洋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他惊愕地看到「一个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小伙子手上晃着一条绳子走过，绳子上吊了一颗漂白过的日本军人头颅」。跟所有在瓜达坎纳尔服役的战斗部队士兵一样，那个大兵也是面容憔悴、军服破烂不堪，但当大兵看到菜鸟新兵在看他，他会咧嘴一笑，然后抓起人头在自己头顶勐转。战争是不是让他发疯了？「怎么说呢，是—也不是，」莱德下了这样的结论：「基本上不是。后来—其实是很快—我们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那小子这样做只是好玩而已。」

一星期之后，莱德正在用餐。虽然他的周围是数以百计腐臭的日本人尸体，而且远方不断传来机关枪、迫击砲和炸弹爆炸的声音，但他看到热食还是大快朵颐。这时他的目光瞄到一只还穿着靴子的日本军人的脚从附近的地面露出来。那具尸体只稍微被泥土覆盖住。他当做没看到，继续用餐。他听到消息说，日本人的尸体漂在马塔尼考

（Matanikau）河上，就在他盛饭菜吃的地点上游不远处。但他还是喝了那水。「就像那个拿着骷颅头在头上勐转的士兵，我在瓜达坎纳尔也入境随俗了。我才到这个岛上七天。」

歷史学者乔安娜．布尔克（Joanna　Bourke）曾经撰文论述士兵在战场上杀人时的愉快感，以及战争可能带来的嘉年华气氛。战斗装备、脸上涂的迷彩，以及「谆谆教诲士兵必须设法变成『动物』的陈腔滥调」，这些都代表一种令前线士兵全身亢奋的道德秩序倒错。这些仪式在抽离那个脉络时似乎显得毫无人性–对刚抵达战场的新兵而言，那确实非常缺乏人性–但它们却提供了某种方式，让人可以面对战斗的骇人景况。我们很难想像一九四二年间瓜达坎纳尔岛上的战斗部队所面临的处境。就连当时在距离前线不远的勤务部队也难以明白被丢进那个「绞肉场」是什么样的状况。时间在那里面毫无意义，人也没有任何逃离的可能。就算侥倖活着出来，不发疯也难。

众所皆知，当时日本人不肯轻易投降，美国人则拒绝接收俘虏，因此那等于是一场殊死战。根据报导，在新几内亚的比亚克（Biak），守在石灰岩洞穴系统中的日本军人曾试图举白旗投降，但美军要他们「滚回洞里去再重新杀出来」。与此同时，日军会向抬担架的美国士兵开火，折磨被擒美军至死，然后破坏他们的尸体。有些战俘惨遭斩首，也有报导显示日本人吃敌人的肉，有时甚至还吃自己人的肉。在那种状况下，人没有脱身的希望，不是拼命杀人，就是等着被杀。

要辨识在最前线战斗过的士兵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他们的模样脏兮兮，全身都是粉尘和步枪机油；他们的军服不但破烂，而且在接连几星期的雨水、汗水和艳阳洗礼下已经变得硬邦邦；他们形容枯槁、身形瘦削、鬍子没刮、眼睛布满血丝、双手粗黑长茧；他们又飢又渴、筋疲力竭、身上散发臭味，而且经常患有「丛林腐烂病」–霉菌在手指、脚趾间以及耳朵里滋生，脏污、虫咬使他们的四肢到处发炎疼痛，许多人罹患疟疾和其他热带地区的热病。总归一句话，这时人头这种玩意儿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鸡毛蒜皮。

所有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都面临飢饿、疾病，以及在闷热和大雨中艰苦劳动。湿气造成所有东西腐败，从枪枝、衣服到身体无一倖免。雨水使人的皮肤变白、肿胀。营区经常淹水，或被烂泥覆盖，士兵在浓密的植被中必须用开山刀披荆斩棘，排成一列勉强穿越。据说在某些丛林特别茂密的地方，如果一个人不时时刻刻用眼睛盯住前面一位士兵的脚，他可能一不留神就会迷路。

到处是蚊子、水蛭、蜘蛛、蜥蜴、蛇和蛆。没有自来水、没有电，

而且尽管人数庞大的勤务部队勤奋工作，依然无法避免出现补给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食物和饮水经常短缺。水终于送来时，装水的容器可能是旧油桶，因此味道非常噁心，让人肚子绞痛；水里充满铁锈，还有一层蓝色油污，但走投无路的士兵也只能勉强喝下去。这样的结果不让人意外：三不五时就会爆发伤寒、痢疾等疫病。在太平洋战区丧命的军人大都是因为疾病、酷热、意外和飢饿而死，在某些战争阶段，因为这种因素死亡的人数高达阵亡人数的一百倍之谱。

莱德的回忆中充满「大规模死亡的恶臭」。他写道：「暂且甭管炎热的天候，光是那臭气就足以让任何身体强健的大男人招架不住。」放眼望去，到处是腐烂程度不一的死尸。面目全非的尸体挂在凌乱的铁丝网上、在河面漂流，数以千计的战士就这样陈尸战场，散落在密林间，从烂泥地或草草挖成的坟墓中突现出来。许多人被砲弹炸得体无完肤，变成四散的尸块，或在烧夷弹攻击中被烧焦，不然就是暴露在热带天候下发黑。战场上随时都会看到没了头的身体、没了身体的头。就算在前线后方，也会发生可怕的意外。舰艇上断落的绳索、空转的飞机螺旋桨叶片，都可能让倒楣的人断了头。美军运输团的一名士兵在补给船上忍受经年累月的辛劳工作以后，不小心在停电时摔进底层船舱，结果在坠落途中被一个大鉤勾到脖子，头就这样断了。他被装进篮子里提回甲板上。

尤金．史雷治写道：「激烈的求生奋斗……侵蚀掉文明的伪饰，使我们都变得野蛮。」他强烈感觉到当时的生存环境导致某种社会退化现象。人体残块四处可见，敌人遗体俯拾即是。换言之，道德景观与物质景观同样超写实，因为士兵已经失去所有在家乡时规范他们生活的正常社会结构。他们被死人团团包围，他们接到杀人命令，他们以为自己即将阵亡。在那种情况下，如歷史学者乔纳森．葛罗佛（Jonathan Glover）所言，人可能「逃脱道德认同的约束」。他们对周遭的一切变得麻木不仁。

再举史雷治的例子。有一次他与他的作战单位在贝里琉岛上攻向敌方阵线时，他看到一名日本机枪手就地阵亡的景象，那人的姿势彷佛还在用瞄准器瞄准，正准备开枪射击，但他的头顶已经被炸开。史雷治跟参与战斗的美军机枪手说话时，发现其中一人正把珊瑚卵石抛进那名死亡士兵被炸开的脑袋瓜。「每次他投掷成功，我都会听到那个可怖容器中发出雨水溅起的声音。」但是，史雷治也提到，那个美国军人的行径其实跟家乡小孩朝水洼里丢石头没什么差别，因为他做得很随兴，而且「他的动作中没有任何恶意的成分」。

是没错，盟军变成了「野蛮人」，但在他们眼里，日本人根本不能

算是人。日本人在美国民众和美军的心目中被彻底非人化。在宣传资料和媒体中，他们被描绘成失去理智的自杀攻击狂，对丛林战有一种令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喜爱。他们被蔑称为「疯狗」、「黄虫」、「胡乱嗥叫的鼠辈」，被比喻成猿猴、昆虫、爬虫动物。

新兵会听到一些关于敌人的故事：「他们会像野猫般躲在树上。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有时会发出尖叫声，跟在屠宰场里吓得尖叫不停的牲畜差不多。还有些时候他们会无声无息地过来，连蛇都不会被惊动。」一名陆战队员表示：「真希望我们是在跟德军作战，至少他们是人，跟我们一样……可是日本鬼子根本就是动物……他们在丛林里行动自如，彷彿他们是在那里出生的，而且就像某些野兽一样，只有在死掉的时候才会被人看到。」许多人相信日本人有夜视能力，而且只要吃树皮和树根就可以存活。根据美国战争部刊行一本改编自一部训练影片的宣传手册–《日本鬼子兵》（The Jap Solder），索罗门群岛的美军相信日军可以透过气味觉察敌人的存在，他们形容那是「动物般的野性嗅觉」。

说日本人是动物不打紧，一些美军认为自己是在狩猎。在某些国家，外观看起来像官方文件的「狩猎执照」会被分发给年轻人，鼓励他们从军。「不分季节，没有限制。猎杀日本人的许可证。免费提供弹药和装备！外加优渥薪酬。请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跟大型动物猎手一样，有些接受号召的青年会带着战利品返国，以证明他们的骁勇善战。

在现代战争中，当战士夺取战利品首级，这里面通常有一种强大的种族因素在作祟。在十九世纪的战争期间，英国和德国的军人会从南非及东非把人头带回家，但白种欧洲人鲜少收集其他白种欧洲人的头颅。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鑑识科学家记录过的二次大战战利品首级都是日本人的头，没有任何纪录显示有人从欧洲战场上把人头当战利品带回家乡。种族主义不是军人夺取敌人头颅的唯一原因，毕竟人在战时受到的训练是要兇勐杀人，而且所有敌对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人化–但种族主义无疑是一个普遍的因素。夺取战利品的行为在二十世纪的越战、韩战及太平洋战争中显着增加，部分原因是地理环境和作战方式，但也是因为萦绕在这些冲突中的强烈种族偏见。参与这些战争的军人经常把他们的工作等同于在丛林中猎杀野兽。

人类学者赛门．哈里逊（Simon Harrison）针对非洲殖民战争中夺取战利品的行为做了研究。他提到一名比利时军官的故事，那人在一八九一年为利奥波德（Leopold）国王[21]打仗，返回营区时，他身上带着当地国王姆西里（Msiri）[22]的首级，然后高喲一声：「我干掉一头老虎

了！吾王万岁！」还有一个故事也类似。一九○六年，率领最后一次祖鲁人（Zulu）抗英行动的班巴塔（Bambata）酋长被杀以后，他的头被切了下来，放在一处受武装保护的营帐中，向他的追随者展示，藉此逼迫他们投降。虽然官方报告指出班巴塔的头颅和身体后来被一起埋葬，但一幅一九二五年刊登于一本南非军队刊物的照片显示，有一颗骷颅头以类似狩猎战利品的方式被安装在一块板子上，说明文字上写着：「下方照片呈现反叛领袖班巴塔酋长的头颅，他在摩姆（Mome）峡谷被杀，他的头被切下以供辨识。」

哈里逊对这个主题做过详尽的调查，他的论点是，如果男性的力量及阳刚特质是透过狩猎的暗喻来表现，夺取这种战利品的行为就比较容易发生。举例而言，列表统计成功「猎杀」的次数，或「尸体计数」（body count）的做法（这是美军在越南採行的一个概念，旨在统计「毙敌数」，证明他们正在赢得战争），这些无不暗示着某种以捕杀猎物为底蕴的文化。一九六九年间，一支在越南的美军侦察队在收音机上头摆了一颗骷颅头，它的额头上满满都是彩色缎带，每条缎带上都标明日期和号码，纪念他们在战役中的尸体计数结果。此外，跟狩猎时收集战利品的情况一样，人类牙齿和耳朵在军营中可以赋与拥有它们的人地位。一名一九六○年代后期于越南服役的战斗伞兵小亚瑟．「吉恩」．伍德利（Arthur E. “Gene” Woodley, Jr.）会在脖子上佩挂一条由大约十四只耳朵和手指组成的项鍊，所以他不管到哪里都吃得开，「可以拿到免钱毒品、白吃白喝、免费嫖妓，因为没人想招惹他，因为他是个大杀手……换个说法，那是战斗型阳刚男性的象徵。」这类装饰品能赋与力量—它让人无法不去注意，它令人惊愕震撼，它也象徵着战斗技能。它是自我伸张的有力配件。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也带有某种戏剧化成分。在许多案例中，取得那些东西的过程会被「神话化」。多数战利品是在战斗结束之后夺取的。以人头为例，鲜少有人会在激烈战斗之余把刚阵亡的敌军头颅砍下来留念，纵使偶尔这种事确实会在当事人极端恐惧、愤怒，或某个在前线的「小伙子发了疯」时发生。一九四三年一月，服务于美军杂志《美国佬》（The Yank）的麦克．莫里斯在瓜达坎纳尔岛上见到一名士兵，他「全身上下都是出自日本鬼子的纪念品」，而且还说他亲手砍了两名负伤日本军人的头。其中一人是军官，当那个美国大兵弯身要偷军官的剑时，日本军官伸手抓住他。「小伙子一时气疯了，」莫里斯写道：「一部分原因是他的一个伙伴被杀害，但我认为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吓得要死。他失去控制，抓了日本人的刀就往他的腹部、胸部、背部勐刺，切下他的左臀部，然后将他斩首。」这个故事并没有让莫里斯特别吃惊—「总之小伙子疯了，于是把两个人的头砍掉。这就是打

仗。」不过这件事还是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好几天，他一直自问，关于这种暴力攻击的性质，无罪推定原则是不是应该适用于那位大兵。

让莫里斯觉得比较反胃的反而是部队里的牧师。那人差点没把他照管的小伙子捧上天：「没有任何事挡得了美国青年」、「这小子可真了得，嗜血如命！」不过就算文诌诌的莫里斯（他是拿着记者笔记本上战场，而不是举枪奔赴前线）也知道恐怖纪念物可以赋与持有者地位。或许是因为他身为记者的「外来者」身分，而且可能他想设法掩饰对战争的厌恶，莫里斯开始随身带着一颗牙齿，并且宣称那是从某个死在瓜达坎纳尔的日本战士身上拔下来的。某天晚上他在用餐时把它亮出来，享受它带来的一片赞扬与敬意，但这时忽然有人说那不是人类的牙齿。那时莫里斯已经喝了很多波旁威士忌，他恼羞成怒，但也只能坐着生闷气，同桌袍泽则差点没笑掉大牙。「我实在太逊了！」他在日记里写道：「过于渴望伸张自我的诅咒。」

大多数步兵瞧不起那些「沽名钓誉的后方梯队军人」，认为他们不曾有一天真正上战场与敌军厮杀，只是在事后搜刮纪念品。不过牙齿，甚至头颅，并不光是用来炫耀的展示品，也可以是供人思考的素材，并帮助某些士兵面对他们陷入的极端环境。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点。美军运输团士兵赛．坎恩（Sy Kahn）的任务是在新不列颠（New Britain）岛23的海岸装载船舰或卸货。他十九岁从军，身上带了好几副眼镜，他坦言自己「手上拿书或小提琴比拿步枪要来得自在无数倍」。他相信自己可能一去不返。

一九四四年二月，坎恩出勤务几个月之后，有一次跟一位朋友冒险闯进森林，探索一处废弃的日本医院和军营。森林非常茂密，遍布沼泽、蚊虫滋生，地面上到处是弹药、枪枝、补给品和医疗器材。那是个「神祕而又令人觉得不祥的地方」。他们捡拾了几个纪念品—上头写了日文的罐子、一些竹编篮—但在回营途中，他们无意间踏到令他们惊心动魄的东西：人的骨头。第一个看到的是腿骨，然后是两根肋骨，再来坎恩看到一颗骷颅头。他无法确定那是日本人的头，但由于「颧骨位置高而且突出」，他推断那应该是日本人没错。头骨一部分被炸掉，下颚不见，皮肉也已经完全消失。坎恩用一块布把头骨包起来带回营区，拿到海里清洗干净，然后让它在太阳下晒干。他和他的朋友把它当做烛台。骷颅头大喇喇地装点着他们刚布置好的房间—一个他们精心打造、洁净舒爽的小窝，一部分位于地面以下，周边围绕着沙包，往外可以看到大海，房间里有书桌、几本书、照片、香菸，以及那颗骷颅头。那是个「干净而且孤立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非常享受。

坎恩发现自己开始思索那颗骷颅头的意义。他不由自已。他在日记

中写下这件事。他很想知道头颅的日本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活和家庭是什么样子；他想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否杀过很多美国人。一般士兵会公开展示战利品首级，藉此剥夺敌人的人格，但坎恩的骷颅头却变成私密时刻的思考焦点。它使坎恩想跟那个没有脸孔的无名敌人建立某种关系，让他有了空间可以把那个「日本鬼子」视为一个个体。坎恩不禁思考，是什么样的情况使他们在世界彼端的「一条丛林溪流边」遇合？而在这种感觉休戚与共的奇特时刻，他不禁想到战争及死亡随机不可预测的性质。为什么那个人的头骨会变成某个美国大兵桌上的烛台？但是坎恩感受到的并非怜悯，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很可能遭受相同的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交战双方的军人毕竟都可能「在我眼前被炸掉」。骷颅头带有悲剧色彩，它也非常荒谬，但它终究无足轻重。

在坎恩手中，骷颅头化成一个死亡提醒标志。他想到死亡的不可化约的物质性。死亡的军人现在成为一个「没有身体的东西」。他用自己的手指感受这种物质性：「摸弄这颗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思考的头颅，让我的手游移在那个平滑的硬壳内侧，那里面曾经装了脑筋和生命物质；拨弄那空洞的眼眶和鼻部，拉动那松弛的牙齿。」坎恩彷佛把死亡当成玩具，跟它玩耍，他设法与死亡达成妥协，设法驯服它。

战场上尸横遍野，肢体肉块溶成一片莫可名状的大海，但当其中某个单一的人体部位—头颅、手指、耳朵—被捡拾出来，带进一个新的、较为私密而居家的环境脉络中，它却能提供稀罕的思考空间。近距离观看时，它有了个性，士兵则在震慑中陷入默然。无论他们是否喜欢，他们都必须面对自己与敌人共享的残酷命运。尽管拿取战利品首级的行为是由椎心的仇恨所点燃，但这种行为或许也表达出某种休戚与共的情怀。毫无人性的敌人是一个虚构的幻象，这种幻象有其侷限。最终战士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只是被迫投入战役，一如那些日本军人。此外，在某些方面，知道敌人具有人性还是比较妥当，因为虽然这会带来罪恶或懊悔的感受，但这些感受本身终究证明我们不是野兽，战争还没有完全泯灭我们的人性。

在太平洋战争中，双方士兵都会把自己的物品留在他们发现的敌人尸体上。照片和单位标牌会被塞进死难者已经没有生命的手中。这种向死者张开怀抱的行为隐约透露出某种超越敌我界线的个人认同感，以及一种在战斗中与敌人分享过某种深刻事物的感觉，当事者因而明白，所有人都在面对失去一切的危险，以及死亡的恐怖。被做成项鍊并当成饰品穿戴的牙齿和耳朵确实能成为威望的象徵，但它也代表我们在深层上认同了死亡的真实面向，那个所有人都被迫面对的死亡。

一九四四年，在一场夺取贝里琉岛的艰苦战役中，尤金．史雷治看

到一名战友从野战背包中取出一个袋子，打开后骄傲地展示里面的纪念品━一只已经部分木乃伊化的手。跟那些过来凑热闹的陆战队员一样，史雷治感到惊愕、噁心，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战友：把它丢掉！战友后来也照做了，不过这件事立刻促使史雷治思考自己终究会死去。「我想到我有多珍惜自己的手，以及人类的手是多么惊人的奇蹟，既能为善，也能行恶。」史雷治也质疑自己看到别人袋子里放了一只手时的反应，纵使尸块无处不在，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会收集死人的牙齿，「但就某方面而言，[收集死人的] 手似乎太离谱」。牙齿不具个人色彩，每颗牙齿看起来跟其他牙齿都差不多。牙齿基本上不会是一个人的显着特徵，一旦从嘴巴里拔下来，通常都可以互相替代。但人的手不一样，手是具有肉体的有机体，手拥有歷史和个人性。史雷治描述他那位战友为「二十世纪的野蛮人」（纵使还算是个「温和派」的野蛮人），但就牙齿而言，他觉得自己已经「不痛不痒了」。

骷颅头也一样。骷颅头不像刚被切断的人头那么有争议性，因为它已经干燥硬化，看起来跟活人几乎没有共同点，这就是坎恩花那么长时间冥想他那颗骷颅头的原因之一。他忍不住思考，书桌上那个没有生命的硬壳，跟在丛林里战斗、活生生会呼吸的人之间是多么天差地别。正如史雷治所感觉的，把一只有皮有肉的手占为己有是阴森恐怖、缺乏道德而且胆大妄为的事；但是，纵使将牙齿或骷颅头占为己有同样有可议之处，它终究显现出某种美学情怀。

战区生活的空洞无聊导致士兵将死人的骨头拿来当娱乐。他们会削骨头打发时间，把骨头雕刻成饰品，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飞行员林白曾听说新几内亚诺姆佛尔（Noemfoor）岛上的战斗机控制部门人员「经常从他们杀死的日本人身上取走大腿骨，用它来做笔插、切纸刀之类的东西」。一名澳洲军人把他拿的日本人头骨做成香菸罐。头骨、肋骨和比较长的骨头深受欢迎，因为很容易用来雕制成生活物品。头骨上经常出现这样一排刻字：「这是个好鬼子」，旁边签有单位成员的名字。坎恩把骷颅头当成烛台的例子并不罕见，有些士兵会把蜡烛插在颅腔内，也有一些人把蜡烛固定在头骨顶端。

目前在美国，每当有人找到太平洋战争或越战时期的战利品首级，经常会发现上面有文字、图案或彩绘，这通常是最初拿到那些人头的军人的杰作，不过有时是出自后来的拥有者之手。有一颗骷颅头在二战期间由一名海军医护人员带回美国，后来他的孙子找到那颗骷颅头，为它喷上金漆，并繫上一条束头巾，放在卧房里当摆饰，但某一天他忽然觉得害怕，结果把它丢进湖里。还有一颗从冲绳带回美国的骷颅头，被喷上红色和金色油漆，一九八○年代初期被人送到一个法医鑑识单位。有一颗骷颅头出自一名坠机飞行员的骨骸，它被带回田纳西州摩根（Morgan）郡以后，形体被弄大，当成万圣节的南瓜灯。另有一些后来被发现的骷颅头上面尽是些用蜡笔、签字笔或喷漆绘制的涂鸦和图画，还有蜡烛留下的炭迹和蜡渍。这些「驯服」死人、使他们从人变成生活物品的程序是从战场上开始的。

在人类骨头随处可见的战场上，就某个层面而言，值勤时把骨头拿来加工美化是天经地义的事。能花那么多时间在这种工艺上当然表示生活的烦闷寂寥，但也显示出某种自豪感，以及希望在敌人骨头上留下个人印记的欲望。或许这些工艺品代表一种取得控制权的企图，藉此使死亡显得较为亲切而容易管理–把令人困惑难解的暴力性死亡转化成可以用来呵护自己的小确幸。这种工艺品包含情绪抒发的成分。经过装饰美化的骷颅头及骨头同时是吸引人的玩具、死亡提醒标志，以及一种向敌人宣示力量的手段。占为己有的行为可能既是军事优势的表徵，也夹带一种休戚与共之感，甚至拥有某种程度的感情。

军人有时带着一种儿童般的愉快心情收集战争纪念品，在检查人体残块时甚至带有近乎科学家的兴趣。「恐怖瑞典人」汤玛斯．拉尔森（Thomas J. “Horrible Swede” Larson）曾在土拉吉（Tulagi）岛24上担任海军通讯员，他形容自己是个「嚣张放肆、乐天知命」的傢伙。他收集了不少东西，上岸休假时，他会跟当地居民交换织品和工艺品。他以海军军官的身分在城镇购物，从死人身上或被打下来的飞机上拿些「东洋纪念品」，或巡游各个岛屿，探索那里的贝壳、蝴蝶和昆虫。有一次他把一条长达七英尺的蛇剥了皮（他说那条蛇是个「美丽的傢伙」），然后像个小男生一样将它挂起来吓人；不过，就像一名自然学家，他也打算鞣制那张蛇皮，做为个人的收藏品。他很高兴有机会在一九四三年八月造访瓜达坎纳尔岛，并兴奋地接受一名军官的提议，让军官开车载他沿着马塔尼考河而上，探索那一带的老战场。那天他捡了一把日本步枪及一个钢盔，然后一直珍藏到他晚年。他也捡了一整袋的骷颅头。蚂蚁已经吃光脑部和柔软的部分，但拉尔森还是得把上面的头髮刮除掉，然后想必他清洗了骷颅头，再分送给朋友。他自己保留了一颗骷颅头，用它来装自己的钢盔和菸斗。

拉尔森在说明他的个人收藏时提到过骷颅头。「我在这里小有名气，被人视为地方上的甲虫、蝴蝶、蛇类、贝壳及蜥蜴权威，」他一开始时写道，然后他描述他「那个装满日本人头骨的袋子」。对他而言，那些骷颅头来自瓜达坎纳尔的重大战役现场这个事实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那是个重要而且恶名昭彰的地方；这不但增加了那些骷颅头做为名副其实战争文物的价值，也使他做为收藏家的地位更形提高。「我这种名气传遍南太平洋，」他表示。他知道把骷颅头当成纪念品是一件惹人争议的事，不过他还是沾沾自喜地以「岩礁乐活者」（rock happy）25自居。他写道：「当一个人开始收集敌人的头骨，就表示他差不多病入膏肓了。」

拉尔森跟他的骷颅头变得有点难分难舍。他把石膏塞进它的眼窝，用虹彩海螺加以装饰，然后放在床头。在土拉吉岛服役十一个月之后，他已经「像殭尸般走路摇摇晃晃」。返回美国途中，他把大部分纪念物留给在纽西兰的朋友，不过他在奥克兰以美军连络官身分搭上皇家海军轻型巡洋舰「里安德号」（HMNZS Leander）时，还是随身携带了那颗骷颅头以及其他一些物件。不幸的是，英军指挥部对那颗头颅有意见，他只好把它留下，送给奥克兰博物馆的自然史典藏，不过这个结果倒跟他收集骷颅头时的想法相当吻合。

有时候，即便是在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下，军人仔细研究人体部位的动机可能源自一种经验老到的好奇心。有一次，尤金．史雷治在战场上打量敌人尸身上的牙齿，被一名军医责备，结果他反驳说：「我爸是个医生，我相信他一定会觉得我这么做很有趣。」

如果医疗人员可以把死尸当成生物物质，那么一般军人又何尝不可。来自麻萨诸塞州沃特罕（Waltham）的詹姆斯．法赫（James Fahey）是美军轻型巡洋舰「蒙佩利尔号」（U.S.S. Montpelier）的一等水兵，歷史学者保罗．法瑟尔（Paul Fussell）描述他是个温和守礼、有耐性，而且不喜欢血腥的罗马天主教徒。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当日军在雷伊泰（Leyte）湾26出动数百架飞机，向美军舰队进行自杀攻击，企图阻止美军攻下他们控制下的主要岛屿，「蒙佩利尔号」是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激烈战况中，美军勐烈的防空砲火让日本飞机碎片及飞行员尸块像下雨般落在舰艇甲板上。根据法赫的描述，在战况缓和之际，士兵会四处搜寻纪念物。他自己拿了一块飞机碎片。甲板上到处是「血、内脏、脑浆、舌头、头皮、心脏、手臂」，士兵则开始随地捡拾。有个人捡起一块头皮—「看起来就像你刚剥了一只动物的皮」；另一个人拿起一块膝盖骨；法赫捡了一块铁板，上面有一片人的舌头，他很惊讶那舌头居然那么长，而且一部分扁桃腺和喉部还连在那上面。

「现场相当混乱噁心，」法赫写道，不过美军士兵们似乎积极设法在那堆混乱噁心的东西中理出些头绪，有个人甚至开始把它变成表达情意的纪念品：法赫的一位同袍拿了一根肋骨，将它清理干净，因为他说他的姐妹希望收到一块日本人的身体。虽然这种事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有不少人真的会把骨头寄回家乡当做送给亲人的礼物。在士兵的家书中，他们会很自然地提到亲朋好友向他们要求骷颅头的事：「我想寄颗日本人的骷颅头给派克」、「妳想不想要日本人的骷颅头？」而在民众的房子里，骷颅头可以成为受人喜爱的摆饰，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时候，可以藉这个机会让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学会用平常心看待这种东西。有个从瓜达坎纳尔退役的老兵带了一颗骷颅头回美国，还帮它取了个绰号叫「奥斯卡」，上面有他单位伙伴们的签名。数十年后，当那颗骷颅头被重新发现，并且寄交给日本政府，老兵的姪女因必须跟骷颅头分开而感到难过：

所有认识我们家或进过我们家的人都看过它……不管你什么时候走进那栋房子，都会看到它摆在柜子中央……那是某个死掉的人，我伯伯是这样感觉的。没错，现在的人会对这种东西感到愤慨。但当时我们没有这种感受，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时是在打仗。朱利斯伯伯只是觉得自己在做他在那边应该做的事。

骷颅头经常会被取宠物名字，例如「山姆」或「查理」，可是有一次，一件这类的礼物被美国媒体报导出来，结果引发国际性的谴责。

一九四四年五月，《生活》（Life）杂志的「每週照片」专栏刊出一张照片，画面上呈现的场景是一位名叫娜塔莉．尼可森（Natalie Nickerson）的年轻女子坐在桌前写信给在太平洋地区服役的海军男友。娜塔莉若有所思地凝视男友寄给她的礼物：一颗日本军人的骷颅头。骷颅头整理得干净清洁，上面刻有十四名美国大兵的名字，以及这样一句铭文：「这是个好鬼子─在新几内亚的海滩上捡到的死日本鬼子。」图片说明指出，这个礼物让娜塔莉非常吃惊，不过她还是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名字帮骷颅头取名叫「东条」27。

《生活》杂志的读者纷纷投书谴责娜塔莉和骷颅头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恐怖、令人作呕」，他们还指出，假如情况颠倒，是由东京的着名杂志刊登年轻日本女子在凝视美国大兵的骷颅头，美国舆论必定一片譁然，指控日本人的变态恶行。

这些投书刊登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隔天，《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报导一名宾州国会议员，送给罗斯福总统一把用日本阵亡军人的手臂骨头制成的开信刀。报导内容指出，那位国会议员还向总统表示歉意，说他很不好意思送给总统「这么小一个日本人的人体部分」。日本的评论家大肆抨击美国总统的伪善，认为他「总爱冠冕堂皇地把人类文化和自由这本大书搬出来讲，然后却撕掉其中重要的一页」。几天以后，娜塔莉和她那颗骷颅头的照片被公布在日本媒体上，结果引发激烈愤慨。「就连在那个美国女孩的脸上都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兽性本质」，日本第一大报的一名记者写道：「让我们一起宣誓将美国的野蛮暴行从地表上全面抹去。」

事到如此，由于担心美军战俘及被拘留平民安危的声浪愈来愈高涨，罗斯福总统把开信刀物归原主，并建议为那块骨头举行慎重的葬礼。美国海军对《生活》杂志那张照片也做出回应，针对涉及此事的那名中尉—即娜塔莉的男友—「据称可能犯下」的行为进行调查，但终究敷衍了事，案子最后无疾而终。

根据一九二九年的日内瓦公约，亵渎阵亡敌军遗体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战争惯例，也不符合一项美日两国针对阵亡将士处置方式所签订的双边承诺的精神，但美国海军最高指挥部的回应方式显得不甘不愿。战争部明确表示，亵渎阵亡日本军人「严重违反法律与德行」，但战争部之所以劝导媒体不要刊登有关「战争纪念物」的报导，其实是因为这类报导可能导致战场上的报复行为。除了强调「德行」之外，战争部可能更重视谨慎行事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战区指挥官被要求採取所有必要措施，「防止此种违法且残暴的行为」，并对违犯者进行调查及纪律处分。《生活》杂志照片的事也在这时传到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部队。一九四四年十月，一名于一九四二年入伍的三十岁艺术家约翰．盖塔．布朗宁（John Gaitha Browning）在新几内亚的荷兰地亚（Hollandia）28附近捡到一颗骷颅头。他把它带回营区，放在一名战友床上，所有人都跑去拍照，但他知道监察官会设法让人再也没法看到那些照片。「军方被人头的问题搞得紧张兮兮，」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断接到警告，说假如持有日本人的骨头、牙齿等等，将受到军法审判、死刑等等，各式各样的荒唐威胁。」他认为《生活》那则图片报导「使情况变得更糟」。但布朗宁和

他的袍泽没有真的把那些「荒唐威胁」当成一回事。

在一场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被牺牲的战争中，美军的指挥官们忙着为国家赢得胜利，「骷颅头问题」对他们而言相对不重要。有些军官本来就预期到士兵会有恶劣的行为；有些军官决定当做没看到犯行证据—在嘉年华般的狂热氛围中，从战场上捡拾人头经常被视为「核准违法」的行为。如何让士兵「按要求」做出暴力行为向来是军队中的一大挑战，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大规模徵兵制度出现以后。训练计画的设计宗旨是透过长时间的身体虐待与口语辱骂，剥夺士兵的个人身分认同。士兵进入一个士官权力无限上纲的世界，粗暴的对待在那里受到高度赞许，外来者不被当人看待，士兵生活的所有细节都由别人律定。严厉的训练策略足以侵蚀平民价值观，打造更有效率的杀手。一名参与越战的陆战队员记得当年的教导：发现受伤敌军时，「很简单，如果你的刺刀已经固定在枪桿上，那就把它往下一挥，再套句教官的话—『砍掉他的头』，或者『往他身上补上几刀，确保达成效果』。如果身为军人却没有能力杀死伤者，那他在心理上就不适合作战。」

这是一个难以拿捏的平衡问题。军人被要求在战斗的压力状况下表现出凶暴的行为，但当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军事贡献时，他们又得立刻回復到平静祥和的生活状态。二十世纪中期的评论者承认「承平时期最会制造麻烦的人物」在战场上反而成为最厉害的角色。有些行为平常会让老百姓锒铛入狱，打仗时却可能使士兵获颁勋章。没有人会因为把敌人的头颅做成装饰品或把名字刻在骨头上而拿到勋章，不过军队中有一种默契，认为这类活动可以安抚战争对心理造成的莫大压力。

在美国，每年都会有一两个源自太平洋战争、韩战或越战的战利品首级重见天日，被送到鑑识单位让科学家鑑定。这些骷颅头偶尔是在警方为了其他原因搜索房屋时碰巧发现的，不过通常是因为骷颅头的主人对于继续把它放在家里感到不安与矛盾，因此不是把它捐出来，就是把它丢掉。在美国、澳洲或英国的住家环境中，战利品首级并没有个普遍令人接受的位置。纵使在血腥战争结束后，这种东西可能被视为军人应得的报偿，因而堂堂登门入室，但几十年过去了，多数骷颅头早已显得不合常规、令人厌恶，就连当初把它带回家的战士自己都有这种感觉。家人偶尔可能觉得它有一种亲切感，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它既缺乏品味又让人神经紧张—退伍军人的妻子似乎最常抱持这种想法。战争肆虐的世界为这种战利品创造出存在空间，但那个世界已然远去，骷颅头变得为人所不容。

那些硕果仅存的战利品首级是来自战争冲突的诡异碎片，而战争冲突一直都是人们用笔墨无法形容的恐怖景象。做为见证战争恐怖的实体

物件，它们被带回家乡后却显得格格不入，而且许多收集它的军人想必自己也感觉到这点。战利品首级既具体又抽象，它见证的是一些有高度特定时空背景的经验，那些经验很难跟他人分享。虽然死难者在与战争有关的歷史论述中经常隐而不显，但士兵经常在日记中提到他们，因为到处都是死人。死亡无所不在，因此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形是外人无法体会的。或许这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战利品首级在今天令人不安的因素之一：它把死亡带来人们眼下的时空，迫使我们必须设法理解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事物。

虽然战利品首级难以容身于平民社会，但它们在战场上却发挥许多不同功能。它们跟取得它们的军人一样包罗万象，它们既能表徵愤怒，也是恐惧的化身。有些骷颅头被视为狩猎战利品，有些则被转化成爱情的象徵物、公仔、伪科学标本，或供人消遣的玩物。骷颅头既可能激发一个人自省，也可能鼓动他耀武扬威。归根究柢，骷颅头是某个人的外壳，而那个人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内心深处。这样看来，在各种方面可说与死亡短兵相接的军人会受到人头的吸引，就不足为怪了。

战利品首级是敌人被驯服后的化身，因此它可能引发某种想要豢养它的感觉：士兵会帮它戴帽子、钢盔，或拿香菸、菸斗给它抽。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里客一样，骷颅头重生了，它有了个性和暱称；但这种为死人骨头赋与新生命的逗趣做法却也不免凸显出它没有生命的事实。首先，战利品首级见证了一个人的力量，他能杀死另外一个人，而且不吝于把一个死人变成工艺品。美军在二次大战及越战期间寄回家乡的骷颅头都经过彻底清洁和抛光。洗掉所有死亡的腐化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干净无瑕的白色物件。敌人已经被处理得服服贴贴。人体战利品是生存意志的表徵，也象徵我们与我们的性命所仰仗的袍泽们休戚与共。即使在骷颅头激发士兵的呵护本能时，它依然无情地见证着士兵的主宰优势。它让士兵重新享有被赋与权力的感觉，因为在混乱的战斗中，高举骷颅头形同宣示掌控局面。刽子手在死刑台上举起叛徒的头颅也是相同的道理：就此宣告，秩序已然恢復。

17 译註：巴布亚新几内亚最东端的大岛，地理上属于索罗门群岛。

18 译註：西太平洋索罗门群岛的第一大岛。

19 译註：位于帛琉的一个岛屿。

20 编註：指《老兵长存》（With the Old Breed: At Peleliu and Okinawa），后被名导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改拍为电视影集《太平洋战争》（The Pacitic），二○一○年播出。

21 译註：即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一八三五至一九○九年）。

22 译註：姆西里（约一八三○至一八九一年）原本是商人，后因有管道取得弹药而成为军阀，并于一八五六年建立强大的叶克王国（Yeke Kingdom，位于现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

23　译註：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外海，是巴国本土之外的第一大岛，与台湾面积相当。

24　译註：位于索罗门群岛。

25　译註：形容一个人被派驻在远方（通常是岛屿）很久以后，变得有点古怪甚至疯疯癫癫。

26　译註：位于菲律宾中部的雷伊泰岛，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从这里涉水上岸，带领美军展开收復菲律宾的行动，期间为时四天的雷伊泰湾海战是歷史上最大的海上战役。

27　译註：即东条英机（一八八四至一九四八年）。

28　译註：曾为荷兰属地，现称查亚普拉（Jayapura），是印尼巴布亚省首府，位于新几内亚岛的北岸。

第三章
人头落地
DEPOSED HEADS



千百年来，死刑台是真实上演生死大戏的终极舞台。十八世纪中期，爱尔兰政治家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就观察到一个现象，正在欣赏皇室悲剧的剧场观众一听到附近广场上有某个元首即将遭受处决，他们就会迅速朝出口冲去。柏克指出，真实的不幸蛊惑人的力量远比我们对表演台上的苦难剧码的兴趣更强大。这个见解在今天依然适用，但在这个数位化时代，网际网路成为世人观看骇人处决场面的中介，一方面为我们提供绝对安全的距离，同时却又让我们成为第一排观众。今天的人会在摄影镜头前高举被切断的人头，观众则可以在自家观赏那样的景象。伊拉克战争期间，斩首影片的惊人惑众能力首度获得毫无疑问的证实。

九一一事件之后那几年，随着英美主导的「反恐战争」先后在阿富汗及伊拉克地区展开，一种新的杀人模式骤然出现，让媒体措手不及：欧洲人和美国人被伊斯兰好战集团挟持为人质，据以要求赎金，而后在摄影机前遭斩首。在整个人类歷史上，一直是罪犯因为犯了罪而被砍头；现在，罪犯却在骇人情况下斩断平民的头颅，而且露骨的处死影片在网路流传，人人皆可观看。

第一位美国牺牲者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丹尼．沛尔（Daniel Pearl）。二○○二年，他在巴基斯坦遭绑架，挟持者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释放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战士。这种不切实际的最后通牒后来将接连出现。歹徒于二月一日将沛尔斩首，几星期后，沛尔被处决的影片曝光。三月间，影片开始在网路上流传。六月，《波士顿凤凰报》（Boston Phoenix）在网站上提供该影片的连结，结果这个做法受到美国评论界的极端排斥，他们抨击《波士顿凤凰报》「罔顾人类尊严」，但该报网站终究酿成一波提供影片连结的热潮，观看沛尔被斩首死亡的暴力影片是否正确，也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

第二名被人用这种方式杀害的美国人是尼克．伯格（Nick Berg），他也是第一个在伊拉克遭到斩首的美国人。伯格是一名工程师，他在二○○四年四月九日被绑架，五月初遇害。在沛尔惨死两年后，这次路透（Reuters）新闻社在几天内就发布未经剪辑的影片。路透社的说法是，为客户做编辑决定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沛尔的处决影片只在CBS新闻网以三十秒的长度播出，相较之下，这次所有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都播放了伯格遇害的影片，尽管影像都在实际斩首画面出现前停格。虽然传统新闻媒体自我节制，避免播放完整影片，但这时电视制作人已经变成只能跟在群众屁股后面走，而不是在报导最新消息。网路使用者在自家的私密环境中，大胆主动观看伯格遭斩首的影片。

尼克．伯格的处决影片迅速成为网路上被搜寻最多的视频之一。最

初公开影片的是一个与盖达组织（al-Qaeda）有关连的网站，由于该影片造成的网路流量过高，负责代管的马来西亚公司在伯格死亡两天后决定关闭该网站。公司资深主管阿弗瑞德．林（Alfred　Lim）表示该网站被关闭是「因为它忽然造成网路流量暴增，占据太多频宽，导致本公司其他客户的不便」。在一天之内，伯格的死亡影片成为Google、Lycos、Yahoo等搜寻引擎的搜索排行第一名。五月十三日，美国网路上的搜索词语排行榜前十名如下：

尼克．伯格／影片

尼克．伯格

伯格／斩首

斩首／影片

尼克．伯格／斩首／影片

尼克．伯格／斩首

伯格／影片

伯格／斩首／影片

「尼克．伯格」

影片／尼克．伯格

伯格被斩首的影片在连续一星期中成为网路上最多人搜寻的内容，在整个五月间则是第二名，仅次于选秀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

伯格的死亡触发一连串类似的斩首事件，由伊拉克数个伊斯兰好战团体策动，并拍成影片在网路上流传。二○○四年，伊拉克发生六十四起有资料纪录的斩首事件，其中十七名遇害者是外国人，二十八个斩首过程被录影。接下来一年中，伊拉克境内被录影的斩首事件有五起，然后数目一直减少。二○○四年间，获得最多媒体报导的影片也最让民众趋之若鹜。六月，一名美国直升机工程师保罗．强森（Paul　Johnson）在沙乌地阿拉伯遭绑架后被斩首，他死后几星期间，Google上最多人搜索的词语就是「保罗．强森」。二○○四年九月，英国工程师肯尼斯．毕格利（Kenneth　Bigley）在伊拉克被挟持，并于隔月遭挟持者斩首，后来一个美国机构表示，他们在网站上公布的毕格利死亡影片被下载了一百多万次。一名荷兰的网站经营者则指出，每当伊拉克的斩首影片发布在网

站上，每天的阅览次数就会从三十万增加到七十五万。

美国德州、加州和华盛顿州都出现中学教师受到行政休假处分的情事，因为他们把尼克．伯格被斩首的影片播放给学生看。当《达拉斯晨间新闻报》（Dallas Morning News）刊登静态影像，显示攻击伯格的一员，手持伯格被斩下的头颅（但脸部做了模糊处理），他们表示决定这么做是因为看到网路世界对该事件的高昂兴趣。该报社论指出：「今天本报的读者投书版都是与伯格有关的投书，其中大部分是要求本报刊登更多伯格被处决的照片。昨天我们收到八十七封跟这个主题有关的投书，没有一封要求我们停止刊出这种影像。」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在下载影片后会实际观看，不过确实有极多美国民众想看那些影片并进行讨论，特别是伯格的影片，因为他是第一个在伊拉克遭到斩首的美国人，而且他是丹尼．沛尔遇害两年后第一个在处决时被录影的人。伯格遇害时，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度刚开始下滑，而那部影片大受欢迎的现象凸显出在创造新闻话题方面，网路侵蚀传统新闻媒体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电视新闻制作人或许对影片进行了编辑，但这并不打紧，因为民众会自己到网路上观看影片。网路让民众得以透过自行上网搜寻资讯，以抗议主流媒体被有感的「审查制度」箝制的情形，或者藉此随心所欲地全面摆脱对主流媒体的依赖。无论民众是认为亲眼看到伯格被处决的影片是件「要紧」的事，或只是因为好奇心驱使而观看，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群众」正在取得控制权，或说正在摆脱控制━端赖我们从哪个观点来审视。

伯格死亡五个月之后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五月和六月之间，三千万人━相当于当时美国全体成年网路使用者的百分之二十四━看过一些在电视上播放时会被视为太恐怖、太露骨的伊拉克战争影像。那段时间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局势混乱不堪，除了伯格被斩首外，还有美军人员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待囚犯的照片释出，以及四名美国的合同工作者在法鲁加（Fallujah）被叛军杀害的相关照片━他们的尸体被拖着游街示众，然后悬挂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桥梁。媒体上充斥着这种画面，而且美国人甚至积极蒐罗这类影像：在网路上看过露骨影像内容的人有百分之二十八是主动搜寻的。调查也发现，看过露骨内容的人有半数认为自己观看那些影像是「很好的决定」。

决定观看伯格斩首影片与否的问题在网路上被政治化。部落客声称自由派新闻媒体大肆播放阿布格莱布的骇人影像绝非偶然，而这确实严重削弱了布希政权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公信力。同时，在部落客眼中，那些媒体对伯格事件的报导太有限，而且拒绝播出完整的斩首影片，藉此迴避这个议题。伊文．马洛尼（Evan Malony）指出：「媒体一下说我

们必须看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照片，才能了解战争的恐怖，可是伯格被斩首后，他们又说我们无法承受真相……媒体让我们看到阿布格莱布的丑陋事实—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对的—可是拒绝用相同方式处理伯格遇害的事件。」杰．罗森（Jay　Rosen）教授说得更明白：「他们没有把所有东西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刀子、喉咙、尖叫声、挣扎的情景，以及被举起来拍照的头颅。可是来自阿布格莱布那些令人作呕的照片却不断出现。」

其他一些网民承认观看处决影片纯粹是好奇使然，没有更「高尚」的目的。一名匿名网友表示：「我们几乎无法相信一群人可以无情到做出那么残酷而兽性的事，只有亲眼看到才能证实这点……观看这种影片令人百感交集—主要是被害者明显的恐惧和痛苦令人感到不堪，还有对那种血腥的厌恶感，以及对行凶者的愤怒等。」同时，网站编辑们对于公开这种内容也表达出类似的复杂态度。他们公开这种影片可能是因为他们致力打击恐怖主义（民众应该看到），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反对主流新闻媒体实施的「审查制度」（民众有权看到）。「惊恐网站」（shock site）公开这种影片则纯粹为了提供阴森恐怖的娱乐，跟他们播放其他暴力、挑衅影片的目的一样，都是要吸引顾客（来看啊！）。

在斩首影片吸引到的观众中，有些人是毫无歉意地观看，有些人虽然内心充满疑虑，但还是忍不住看下去，而网路为所有人提供了匿名性。摄影机为观众承诺某种程度的超然，且只要键盘一敲，画面就能立即出现，这种双重性使那些影片更加无远弗届。如同军事分析家罗纳德．琼斯（Ronald　Jones）所言，光靠一台录影机和网路连线，任何小小的好战团体都可以塑造出「国际性媒体事件……获致惊人的战略冲击效果」。确实，就恐怖攻击而言，在摄影机前把被害者的头斩断是极有效而且极具效率的策略。这种做法所需的金钱、训练、设备、武器、弹药非常少，除了最初的挟持行动之外，不需要仰赖任何复杂而且可能出差错的协调工作或科技，而做出来的结果又非常容易传播。根据另一名分析家马汀．哈洛（Martin　Harrow）的说法，那种策略「具有最大化的能见度、最大化的影响力，而且会引起最大化的恐惧」。

这就难怪伊拉克的人质斩首影片是「为电视而制作」。其他恐怖主义活动，例如自杀攻击或炸弹攻击，不容易用摄影机捕捉，因为这类行动必然是祕密进行、无法预测而且狂暴混乱的事件，但将人质斩首却可以透过精心的舞台管理、动作设计和预演呈现出来，同时依然保留残酷写实的一面。影片是近距离拍摄的清晰画面，杀人者让观众坐进第一排座位观赏表演，而他们想要呈现的是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组织力、他们坚持的立场，以及他们对受害者的完全掌控和主宰。当一名义大利人质

一保安官法布里吉欧．库瓦特洛奇（Fabrizio Quattrocchi）即将在摄影机前被劫持者枪决时，他忽然跳起来设法把头罩扯掉，并大声叫着：「我要让你们瞧瞧义大利人是怎么死的！」结果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决定不播出这段影片，因为它「太惊悚骇人」。这是库瓦特洛奇在临死前获得的小小胜利吗？没有任何人因为娱乐或教育性的理由在网路上看过他遇害的画面，而擒拿他的人也无法按照原计画来利用他的死亡得到好处。

在这种精心策划的处决仪式中，包括被害者在内，所有人都必须扮演他的角色。整个程序是一齣戏剧，它的目的是塑造权力、引发恐惧，正如十三世纪以降的国家处决。不过，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约翰．艾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教授指出，就伯格遭斩这种处决而言，「关键不在于处罚某个个人，而是利用某个个人」。即便被害者是无辜的人质，源自杀害这件事的张力依然能广泛展现于世间，而且社会大众也对此表示顺从。当观看者现身死亡现场，或透过Google搜寻最新处决影片，他们也扮演了属于他们的角色。

尼克．伯格遇害后不久，一名分析家接受《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採访时表示：「恐怖主义的目的是引发恐惧、制造骚动，而只有靠媒体支持他们的行动，并致力将它散布于广大群众，那个目的才可能达成。」那些杀人者将影片公布于网路，因为他们很清楚新闻媒体将不得不跟着群众的脚步走。电视新闻节目若不是因为拒绝播放在网路上自由流通的影片而变得多余，就是必须做杀人者希望他们做的事，向更广大的观众传播影片。与此同时，如芭比．泽利瑟（Barbie Zelizer）所言，网路提供了一种「责任归属的空白」，没有人能清楚知道影像是谁拍摄的、谁散布的，哪些人又看了那些影像。那整个经验都已经迷失在芸芸众生之中。

一般人认为处决现场那些喧腾叫嚣的广大群众属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过去，事实的确也是如此，但我看了愈多关于处决的歷史文献以后，就愈发觉得过去两百年来处决活动之所以逐渐被掩藏在公众目光之外，甚至在某个程度上酷刑做为一种处罚方式逐渐消失，关键与其说是大众舆论的演变，不如说是菁英社会对文明礼仪的担忧。处决场面一直都吸引群众观看，他们随时乐于欣赏那个情景。死刑台的风景绝对没有忽然变得更不合时宜，而是一群永远愿受到蛊惑的观众变成某种令人难堪的因素，或许也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公开处决画上休止符，不是因为处决这个剧码本身，而是因为在看戏民众的感受与菁英对合宜行为的定义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鸿沟。

十八及十九世纪期间，许多人开始认为能够亲临处决现场旁观是不

自然的事，但这种观念的改变并未防止民众在机会出现时抢着去看，不仅当时如此，未来恐怕也一样。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学者文盲，处决场面一直吸引着各色各样的人。每个人的反应可能不同：有些人会嬉笑怒骂，有些人会用心写下心得，还有一些人会昏倒、呕吐或哭泣，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反应是由文化因素所决定。但歷史给我们的教训是，身为人类，我们确实生来就有能力目睹斩首及其他形式的处决场面，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大众娱乐活动来欣赏。

歷史上只要有公开处决存在，就有群众会前去凑热闹。在十九世纪初期的伦敦，每当有人被处以绞刑，通常会有五千人聚集观看，而当着名重罪犯被处死时，围观民众可能高达四万甚至十万人。尽管时代变迁，这些数字大致上都差不多。一九三六年莱尼．贝西亚（Rainey Bethea）被吊死时，估计有两万人在现场旁观。那次是美国最后一次举行公开处决。不可否认，这场处决的消息事先获得多于平常的宣传，因为有人臆测行刑者可能会是一名女性━佛罗伦丝．汤普森（Florence Thompson）警长。后来汤普森把这个工作委託给一名退役警员，由他负责拉扳柄，打开套索底下的活门。

三年以后，众多情绪激动的民众聚集在法国凡尔赛的圣皮耶（Saint-Pierre）监狱外，观看恶名昭彰的德国籍连续杀人犯奥根．怀德曼（Eugen Weidmann）上断头台。怀德曼是最后一名在法国被公开处决的罪犯，表面上的原因是那天围观群众的行为变得「特别丑恶」。不过，尽管确实有几个人设法爬上附近的屋顶观看断头场面，有关民众喝醉酒闹事的报导都是媒体夸张渲染出来的。

根据歷史学者保罗．弗利德兰（Paul　Friedland）的研究，怀德曼被处决时，真正的问题关键是死刑任务执行的时间被延迟。那天的行刑者新官刚上任，第一次执行任务的他严重低估准备工作所需的时间。结果怀德曼不是按照惯例在破晓时分受刑，而是在光天化日下被处决，让群众中的摄影师能够尽情利用良好的光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刊出一系列照片，以定格影像一秒秒地呈现处决过程。断头台大刀落下的画面甚至被镜头捕捉到两次，而不只是一次。就官方角度而言，更糟的事是处决场面居然被人拍成影片。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网路上找到这个影片，彷彿当时那些「不守规矩」、「令人反感」的围观民众还不够离谱，现在，拜摄影科技进步之赐，成千上万的好奇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观赏公开处决的情景。怀德曼死后一星期，法国就决定停止公开处决–不是因为这种场景恐怖得令人不忍卒睹，而是因为当局非常清楚不管那有多恐怖，民众还是会抢着去看。

欧洲各国早已全面废除死刑，而在美国，由州政府负责的人犯处决不是公开活动，尽管它仍旧可能造成骚动。美国近年歷史上最有名的杀人犯之一–提摩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在二○○一年五月以致命注射遭处决时，大批人潮涌进印第安那州的泰尔霍特（Terre Haute）。除了一千三百多名新闻记者，以及协助他们采访的工作团队，还有数百名抗议人士和一些贩卖食物、T恤、纪念品的小贩，他们都提早匯集在这个小镇，设法在这个事件中获益。「我们吃的、睡的、吻吸的，都是麦克维。」一名当地记者在处决前一个月这样表示。

当然，那些人之中绝大多数并没有亲眼目睹麦克维死亡。进入位于处决室上方的特别观察室，真正看到他死去的，只有十位被害者家属、十位随机挑出的记者，以及数目未公开的政府官员、数名监狱员工，和四名由麦克维挑选的证人（两名律师，一名他的辩护团队上的调查员，以及他的传记作者）。另外有两百三十二名被害者家属在现场附近透过闭路电视即时观看处决情景。

州政府裁定那些证人有权利知道与一个人的死亡有关的可知事物。我们不知道假如有机会的话，是否会有更多人观看州政府实施的处决，但我们似乎可以合理推测，像麦克维这种处决除了直接被他的罪行影响到的人之外，也会吸引一些喜欢窥视的人前去观看。

国家处决重新回到美国或欧洲的公众舞台基本上是无法想像的事，公开斩首更是不可能，但这并不是因为被处决者所受的痛苦所致。当斩首是以高超技术实施，而且犯人处于臣服（或被镇定剂控制）的状态，那是一个快速而且–就我们目前所知–相对无痛的死亡方式，但在人犯处决的歷史中，死刑现场的外在景象向来跟它带给当事人的感觉一样重

要，而斩首确实是件看起来污秽不堪的事。

最近两百年来，在欧洲及美国陆续出现愈来愈低调的处决方法，包括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採用的长距坠落（long-drop）绞刑，以及后来的致命注射。但我们不清楚是否看起来比较不那么残暴的死亡必然也比较人道。美国方面的研究显示，犯人如果选择行刑队开枪射击的处决方式，从第一枪击中身体算起大约一分钟以内会造成心脏死，而典型的致命注射虽然宣称不会节外生枝，却可能需要九分钟左右才能导致死亡。尤有甚者，在准备及实施注射时，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增加犯人承受长而痛苦的死亡风险。枪和断头台或许看起来比较吓人，但相对而言却比较简单而有效。

这种「戏剧效果」和「控制手段」之间的永恆拉扯，就是围绕着死刑这个概念的核心议题。杀人从来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它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奇观性质而且无法预测的事件，而比起其他致死方式，斩首处决尤其如此。司法体系为了显得低调而悲悯，逐渐设法将死刑加以控制，但低调和悲悯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力量，原因很简单，就是处决看起来跟感觉起来不见得一样。这就是斩首处决血腥而赤裸的力量所在。

如果行刑者只有一把刀或一把斧头，要用单一动作干净俐落地斩断一个活人的头是很困难的事，需要相当大的力量、相当高明的技术，有时还得靠运气加持，或者三者同时具备。基于这个因素，被斩断的人头得以成为强有力的战利品。军人拥有战利品首级代表他确实在战场上经歷过赤裸裸的短兵相接，而且通过所有考验生存了下来。战争发生时，战利品首级是优势的象徵、尊敬的来源，它正式宣告战士的技术和力量，但也默认着事件有可能以不同方式发生。反观处决人犯这件事，政府官员无法与民众进行这么随兴的互动。当处决的执行权掌控在国家手中，斩首成为一齣剧码，而这个剧码必须按照预定计画来制作。

因此，千百年来，政府将斩首处死加以官僚化的做法就显得无可厚非。政府在不同时期以各种不同方式任命官员、建立规范及作业文件、制订相关仪式及记录系统、调整斩首的机械性细节，设法将死刑台上的剧码全面纳入管制。政府用这些办法取得战利品首级具有的力量，并依据自己的目的加以挪用，无论目的是宣告罪行、杀鸡儆猴，或恢復国家元首的荣誉和权威。

十三世纪期间，英国境内开始出现仪式化的叛徒头颅公开展示。在许多方面，这种展示大致上不过是战士在战场上高举战利品首级的行为在城市环境中的演进版。在中世纪的英国，取自战场的首级偶尔会被送给国王，然后向民众展示。不同的是这种首级─叛军领袖或叛国贼的头

颅—被送到都市环境中的「表演台」上，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剧情的发展过程。

死于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期间的独立威尔斯最后两位王储—罗威林（Llywelyn）及大卫．格鲁菲（Dafydd ap Gruffydd）两兄弟[29]—为上述两种战利品首级之间在性质上的连续性提供了最佳的实例，因为其中一人是在战场上阵亡，另一人则是在死刑台上丧命。哥哥罗威林于一二八二年在奥瑞文桥战役（Battle of Orewin Bridge）中被英格兰国王的士兵杀死，他的头颅被砍下来以后，首先送给爱德华国王，然后送到驻扎在安格西（Anglesey）[30]的部队，最后又送到伦敦，在伦敦塔的大门上放了至少十五年。据说那颗头颅是由一名骑兵叉在矛尖带进城里。

隔年，罗威林的头颅有了伴—他的继任者、亦即他的胞弟大卫也以英王背叛者的身分遇难；但他不是死在战场，而是被活捉，经过审判后被处以死刑。一二八三年十月，他被绑在一匹马的尾巴上拖过史鲁斯贝里（Shrewsbury）的市街，然后在死刑台上被砍成四大块。截至当时为止，他是透过这种相对新颖、充满折磨而且富于奇观效果的方式死亡的「叛国贼」中地位最高的一位。

在某个意义上，这对威尔斯兄弟的头颅算是战利品首级，因为几乎所有在爱德华一世时代遭斩首的叛徒都是塞尔特「叛乱分子」，他们是英格兰国王设法征服威尔斯及苏格兰时的牺牲者，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三○五年丧命的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31]。跟一般战争的情况一样，爱德华一世的背叛者的首级在象徵意义上比在策略意义上来得重要，因为，就爱德华国王的案例而言，一个人如果遭受斩首的命运，通常是因为他背叛了过去与国王之间的协议，因此国王藉此表达他做为封建君主的愤怒。举例来说，在此之前几年，大卫曾经跟爱德华国王结盟，共同打击他的哥哥罗威林，但当他决定背弃君王，他也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惩罚。

在展示叛徒头颅这个部分，某些习俗逐渐发展起来。罪犯被处决以后，他们的头颅会被展示在市区人潮匯聚的地方—英国的伦敦桥、西敏堂、伦敦塔，爱尔兰的都柏林城堡、法国的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32]或在城市边界上的地点—城门、城墙、桥梁等。死人的尸块一方面宣告犯人的罪行，一方面也象徵对他们的侮辱。为了这种理由，威廉．华莱士在距离他的支持者数百英里之遥的伦敦被处死之后，四肢被砍下，分送到四个北方城镇展示：泰恩河畔纽卡索（Newcastle-upon-Tyne）、特韦德河畔伯立克（Berwick-upon-Tweed）、史特凌（Stirling）及伯斯（Perth）。负责运送华莱士断肢的约翰．赛格瑞夫（John Segrave）爵士获得十五先令的酬劳。根据当时一名编年史作者

的说法，华莱士的四肢被当做他所犯罪行的提醒标志物。先前大卫．格鲁菲在伦敦被斩后，尸块被往西分送到布里斯托（Bristol）、赫里福德（Hereford）及北安普顿（Northampton），也是相同的道理。

不过，叛徒的头颅往往被保留在伦敦，或被送到那里。头颅会获得防腐保存，尽可能使它能长久展示。大卫的头颅「用铁绑住，以免因为腐化而摔落地面成为碎块；然后插在木桩上置于显眼处，让伦敦市民讪笑」。更常出现的情况是，叛徒头颅会被涂上焦油，或用滚水煮半熟，以减缓腐化作用。煮半熟是自古以来常用的做法，特别是用于着名叛徒的头颅，因为这种方法能够延长头颅的「有效期限」。煮半熟的方法与其他文化中的蒸熟及干缩程序性质类似，可以阻碍叛徒头颅的自然分解程序，将其变成军权及国威的长期象徵。

在城市各处维持良好的头颅展示需要耗费可观的时间和精力。从十四到十七世纪，在超过三百年时间中，一名「人头管理员」会住在伦敦桥的门楼中，负责将叛徒的头颅及尸块整理得最具展示效果。腐烂得太严重的头颅通常会被丢进河里，换成比较新鲜的头颅。有时这些展品的陈设方式具有象徵意义。苏格兰贵族阿托尔（Atholl）伯爵约翰．史特拉斯博基（John of Strathbogie）于一三○六年以叛徒身分被处死以后，他的头颅被放在华莱士的头颅旁边，但木桩比较高，藉此表示他的地位比较高。一四五一年，二十六名肯特（Kent）郡反叛分子被处决以后，其中九个人的头展示在伦敦桥，他们的领袖杰克．凯德（Jack Cade）的头颅则置于最中央（凯德在逃离伦敦的途上被杀）。

在其他城市，平常负责巡逻城墙和城门的警卫在必要时也会处理头颅和尸块的展示工作。除了把头颅陈设得醒目以外，他们还必须保护这些展示品，避免它们被家属和同情者偷去埋葬。一七四五年，詹姆斯起义（Jacobite risings）33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着名的「窃头」事件。那年詹姆斯党军官法兰西斯．唐恩利（Francis Towneley）在卡莱尔（Carlisle）城堡被擒，并于隔年七月处死。他被处以绞刑，一命呜呼时用马拉着游街示众，然后斩成四大块，头颅则用沥青浸泡后，插在木桩上展示于伦敦圣殿关（Temple Bar）。不过这颗头颅在那里待得不久，因为它很快就被偷走，由唐恩利家族祕密保存两百年之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它被放在家族祈祷堂的镶板后方，后来改放在餐柜中的一个篮子里，之后又用帽盒装起来存放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德拉蒙德银行（Drummonds Bank）34的保险库。一九四五年，唐恩利的头颅终于从该银行移出，埋葬在家族墓穴中。

一七四六年唐恩利头颅遭窃的具体情况已经难以考证，不过当时这种偷盗行为会受到严厉的处分。一七五四年，两颗展示在约克（York）

一座城门上的头颅消失不见后，市长大人亲自登上城墙顶端观览犯罪现场，英国国王也接获通知，政府则发布悬赏令，民众只要提供任何有助于逮捕窃贼到案的资讯，就可获得奖金。犯行者落网之后，被判处两年徒刑、五英镑罚锾。不过，在至少一个例子中，伤心的家人是靠着耐心获得补偿。一五三五年七月六日，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爵士被处决以后，头颅被插在木桩上展示于伦敦桥，他的女儿玛格丽特．罗波尔（Margaret Roper）和一些朋友则悉心看管着那颗头颅。一个月以后，头颅被拿下来准备丢进河里，但玛格丽特用贿赂方式请求执行者让她把父亲的头带回家。她被枢密院（Privy Council）传唤，并被控持有不可侵犯的物品，但她在抗辩词中表示，她打算把摩尔的头埋葬在家族墓穴中。最终她获得无罪开释，然后据说她用香料把父亲的头颅腌起来保存。一五四四年玛格丽特去世以后，摩尔的头才被埋进坎特伯里（Canterbury）圣登斯坦（St Dunstan）教堂中的罗波尔家族墓穴。

虽然有些人的头颅被他们的支持者救出，有些头颅却惨遭敌人毁容。展示人头的做法使这些展品被迫暴露在进一步受亵渎的风险中。有许多例子显示，天主教殉道者被处决后，他们的尸体会遭到破坏。一五八九年，天主教士乔治．尼可斯（George Nichols）及理查．纳克思利（Richard Naxley）在牛津被处死以后，有些民众用刀子砍嚼他们的遗体。八年以后，政府官员把圣方济各会教士约翰．琼斯（John Jones）的脸部刮烂，然后用粉把它抹黑。一六四二年，休．葛林（Hugh Green）在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被处决以后，一部分围观群众把他的头拿来当足球踢着玩，还拿小木棒戳进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

群众三不五时就会主动介入，设法操控状况。他们会把尸体弄得面目全非，藉此强化处罚效果；他们也会把尸块偷走，使政府拿不到那些「战利品」。这一切都可能使行刑者的工作变得更具挑战性，因为他毕竟背负着让观众享受一场精采表演的责任。

斩首是行刑者的重头戏，围绕在死刑台四周的群众则会很快地为他的表演打分数。砍头是一个重要活动。在英国，这种处决方式通常是富裕阶级的专利，彷佛社会中最有权势的成员被判处死刑时，也应该由国家展现足以匹配的强大力量。过去在许多欧洲国家，斩首被视为光荣的死亡方式，而且相对不痛苦，也比较不会对死刑犯造成羞辱。跪着或俯卧着接受刀锋的致命一击比吊在绳子上来得有尊严，而且如果刽子手的技术好，死亡几乎立即就会发生。在德国，绞刑经常被用来处罚「鬼祟型」的犯罪，例如偷窃或闯空门，斩首则比较常用来处罚公开场合下犯的罪，例如杀人。死刑犯经常设法请求把绞刑、轮刑等判决改成比较轻

松俐落的斩首处决。在荷兰，斩首做为杀人罪的处分方式，通常用于在打斗中犯下杀人罪的犯人，因为这种死法被认为比较光荣。

不同国家会采用不同方法。在德国、荷兰、瑞典及法国，菁英阶级人士是在死刑台上跪着或坐着，眼睛蒙住，然后由刽子手挥剑砍去头颅。英国人则比较喜欢用斧头，因此死刑犯必须采取比较卑屈的姿势，除了跪地，还得脸部朝下，把头放在垫头木上。当然也有一些不按规则实施的例外，例如奥利佛．克伦威尔命令执行处决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刽子手把垫头木位置降低，使国王的身体必须俯卧在地，这样的姿势更具羞辱意味。相较之下，亨利八世比较人道，他同意王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要求，请一名法国剑手专程从加莱（Calais）渡海到英国行刑，王后则以法国式的挺身跪姿受刑。斧头和剑这两种武器都不是很可靠，尤其是在英国，因为英国的刽子手对调整绞刑绳索比较在行，磨刀不是他们常做的事。

观刑民众几乎跟行刑者一样无情。假如剑手动作不俐落，死刑犯的痛苦因此被不必要地拉长，观众可能会向行刑者投掷泥巴、石头，甚至直接攻击他。行刑者是社会中最常遭到谩骂也最令人害怕的角色之一，但当他们把处决工作搞砸，他们偶尔会因此丢掉性命。欧洲各地都曾发生刽子手被人用石块砸死、殴打致死，或在家中被谋杀的事。在十八世纪初的荷兰，有一次当行刑者正忙着用火罐在罪犯身上打烙印时，愤怒的民众设法爬上死刑台，拿起火罐往行刑者身上丢。一四六四年，在德国的奥格斯堡（Augsburg），一名刽子手剑法太差，没砍成犯人的头，他逃到一座桥下，结果还是被一名气愤的观众拿铁棒朝他头上勐打。一六○七年，在德国另一端的采勒费尔德（Zellerfeld），一名刽子手在下手五次之后依然没有达成任务，结果居然在街上被人砍死。十六世纪初期，纽伦堡市议会不得不请警卫保护死刑台，以遏阻那些「拿着榔头、丁字斧及其他武器四处聚集的广大群众」。难怪许多刽子手不得不靠喝酒平缓紧张的神经。

酒精或许有助于强化心神，但对手部的稳定而言只是败事有余，因此无疑使刽子手的问题更大。刽子手行刑失败时常用的一个说词是他看到死刑犯的头在他眼前变成两个，「因此他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在许多例子中，刽子手挥剑砍到下巴，或举起斧头砍进肩胛骨、头盖骨，结果必须重复两次、三次、五次，甚至二十次，才终于把死刑台上的可怜傢伙送上西天。一五八七年，刽子手砍了三刀，才把苏格兰玛丽王后的头砍下来；一五四一年，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女爵玛格丽特．波尔（Margaret Pole）则被砍了更多刀才断头，因为她为了表示向命运反抗，拒绝把头放上垫头木。

这类故事足以显示，就算死刑犯身体被绑住、眼睛被蒙住，要想一刀砍断活人的头还是极为困难的事，而且这还没有把第三者的因素考虑在内—现场观众会叫嚣、起闹、丢东西，刽子手很容易因此分心。就算犯人已经死亡或至少失去意识，也没有人能保证把他的头砍得干净俐落。一八○三年，爱尔兰革命分子爱德华．德斯帕（Edward Despard）被处以绞刑，然后尸体被取下，由一名外科医生负责切断他的头。很不幸，医生「没切到他应该要切的关节，」歷史学者加特勒尔（V. A. C. Gatrell）这样描述：「结果只好拿刀继续砍，最后某个刽子手干脆用手把那头握住，用力扭了很多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头部与身体分离。」最后，德斯帕的行刑者终于能把他的「战利品」举起来，按照惯例向两万名观众高喊：「这是叛国者的头！」

虽然刽子手的工作充满挑战，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一旦斩首任务顺利执行完成，刽子手可能获得极大的殊荣。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比较富裕的欧洲刽子手会聘请助理执行比较不重要的刑罚，但斩首一直都是「大师」的专利。一些关于刽子手的迷思陆续出现，民间则流传他们拥有魔法的故事。据说他们有办法找回走失的儿童或被偷走的财物，靠碰触就能驱邪或治病，而每当有人被判处死刑，刽子手家里的剑就会震动发出响声。有一个故事是说，一名刽子手砍断一个站着受刑的犯人的头颅时，由于挥刀动作极快，因此尸体上唯一看得到的痕迹是脖子四周一圈细细的血渍。还有传言指出某些刽子手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把一大群歹徒斩首完毕。

汉堡刽子手克劳斯．福禄格（Claus Flügge）在一四八八年间完成一项惊人之举：连续斩断七十九名海盗的头。当参议院问他对于缔造这样的成绩有何感想，他回道：「我觉得太棒了，现在我还可以继续执行任务，帮贤明、高贵的参议院全体成员砍头。」显然在场参议员丝毫不觉得福禄格肆无忌惮的幽默感好笑，结果福禄格自己被砍了头。

多数因为勤务执行不当而送命的刽子手只能怪他们自己能力不足或神经紧张。不过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行刑者高举的叛国者头颅被砍得乱七八糟，显见即便是不称职的刽子手也能向身体完全没有防卫能力的死刑犯耀武扬威。于是在十八世纪末期，法国政府决定着手改变这一切。砍头用的剑从刽子手手中被拿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滑轮组—砍人头的机器诞生了。

断头台的设计目的是低调执行斩首工作。当断头台于一七九二年四月在法国首度现身，成为官方处决工具，它的宗旨是使致人于死的残忍工作变得比较干净、速捷、可靠，因此也比较人道而不具奇观效果。当时的评论家对断头台赞誉有加，认为相较于早期那种有如酷刑而且结果

难以预测的施刑方式，断头台是长足的进步。从前的人被处死的速度经常跟他们所犯的罪、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行刑者的技术优良与否有关。现在，所有在法国被判死刑的人都将以同样方式——部断头机器—快速而有效地处决。

然而，一七九○年代最初目睹断头台运作的观众显得相当不以为然。他们习惯看到更戏剧化的场面。断头机器速度太快，甚至让人觉得敷衍了事，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它的运作几乎不会出错，场面不容易出现混乱，在死刑台上的人之间则几乎没有任何互动。没有人会介意看到犯人的头被砍断，大家都已经习惯看到那种景象；相反地，他们失望地发现看不到犯人的头被砍断。初期观看断头台处决的群众最明显的反应是困惑。死亡来得太快，根本不可能看清楚。

本业为医生的法国国会议员苣内–乔治．加斯特里耶（René-George Gastellier）这样描述断头台的速度之快：「从第一个接触点到最后一个接触点，中间没有任何距离，形同一个无法分割的点；刀锋落下，犯人就此不再存在。」群众对这种处决速度吃惊到几乎不知所措，他们会大声吆喊：「把我的木头死刑台还回来！把我的木头死刑台还回来！」大费周章跑到处决现场，却什么也看不到，这算什么？但对有关当局而言，断头台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而得以成为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完美方案：它提供一场不具奇观性质的演出，一种公开进行却又无法真正看到的处决方式。

今天，很少法国人会觉得公开举行的断头台处决是一种「反高潮」，但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民众习惯看到时间拖得很长的死刑，犯人被撑开在死刑台上，遭到剥皮、火烧、刀砍，或在死亡轮（breaking wheel，简称wheel）35上被砸烂。虽然法国在死刑这个领域并不是最具生产力的国家–这个不太光荣的头衔也许可以颁给英国–但他们有办法用惨绝人寰的方式执行死刑。现在的我们很难想像自己生活在那种能够容许恐怖酷刑的社会，更甭论实际看到那种场面，但我们这种观感是相对晚近才形成的。

早期的公开处决可以是极为漫长的过程，但当时的纪录文献却鲜少提到死刑犯身体上的痛苦。根据《雷纳柯斯特编年史》（Chronicle of Lannercost）的记载，大卫．格鲁菲「首先是以叛国者之名被马匹拖着游街，然后是以窃贼之名被问吊，但刻意不让他死去；第三个步骤是以煽动者及杀人犯的名义被去势和开膛取脏、在他眼前烧掉，然后活生生被斩首；第四个步骤则是以反叛分子之名，把他的尸体切成四块，分送到英国四个庄严地点展示，供民众观赏」。36诸如大卫之流的叛国者在文献中被去除人格，因此他们几乎变成只是一具象徵其罪行的躯体。

十六世纪期间，当宗教争端导致数以千计的人被送上死刑台，民众开始比较注意死刑犯的行为：他们走向死刑台时，究竟是会忏悔，还是毫无悔意，甚至快活地信守异端到最后一刻？死刑台上的表演不再只涉及执行司法正义，也开始涵盖对一齣个人剧码最后一幕的观察。到了十

六世纪末期，无论受刑者犯的是什么罪，当局都会印制传单，介绍犯人的背景及他们的罪行，受刑者在死刑台上发表最后演说也成为一种惯例。不过，处决场面依然跟从前一样受欢迎。在欧洲各地，数以千计的人会涌向刑场看犯人被吊死、乱刀砍嘣，或被折磨至死。他们会付出高价取得最佳观赏位置，他们把这件事看成一种娱乐，许多人几乎是带着临床医师的超然心态在观看行刑。十六世纪末期，来自法国蒙佩里耶（Montpellier）的医学系学生菲利斯．普拉特（Felix Platter）在日记中详细描述十五场公开处决。他没有描写死刑犯的反应，但他记录了行刑者是在哪个时间点使用被火烧红的钳子，或在砧板上砍下犯人的手，或斩断他的头，把他切成肉块，吊在城墙外的树上。

一七三七年的巴黎，在许多年不曾有贵族被处斩之后，大批民众聚集在一名贵族的处决现场，挤满附近的街道及看得到死刑台的窗边。刽子手行刑时，没有人吓得倒抽一口气，没有人哭，也没有人移开视线，完全没有。「所有人都鼓掌称赞［刽子手］的高超技术。」一七五七年，在罗伯特–法兰索瓦．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的处决现场–那是众所皆知、残酷得无以復加的「世纪处决」–数以千计民众涌向格列夫广场（Place de Grève）37一带的街头与建筑物，爬上附近的屋顶，耐心等待数小时，看达米安被人用溶化的铅和热油折磨，然后用马匹缓慢而笨拙地将他的身体肢解，最后再由刽子手砍成碎块；但即使面对这般景象，也没有人叫喊或哭泣。「巴黎人看起来像在凑热闹，他们的行为毫无奇特之处，甚至显得满不在乎。他们既没有显现仇恨，也没有流露怜悯之情。」有一个人拿着笔记本越过围栏凑近达米安，仔细写下他在恐怖酷刑过程中所说的每一句话。

一八二○年，卡托街（Cato Street）阴谋分子38被问吊、斩首时，在场十万名伦敦民众看到死刑台上血流成河、「彷彿屠宰场」的情景，不禁发出嘘声，现场一片叫骂和呻吟。一位名叫塞西尔．费恩（Cecil Fane）的观众跟一群人挤在现场上方的一处窗口，他忍不住别过头，结果他的惊怕模样引发身边伙伴们的「强烈鄙视」。其中一名年轻女子「从头到尾看得目不转睛，而且还在犯人吊了几秒钟之后大叫：『还有两个没死！』」

各地民众持续涌向处决现场凑热闹，但在十八世纪结束之际、法国导入断头台时，许多评论家已经开始对死刑台上的血腥展示感到极度不安。虽然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质疑死刑本身，但他们质疑民众的观看欲望。直击别人受苦，而且还显得无动于衷，这样的行为开始被批判为残忍无情、违反人性。尤其女性被认为应该表现出怜悯的本能，因此男性对处决现场那些女性观众的麻木不仁开始表示震惊。

评论家们不只对死刑台上的情景感到惊骇，也对下方民众嬉笑怒骂的行径感到错愕，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惊愕心情并未阻止他们自己为了「见证」同胞们的缺乏感情而跟着去凑热闹。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于一八四○年赴库瓦吉耶的处决现场看他被吊死，他发现观众没有表现出任何「合乎那个场合的情绪……没有悲伤、没有健康的恐惧感、没有厌恶、没有严肃心情；唯一有的是下流猥亵、缺德放荡、轻浮、罪态，用五十种方式炫耀他们的罪恶」。萨克雷当时也在场，他注意到群众中有机械工人、绅士、扒手、国会议员、记者等等；虽然他对于「把我带向那个残酷场面的残酷好奇心感到羞耻而卑贱」，但他还是加入了观看的行列。有些观众在处决现场会受不了，但多数人都能够不带任何特别感情地看罪犯被处死。

我们会假定我们对残酷死亡仪式的厌恶是源自人类的本能与天性，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地，公开处决不但不会让中世纪观众觉得特别惊骇，近代以降的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世纪的人也不会觉得那种场面特别吓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对其他人的痛苦有一种透过强烈想像而形成的同理心，这使我们与过去的人有所区别，但就连这种心有戚戚焉的情怀也可能不堪一击，纵使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虽然包括狄更斯和萨克雷在内的一些人已经觉得奇观性质的惩罚看起来像另一个时代遗留的野蛮遗产（这两位作家在看到库瓦吉耶被吊死以后，都发表文章谴责死刑），但真正开始让有关当局感到困扰不安的，是观众的麻木不仁和受刑者所受的痛苦。

设计断头台的目的是为了去除公开处决的奇观性质，使它显得较为人性而低调。法国的第一座断头台是由一名德国钢琴制作师所建造，当时只有他愿意以相当低的价格接受这么吓人的委制业务。这座断头台的设计概念是临床般的效率，并在一七九二年初由一群医师、政治人物及工程师在巴黎南郊的比塞特尔（Bicêtre）进行测试。一批活羊及死人陆续被放在刀锋下砍头，据以针对技术细节进行最后调整。在接下来几年中，相关单位陆续又在设计上做了一些微调，进一步提升了这部机器的效率。木质滑轨以黄铜沟槽取代，比较不会卡住；后来又装上小轮子，使沟槽不需要用肥皂润滑。原本用来升降刀片的绳索滑轮组改成弹簧荷重的钢夹，可以用槓桿释放，这样的操纵机制使刀片能够在一秒钟内往下坠落二又四分之一公尺。导入橡皮避震装置可以防止刀片在坠落之后重新弹起，造成二度切割。然后是加装一个大型镶锌篮，接收死者遗体，另外还装上一个比较小的篮子或桶子，用来承接人头，使它迅速隐没于观众视线外，不至于在死刑台上滚动。最后还有一个很人道的设计是让断头台可以安静无声地组装，这样一来死刑犯就不必在人生最后一夜听到外头工人的敲打声。斩首工作逐渐变得更安静、更俐落、更可

靠。

此外，死亡不再是由人类的手直接操刀，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施加的撞击力。行刑者的角色因而改变，从恶魔般的刀剑手换成具有自制力而且相当一丝不苟的工程师。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期间，到巴黎的访客见到当时的行刑长夏勒–昂利．桑松（Charles-Henri Sanson）时，都会惊讶地发现他受过良好教育，也很有礼貌，而且还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桑松不需要拥有强健的体魄，但他必须有良好的组织能力。断头台属于行刑长，由他负责保管。行刑前夕，断头台必须在平坦地面细心搭设、精确调整，以确保执行程序快速无误地进行。断头台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保持清洁，血迹必须清洗干净，刀片必须磨利；但在大刀砍下那一刻，行刑者却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只是个旁观者。法国的刽子手成为真正的专业作业经理，这个现象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更为明显：执行处决以前，一群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会熟练地把断头台组装起来。

政府也开始设法与断头台保持距离，并将它委婉地称为「死亡器具」或「司法木具」。行刑者和他的断头台一起活在某种自主环境中，但两者都没有任何官方地位。国家会将死刑犯下包给刽子手，因此断头台彷佛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有点像需要维修及定期加油的引擎。刽子手逐渐对断头台的行刑速度感到自豪。十九世纪期间，报纸会提供与断头台的初运转、破纪录性能及创新技术有关的细节，彷佛砍头是一种运动。断头台问世初期就创下惊人纪录。一七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二十一名吉伦特派（Girondist）39成员在三十八分钟内被斩首；一八○四年，二十六个死刑犯在二十七分钟内魂断刀下。

砍头进入生产期。歷史学者罗纳德．保罗森（Ronald Paulson）认为，很显然「只要持续提供人体给它，这种机器就会继续砍人头，就像别针制造商会继续制造别针」。从一七九三年六月底开始，为期十三个月的恐怖统治时期（Reign of Terror）40，数以万计的人遭到杀害，断头台俨然宰制法国，据说以一分钟砍一颗人头的速度运转。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处决人数依然高得惊人：一八二五年达一百三十四人，一八二六年达一百五十人，一八二七年达一百零九人。一八一○年起，包括杀人和抢劫在内，共有三十种不同罪行得以处死。一八二○年期间，愈来愈多的政治犯罪也变成死罪。

稳定的死刑供应成为良好治理的证据，人民不但容许，甚至会这样要求。法国的刽子手在许多个世纪期间一直遭受公众谩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死刑在一段时间中被视为多余，无助于社会的顺利运作，他们才暂时翻了身。一九○○年代初期，当反对死刑的法国总统法利埃（Fallières）将所有死刑判决改成终身监禁，抗议人士走上巴黎街头高

喲「断头台万岁！戴布雷万岁！」刽子手安纳托尔．戴布雷（Anatole Deibler）在许多年间一直是报章杂志讽刺的对象，但忽然间他却发现自己摇身一变为「惊恐的社会大众的捍卫者」。由于社会上紧张气氛瀰漫，有些认为处决地点可能不好找的民众甚至愿意提供私人厅堂供处决之用。法利埃就职三年后软化了他的立场，于是断头台的刀片又被往上拉起，大众则重新开始厌恶刽子手。

对某些人而言，断头台看起来最前进的面向—速度、机械性的自足—很快就变成厌恶感的来源。恐怖统治期间，断头台似乎自成一股力量，它代表技术的胜利，不但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带有深层的威胁性。最初支持它进场的人以为它能使普通人的死亡更有尊严，但结果它却使死刑犯失去个人性质，让他们看起来都变得一样。机器不懂得差别待遇。砍头不再是罪犯透过死亡获取荣誉的手段，相反地，它剥夺了死刑犯的个人色彩，将所有人化约为相同的基本生物组件—头颅和身体。这个革命的动力室逐渐成为保守价值的表徵，砍头则不过是维持现状的诸多方法之一。

偶尔会出现某个死刑犯鹤立鸡群的情况。一七九四年六月十七日，在一场大量处决—超过五十名「阴谋分子」在二十八分钟内遭断头，其中包括一名杂货商人、一名音乐家、一名教师、一名柠檬水商贩—之后，就连名满天下的刽子手桑松也无法再忍受流血场面。在丧命的人之中，有一名十八岁的女孩妮可．布夏（Nicole Bouchard），看在桑松眼里，这女孩纤细脆弱得「连老虎都会怜悯她」。桑松觉得无法承受，不得不离开断头台。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怕的一天。断头台吞噬了五十四个人。我的力气用尽了，我的心脏受不了了。那个晚上，我坐下来吃晚餐时，告诉我太太说我可以在餐巾上看到血迹……我不会宣称拥有任何我所没有的情感—我太常以太近的距离看到人类同胞的痛苦与死亡，心情已经不容易受到影响。假如我感受到的不是怜悯，那就一定是神经崩溃所造成；我生而应该服务正义，但现在的我却懦弱地顺从一个跟正义背道而驰的制度，或许上帝的手正在为此处罚我。

与此同时，一个卖报的人站在巴黎街头叫着：「快报！快报！这里有最神圣的断头台乐透中奖人一览表。赶快来看啊！今天一共大约有六十人中奖。」

桑松知道他的位置是在一场无法停止的表演秀中央，而所有表演者都必须扮演好他们的角色。妮可的演出无懈可击。当一名副手前来绑住她的纤细手腕，并问她：「这一切都是一场笑话，对吧？」她在泪光中

微笑答道：「不，先生，这是真的。」

其他人面对死亡时不见得这么泰然自若。一七九三年十二月，路易十五的情妇巴利夫人（Madame du Barry）被送往断头台时，完全无法控制她的恐惧。她在死刑台上奋力挣扎，恳求群众救她的命。这是不合时宜的举动。死刑犯被认为应该展现勇气及克制，像妮可．布夏那样。他们或许可以说个三言两语，赢得观众的赞赏，但他们的态度必须体现一种无私的决心，愿意「好好地死」：唯有这样，他们才能证明他们的执着是公允正确的；唯有这样，他们才有权利要求获得不朽。死刑犯经常事先演练他们赴死的那一刻，并请其他犯人扮演刽子手及其助理的角色。当上校副官长博瓦古雍（Boisguyon）在刀下就位时，他告诉桑松：「今天是正式演出—你将非常惊讶我对自己的角色有多熟悉。」

巴利夫人不熟悉她的角色。她严重怯场，而当她开始尖叫，然后瘫软，刽子手也变得焦虑，群众则开始有所回应。他们开始怜悯巴利夫人，并且开始犹疑是否应该不顾她的罪行，停止处决。画家伊莉莎白．维杰—勒布杭（Elisabeth Vigée-Lebrun）在回忆录中描述这个令她印象深刻的情景，并指出「比起赞赏之情，老百姓更容易受到怜悯的蛊惑」，因此她相信「假如这个可怕时代的牺牲者不是那么骄傲，假如他们不是那么勇敢地迎接死亡，恐怖统治可能早就已经结束」。被害者本身是否也已经屈服在断头台的魔力下？巴利夫人的遗言是「等一下，刽子手先生，再等一下下」；但表演终究必须继续下去。

或许巴利夫人那种令人迷惑的恐惧，以及她无法继续表演的事实，都在提醒那天的在场观众一件事：他们也在整个表演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或许他们开始感觉不自在，彷彿他们对她的痛苦必须负一部分责任。断头台把斩首转变成一个不带激情的程序，残酷性质已经被尽可能最小化，但是，将戏剧性从死亡抽离是一个危险的理想。恐怖统治相当有效地证明，只有一种东西比被切断的头颅更恐怖，那就是觉得它很平凡的社会。人类歷史中的大部分时候，斩首的戏剧力量比政治伦理更要紧，而且即使到最后，就连断头台大刀落下，也无法缓解剧情张力。只有在剧情没有按计画进行、表演者忘了他们的台词，或群众行为失当的时刻，制作上的脆弱才会被暴露出来。国家处决是这些表演者全体之间的微妙合作。有些参与者施展的力量比别人多，有些则完全不具力量，但即使是一位死刑犯，他也有可能扰乱剧情。至于群众，他们无法抗拒这部终极戏剧作品的恐怖，于是他们也甘愿成为同谋，与其他参与者一起造就它的成功。

来到二十一世纪，摄影机为砍头事件的自发性质画下休止符。如同电视上的实境秀，「为电视制作」的砍头影片提供一个经过剪辑的事件

版本，使今天的刽子手能与他的影片制作人分享他的权力。故事的一部分被留在剪接室地板上。如果这样做似乎是在对网路上所呈现的恐怖谋杀轻描淡写，那么这也是效果的一部分，因为现在，身为观众的我们无需实际看到某个人死去的情景，也能够观看那个场面。表演变得比从前更壮观，而且现在要扰乱它的机率非常低，因为参与者从来不会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也没有人能弄清楚是谁在策划这场表演。

二○○三年十月，脸书上有人分享一段视频，呈现墨西哥一名身分不详的女子被砍头的情景，而且影片没有警告内含血腥暴力。这段视频引发强烈抗议，脸书一开始拒绝移除影片，因为脸书声称它的角色只是促进内容分享及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不是针对人们的讨论进行编辑。这个社群网站强调，使用者分享这段视频是为了谴责它；假如他们是在赞扬这样的影片，脸书的处理方式必然会不一样。不过，当这个事件开始受到高度瞩目，而且英国首相大卫．卡麦隆（David Cameron）明言表示脸书的决定「不负责任」，脸书终于将该影片移除，承认它有「颂扬暴力」的可能，并宣布以下政策：将针对分享暴力影像及视频的使用者进行重新审视。

脸书不希望被视为不负责任的网站，但它也不想为使用者的行为负责。在这个案例中，脸书如果逃避它对那些在网路上分享视频的人的责任，就等于是在逃避它对观众—特别是儿童—的责任，这些人在决定观看影片以前，可能无法理解影片的性质。网路模糊、淡化了事件的责任归属，同时却又让使用者以前所未见的便利性参与事件。我们可以观看别人的死亡而不受社会谴责，甚至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这件事。我们不禁要问：家庭成员、青少年、儿童、心理脆弱的人，他们是否受到适当保护，不会看到这种容易造成心灵创伤的影片？该如何保护他们？这些问题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式。对其他网路使用者而言，观看这类视频已经成为个人良知的问题。不过，或许情况一直都是如此，因为群众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不要看。

29　译註：罗威林．格鲁菲（约一二二三至一二八二年）及大卫．格鲁菲（约一二三八至一二八三年）是罗威林大王（Llywelyn the Great）的孙子。罗威林大王于一二一六年徵得宗主国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同意，将威尔斯地区各王国统一为威尔斯公国，并由他统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先后与罗威林及大卫交战，并将其杀害，全面征服威尔斯。罗威林及大卫因而分别成为独立威尔斯最后一位国王及独立统治者。

30　译註：威尔斯西北部的一个岛屿。

31　译註：威廉．华莱士（约一二七○至一三○五年），苏格兰贵族、骑士，苏格兰独立战争领袖之一。一二九六年英格兰併吞苏格兰，他带领人民对抗英格兰，后因部下出卖被捕，遭英王爱德华一世以叛国罪之名处死。

32　译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广场即现在的巴黎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

33　译註：詹姆斯起义是一六八八至一七四六年间发生于英国的一连串起义事件，目的是让光

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期间遭国会罢黜的苏格兰王詹姆斯七世和最后一位天主教英格兰君王詹姆斯二世，以及后来的其他斯图亚特王朝后代回归王位。

34　译註：目前隶属于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集团。

35　译註：死亡轮是古代用于公开处决的一种酷刑，十八世纪才废止。受刑人被绑在轮子上，刽子手以棍棒等钝器击打他的四肢，把骨头打断，然后受刑人通常会被留在原处直到死亡。

36　译註：以上程序即英国中世纪末期至近代处决叛国者所用的「拖行、问吊、分尸刑」，于十四世纪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立法通过实施，一八七○年正式废止。先前提到的法兰西斯．唐恩利也是以类似方式遭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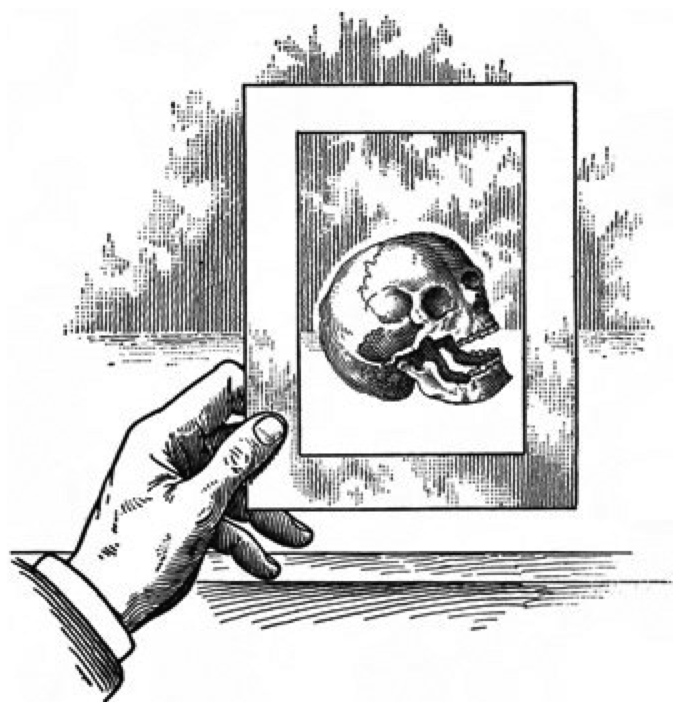
37　译註：即现在的巴黎市政厅广场（Place de l’Hôtel-de-Ville）。

38　译註：一八二○年，一群人在伦敦卡托街集会，密谋杀害全体英国内阁成员及首相利物浦（Liverpool）伯爵，史称卡托街阴谋。

39　译註：吉伦特派（【法】La Gironde）是指一七九一至一七九五年间源自吉伦特（Gironde）省的一个政治派别，主要代表信奉自由主义的工商业资产阶级。

40　译註：恐怖统治（【法】la Terreur）也称雅各宾（Jacobin）专政，从一七九三年夏天持续到一七九四年夏天，是法国大革命期间一段充满暴力的时期。当时罗伯斯比（Robespierre）领导的激进共和主义雅各宾派统治法国，与较温和的吉伦特派争夺政权，成千上万的人被控反革命，遭到处决。

第四章
画框里的头颅
FRAMED HEADS



「英国青年画家」（Young British Artists）运动[41]的创始成员之一—马克．奎恩（Marc Quinn）以雕塑作品《自己》（Self）闻名。他用自己的九品脱冷冻血，铸造出他自己的头。《自己》是一个持续进行中的计画：奎恩的第一个「血头」雕塑创作于一九九一年，此后他每五年再制作一颗头，藉此记录他的老化过程。查尔斯．萨契（Charles Saatchi）买下这系列血制艺术家上身塑像中的第一个作品，第四个作品则已由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购置。

奎恩将《自己》形容成「终极肖像」。「对我来说，这个雕塑源自一种想要把肖像艺术推向极端的想法，让这种艺术表现变得不只是具有模特儿的造形，而且真的是由模特儿的血肉所制成。」奎恩对人体表现方式的极限充满迷恋与执着，这促使他后来用自己的粪便铸造出他的头，以及在他喜获麟儿之际用胎盘铸造出新生婴孩的头。当然，无论这些作品有多露骨，它们都还称不上「终极肖像」—奎恩是否会将自己死后的身体奉献给他的艺术任务，把他自己的头颅放进冷冻玻璃柜，让世人观赏呢？「是的，我有想过这件事，」他说：「关于哪些东西可能会有意思，目前我还没有下任何结论，而且我也必须考量家人的想法。不过能够用自己遗留的东西创作，那真的会是终极的作品。」

这确实令人惊愕，但奎恩的「终极肖像」概念其实是在玩弄一个悠久的死人雕塑传统，其宗旨在于为创作对象赋与尽可能逼真的形象。活人肖像只能抓住时间中的某一个瞬间，但死人肖像却彷彿在声称，它具有那个人整个生命的某些根本要素。通常一幅肖像会记录下艺术家和模特儿之间的某种关系，或至少是某个互动；但当「模特儿」是个死人，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创作对象的最后一幅肖像变得最逼近真实，正因为它超乎双方关系的影响。做为一个完全未经模特儿中介的艺术表现，它显然得以摆脱所有与艺术诠释或坐立摆姿有关的限制因素。

奎恩的创作概念令人联想到制作死亡面具的传统。死亡面具在十九世纪非常盛行，它所颂扬的概念是，死亡的时刻可以揭示出创作对象最纯粹的一面，因为他已经不再受到人生烦忧所扰。从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到侦探小说作家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从英国文豪威廉．渥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到美国男星詹姆斯．狄恩（James Dean），无数作家、政治家、作曲家、演艺界名人都在死后数小时之间让人在脸上浇上一层层石膏，藉此设法永远为他们的容颜留下最精确的表情。死亡面具为当事人提供实体遗迹。虽然死亡面具宣称具有未受艺术家影响的真确性，但它的制作过程却包含相当程度的艺术手法。创作对象的脸孔必须先涂上一层油，然后才开始上石膏，每一层石膏的厚度只有几公釐，涂布石膏时还要嵌入纱线，这样一来，

取下干燥石膏时才不会损坏它所復刻的表情。

在创作对象死亡后，尽速展开死亡面具的制作工作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才能在血液冷却、五官僵硬之前，捕捉到最逼真的形象。这门艺术的一位大师乔治．柯尔布（George Kolbe）曾经抱怨：「经常有人告诉我死者生前有多么美，而现在他却变得那么吓人。」生与死之间的界线提供一个清晰澄澈的时刻，死者体内的那个人彷彿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诚实揭示出来。死亡面具曾经是一个深受欢迎的纪念形式，而且不只有社会菁英趋之若鹜，许多遭断头处决的罪犯的脸孔也会透过这种方式，用石膏永远固定起来。每一副铸造出来的作品，都为某个曾在处决当天被高举示众的人头提供永恆的版本。

奎恩的「终极肖像」当然呼应了断头台—即歷史学者丹尼尔．阿拉斯所形容的「肖像机器」—本身的阴森作品。断头台制造即时呈现的「肖像」，这个肖像被高举示众，以资证明叛国者的身分，一个人就透过这样的肖像被永远「撷取」下来了。确实，法国刽子手的一名助理后来得到「摄影师」的称号，因为他的工作是在受刑者死亡之前的最后几秒钟调整他的姿态。他必须抓住犯人的头髮（假如犯人秃头，那就抓他的耳朵），把他拉到刀片下方的定位，为了最后那幅肖像，所有细节都必须完美无瑕。

若说照片使时间停止，让摄影对象转化成一个可供拥有的物件，那么断头台也等于拍下了一张照片，将它的对象永远保持在静止不动的姿态中。拜一个现代科学及工程技术上的小小奇蹟之赐，断头台以类似于照相机的原理，在一道闪光中产生骇人图像。这个「创作成果」同时受到物理法则及人类艺术作为的管制，因为「摄影师」唯一需要做的事是按下按钮，然后照片就会出现，跟光线落在透镜上一样肯定。

做为科学的机器，断头台和照相机都宣称它们从事的是制造真实的专业：两者都在标记时间的停顿，以及创作对象在同一瞬间为接受审视而被抛进的孤立处境。这种机器宣称没有自己的意见，只是在事件发生时进行记录。断头台创作一系列断头肖像，让行刑者高举示众，做为这样一部机械设备，它负责产生叛国者的「证据」或「印制图像」，每一位受刑者轮流让断头台将他们从「人」转化成某个「类型」—罪犯的类型。

十九世纪末期，摄影技术开始被用来制造关于人类体型结构的科学事实，而「大头照」则是这项工作的核心。那个年代非常流行「人相学」，这门学问的立论是：一个人的脸部外观与其性格的内在构成之间具有直接关连。在新型摄影科技与人相学的相互作用下，头部照片成为

有力的科学工具。仅仅倚赖应用物理学的法则，拍摄对象被孤立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中，头部照片因而似乎提供了关于真实的明确纪录。于是，无以数计的罪犯、疯子、穷人、外国人被摆在测量尺规和框格中，与照相机之间构成一段精准的距离，然后头部的完整正面和侧面照片就会产出，做为比较对照之用。「掌握真实」的假象为照相机后方那个人带来权力，他积极地将他面对的个体转变成某个种族及社会「类型」，剥除他们的人格，将他们化约成一个单一的定义型特徵—「一个典型的原住民」或「犯有以非暴力手段窃盗他人财物的罪名」—而这一切就好比断头台在忙着制造叛国者。

比较早期时，断头台为记录型艺术家—主要是镌版画家—提供直接的创作灵感，他们抓住这个机会，用简单线条将最近被斩下的头颅画成廉价图画，销售图利。事实证明这是个很好的商业策略，因为很少人能抗拒细看最近一名叛国者脸孔的欲望，即使是那些在处决当天前往现场观看的民众，绝大多数也难以真正窥见场子中间发生的事。断头者图像很容易制作，而且艺术家可以声称自己没有让创作意图介入其中。该图像将实际场景化约到只剩下最基本的元素，画面上没有背景，没有服装或道具，死者遗体也没有显示出来。它把实际事件的戏剧性转化成完成任务的宣告。

断头画像沿袭一个约定成俗的规格：在每一幅作品中，刽子手的手都抓着死者头髮举起头颅，刚被切断的脖子下方则还在滴血。血这个创作细节是为了证明画面呈现的是对一个死亡时刻的精准记录。断头者图像看起来彷彿是「写生」—在创作对象被实际剥夺生命的那一个精确时刻加以临摹。

断头台透过一个中立的机械技术，将受刑者的脸部表情固定下来，而版画、石膏塑像、照片都只不过是在勉强模仿断头机器的作业成果。断头台上的死亡将所有暧昧与矛盾—无论是在证据、动机或评断方面—从受刑者的人生故事中抽离，只留下唯一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徵：这个人是因为犯下叛国罪而遭到处决。观众亲眼目睹罪犯类型的建立。「看啊，叛国者鑑！」

断头台在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在狂热的观众眼前，煞住了时间；它制造出一幅「终极肖像」，材质是真正的人体组织和皮肤，并且排除了所有艺术诠释面的限制因素。若说断头台是一部终极肖像制造机—一部显然曾经吸引大批群众的机器—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的作品描述为「美丽」的呢？

马克．奎恩探索丑陋与美丽之间的边界，邀请我们从有机物质的角度欣赏人体的美，而不只是把这种美当做一种美学理想来看待。他被比喻为现代的卡拉瓦乔（Caravaggio）42，两人都受到临终人体的吸引。卡拉瓦乔喜欢把他那些即将失去头颅的创作对象，永远悬浮在那个介于生与死之间的痛苦时刻。在《圣约翰遭斩首》（Beheading of St. John）43这幅画中，不幸的犯人脖子已经被斩，但尚未切断，刽子手则伸手持刀准备完成任务，但当然，刀子永远不会落下。与此同时，莎乐美（Salome）44的女僕捧着银盘倾身向前，准备承接受难者的首级，但她不忍直视。也或许，尽管眼前出现血腥恐怖的景象，她依然受到驱使，不由自已地往事件核心靠近。

斩首经常被视为具有性爱性质的行为，纵使这个观点显得不合逻辑。《圣经》中友弟德（Judith）及莎乐美的故事都涉及断头予人的震颤之感，而这两个故事的戏剧张力也不断吸引歷代艺术家诠释诱人舞蹈、残酷处决、银盘乘装新斩头颅等元素。在《新约圣经》中，希律王的继女（也就是一般所指的莎乐美）在他的生日餐宴上跳舞悦众，希律王欢喜之下，起誓应许她的任何要求。她向母亲请示，母亲告诉她要取施洗者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希律王感到犹疑，但还是应允了莎乐美的要求。于是曾经抨击希律王娶莎乐美之母为妻的约翰便在狱中被斩首，头颅放在托盘上带给莎乐美。

友弟德的故事也以女人的危险诱惑力为核心要素，不过友弟德与莎乐美是不同类型的女人。莎乐美年轻而天真，友弟德则是经验老到、精于算计的熟女。友弟德是个美丽而富有的犹太寡妇，她离开被亚述军包围的家乡—以色列伯夙利亚（Bethulia）城，计划用美色诱惑敌军统帅何乐弗尼（Holofernes），藉机颠覆敌军。她允诺何乐弗尼说会把族人的机密洩漏给他，藉此赢得他的信任，然后在他酒醉沉睡时拔他的剑砍下他的头，将其带回给族人做为标志。亚述军发现统帅被杀，仓皇而逃，以色列因而获得解救。45

莎乐美和友弟德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底蕴—某种亲密感。这两个女人在艺术作品的描绘中都与断头紧密相关，友弟德甚至亲手斩断一个人的头。在刽子手的斧头及断头台的刀片下，被切断的头颅必然是具有亲密性的物体。经手头颅、切断男人颈项的女人在神话叙事中几乎是出自必要而洋溢诱惑魅力。她们或许无法靠蛮力战胜男人，但她们可以靠美色解除男人的武装。

美丽女子与死亡男性头颅之间的对比为艺术创作提供绝佳机会，友弟德及莎乐美因而能够在整个文艺復兴时期陆续出现在艺术作品中。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卡拉瓦乔、多纳泰罗（Donatello）46都以友弟德为创作素材，米开朗基罗把她塑造成优雅的女性，卡拉瓦乔将她描绘为血腥残忍，多纳泰罗则让她展现胜利者姿态。断头的绘制有可能带来实务面的挑战，因为受到致命伤害的模特儿极难碰到，因此艺术家通常必须退而求其次，以确实拿得到的死人头颅为范本。卡拉瓦乔画到一半时，发现他把何乐弗尼头颅的角度画错了，因为他想画的是被斩到一半的头。经由现代X光测定显示，他先画了第一颗头颅，然后重新放置范本，又再画了一次，让它呈现适度的松弛角度。

十九世纪末期，莎乐美的形象愈来愈富于强烈的性爱性质，以半裸、自满、挑衅的妖媚姿态，握着她那骇人的战利品，出现在歌舞厅、早期电影，以及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e Klimt）47、法兰兹．史图克（Franz Stuck）48等画家的作品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莎乐美被视为狡猾多于聪慧、力量源自性魅力的女人。在那个年代的真实社会中，愈来愈多女性藉由追求教育、工作、平权，设法脱离她们的「合宜本性」，于是在许多艺术家眼中，莎乐美成为性爱怪兽，这个情形绝对不是巧合。莎乐美用银盘捧着的战利品—一颗男人的头颅—象徵着男性面临女性解放时可能会失去的一切。那颗头颅代表男性的领导权、他们的权威，以及他们在智识与专业上的霸权。可是现在，女人却把它捧在胸前，彷彿成为它的情妇，然后在近乎狂喜的復仇状态中继续展现曼妙舞姿。

《圣经》故事给了艺术家一个机会，设法靠想像砍掉某个人的头。在十七世纪初期，义大利艺术家阿特米西雅．珍提列斯奇（Artemisia Gentileschi）参考卡拉瓦乔的作品，描绘出友弟德的形象，但在她的画笔下，友弟德肌肉更发达，意志也更坚定。珍提列斯奇曾被她的指导老师—艺术家阿戈斯提诺．塔西（Agostino Tassi）强暴，因此有些艺术史学者认为她所画的友弟德具有自传性质：绘画给了她机会报復强暴者，她在画布上砍下对方的头，藉此表达她的愤恨。确实，珍提列斯奇画中的女人袭击何乐弗尼时展现的肢体力量，使卡拉瓦乔描绘的场景几乎显得只是古怪滑稽。

执行虚构的斩首处决可以在幻想层面上提供的自由当然不仅止于此。假如砍头可以是一个奇思异想，那么何不切断自己的头呢？许多艺术家确实这么做了。他们用画笔描绘自己被斩断的头，在作画过程中凝视自己的眼睛。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49、克里斯托凡诺．阿洛里（Cristofano Allori）50、卡拉瓦乔、艾德瓦．孟克（Edvard Munch）51、保罗．高更（Paul Gaugin）52都曾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砍自己的头。有些人把自己画成何乐弗尼，有些是画成施洗者约翰；卡拉瓦乔把自己描绘成滴着血的歌利亚（Goliath）头颅，由青年大卫（David）以几乎懊悔的态度高举在手中。比较常见的情形是男性艺术家把自己描绘成妖媚女人的牺牲品。阿洛里把他的情妇画成友弟德，他自己的头则是何乐弗尼；孟克把自己描绘成倒在血泊中的施洗者约翰，莎乐美则化约为几束髮捲，性别不明。这些都很难解读为对男女激情所下的快乐註脚。法国超现实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主张艺术「诞生于一个无法癒合的创伤」，意指残害是艺术作为的先决条件。同时，艺术也使永恆的创伤成为可能。斩首的意象为艺术家开启一个空间，在那里跟自己的心魔角力、冥思自己的必死命运。

西奥多．杰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创作了一些艺术史上最撼人的断头画作。他的油画《断头》（Têtes coupées，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立博物馆典藏）及《断头处决男的头颅》（Head of a Guillotined Man，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典藏）都是残酷得毫无保留的作品。头颅摆在血迹斑斑的白布上，其中一颗嘴巴开启、双眼睁大，彷彿对自己的死亡感到震惊。在这些细腻程度惊人的作品中，杰利柯传达出一种对精确性已经到执迷不悟的迷恋。

杰利柯是在一八一八年末或一八一九年初创作这些画，当时他的年纪是二十七岁。同一时期他正在画《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Medusa），那是一幅规格将近五公尺乘以七公尺的油画，他为此特地在巴黎胡勒郊区（Faubourg du Roule）53租下一间安静的大工作室，在那里闭门造车。《梅杜萨之筏》描绘的是一八一六年七月法国海军舰艇「梅杜萨号」遇难后，一群倖存者在木筏上漂流的情景。他们在大西洋海面一共漂流了十二天，一百四十七名遇难船员中只有十五人存活，其中五人在获救后数个月间陆续死亡。梅杜萨号的故事是一个关于飢饿、脱水、食人、疯狂的可怕传奇，在一八一六年末被报导出来以后震惊法国社会。随后在整个一八一七年间，船长在失职及弃船的罪名下接受军法审判，吸引舆论的密切注意。

梅杜萨号海难事件给了年轻的杰利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奠定他做为艺术家的名声。那是一个当代发生的新闻事件，充满身体与情感上的戏剧张力，紧紧抓住民众的想像，并成为他为巴黎美术沙龙创作大型绘画的素材。杰利柯开始准备绘制一幅巨大的油画，而由于他是个绝对理想主义者，他仔细研究了故事的所有面向。他致力收集书籍和剪报；他拜访海难倖存者，并与他们结为朋友，其中包括设计救生筏的木匠，这名木匠特别为杰利柯按比例制作了一个模型；他也设法研究死亡在人体上产生的效应。事实上，杰利柯等于是将他的工作室变成了停尸间，他从附近医院收集到一些尸块，并研究它们的腐烂过程，到后来连他最亲近的朋友几乎都不敢踏进他的工作室一步。

杰利柯的工作室位于波戎（Beaujon）医院附近。在这里，他可以研究垂死病人的身体退化情况，以及死亡者的身体。他跟护士及医学院学生达成协议，让他可以参观医院解剖室，并将截断的身体部位带回工作室。据推测他应该是把那些腿和头颅偷渡出医院，因为在当时，掘墓和解剖只在医学专业范围内被允许。胆子小的人难以承受这类活动。一名医学院学生记得他第一次进波戎医院解剖室的情景：

……这座人肉屋，散落各处的肢体，面目狰狞的头颅，半开的头盖骨，令人作呕的臭气，脚下踩的血泊……无不把我吓得跳窗逃出讲堂，我用最快的速度逃走，喘气跑回住处，彷彿死亡及它的恐怖仪队紧追在后。

这就是杰利柯研究受创尸体结构并据以绘成素描的地方。他也会到巴黎的殡仪馆参观，在那里，无人认领的尸体会被放在大理石板上供人观看。

现在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在十九世纪的巴黎，殡仪馆是最受民众

欢迎的公共景点之一，它甚至出现在汤玛斯．库克旅行社（Thomas Cook tour）54的市区观光行程中，每年有一百万人到那里参观。一家报纸宣称：「在巴黎，无论是本地人或外地人，我们很难找到有谁不曾到那里朝圣。」殡仪馆内里有一间空间宽敞、灯光明亮的「展示厅」，访客可以在那里隔着大型玻璃窗看到裸裎的尸体（只在私处盖了一块布），而每当其中一具尸体引起媒体注意—例如漂在河上被找到的小孩—数以千计民众就会亲自去看。因此，杰利柯对死人的好奇本身并不算不寻常，尽管他的专注探究确实使他与众不同。

在数个月期间，杰利柯把全副心力灌注在这个题材上，不断嗅闻、触摸、感受身体创伤及腐化作用的真实面貌。他详细研究木筏漂流故事的所有细节，并且跟他要画的人物一样与死亡共处。他把头髮剃光，与社会隔绝，只让一小群亲近友人到工作室拜访他，并设法请人带食物到那里给他。在那段自我隔离的时间中，他创作出他的断头系列画作。

过去这些画作曾被认为是《梅杜萨之筏》的预备习作，虽然并没有任何头颅被纳入这幅巨作的最终构图，而且这幅画中的所有人物，包括尸体在内，都是依据活人模特儿画出来的。与其说是预备习作，杰利柯的断头作品似乎应该是他为了探索斩首在情感及身体面引发的后果而做的私人练习，因为它们从来不曾公开展示。这些作品与他在人类苦难及其极限方面的深层思索有关，同时也显示他决心实际体验他即将描绘的一切。

杰利柯的头颅绘画跟他的断肢练习作品一样，都受到许多艺术史学者的关注，不过这些画抛出的问题多过它们提供的答案。不同于他为《梅杜萨之筏》所做的其他练习画，这些画作都是完整实现、经过仔细构图的艺术作品，但它们也充满矛盾与暧昧。这些写实得令人心惊的画作一部分是想像的作品，因为至少有一幅所谓断头画其实是按照一名活人模特儿画成的，而且就连那幅真正依据断头（那颗头源自一名在比塞特尔被斩首的小偷）画成的作品也含有一些额外的细节，例如鲜血，这些元素一定都是他自己加的，因为头颅的血在杰利柯作画前一定早就流光了。这一切都表示，尽管这些画写实得不可思议，而且诞生自创作者对解剖室的着迷，但它们绝对远远不只是人体解剖结构方面的练习。这些画作也代表某种冥想，巧妙诠释断头台在法国社会中的黯黑存在。或许杰利柯用画笔为模特儿断头的举动是一种尝试，他希望藉此全面明瞭那把「国家剃刀」的恐怖。

杰利柯在画头颅时赤裸裸地呈现血淋淋的颈干，甚至将它往前推向观者，使观者无处可躲。他的细节刻画清楚得几乎无法原谅，但他也非常注重斩首死亡造成的情绪效应，因为他似乎画出处决程序的不同时

刻：以《断头》为例，他画的一颗头颅表现斩首引发的焦虑，另一颗女性头颅则显示残酷处刑结束之后那宛如睡眠般安详的死亡图像。杰利柯想表达的讯息是暧昧的：他是在谴责断头台的恐怖，还是陶醉在那种恐怖之中？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杰利柯反对死刑。他的好几个朋友和客户是自由派政治组织基督道德会（Société de la Morale Chrétienne）的成员，该组织致力推动废除死刑，而且艺术史学者认为杰利柯很可能也支持这项运动，不过他的画作本身政治色彩并不浓。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十五年后贾克—雷蒙．布拉斯卡萨（Jacques-Raymont Brascassat）描绘的人物—即将成为刺客的吉乌赛普．费耶斯奇（Guiseppe Fieschi），跟杰利柯的作品相比，这幅画的政治意涵就非常明显。

费耶斯奇在一八三六年被送上断头台，因为他参与一场暗杀法国国王路易腓力（Louis-Philippe）55的阴谋。布拉斯卡萨把费耶斯奇被斩断的头画成一幅肖像，他画的头竖立在布料上，虽然上面有血迹，但被切断的脖子掩藏在布料底下，几乎完全看不见。头颅沐浴在来自上方的光源中，表情虽然显现挫败，但也充满尊严。他看起来几乎算是安详。布拉斯卡萨也画出断头台，位于费耶斯奇头颅后方的阴影中。一排血红色题字呈献给这位被处决的激进人士，与贾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56献给马拉（Marat）57的题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将费耶斯奇定位为政府压制下的烈士。简言之，布拉斯卡萨将他画笔下的断头做了整理，并设法向观者保证，在他选择的骇人题材背后，有一个深具意义的政治理念。杰利柯没有为他的观众提出这样的保证。他画的人物都是无名氏，而且都不知何故遭到凶狠摧残。

杰利柯不对他作品中的恐怖做解释，而是彷佛在那种恐怖中流连。他的绘画都经过仔细布局，并以戏剧化的灯光衬托。男性及女性的头颅从黑暗的房间中冒出来，并排斜倚在垫布上，令人联想到死亡的囍床。在其他画作中，彷佛没有关节的手臂和腿在温暖的光线中优雅交织，暗示着具有性爱意味的拥抱。杰利柯打断我们的期待，因为我们的震惊而欢喜。他的画作比较恣纵，在这点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氛围。杰利柯不是唯一受生死的黯黑事实所吸引的艺术家。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恐怖是很大一门生意。廉价的恐怖小说成为畅销书，阴森的剧场表演吸引爆满的观众。蜡像博物馆中的「恐怖展览室」，以及以骨骸或尸体起死回生的意象为号召的魔幻灯笼秀，无不吸引大批群众，更不用说那些展示于市立殡仪馆的「真品」，或经常在运作的断头台，这些都能创造大批观众。杰利柯的断头及残肢画作与这种对恐怖的迷恋有关，不过他的作品也会将这种迷恋抛进人类生死的严酷现实中，藉此加以嘲弄。

尽管有种种政治意涵、医学影响、情感牵扯，尽管杰利柯的这个创作主题无可避免地存在于当时的法国社会文化中，而且受到欢迎，但无庸置疑，最令杰利柯陶醉的因素是苦难所蕴含的美学。他会成为一位浪漫主义运动的英雄人物绝对不是偶然。他画罪犯、疯子、病患、穷人和死人。他在别人不忍卒睹或瞠目结舌的地方看到了美。他的一位朋友西奥多．勒布杭（Théodore Lebrun）记得自己在杰利柯创作《梅杜萨之筏》那段时间见到过他。当时勒布杭患有黄疸，这个疾病把他整得可说是不成人形，惊恐的民众在街上看到他甚至会赶忙把门关上，但杰利柯却告诉勒布杭：「你好美啊！」并请他摆姿让他画一幅肖像。勒布杭发现他「在这个到处寻找死亡色彩的画家眼中显得很美」。

杰利柯认为伤残之美比古典美感更真实、更有意义、更具张力，尽管现在我们看得出他的作品可以冠冕堂皇地在古典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梅杜萨之筏》这幅画里，我们看到身强体健、肌肉线条栩栩如生的勇士奋力解救一群消瘦悲惨、在疯狂与死亡边缘挣扎的落难者。这些使《梅杜萨之筏》广受好评的英雄人物，正凸显出杰利柯在古典美学上的造诣。当时很少有人探讨杰利柯作品的传统性格，无论是喜爱他的艺术或讨厌他的艺术，几乎所有人都把他视为革命派创作者。以古典学派守护者自居的尚–奥古斯特．多明尼克．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58认为《梅杜萨之筏》令人惊骇。「我不想跟《梅杜萨之筏》或任何其他那些跟解剖房有关的图画沾上边，那些画把人画成尸体，一味展现丑陋、可怖。不！我不要那些东西！艺术无论如何都必须是美，必须只教给我们美。」相形之下，杰利柯的朋友及精神传人欧仁．德拉克鲁瓦（Eugène Delacroix）59看了几幅他的人体解剖练习画作之后，就毕生无法忘怀；在他眼中，那些画「超凡绝顶」，无疑「应该被理解为『美』的最佳论据」。

杰利柯画断头的故事很容易成为被人夸大渲染的题材。先前我自己就已经把他在一八一九年租的画室描述成停尸间，在我之前，无数其他作家也曾这么比喻。但今天硕果仅存的这类画作描绘的只有一颗断头（他画了好几次）、两根截断的手臂及一条腿。原本想必有更多。一八二四年他的画室出售时，有一本目录列出一组包含十幅画的「人体各部位」习作，这可能代表有其他一些他以肢解过的人体为题材的习作已经散逸。现存的几张剥皮尸体素描画看起来可能是在解剖室完成的。杰利柯的第一位传记撰写者夏勒．克雷芒（Charles Clément）□他也是最常被引述的一位–提到他的画室中有「为数众多的尸体」、一颗他保存了十五天的断头，以及他的朋友们吓得不敢去看他的事。然而，在当时的巴黎，死亡却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一个充满污秽与疾病的城市，许多居民因为战争或贫穷而身体伤残。在那座城市里，每星期都有残酷的断

头处决在喧闹的群众眼前公开执行，死人尸体也很容易找到。

此外，不只有杰利柯试图与死人建立更亲近的关系，在他工作室的烛光下，亚歷山大．柯兰（Alexandre Colin）、夏勒－艾米尔．尚玛丹（Charles-Emile Champmartin）这两位年轻艺术家多次在旁一起描绘断肢。尚玛丹在那段期间自己也画了一幅断头－《死亡之后》（After Death），直到不久以前，这幅作品都被归为杰利柯的创作。在他们那群画家中，有一位奥古斯特．哈菲（Auguste Raffet）据说从一家军医院拿到一名年轻士兵的头，然后花了好几天「从每个角度画它……时而插在木桩上，时而摆在托盘中」。这些人都为艺术创作而蒐罗死人尸体。断头台不断运作，对生活在那种环境下的人而言，断头令人厌恶的程度或许显得比今天低，就算只是略低一些。

歷史学者经常像我一样，在解释杰利柯的画作时让人觉得彷佛它们的创作者需要获得「平反」，彷佛我们需要向自己证明，杰利柯虽然执意画死人的尸块，但他本人非但不是个败德者，而且与此相反，是个勇敢而不寻常的艺术大师。今天，死人的遗体通常被掩饰在大众目光之外，但艺术家依然比一般人更有可能想跟死人混在一起。况且，杰利柯当年只是在私底下画那些人体解剖习作，而奎恩之流的当代艺术家却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惊骇艺术」（shock art）而名满天下。

一九八一年，在英国里兹的一个太平间里，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在一颗被切断的头颅旁边摆姿让人拍照。那时他只有十六岁。那是一名秃顶男子的头颅，他的身分至今依然没有人知道；头颅置于金属桌上，赫斯特弯身凑近它，脸颊与它非常接近，几乎可说跟死人摩头擦脸，就这样被拍进画面。面对镜头的赫斯特笑容满面、洋洋得意，但后来他回忆起来时，觉得他的愉快中也夹带着恐惧。那是一种叛逆青春的震颤心情：

那是我和一个死人的头。被切断的头。在一个太平间。人的头。我十六岁……如果你仔细看我的表情，其实我是在说：「快啦快啦，赶快拍。」那是一种担忧。我想要秀给朋友看，但我没办法把所有朋友带过去，带进那个里兹的太平间。我简直吓坏了。我是在笑，可是我很怕他会忽然张开眼睛，然后「吓！」的一声。

即使还只是个少年，赫斯特已经能够以高超技巧发挥他那种令人惊骇的力量。当时他想让他的朋友们刮目相看；十年后，他把这张照片印在铝板上，以《与死人头颅同在》（With Dead Head）为标题，进行限量发行，这时的他已经透过最初几次个展，为自己在当代艺术界奠定名声。他天生具有一种本能，知道怎么制造冲击。

在这张照片中，我们看到赫斯特厚脸皮地开了个粗鄙玩笑，而这也让我们不禁质疑自己的假定。就像杰利柯，赫斯特也操弄了观者的嫌恶之情：我们一方面反感，一方面却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与死人头颅同在》代表着充斥在赫斯特整个创作生涯中的许多主题：生与死之间的模糊边界；解剖、腐化、保存等过程；厌恶与恐惧的极限；医学及科学介入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自我放纵、幽默和争议能够感动我们的力量。

考古学者莎拉．塔洛（Sarah Tarlow）形容这幅图像是一种「权力的滥用」，它「违反了那些经常处理死人尸体的人的所有专业标准」。尽管赫斯特的题材是个无名氏，但他的样貌清晰可辨，而且从来不曾允许赫斯特创作这个「麻木不仁而且充满剥削性」的作品。

那天赫斯特到太平间是为了画人体解剖结构，他正在透过绘画学习生命与死亡。

我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想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我到太平间去，看到那些尸体，我觉得很噁心，我心想自己也会死，感觉真可怕。然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那里，我开始画它们……那种感觉就像我在抱着它们……而它们只是一些死尸。死亡被移到稍稍比较远的地方去了……死亡的概念其实……当你真的面对着那种东西—那种种影像—它就被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赫斯特在适应死人。他带着青春少年的豪勇做这件事，而那种豪勇持续感染他的创作：「那些人并不在那里，那里只有这些物体，看起来马的像透了真人。所有人都把手放进对方口袋，胡闹一场，对着人头『哗！』一阵……但它真的不在那里，又被推移到不知哪儿去了。」赫斯特是否已经完全成功地物化死人，以至于他根本不再需要把他／它们看成人？或者，他那些失敬的玩笑只是一种企图，用来掩藏自己在情感上的脆弱？他说他很怕断头会恢復生命，这彷佛又像在证实，那终究不只是一个物体或玩物。

做为一个艺术作品，《与死人头颅同在》可以被诠释为一种征服的意象，但做为一张照片，它也记录着一个少年爱耍酷的时刻—画面上那个十六岁男孩明目张胆地在追求一件他认为非常光荣的事。赫斯特到太平间学习如何画画。既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那里画死人，想必在他的创作工作中，一定也有一些比较安静的时刻让他冥想。临摹死人尸体必然是一场复杂的情感之旅。

艺术家萝拉．佛格森（Laura Ferguson）进驻纽约大学医学系创作，并在那里开设绘画课，供学生及教职员参加。谈到绘画工作时，她说：「必然有很多事情会发生—那是极为深刻的经验。一个人在画画时，他必然是在表现自我，无论他是否喜欢如此。有某种东西会从你身上跑出来，特别是当你在描绘一具尸体或尸体的某个部分。在某个层面上，你必然是在处理情感。」其他一些艺术家在谈论画死人尸体的经验时，也提到那不只是一种观看的方式，也是一种认识的方式。绘画是一种与死者同在的方式。它必须包含一种凝视的强度，以及艺术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必须保持聚精会神。赫斯特的照片在几秒钟时间内就产出，

但想必他创作绘画时必须花比较多时间，而且必须以不同方式集中心智。「我们花很多时间跟我们在画的物体或东西达到交感，」佛格森表示：「到后来我们会用一种更深层的方式认识它，那是在解剖它或在书里看到它时无法达到的境界。」

进驻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医学院进行创作的乔伊丝．卡特勒—萧（Joyce Cutler-Shaw）将画死人的工作描述为「透过移情作用，用眼睛与创作对象达成的拥抱，它在瞬间就透过手部转码出来」。那是一个冥思的过程。她还指出，当年杰利柯致力克服的技术性挑战，在今天仍持续困扰着以死尸为创作题材的艺术家—例如死亡和睡眠该怎么区分。卡特勒—萧谈到人死之后身体的重量和浮力之间的差别，她也说死亡跟生命一样，是一个随着时间改变的过程，尸体会变得僵硬，然后开始分解腐烂，不然就是做防腐处理，供后续医学研究之用。当艺术家进入解剖室创作，这类技术性问题都会萦绕在脑海中。

赫斯特的《与死人头颅同在》呈现出一幅恐怖的肖像，肖像主体是真实的—也是死去的—血肉，而当他做出这件事，当他将一具尸体的头颅暴露出来，他也嘲弄了太平间及解剖室最普遍的原则之一。在医学实验室中，尸体的头部通常会用好几层纱布包起来，身体部分相形之下则成为密切端详和探索的焦点—彷佛把平常的肖像主从颠倒。在解剖室中工作的学生经常假定包裹头颅的纱布是用来保护他们的感受和尸体的尊严，因为如果从头到尾都不会看到那张脸，拿刀切割人类遗体也许会比较简单。但是，把人头包裹起来的做法也有一些重要的实际考量。学生会花许多个月解剖同一具尸体，但头部和颈部的皮肉非常细緻，很快就会变干，容易损坏。包覆材料可以保护头部，不过，在这么做的同时—无论这个做法是不是刻意的—尸体的身分也被掩藏了起来，这有助于把一个「死去的人」转化成适合做科学研究的「标本」。如果人头是宝贵的，那么这就强调出谨严低调的作为在这种不带感情的环境中有多么必要。

艺术一直存在于解剖室中，今天的医学艺术家跟摄影师、放射线技师、电脑科学家一起工作，设法呈现从外科程序到病理学标本之间的所有细节。在比较早期的年代，绘画是人体解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解剖师发现的结构非常复杂，只有透过绘画才能加以记录及传播。「绘画科学」与「解剖艺术」之间的分野向来非常难以界定。一个非常着名的例子是雷奥纳多．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他小心翼翼地从好几具尸体取下「非常细小的肉块」，藉此让自己熟悉人体形态。达文西在描述他这个工作时承认，其他艺术家可能会因为觉得噁心而不愿涉足这种事，或者会害怕「在半夜跟一些被肢解、剥皮，看起来非常吓

人的尸体共处」，要不然就是缺乏技术或耐心。用解剖学方式画死人的身体是非常劳神费劲的工作，而达文西的见解在今天依然跟他所处的十六世纪时一样合乎实际。艺术家首先必须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他还得动员他的所有能力，并且聚精会神。

医学艺术家是依据特定规格创作，为了某个实际目的挑选、釐清医学资讯，但过去二十年来，医学院教职员工间也出现愈来愈多优秀艺术家。讲师们发现艺术课程不只让学生的观察技巧更敏锐，也能平抚人体解剖造成的情绪负担。惊奇与嫌恶的感觉不断流动起伏，这是研究「大体解剖」（gross anatomy）时产生的双重反应。学生学习如何在训练过程中掌握并控制这些情绪，医学系也开始鼓励学生以创意方式—比如上写作课或绘画课—表达情感，藉此帮助他们管理情绪。

人体某些部位对学生而言特别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部位很难物化。尸体的手部、生殖器和头部是经常被举出的例子，因为它们不容易解剖。一名学生写道：「头部、脸部和颈部太有人性了。」解剖人头使我们必须直视我们的工作性质，因为无论书本上写了什么理论、医院里立了多少规则、尸体上包了多少布料，我们正在切割的死人毕竟在不久前还是个会微笑、会思考、活生生的人。一项针对一所医学院的创意计画所做的研究显示，学生的绘画作品经常省略尸体的手部和脸部。一名学生在创意写作课中描写他是如何过滤医学知识，同时刻意「忽略手部和脸孔」。另一名学生曾经以一位还在世的癌症患者为题材作画，她写道：「我把她的脸画得好像消失在一张张揉皱的诊疗报告中，彷佛这样我就可以把她看成一个你必须用目光穿透的科学物体。」她把那个脸孔描绘成某种缺席的存在，而把它覆盖住的做法等于是默认了它的力量。

另一些学生决定在艺术课堂上画出解剖过的人头和头骨。萝拉．佛格森的一位学生麦可．马洛尼（Michael Malone）画了一颗被剖成两半的头，作品标题是《遗弃》（Abandon），这个作品后来被刊登在纽约大学刊物《广场》（Agora）。死人的头颅被剥皮、切开并置于长椅上时，可以成为令人难以抗拒的艺术题材，跟它还活生生时一样。绘画也促使学生学着将他们的病人思考为具有生命史的人。一名学生表示：「我变得比较习惯把病人看成各有各的生活的独立个体。」另一名学生则表示他「体会到我们可以把病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画进同一幅画」。学生可能会把切断的头颅画出来，也可能完全省略创作对象的头部，但无论他们用哪种方式表现，艺术都为死人赋与了一个空间，使我们能从一堆森冷的人体解剖标本中感受到他们的「在场」。

不过话虽如此，解剖室首先还是一个工作地点，因此还是有一些实际面向的考量。当某个艺术课的学生决定画一颗断头，那可能只是因为

那个星期刚好有一颗断头可画。当一个经验老到的死人观察者看到解剖头颅，他可能不会有任何评论。有一次我针对乔伊丝．卡特勒—萧画的解剖头颅提问，她只是这么回答：「它们是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解剖教学课程收藏的解剖模型，是从真人身上切下来保存的。它们跟原来的身体之间没有关连。我是在人体解剖实验室里发现这些东西的，我觉得非常好奇，于是产生强烈冲动想把它们画下来。」卡特勒—萧这番话说明了解剖室那种夹带务实与惊奇的特质。对门外汉而言，一系列「跟原来的身体之间没有关连」的人类头颅可以在实验室中被「发现」，这个事实跟那些头颅本身一样令人匪夷所思。

艺术家处理刚切断不久的人头这种题材时，有时会碰到一些极为不可思议的事，两百多年前的玛莉．格罗霍兹（Marie Grosholtz）即后来世人所称的杜莎夫人（Madame Tussaud）就是一个例子。杜莎夫人三十多岁时生活在巴黎，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她以断头台上的牺牲者为样本，创作蜡像。杜莎夫人成立的蜡像展示馆以展示革命时期的人头出名，虽然她也用活人模特儿创作，但一部分样本是在人死以后才被送到她的工作室。根据她后来的记述，巴士底监狱暴动发生后，典狱长贝纳．荷内．德洛奈（Bernard René de Launay）侯爵及巴黎商会主席[60]贾克．德弗雷赛勒（Jacques de Flesselles）遇害，成为法国大革命最早的牺牲者。他们的头颅被插上木桩示众之后，很快就被人取下来送到杜莎夫人的沙龙，她坐在展览厅台阶上，把血淋淋的头颅摆在膝上，就这样描绘他们的脸部表情。她还宣称，她的友人罗伯斯比被斩首后，他的头颅很快就从断头台被送到她那，然后她也是这样把人头放在膝上，进行蜡像制作。另外，她记得马拉遇害后，巴黎警察队把她请到事发现场，然后她「在最痛苦的情绪激盪之下」塑造马拉的脸部蜡像，那时马拉还躺在浴缸中血流如注，身体依然温热。后来法王路易十六及王后玛丽．安东尼（Marie Antoinette）在断头台上丧命，他们的死亡面具也是由杜莎夫人所制作。

杜莎夫人有可能在这些故事的细节部分加油添醋，藉以强调她的作品的真实性，但她确实很习惯在工作上接触到人头。法国艺术家贾克—路易．大卫和艾田—尚．德雷克吕兹（Etienne-Jean Delécluze）[61]于一八○○年代参观杜莎夫人的蜡像沙龙时，她向他们展示一个柜子，里头存放的都是着名革命人士的头部蜡像，其中包括罗伯斯比。当初包裹罗伯斯比被砍烂的下巴的绷带也放在那里。据说大卫端详那些作品好一阵子以后，说了一句：「真的很像，做得很好。」

杜莎夫人的蜡像作品确实非常精确，而且她的创作速度极快，总能在相关事件发生后迅速将蜡像陈设在她的展览沙龙，因此她很快就声名大噪。她不断更新展览内容。她经常刊广告徵求私人委制工作，活人或死人她都愿意处理，而且她向顾客保证死人会得到「最精确、栩栩如生的外观」。与此同时，她的员工会出席法院开庭，绘制素描、做笔记，与当局协商购买受审犯人的衣物及个人物品，这样一来，犯人被送上断头台处决以后，很快就可以成为她的展品。杜莎夫人的「恐怖屋」（Chamber of Horrors）受到广大欢迎，有些犯人甚至会在被处决以前先把他们的衣服捐给她的展示馆。

杜莎夫人提供了一种「不名誉的不朽」，这是她的展览最大的特点之一。她让她的创作对象在死后有了新生命，尽管是用蜡来塑造。断头

台使那些人变成物品，杜莎夫人则以艺术家身分，透过她的技艺将一丝生命带回给他们。杜莎夫人把这个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她在英国办展，展示法国革命人士的头颅蜡像，并採用烛光照明。她的展览使英国民众非常着迷，因为他们对正在海峡对岸的法国发生的事深感兴趣。参观者来到这里，可以亲眼看到最有名的一些法国大革命牺牲者，体验某种亲临现场的感受。杜莎夫人的「恐怖屋」很快就纳入许多恶名昭彰的罪犯蜡像，让付费民众看个够。她第一次使用英国斩下的人头创作，是在爱德华．德斯帕被处死的时候。德斯帕是一名爱尔兰军人，他因为在一八○三年图谋杀害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而遭判死刑。他的头给断头台上的官方执法人员制造了不少麻烦，他们经过一阵砍噼和扭拉之后，才终于让他断了头。德斯帕的遗体被送到他的朋友那里以后，杜莎夫人突然造访，要求他们让她把德斯帕的头做成蜡像。作品完成以后，以蓝色调烛光展示出来，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参观人数随之暴增。

杜莎夫人的创作发想是「活死人」的假象，这个概念使她大举获利。艺术家绘制肖像、画断头，或同时进行这两件事时，他是在具体与想像之间画界线。肖像作品需要创作者透过想像，跳进创作对象的「灵魂」；断头雕塑则需要创作者藉由想像跃过死亡的边际，或者至少跳到深渊边缘。

有些艺术家—例如卡拉瓦乔—似乎执意拉扯生与死之间的痛苦边界，透过他们的艺术作为保持边界开启，藉此探索其中的空间。十八世纪结束之际，断头台的处刑速度否决了那个空间，使它无法再用肉眼分辨，于是其他一些艺术家，例如杰利柯，开始设法靠想像进入那个空间。刚被切断的头颅虽然已经失去生命，但似乎还隐约抓着生命。它看起来比骷颅头残忍，也比较有活力、有生气，但它终究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如同莎乐美的女僕，我们不忍观看，但却又不由自主地往前凑近，面对面直视那个人的命运。

杰利柯、杜莎夫人、赫斯特、奎恩，他们在追求真实性的过程中使用血和肉，致力让他们创作的形象逼近真实。艺术可以让我们获得某种看待死亡的观点，但艺术也可能瓦解那个观点，重新使出打击力道。通常艺术作品为真实事件提供了令人心安的框架，但这几位艺术家却在实验如何移除那个框架。赫斯特曾经呼应奎恩的「终极肖像」概念，提到他想要「创作更真实的艺术」。艺术可以推挤生与死之间、现实与创意表现之间的界线。然而，艺术表现终究缺乏他们都在追求的那种真实性，在这个前提下，「真实」肖像的概念是荒谬的。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奎恩的看法是这样：「我也认为，用我的血和我的身体来打造出完全的『自画像性』（self portrait-ness），这个企

图之中也夹带了某种反讽的因子，也就是说，纵使雕塑作品是我的形体，而且使用的质材出自我的身体，但对我而言，它只是凸显出真正活着的人和构成那个活人的质材之间的差异。」用最极端的质材–被斩断的人头–来创作或许具有逻辑性，但那不会是肖像，因为那里面没有错觉、没有生气、没有艺术家平日贯注在其技艺中的任何本领。死人的头颅甚至不再是那个人，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还会是。观察断头台的人无法相信头被切断以后就死了。他们会看到那些头颅还在抖动，他们相信它们还有视觉，还可以感受周遭的世界，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见解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曾经成功地跟被斩断的头沟通（尽管不是没有人尝试这么做–这点我们随后就会看到）。

如果科学无法让一颗被斩断的头恢復生命，那么这里就是艺术家展现力量的所在。艺术可以实现我们所有最晦暗的冲动，它可以让那些徘徊在地狱边缘幽微处的勐兽劫后重生，不管这么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艺术家一直受到断头的吸引，原因就是它拒绝被迫静止不动。任何医学院学生都会告诉我们，把一个人做成一个物品是极其费劲的事；艺术的凝视则提供了空间，让那些标本能够在非常不同的舞台上重新发声。那个舞台–无论是画布、解剖桌或神位–为我们跟那些异化物体的互动提供框架，替它们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并且能够赋与它们更大的发声权，远远超过它们生前所享有的声音。

41　编註：简称为YBA，该运动起于一九八八年一群英国年轻艺术家的策展构想，此后他们精采、富有创造力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一股风潮，也成为前卫艺术和时尚的代名词。

42　译註：卡拉瓦乔（一五七一至一六一○年），文艺復兴时期义大利画家。

43　译註：圣约翰即施洗者约翰，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施洗者约翰为基督新教译法，天主教称「圣若翰洗者」，伊斯兰教则称「叶哈雅」。在基督教中，圣约翰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礼，包括他的表亲耶稣在内，后来因为抨击犹太王希律（Herod）而被捕入狱并遭到处决。

44　译註：莎乐美是《圣经》的人物、希律王妻子希罗底（Herodias）的女儿，但「莎乐美」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并没有出现，而是源自一名犹太歷史学家的着作。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述，约翰曾对希律王说他娶希罗底不对，使两人怀恨在心，后来希罗底藉机报復，导致约翰被杀。详见以下本文。

45　译註：这个故事记述于《旧约圣经．友弟德传》。

46　译註：多纳泰罗（一三八六至一四六六年），文艺復兴初期义大利佛罗伦斯的着名雕刻家。

47　编註：古斯塔夫．克林姆（一八六二至一九一八年），奥地利象徵主义画家。

48　编註：法兰兹．史图克（一八六三至一九二八年），德国象徵主义画家。

49　编註：卢卡斯．克拉纳赫（一四七二至一五五三年），文艺復兴时期德国画家。

50　编註：克里斯托凡诺．阿洛里（一五七七至一六二一年），义大利佛罗伦斯肖像画画家。

51　编註：艾德瓦．孟克（一八六三至一九四四年），挪威表现主义画家。

52　编註：保罗．高更（一八四八至一九○三年），法国印象主义画家。

53　译註：位于现在的巴黎第八区，凯旋门以东一带。

54　译註：汤玛斯．库克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原本是橱柜制作工匠。他在一八四一年成立汤玛斯．库克旅行社，是当今旅游业鉅子汤玛斯．库克集团（Thomas Cook Group）的前身。

55　编註：路易腓力（一七七三至一八五○年）在法国七月革命（一八三○年）后即位，在左右翼党派间採行中间路线，后因施政不当引发二月革命（一八四八年），被迫退位。

56　译註：贾克−路易．大卫（一七四八至一八二五年），法国新古典主义重要画家。

57　译註：尚−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一七四三至一七九三年），法国医生、政论家、科学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马拉成为激进的政治家及记者，当选国民公会代表，并参与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立雅各宾专政，不久后在自家浴缸中被一名吉伦特派的女刺客刺杀身亡。

58　编註：尚−奥古斯特．多明尼克．安格尔（一七八○至一八六七年），法国新古典主义画派领导人。

59　编註：欧仁．德拉克鲁瓦（一七九八至一八六三年），法国浪漫主义画家，他和尚−奥古斯特．多明尼克．安格尔间的辩论曾撼动整个法国画坛。

60　译註：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旧政权时代，商会主席负责统筹所有行会及主持市议会，其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市长。

61　编註：艾田−尚．德雷克吕兹（一七八一至一八六三年），法国画家与艺术评论家。

第五章
力量强大的头颅
POTENT HEADS



每年七月第一个星期天，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北郊的德罗赫达（Drogheda），数以百计的天主教徒跟着卢德圣母教堂的圣髑队伍，往一英里外的圣彼得教堂行进，到那里参加一场特别弥撒。这个行进仪式是为了纪念圣奥利佛．普兰基特（Saint Oliver Plunkett），这位圣徒于一六八一年受难，死后成为象徵爱尔兰和平及和解的主保圣人62。行进队伍包括教区主教、红衣主教、教宗骑士、市长、市议员等，他们身上都穿着颜色鲜艳的礼服。在随行的风笛乐队奏出的音乐声中，地方宗教及平民团体成员举旗前进，游行阵容还包括朝圣者和其他加入庆典的民众。随后，在圣彼得教堂的弥撒典礼上，他们会坐着跟圣奥利佛的头颅一起祷告，这位圣人的头颅就保存在教堂内一座以黄铜与玻璃打造、美仑美奂的神龛中。



圣奥利佛．普兰基特的头颅。

普兰基特的头颅已经有超过三百三十年歷史，保存状况非常良好。他的皮肤干燥呈褐色，眼睛闭起、眼眶下陷，鼻子紧缩变小，不过头上及下巴还有一些毛髮，他的嘴巴微开，露出一组整齐完好的牙齿。尽管普兰基特的头颅应该是在他死后不久就获得防腐保存，而且近年来教会

也投资了不少金钱和时间维护它，但长久以来，这颗头颅的绝佳保存状态一直被视为它的奇蹟特质之一。

长期展示人类头颅的工作必然附带某些实务上的责任。一九九○年时，德罗赫达的教区神父请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的典藏专家检查普兰基特头颅的状况。专家们发现玻璃柜内湿度太高，导致圣人皮肤出现微小结晶，以及过去数十年间不时发生的小虫感染问题。专家分析头颅状况期间，教堂决定请人帮这个圣髑制作新的神龛。教堂的首要要求是安全性、可见度、可亲性和维护上的方便，这些考量就一个宗教机构而言似乎显得相当庸俗，但从圣物保存的角度来看，教堂的角色与博物馆其实相当类似，都有义务为参观民众好好保管文物。普兰基特的头颅必须获得安全保存，同时又要容易让民众看到，方便他们向圣人请愿。每年有成千上万民众来到这里瞻仰木乃伊般的普兰基特头颅，其中大部分来自欧洲、美洲及澳洲，但他们不见得是天主教徒。有鑑于此，教堂决定让圣髑有个新家，而且，除了上述的重要实际考量之外，教堂当局也希望改善圣髑在「礼拜仪式及美感」等各方面的环境。

像普兰基特的头颅这种神圣而且显然力量非常强大、足以吸引全球各地民众前来拜观的物品，当然值得被安置在一座能向天主教社群宣扬其重要意义的神龛中，而且那个地方应该适度地庄严宏伟。新的神龛在一九九五年设置完成，包含一座黄铜及玻璃打造的灯台造型展示柜（让参观人士可以从所有角度看到圣人头颅），柜体置于石材基座上。一座高达九公尺的细长哥德式小尖塔将灯台顶端连上教堂屋顶。普兰基特的头颅置于宝石镶嵌的黄铜圣物柜中，那是在一九二一年—也就是普兰基特获宣福[63]的隔年—制成的。四周墙面上是文字镶板，内容叙述圣人的生平与死亡事蹟。看到这一切以后，没有人会怀疑奥利佛．普兰基特在圣彼得教堂和整个天主教会的身分认同、乃至爱尔兰民族意识中扮演的核心角色。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事实是，普兰基特被斩下的头颅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头颅主人生前受到的注意。就连天主教歷史学家也同意，普兰基特的人生相对上并不出色。不同于其他死后留下头颅的圣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义大利锡耶纳的圣加大利纳（Saint Catherine），她的头颅保存在圣多明我圣殿（Basilica di San Domenico）□普兰基特没有奇蹟般的慧见。他没有撰写过神学宣传手册，也不曾参与教宗政治。尽管他努力工作，致力领导受内部冲突及外部迫害夹击的教会，但他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成分会导致他走上殉道之路，而且他受难的情况虽然悲惨，但并非绝对独特。

普兰基特只是十七世纪末宗教迫害的一群无辜受害者之一，这些人

在被捏造出来的教宗阴谋（Popish Plot）64所引发的反天主教狂潮中遭到牺牲。普兰基特曾在阿马（Armagh）郡担任十年的大主教，在那段时期，他被捲入天主教不同修会间的争端。在战争肆虐的爱尔兰，他的工作处境非常艰难，但他无疑是个负责能干的主教，在那个天主教会乃至整个爱尔兰都陷入不安与骚动的年代，他创下举行最多坚信礼的纪录，并且有效推行宗教包容。然而尽管如此，他与其他神职人员之间的互动经常非常尖酸，有些人指控他专横霸道，不过也有人强调，在神职人员的内部纪律完全失序的情况下，坚实的领导格外重要。一六七九年，他所属的天主教会中一些报復心强的人检举他，导致他受审判，先是在都柏林，后来是在伦敦。在伦敦时，他成为教宗阴谋的最后一名被害者。事实上，他是歷史上最后一位因为信仰而在泰伯恩死刑台上丧命的天主教徒。

跟那些年间被捲入风波的许多其他天主教徒一样，普兰基特是以无辜者的身分遇害，但这些牺牲者的命运跟封圣与否没有任何必然关系。普兰基特最受后人推崇的一点是他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来的泰然自若。他在半年的寒冷冬季中被单独监禁，只能靠贫乏的囚粮勉强维生，但他依然执意每星期斋戒三天，而且所有时间他都在祷告。他的平静心情流露在他的书信中。他写信给他过去的祕书：「我在十五日被宣判死刑，但我没有任何恐惧，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失眠，一刻钟都没有。」在最后两星期的生命中，他的处决日期被延后了三次，不过在他殉难那天早上，他以稳定的字迹签署了信件，纽盖特（Newgate）监狱的典狱长则在报告中提到，普兰基特睡了一晚好觉之后，「彷彿去参加婚礼般若无其事地」前往死刑台。他发表长篇演说，宽恕所有指控他的人，然后一边唸祷词，一边从容就义：「上帝啊，我将我的精神交付于祢手中。」

据说普兰基特的高尚举止令刽子手深受感动，于是他设法先让普兰基特断气，才开始将他开膛剖腹65，然后他又让死者的朋友把他的身体各部位带回去做纪念。这类说法都相当千篇一律，而在他被处决之后的那些年，围绕着普兰基特的遗体陆续又出现一些常见的传说。说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头在死刑台上被砍下来丢进火里，他的一位朋友伊莉莎白．薛尔顿（Elizabeth Sheldon）赶去把它抢救出来，将头与两条前臂一块带回家存放。最初几年观察到那颗头颅的人都说它闻起来有甜美的香气，在头颅被关在锡盒中三四年后，这个现象必然是一种神蹟。这时他的遗体早已被肢解、埋葬，但根据某些记载，当后人把他的遗体挖出来时，发现它已经在坟墓中自行组装成原状。

经常有人说神圣的身体会反抗自己的腐化，不仅如此，偶尔还会出现它们在坟墓中对抗已经断头的遭遇。西元八七○年，圣艾德蒙（Saint

Edmund）国王遭斩首殉道，后来有人发现他在棺木中的身首已经接合，除了脖子上有一圈细细的红线之外，没有任何致命伤口的痕迹。民众发现他的身体以后，无论怎么尝试，都无法把他的头部跟躯干分开。另外有些记载显示十世纪爱尔兰国王布莱恩．勃鲁（Brian Boru）于一○一四年在克隆塔夫战役（Battle of Clontarf）中遭到斩首，但后来他的尸首却又恢復原形。

近年来，天主教会倾向与所谓「魔法」圣髑的传说保持距离，只将神圣遗体单纯视为思念与祈祷的场域。德罗赫达的教堂中关于圣奥利佛的摺页说明指出他的头颅保存良好，但不是说这个现象代表他的肉身有如神蹟般不会腐化，而是把它视为一个见证，代表他殉道之后，歷年来照顾这个圣髑的人所拥有的信仰与好运。不过普兰基特获封圣是相当晚近的事，也就是一九七五年，而这使他成为七百年以来爱尔兰出现的第一位新圣人。在黄铜与玻璃箱中保存完好的普兰基特头颅多年来获得无数民众瞻仰，因此当然有助于动员支持力量，促使他晋升圣人的行列。假如他的头颅没有获得防腐保存，也没有展示在德罗赫达的教堂，在那里殷勤地将信徒的愿望转达给上帝，这位普兰基特大主教很可能只会是歷史教科书中的某个人物。

十八世纪期间，普兰基特几乎被人遗忘，但十九世纪末期时，两本他的传记问世，随后在二十世纪初期又出现一些更通俗的书籍，介绍他的生平事蹟。拜一小群他的支持者之赐，他在一九二○年获宣福。当时他的头颅已经摆在德罗赫达的一处修道院超过两个世纪。隔年，他的头颅被移置到镇上的教区教堂，因为那里比较方便民众拜观和崇敬。然后在一九三三年间，「有福者奥利佛．普兰基特封圣祈祷会」（League of Prayer for the Canonization of Blessed Oliver Plunkett）成立，该会会员致力于向广大信众传扬普兰基特的生平事蹟，他们努力促使信徒前往德罗赫达的普兰基特神龛朝圣，并鼓励天主教徒赶紧祈祷上帝赐与奇蹟恩典，让他得以满足条件，成功封圣。他们也积极散发宣传资料、撰写布道文章，以及签署请愿书。

由于在普兰基特能够成为圣人以前，必须有两个重要奇蹟能直接归诸于他的介入，因此德罗赫达的普兰基特头颅圣髑成为封圣运动的核心元素。[66]二次大战以后，封圣运动工作人员用一．五便士的价格把碰触过普兰基特头颅和脸部的小布片卖给信徒，藉此收集活动所需资金，他们也请信徒回报任何「透过有福者奥利佛的介入而获赐的恩典」。虔诚的教徒回报的神蹟包括普兰基特头颅散发的甜美香气，以及它脸上的「可爱」五官，他们宣称「一代又一代的高尚教养及文化薰陶共同形塑出那优美的太阳穴，雕塑出那精緻的鼻子和嘴唇」。根据一九七○年代

阿马郡大主教托马斯．欧费伊（Tomás Ó Fiaich）的说法，德罗赫达俨然成为「全国信奉有福者奥利佛的中心地」。

不过一九五八年普兰基特赐与的神蹟，是发生在距离他的头颅放置地德罗赫达很远的地方。那时义大利拿坡里的一名女子生了无药可救的重病，她临终时，来自爱尔兰多尼戈尔（Donegal）的修女卡布里妮．奎格利（Cabrini Quigley）彻夜向有福者奥利佛祈祷，请他帮助治病，结果普兰基特真的介入赐福。第二天早上，女子的病况竟然违反医生的预测，她恢復了意识，不久后就完全康復。普兰基特封圣运动在一九六九年再次获得激励，「有福者奥利佛．普兰基特十字军运动」（Blessed Oliver Plunkett Crusade）在爱尔兰成立，并开始举办年度活动「德罗赫达神龛七月朝圣」，吸引成千上万信徒到普兰基特的头颅前祈祷。一九七二年，封圣运动声势更加浩大，拿坡里圣蹟获罗马天主教廷认可，几年后普兰基特正式获封圣人。

普兰基特死后，伊莉莎白．薛尔顿将他的头颅及手臂存放在家中许多年，在她之后，持续有众多追随者相信他的头颅具有强大力量，足以在天主教社群中凝聚支持。不管薛尔顿是把普兰基特的身体部位视为圣物或单纯的珍玩，重要的是她有先见之明：她写了一张鑑定书，由她和主任医师共同签名，藉此证明她那珍贵收藏的来源。这张文书目前保存在德罗赫达的圣彼得教堂。

在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中，普兰基特的头持续向世人施展它的力量。它有效形塑了教会对普兰基特的看法，无论是对于他这个人，或者是对于他在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的意识中，从大主教到主保圣人的地位演变。一六四九年间发生多起英国人屠杀爱尔兰人的事件，其中发生在德罗赫达的屠杀极其有名67，由于普兰基特的头颅就安置在德罗赫达，它便自然而然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象徵之一。而由于普兰基特在爱尔兰歷史上充满宗教分裂、冲突以及政治压迫的时代中致力奉献，他在天主教会内部也成为代表和平与和解的主保圣人。

在普兰基特成为圣人之前，他的头颅早就已经声名远播。二十世纪期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拜观。许多红衣主教及教区主教都会到普兰基特的头颅前面祈祷，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教宗保禄六世的蒙第尼（Montini）红衣主教，他在一九六一年拜访德罗赫达，十多年后普兰基特封圣时，他以教宗身分担任典礼主持人。从各种发展看来，在推动普兰基特封圣的长期运动中，他最重要也最坚贞的支持者可说就是他自己的头。教会长年挹注资源，维持这颗头颅的展示，让它保有良好的状态，以及庄严肃穆的居所。这样的慎重对待无疑为普兰基特带来某种威望，而这一切确实要归功于他的头颅。

一旦人体的某个部位获得防腐处理，并被保存在地面以上一段时间，而不是像正常情况那样回归尘土，它就会逐渐发展出自己的身分，甚至抗拒自己被埋葬的命运。入土为安原本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但此时这个可能性却变得愈来愈遥远。即使在普兰基特封圣以前，他的头颅就已经为自己在社群中找到一个位置，为自己建立一些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做为修道生活的一部分，或在比较晚近的时期在德罗赫达教区扮演公共角色。普兰基特的头颅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并要求世人持续照顾它、呵护它。由此可见，时代环境能够把一颗断头—某个人的尸体留下的一个血淋淋的部分—转变成宗教生活及俗世生活中一个受到重视的参与者。民众不仅接受普兰基特的头颅这种东西存在，他们甚至似乎无以抗拒地受到吸引—当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按照一般方式埋葬，而且被展示出来，它有可能展现格外强大的力量。

今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会在圣人的头颅前面祈祷，这些头颅存放于欧洲各地教堂中，并且经常被安置在珠光宝气的圣髑柜中。圣阿格尼丝（Saint Agnes）的头颅保存在罗马圣梯小堂（Sancta Sanctorum）68的一个银盒里。圣彼得（Saint Peter）及圣保罗（Saint Paul）的头颅据说在附近不远的拉特朗圣若望大殿（Basilica of St John Lateran），藏在高高的祭坛某处。圣塞巴斯提安（Saint Sebastian）的头颅也在罗马，保存在四殉道者（Four Crowned Martyrs）教堂。圣加大利纳的头颅成为义大利锡耶纳的重要「观光景点」。圣露西（Saint Lucy）的头颅被保存在法国中部布尔日（Bourges）的主座教堂。圣海伦纳（Saint Helena）的头颅位于德国特里尔（Trier）69主座教堂的地下室。圣伊华（Saint Ivo）的骷颅头被安放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特雷吉耶（Tréguier）大教堂。这些人的头颅都已经在墓穴以外的人世间生活很久，未来想必不可能轻易让人埋回土中。

这些头颅之中最有名的是圣加大利纳的头。圣加大利纳死后四年，她的头在一三八四年从遗体上被切下来，跟她的食指一起从她去世的地方—罗马—送回她的家乡锡耶纳，然后就一直安放在圣多明我圣殿。自从她在一九三九年获封为义大利主保圣人，后来又在一九九九年成为欧洲主保圣人，每年举行一次的圣加大利纳庆典可说愈来愈华丽盛大。跟德罗赫达的圣奥利佛庆典一样，圣加大利纳庆典也包括游街行进，队伍中有地方官员、重要神职人员，以及军人代表、政府部会首长等。行进结束后，弥撒仪式于教堂内举行，圣加大利纳的头就位于侧面的一座祈祷堂中。圣加大利纳的手指会随着队伍游街，并由来访的红衣主教透过它为锡耶纳、义大利及欧洲赐福。偶尔加大利纳的头颅也会被拿出来游街，例如二○一一年纪念她封圣五百五十週年的时候。一年到头，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不断涌进圣多明我圣殿，拜观她那包裹白纱、置于银质

圣髑柜的木乃伊头颅。

这类圣髑可以让保存它们的地方名扬四海，因为它们吸引信众朝圣，并连带创造经济及政治上的益处：被神圣化的人体部位既能鼓舞各国王公贵族前去拜观，也会促使百姓开设酒馆食肆。传说故事会描述圣人如何自行决定到哪里去，彷佛藉此凸显圣人对当地繁荣发展带来的贡献，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强力连结。许多故事描绘圣人在受斩后带着自己的头颅前往最后埋葬的地点，例如圣德尼（Saint Denis）70从巴黎蒙马特的斩首现场捧着自己的头，一边诵经一边走了将近十公里路才倒下安息。据说兰斯的圣尼卡修斯（Saint Nicasius of Rheims）被处斩时正在诵读《圣经．诗篇》第二十五篇，但人头落地后还一直唸到第一百一十九篇。根据查证，共有超过一百五十个殉道者带着自己被切断的头颅前往选定地点的故事在民间流传。

圣加大利纳不是提着自己的头到锡耶纳，不过有一个说法是她从旁协助负责搬运她的头的人。根据这个版本，圣加大利纳的追随者于一三八○年代将她的头颅祕密运送通过罗马市街时，遭到市区保安搜索，但当保安人员打开承装加大利纳头颅的袋子时，他们却只看到满满的玫瑰花瓣，于是行旅人马得以顺利通过。据说加大利纳用这个方式表示她同意离开罗马，因此她的头颅属于锡耶纳就更理所当然。她的头颅不是唯一一个自行决定命运的人头。据说波维的圣儒斯特（Saint Just of Beauvais）的遗体在一○三○年代中期从法国奥塞尔（Auxerre）运往瑞士普费弗斯（Pfäfers）时，忽然在通过瑞士弗卢姆斯（Flums）教区边界之际出现神蹟，遗体固定不动。显然圣儒斯特决定留在那里，于是当地教堂请人打造圣柜承装他的头颅。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信徒会到这座小镇朝圣，敬奉这个着名的圣髑。

如同德罗赫达，在锡耶纳和弗卢姆斯，圣人的头颅也创造了许多财富。宗教圣物活化了社区，激发人民开创宗教、经济及艺术事业，其中当然包括安放圣人头颅的祈祷堂，这些神圣殿堂无不金碧辉煌、美仑美奂，令置身其中的虔诚信众激动不已。腐化作用随时威胁着圣髑，但耀眼夺目的圣物柜有助于遏阻这种自然作用的力量。当圣髑是一团皱缩暗褐的腐败有机物，如果把它装进金光灿烂的宝物箱，安置于辉煌宏伟的公共圣殿，民众在这种安静肃穆的场所中，自然会感到心生敬畏。就像德罗赫达的圣物柜，锡耶纳和弗卢姆斯的这些艺术杰作也为来访的朝圣者创造出一种情境，让造访者在其中面对面崇敬那个来自过往荣光的神圣人物。

在某些情况下，圣人遗体会被包覆在一具替代用的金质躯体中，彷佛它是从天堂显灵来到世间。中世纪时，许多圣人头颅被供奉在雕工精美的「上身圣髑柜」中。圣儒斯特的上身圣髑是在十五世纪末期的瑞士用银和铜打造并镀金而成，这个圣髑的惊人之处在于它呈现圣人捧着自己头颅的景象。圣儒斯特遭到罗马保安斩首时年仅九岁，他的父亲找到他时，他就是这样捧着头颅。故事描述男孩把他的断头交给父亲，要他把头拿给母亲菲莉西雅（Felicia）亲吻。当菲莉西雅接到儿子的头颅并亲吻它，她就成了第一个敬奉圣儒斯特圣髑的人。

令人讶异的是，这个上身圣髑表现的并不是圣儒斯特紧紧抓着自己的头：他的头彷佛是透过自己的能量悬浮在他的胸前，而他的手彷佛只是为头颅提供一个外框。几乎无庸置疑，这就是神蹟力量集中显现的地方。圣人双眼半阖，圣体彷佛并非完全在场，首级显得超脱凡俗，神圣力量于焉笼罩周遭。这颗断头显得既生气勃勃又虚无缥缈，彷佛源自来世的耀眼圣观。圣物柜把人类遗骸化为艺术品，形塑出挑战生死界线的展示文化（在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优秀艺术家在俗世范围内进行性质类似的创作）。

如同圣儒斯特把自己的头呈献给母亲，让她亲吻敬奉，这位圣人的上身圣物匣在设计上充分确保了这个特点，因此他在弗卢姆斯一直能发挥吸引信众的力量。圣物将信徒拉进圣儒斯特的叙事中，引导他们敬奉他，请求他们亲吻他，藉此让他们成就他的身分，巩固他主宰死亡的能力。这里面也有一些实际面的考量，因为比起亲吻木乃伊般的人头，亲吻人造圣物比较安全也比较讨喜。从十二世纪开始，无数圣人干瘪皱缩的身体部位陆续被装进精美华丽的容器，以保护他们的脆弱体质，有时圣髑本身的美感甚至与承装它的圣物匣的外观品质呈反比。

十六世纪初，荷兰神父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斯（Desiderius Erasmus）71到英国坎特伯里拜观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遗骨时，他写到金碧辉煌的神龛那种催眠般的眩惑效果：「其大无比、有些甚至大过鹅蛋的珍稀珠宝，使一切显得闪亮耀眼。有些修士敬肃地站立一旁。外罩一移开，我们都虔敬崇拜。」伊拉斯谟斯心荡神驰，但他的一名同行旅伴认为贝克特的圣髑（包括一只手臂的遗骨以及一些污秽的破布）噁心至极，以至于当圣髑来到他面前时，他不但无法献上亲吻，还「充满嫌恶地」退缩。从这个小故事不难看出，就算圣物是一堆吓人的腐化人类遗骸，富贵华丽的神龛还是能在它的周围创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黄金的用意就在眩惑，朝圣者想必是揉着眼睛离开这种地方，因为天堂胜景般的宝物使他们目眩神迷。

华丽的神龛具有动人力量，能够撩拨他们的情感。访客甚至会瞠目

结舌，彷彿他们窥进了天堂，感受到它的神祕力量。光彩夺目的神龛和安放其中的圣髑模煳了生死间的界线。这些遗骨没有完全死亡，因为某种心灵的生命力依然在那里荡漾，并形塑着芸芸众生的生命。

能在死后继续施展影响力的人不只有圣人。罪人也有疗癒的能力。中世纪时，圣人的身体和罪犯的身体可说是最常被肢解并长途运送的人体，因为民众会试图攫取死者的生命力。

死刑犯通常是在健康状况良好时忽然被处决，他们经常相对年轻有活力，因此他们的身体被认为比老死或病死的人拥有更多的力量。他们的骨头、毛髮、皮肉让许多人趋之若鹜，各式各样的故事描写围观民众在死刑台下拼命翻拣，设法拿到一小块片刻前还在上方木板上唿吸的犯人丧命后的温热死尸。指尖、牙齿、耳朵、衣物碎片，甚至吊索的纱线、火刑堆的柴灰，都保留了一些死去者的生命力量。

跟教堂一样，药房里通常也会存放一些人类骨头或经过防腐处理过的遗骸，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有助于恢復健康。人体的任何部位都派得上用场，即便是一小片指甲或一滴血，都可能创造奇蹟，但人头遗骨所含的力量特别强大。人类头骨效用深远，它被当成「一种特殊药品，可以治疗……大多数头部疾病」—这是一名药剂师在一六五七年写下的文句。十六世纪着名瑞士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相信，一个人被吊死以后，他的「生命精神」会「往前冲到头骨边缘」。只要死亡是忽然发生，那些精神就会被关在头颅中，彷彿它们受到突袭，没有时间逃跑。

帕拉塞尔苏斯开的药方包括被斩首者的血，用它来治疗癫痫，头颅及头骨则与痉挛的治疗密切相关。一名德国医生约翰．施洛德（Johann Shroeder）建议将骤死年轻男子的脑部、皮肤、血管、神经及整个嵴柱捣烂，然后把这个混合物放进清水和薰衣草、牡丹等花朵中，蒸馏数次得药，用来治疗癫痫。据说一六四八年去世的丹麦国王克里斯汀四世曾经用一种粉末治疗癫痫，粉末的成分之一取自罪犯的头骨。这类药方在数世纪间非常普遍，以至于刽子手的工作项目之一就是应付那些在旁焦急等待「领药」的病人。即使在一八六○年代的丹麦，还是有文献记载「癫痫患者群集站在死刑台周围，手上拿着杯子，准备在尸体还在抖动时立刻接鲜血来喝」。

许多人相信所谓「交感作用」（sympathetic action），因此人头经常会被用来治疗头部疾病，例如头痛、疯狂等。十八世纪末期，在法国某些地区，被吊死的人的头颅经常被拿来做药丸，据说这种药能够治疗「疯狗咬伤」。用骷颅头盛药喝也被认为可以使健康復原。一五六○年

代，有些在伦敦桥示众的叛国者头颅被一群在皇家铸币局工作的人当做药杯，他们患的病是砒霜中毒，症状包括头痛、晕眩等。病患用清洁过的头骨装药喝，不过其中许多人后来还是一命呜呼。

帕拉塞尔苏斯建议用死人头骨上长出来的苔藓（地衣）治疗痉挛和「头部疾患」、接合伤口，他的根据是：死亡之际释放出来的「生命精神」会从头骨转移到开始在头骨表面生长的苔藓上。由于头骨上长出苔藓的情况相当罕见，因此这种药方更显得弥足珍贵。头骨苔藓似乎在英国和爱尔兰成为特别受欢迎的药方，因为这些国家的罪犯被处决以后，尸体经常被展出示众，直到肉质开始腐烂、骨头上开始长出东西为止。一六九四年间，有报导显示伦敦的药店会销售长出苔藓的头骨，价格从八到十一先令不等，依头骨大小及苔藓生长量而定。

头骨苔藓可内服也可外用，还可以做成护身符随身携带，或与其他成分混合成复方药（蜂蜜、动物油脂、人血、亚麻籽油，甚至厩肥或煮过的蠕虫，都可以丢进混合药剂中）。一六○○年代末期的新英格兰医生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写道：「死人头骨上的苔藓与空气接触后具有良好的接合作用。具止血功能。有些人说，如果把它握在手中，它会像施魔法般让手密合起来。其他骨头上生长出来的苔藓也有类似功能，不过效果没有那么强。」同一年代，法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伦敦撰述时也提到，头骨苔藓对止血非常有效。有些报导显示民众在石头上培养苔藓，然后让它蔓延到罪犯的头骨上，用这个收成卖钱。实际上，药房为了维持稳定供应量，很可能把头骨上长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拿来入药，甚至会用一些不是长在头骨上的东西。

这种药品在整个十七及十八世纪期间受到广泛使用，当时「木乃伊」—即经过防腐处理，用来制作处方药物的人体遗骸—销售业在欧洲非常蓬勃。从骨头、血液、皮肤到脂肪，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医药用途。制作「木乃伊」的方法很多，根据描述，成品是坚硬的黑色树脂状物质，闻起来有香味，但尝起来是苦味。肉质部分会重复做许多次干燥处理，也可能浸泡在葡萄酒中，或喷洒没药，直到它的颜色变黑或不再发出臭味。完整的年轻尸体最受青睐，尤其是健康状况良好就被处死的犯人。有些人推荐红髮男性，因为据说他们的血液品质比较好。由于药用木乃伊在中古时代广泛流行，赝品应运而生，内行人都知道要买色泽亮黑、气味清香的产品，不能买含有很多碎骨头和泥土的木乃伊。某些早期的人体解剖专家还发现，卖人体脂肪和身体各部位可以让他们赚取优渥的外快，做为解剖研究基金。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种「医学性食人主义」。有一名评论家认为吃人肉是非常可憎的事，并表示应该把所有商店中的木乃伊拿出

来慎重埋葬。他写道：「我认为人类头骨不但只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干燥骨头，而且是我们自己这个物种遭到凌辱，变得骯脏、腐臭的结果。把这种东西吃进身体显然非常低劣，连神话故事里的食人族看到都会吓得发抖。」尽管如此，「木乃伊」直到二十世纪都还曾出现在欧洲的某些药局。德国的药学手册及目录在一九○○年代初期还把木乃伊列为销售商品之一，每公斤价格是十七马克又五十芬尼，虽然其中大部分可能都是假货，也许只是混了一些碎骨头滥竽充数。

翻开人类歷史，大多数时候活人都会往死人身上寻找一点魔法，这个现象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死人的身体确实引人入胜。如果放着尸体不管，它会变硬、发臭、滋生疾病。从十五世纪末期到十八世纪末期，墓园是具有强大力量的地方。穷人通常被埋在大坑中，其中许多人甚至只是稍稍用泥土覆盖。坟墓经常被人掘开，然后任凭尸体暴露在空气中腐化，因此墓园中的土壤被认为会「吃肉」，而且具有超自然力，这点不足为奇。

尤有甚者，生与死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而且当时的人很难真正知道人是在哪个时间点死亡：倾听心跳或拿一块玻璃测试呼吸，都不是万无一失的检测方法。人失去意识时看起来可能像是死亡，然后又会「奇蹟般地」恢復生命。活人世界跟未知的那个「来生」，使死亡和埋葬之间那段时间特别充满意涵及潜在的力量。许多故事描述死人从睡眠状态中醒来，死者亲友则经常会摆出食物及饮品，以备万一亲爱的人復活，可以马上有东西吃。「软尸」—没有显现尸僵现象的尸体—特别令人恐惧。由于无法清楚知道一个人的灵魂是在什么时候离开身体—是死亡的那一刻，还是要等到最后审判时？—因此灵魂留在世间纠缠活人是一个必然的可能性。而且死亡会造成奇异的身体变化，尸体腐化则会造成有害的效应，种种因素加起来，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因为某种原因而继续流传在活人世界的死尸，能够施展相当的影响力。

在刚死去的人的新鲜尸体周围会瀰漫着一股强有力的气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似乎能抗拒腐化作用的身体部位显得最具力量—因为这些部位一直处在生与死之间那个载荷状态，彷彿它们在抗拒死亡，设法继续抓住生命的能量。今天的人依然会谈论奥利佛．普兰基特或锡耶纳加大利纳的头颅保存状况有多么好。从前被插在各地城门及桥梁上示众的叛国贼头颅因为经常腐化得很慢，因此也激发出一些与奇异超自然力有关的故事。

在伦敦，叛国者的头颅经常会以煮半熟处理，使它们具有减缓腐化作用的能力，乍看彷彿超自然奇蹟。一五三五年罗彻斯特（Rochester）主教圣约翰．费雪（Saint John Fisher）被处决以后，他的头颅在纽盖

特监狱经过半煮熟处理，然后被「插在木桩上」展示于伦敦桥。当时正值盛夏，头颅在那里待了两星期，但看起来不但完全没有腐化，反而「变得一天比一天新鲜，连他活着的时候都不曾有那么好的气色」。费雪的脸颊泛出粉红色泽，当他从尖桩顶端俯视底下来来往往的伦敦市民时，彷彿随时都可能开口对他们说话。

老百姓将费雪死后惊人的健康状态视为一种神蹟，反映出他的清白、神圣，以及愿为信仰牺牲性命。费雪的头颅吸引高度关注，结果在桥面上造成壅塞，大批民众挤在他的头颅下方，马匹和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最后头颅管理员接到命令，把那个惹出麻烦的东西丢进泰晤士河，交通才终于获得纾解。

在费雪主教的时代，像他的头颅所蕴含的那种彷彿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力量必须加以管制，无论管制方法是丢进泰晤士河、装入瓶中当做药品销售，或安放–也可以说是禁制–在富丽堂皇的神龛中供人敬拜。只有在获得成功管制或在特定文化脉络下被赋与定义清晰的位置，这些被斩断的头颅才能在人类社群中拥有真正的弹性和韧性。圣人的头颅被纳入宗教生活的纹理中。它们获得体制化，受到信仰体系的保护，置身于个人的奇思异想无法触及到的地方。一个特定的位置被腾出来给它们，相关祈祷仪式随之形成，而许多头颅，例如圣奥利佛或圣加大利纳的头颅，光凭本身的特质就声名远播。教会会以其收藏的人类遗骨为号召，设法成为朝圣的地点；圣人的庆祝日成为基督教年历中的正式节日；与圣髑有关的神蹟故事一一出现。现在，制作精美的指南、摺页、文字说明牌向访客解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这一切都表示，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论在教会内部或在俗世中，这些变成木乃伊的人类头颅依然很少受到质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头颅留在地表上愈久，它被埋进地里的机率就愈低。不管是一颗老朽了、长了苔藓的罪犯骷颅头，或一颗装进圣物匣的圣人头颅，它们都已经不只是死人的头颅，同时又称不上是死人的头颅。随着光阴流逝，它们逐渐干瘪变形，看起来愈来愈不像人，而愈来愈像东西。它们变成身价不凡的文物，具有自己在经济及信仰层面上的影响力，而这些跟它们阴森晦暗的形成歷史没有太大关系。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有任何无远弗届的文化传统足以形塑凡人与圣髑之间的互动，而时代的变迁也早已淡化人类对圣髑产生的感觉。这些干燥得无以復加的物品对许多参观者而言犹如异形，几乎不能算是被切断的人类头颅。它们在外观上的损毁样貌使我们不知如何反应。参观锡耶纳圣多明我圣殿的观光客事后在网路上分享游歷心得时，就算提到圣加大利纳，他们也是以不带情感的方式描述，比如「满古怪的」、「相

当令人惊奇」、「动人」、「实在有点吓人」等。讽刺的是，用玻璃和黄金打造的华美神龛虽然旨在加强朝圣者对圣髑的反应，但它也可能反而让许多现在去拜观圣髑的俗世观光客，更强烈地感受到某种情感上的超然甚至漠然。巧夺天工的展示柜把参观者保持在安全距离外，而且圣髑所在的教堂气氛庄严，受某些特定行为规范的约束，因而会凸显「属于那里的人」和「不属于那里的人」之间的分割。在许多方面，圣人的头颅是临界的物体，而由于它们被保存在一种幽冥的状态中─放在湿度受控制的玻璃展示柜里，介于今生和来世之间─它们显得更具韧度。

在英国萨福克（Suffolk）郡的萨德伯里（Sudbury），有一个人的头颅被安放在一座教堂中做为圣物，但他并不是圣人。赛门．萨德伯里（Simon　Sudbury）的头颅被他的支持者放在那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会被封圣，而虽然这件事从来不曾发生，他的头颅却获得妥善保存，今天我们可以在圣葛雷哥利（St　Gregory）教堂圣衣室的一处壁龛中看到它。这只是一个死人的头，观光客习惯把它看成歷史文物，而不是神圣遗骨。小学生会在歷史课校外教学时来看赛门．萨德伯里的头，这位坎特伯里大主教、英国上议院大法官在一三八一年的农民起义期间遭到一群愤怒的暴民斩首，因为他向老百姓徵收人头税，引发强烈不满。萨德伯里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罪犯，他的头颅是在广义上被视为圣髑，也就是说它见证了歷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基于这个理由，它能够象徵某种生根于十六世纪，但在随后两百年间才慢慢开花结果的改变，也就是「圣髑」这个词汇逐渐失去它的神圣光环。

赛门．萨德伯里于一三八一年遭斩首，那时是中世纪宗教圣物交易的盛期。根据地方上的传说，萨德伯里的支持者把他的头从伦敦桥上的木桩取下，祕密送到他家乡的圣葛雷哥利教堂，或许他们认为这个纪念物有朝一日将能证明它是不会腐化的圣人肉身。但不同于奥利佛．普兰基特，萨德伯里的头颅不曾成为组织性封圣运动的对象；它反倒成为地方民俗的一部分、教会遗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算是室内装潢的一部分。然后，在教堂中安身立命六百余年之后，萨德伯里的头颅开始向科学界诉说它的祕密。

萨德伯里有一家称为「未来展望」（Future　Vision）的基督教慈善机构，经常与地方上的学校合作。二○一一年间，这个机构请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的鑑识人类学者根据赛门．萨德伯里的头颅遗骨，进行脸部重建。头骨被送到贝里圣艾德蒙兹（Bury　St　Edmunds）的医院，在那里进行了一系列电脑断层扫描，然后透过电脑模型软体，在资讯空间中去除头骨上的肉质。这个虚拟头骨被转化成萨德伯里真正头骨的精确三维模型，再据以执行黏土重建。工作人员以青铜及树脂铸

造出三个萨德伯里头颅，一个送给坎特伯里市议会；一个送给圣葛雷哥利教堂，在那里跟原来的头骨一起展示；第三个重建头颅则由「未来展望」收存，做为教材之用，藉以向学生说明赛门的生平事蹟、这座教区教堂的歷史，以及脸部重建这门科学。

于是萨德伯里的头颅成为货真价实的「二十一世纪圣物」。头颅搭配有透过科学模型制成的「上身圣物」，吸引民众前往这座英国国教教堂参观，并由一家基督教慈善机构教导小朋友人体解剖和鑑识人类学。它的存在更凸显出奥利佛．普兰基特的头颅在意涵上确实属于中世纪的范畴。萨德伯里的头颅证明俗世遗物也能引发多采多姿的活动、聚集兴致高昂的民众，这点绝不输于任何圣髑。二○一一年九月，萨德伯里的重建脸孔正式露面时，这项计画获得广泛的媒体注意。记者附带提到这项重建工作对地方史及国家歷史的贡献，但报导重点摆在萨德伯里脸孔公诸于世这件事。这个「科学上的投胎转世」本身就是一个新闻话题。从腐化的有机物质到以贵重金属铸成的光荣与不朽，这个奇蹟般的转化虽然应该归功于科学家而不是神职人员，但它所带来的惊奇感受却是相同的。

奥利佛．普兰基特和赛门．萨德伯里的头颅都留存得够久，因而有机会变成新的东西。它们是时光的旅行者、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它们对过去而言彷佛是异乡人，对现在而言也是。岁月的流逝使它们完全干枯变黑、面目全非，逐渐使它们具有考古文物的地位，在唤醒我们的激情的同时，也诱发我们的学术好奇。拜教会提供的保护之赐，它们成为众人崇敬的焦点，尽管它们的外观状况相当吓人。由于它们「年高德劭」，它们得以掌有自己的空间，并逐渐累积各种死后的新身分。它们「人」的成分少了一点，「物品」的成分多了一些，成为自成一格的价值体，拥有新的权力与新的政治机制。它们跟从前一样继续主宰我们的注意力，而在这个俗世化的时代，我们观看、冥思的性质从神性的奇蹟转移到电脑模型制造的奇蹟，这点几乎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许多经过防腐保存的人类身体不属于教会，但却能累积神祕力量。举例而言，共产政府都知道死人比他们在世时更有能力吸引群众。列宁（Vladimir Lenin）、胡志明和毛泽东可能是当今世界上依然可以看到的政治木乃伊中最着名的例子，多年以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愿意去排队瞻仰他们。列宁在一九二四年去世之后，他的遗体一直展示到今天，中间只有一两次短暂中断。现在他成为令人尴尬的政治问题，因为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无论是把他埋葬或者继续展示他，这两种想法都同样惹人争议。拜一群防腐工作人员锲而不捨地努力，确保列宁在科学技术范围内尽可能达到不会腐化，他早已成为矛盾的化身—共产主义的「圣人」。就在不久前，在一场关于未来如何处置他的国会辩论中，一位共产党员甚至还提出警告，表示绝不可以干扰他，以免使国家受到诅咒。

像列宁这么受尊崇的政治领袖在死后不可能被人砍下头颅，但无可讳言，许多着名人士的尸体没了脑袋，因为他们的追随者想要保有他们

的白净头骨，以资纪念。把人的头颅切断是一种亵渎的行为，但凝视他们的头颅却可以是一种崇敬的举动。贝多芬（Beethoven）、莫札特（Mozart）、舒伯特（Schubert）等作曲家都因为粉丝的热情而丢了头颅。一七九一年莫札特死后，他的遗体跟其他十五个人一起葬在维也纳圣马克（St Mark）教堂的贫民墓园。教堂司事发现这是向音乐天才表达钦佩的大好时机：他在莫札特被埋葬以前，悄悄在他的脖子上绕了一圈金属丝。一八○一年坟墓例行性地重新打开时，司事找到脖子上围了金属丝的那副骨骸，然后把那颗头颅偷走。一八六三年，也就是贝多芬和舒伯特死后三十五年，爱乐之友会（Society for the Friends of Music）把他们的骨骸挖了出来，以便进行例行性的坟墓整修。可是当棺盖打开以后，会员们无法遏制想要拿走头骨的欲望，后来这两位伟大作曲家被悉心埋回坟墓，但身上已经缺了头颅。

「天才的骷颅头」这个概念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当时的头骨科学俨然成为天才的惩罚，因此有钱人死后，它们的尸体经常用严密的砖砌结构保护在坟墓中，藉此遏阻头骨收集者。十七世纪英国作家、博学家汤玛斯．布朗（Thomas Browne）早在一六五八年就写出许多人的心声：「尸体让人从坟墓里揪出来，头颅让人做成汤碗，骨头让人做成菸斗，成为我们敌人的玩物，这些都是悲惨而可憎的事。」讽刺的是，尽管他对这个现象有强烈的负面观感，一八四○年时他自己也逃不过头骨被挖走的命运。他的头骨在接下来七十五年间被保管在诺福克及诺维契医院博物馆（Norfolk and Norwich Hospital Museum）。作家、音乐家及政治人物的头骨经常被人挖出来展示在私人图书馆或公共博物馆，这些地方都是安静冥思的场所，在这方面与教堂性质类似。在漫长的岁月中，着名人物的头骨被当做智性能力过人的物质证据，但无法对他们的天赋提供任何解释。事实上，天才的头颅与圣奥利佛、圣加大利纳或圣儒斯特的头颅有很多共同点，这些俗世遗骨也成为众人崇敬的对象，并使诺维契之类的地方名扬四海。

一八九○年代，诺维契医院博物馆拒绝将布朗的头骨交还给教区教堂重新埋葬，院方坚持俗世崇拜的重要性超过宗教仪式。医院理事会发文写道：「这样一个在本博物馆中受到尊敬地维护及保护的遗骨，不宜被视为只是一个珍玩闲置于此。相反地，它将有助于让参观民众注意到—并且提醒他们—这位伟大学者及医生的贡献。」假如布朗的头骨被重新埋进教堂的圣坛底下，想必它将难以吸引医院的访客，更遑论为他们带来启蒙。

在许多世纪中，最大规模的人类遗骨展示是由教会所进行。这些展示品不只有圣髑，平凡百姓的遗体时常也会被肢解，排放在藏骸所或纳

骨堂中，以便为日益拥挤的墓园节省空间。不过，最近三百年来，科学机构积极声张他们处理尸体的权力，因此教会在这个既污秽又神奇的业务领域失去了主控权。在十七世纪的药店中，人类头骨是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它们可说为后来这方面的伟大科学收藏开启了先河。但是，虽然教会和国家不再是唯一从死亡剧码中撷取力量的机构，人类头骨从来不曾失去它的尊荣地位。头骨一直是收藏家的珍贵物品，无论它的力量属于神圣、公民或科学的范畴。

当教会决定把人的尸体肢解并移置于纳骨堂时，许多神学家强调人的埋葬地点是由他的头颅所标示，不管身体其他部分埋在哪里。在藏骸所中，头骨经常被挑出来存放，并标上死者的名字。这些头骨经常安放在特制的木盒中，有时甚至会以精美彩绘呈现姓名、日期及花圈图样。这类做法在某些地区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例如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那里的藏骸所以彩绘头骨闻名。在欧洲各地无数纳骨堂中，人类头骨从地面到天花板，铺满整个墙面。

这些实践方式的动机或许有所演变，但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间，其中许多做法被收集头骨的科学家所採纳。在博物馆典藏中，如同在藏骸所，头骨代表整个人，头骨会例行性地被贴上标籤、写上文字，保存在盒子或展示柜中。如果某个人物被认为特别重要，他的头骨会跟其他人的头骨分开展示。不管在哲学、原理或美学等层面有什么差异，人类头骨做为收藏品的地位数百年来一直歷久不衰。

由于各种物理及哲学因素，头骨得以抗拒腐化。头骨结构紧密，抗压性强，具有迷人美感，而且拜独特的脸部五官之赐，它可以代表它曾经隶属于的那个人。正如赛门．萨德伯里的古老头骨，它们诱使我们玩弄再生转世的游戏，想像它恢復皮肉之后的模样。头骨的持久性使它能完全抛去从前的属性，打造全新身分和新的社会连结。这样演变的结果是，头骨留存得愈久，它就愈不可能被丢弃或重新埋葬。头骨的强大在于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足以将民众匯聚起来，使他们朝某一个共同目标携手迈进。当我们想到所谓「力量强大的头颅」—千百年来因为奇蹟般的疗效而受朝圣者景仰、受药房重视的人类头骨—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与现在的主流思考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无论是做为圣髑或科学标本，人类的头颅和头骨在今天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而它们之所以到现在还存在于许多地方，必须归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他们带着恋物癖般的兴趣，收藏数以千计的人类头骨，相较于歷来其他社会，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62　编註：主保圣人是指针对某人、某团体或某项活动的守护圣者。

63　编註：是天主教会追封已过世者的一种仪式，用意在于尊崇其德行，认定其信仰足以升上天堂。经过宣福礼后，此人可享有「有福者」（Blessed）的称号，其位阶仅次于「圣人」。

64　编註：此事发生于一六七八年，部分天主教徒被指控阴谋毒杀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拥立约克公爵继位（后来的詹姆斯二世），造成大批天主教徒遭到审讯、处刑。

65　译註：普兰基特的罪名是叛国，按当时英国法律处以「拖行、问吊、分尸刑」。

66　编註：经过宣福礼的有福者，在出现过两次神蹟，经过教会进一步确认其资格后，就可以举行封圣仪式，宣布承认这个人为圣人。

67　编註：一六四九年英国内战期间，克伦威尔率军进入造反的爱尔兰，同年九月，克伦威尔屠灭了德罗赫达全城的居民。

68　译註：全名为「圣老楞佐至圣堂」（Chiesa di San Lorenzo in Palatio ad Sancta Sanctorum）。

69　译註：特里尔是基督教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建立的第一个主教教区，也是现今的德国境内最早建立的城市。

70　译註：圣德尼是三世纪时的巴黎主教，在罗马迫害基督徒期间遭斩首。他最后倒下的地方被人建成圣德尼大教堂，后来那里成为法国国王及王后的埋葬地。圣德尼被尊奉为巴黎及法国主保圣人。

71　编註：伊拉斯谟斯（一四六六至一五三六年），着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为北方文艺復兴的代表人物。

第六章
骷颅头
BONE HEAD



一八○九年，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去世埋葬以后没几天，一名急需用钱的掘墓者就趁着月黑风高，挖出他的遗体，切下他的头颅，把它包在破布中，交给站在一旁的出资者。这位黯夜商人名叫约瑟夫．罗森鲍姆（Joseph Rosembaum），他是海顿的一个朋友。他捧着海顿的头穿越墓园，准备坐进等在外头的马车，但他忍不住好奇，一边走一边就把破布翻开，仔细端详这位死去朋友的脸。时值六月，海顿的肉已经在腐化，他的脑部也开始腐臭。那臭气令罗森鲍姆招架不住，他憎恶地呕吐，但身体上的反感无法阻止他想占有海顿头颅的欲望。他知道只有忍受生物性腐败的噁心事实，他才可能得到他的奖赏─珠圆玉润的音乐天才头骨。于是，罗森鲍姆的马车往维也纳医院的方向扬长而去。

罗森鲍姆强迫自己在旁观看人类头颅转变成歷史文物的过程，那骯脏污秽、不堪入目的第一阶段：拿他钱的医生剥除海顿脸上的皮肤和肌肉，然后清空他的脑壳。「那个景象令我毕生难忘，」罗森鲍姆后来写道：「解剖工作持续了一个小时，脑部的体积非常大，而且是味道最臭、最恐怖的部分。我坚持撑到最后。」海顿的头部组织被丢进医院的焚化炉烧毁。接下来的骷颅头制作工作是把头颅泡在石灰水中去除油脂并使骨头变白，这个工作耗时数个星期，罗森鲍姆不得已只好把朋友的头颅託付给医生，回家思考如何设计展示柜，好让海顿的骷颅头有个好地方可以存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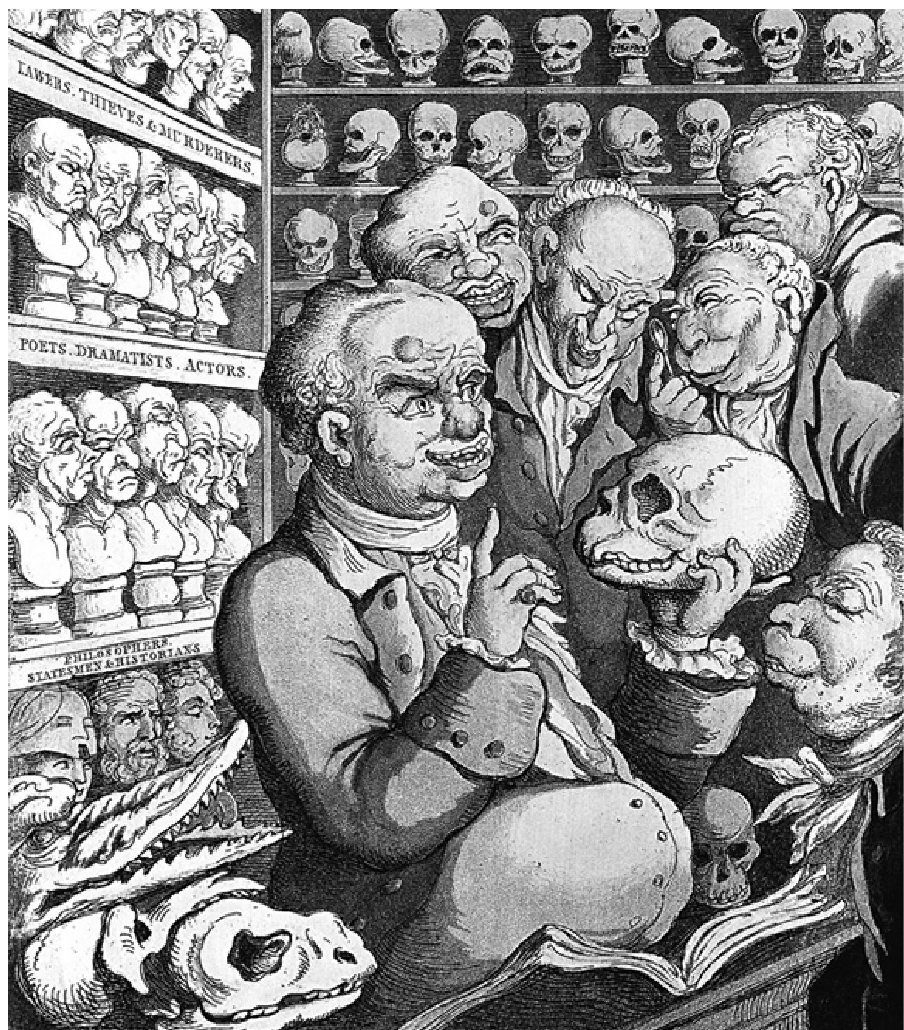
医院人员把完工的海顿头骨还给罗森鲍姆时，他骄傲地把那颗纯净白皙、光滑圆润的头颅摆进玻璃柜。那是个方形高柜，以深色木材打造，设置于阶梯式底座上，并附有简单的圆珠装饰顶盖。展示柜内有一个玻璃圆罩，骷颅头就摆在里面，柜上则摆了一把优美的木制七弦琴，象徵音乐天赋。罗森鲍姆的七弦琴是否是在援引希腊神祇奥菲斯（Orpheus）72的故事？奥菲斯靠着琴声平安进入冥界，设法营救心爱的妻子欧莉蒂丝。罗森鲍姆的黑暗任务也带有闯入冥界般的意味，而驱使他的动力是他对音乐的热情，以及他对海顿做为作曲家的崇拜之意。他也把他所爱的对象从腐烂的阴间挽救了出来。如果那把七弦琴指涉的确实是奥菲斯，可能还有其他象徵意涵在此运作。在奥菲斯神话的一个版本中，奥菲斯的身体被特拉斯和马其顿的女人扯开后扔进海中，他的头也就这样丢了。后来奥菲斯的头颅漂浮在梅雷斯（Meles）河73上被人发现，看起来充满朝气，而且还在哀伤地唱歌。头颅被埋葬的地方建立起一座神庙，成为众人朝圣的神示所。

海顿的头颅在罗森鲍姆的家成为一种神龛。头颅安放在特别制作的柜子里，有如博物馆标本或文物般展示给精心挑选的来宾欣赏，具有尊

崇的意味。它成为一个音乐的象征，代表这位伟大音乐家传承给后世的遗产。看到它的人并不认识海顿，就连喜欢说自己是海顿朋友的罗森鲍姆，他跟海顿也不算亲近，他爱慕海顿公众成就的程度超过对海顿私人癖好的熟悉。这颗头颅不能算是他个人用来纪念海顿的物品，而是一种对海顿在专业上的成功所做的致意。它证实也提升了海顿的知名度。罗森鲍姆的做法放大了海顿性格中的某个面向，同时掩盖了其他的面向。这颗头颅等于是一个经过全面修整，留给后世凭弔的人。

十九世纪期间，一股收藏人类头骨的热潮席捲欧美，而罗森鲍姆是这个门派最早的弟子之一。他醉心于研究人类头颅的「新科学」，也就是所谓「颅相学」（phrenology）。他对颅相学的兴趣促使他决定盗取海顿的头颅，尽管处理死人尸体带有潜在的风险，而且在实务面上非常噁心。他很可能上过维也纳知名颅相学者法兰兹．约瑟夫．嘉尔（Franz Joseph Gall）讲授的课，这位学者在十八世纪末期助长了头骨收集的风潮。嘉尔「头骨学说」（Schädellehre）的立论基础是：一个人的性格可以透过研究他的头颅来读取。他辨识出二十七种人格特徵，并宣称这些特徵–包括记忆、语言能力、狡猾、骄傲、机智、坚定等–都位于脑部特定区域，而且具体烙印在头盖骨上。嘉尔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就刻画在他的头骨隆凸之中。这个理论相当吸引当时的人。

嘉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讲师，而他总是坐在他收集的大量头颅之间向听众授课。他会在桌上摆出一排排人类和动物头骨、杰出人士上身像、石膏塑像以及彩色蜡制人脑模型，墙壁上则挂了头部的大型说明图表。嘉尔讨论某个人的虚荣心或色彩感时，会把他的骷颅头拿起来，指出头盖骨上因为那些特质而发展得特别突出的部位。如果他能拿到新鲜的头颅标本（动物头颅为主，偶尔也有人头），他的助理会在听众面前解剖脑部。嘉尔的讲授在维也纳逐渐出名，后来名声还扩及整个欧洲北部，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从观光客、商人、外交大使到学术界人士，可谓无所不包。他结合医学术语、视觉教具（当时听众中亲眼见过解剖的人少之又少）以及动人口才，使听讲者如痴如醉。上完一堂课以后，听众会排队请嘉尔研究他们的头。这是科学被赋与心灵力量的结果–科学家总是比你自己更认识你，而这要归功于铭刻在你头颅外形上的各种祕密。



法兰兹．约瑟夫．嘉尔在他存放大量头颅及人头模型的典藏室引导五名同僚进行颅相学研讨。彩色蚀刻版画，罗兰森（T. Rowlandson）创作，一八○八年。

不多时，颅相学就横扫欧洲北部，造就出数以百计的爱好者。根据歷史学者罗杰．库特（Roger Cooter）的描述，到一八二六年时，「头颅热」已经「像黑死病般蔓延……从底层厨房到顶层阁楼，［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都趋之若鹜」。他把这个现象比喻成「一个智识型菌菇或红花菜豆品种」。某个到伦敦访问的人发现，在伦敦街头游走时，「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展售供颅相学研究所用的人体上身雕塑及铸形，景象相当惊人」。商店外面经常摆了人头的铸造模型，价格只要几先令。兴致勃勃的收藏家会买下一系列代表不同特质–慈善、好斗、机智等等–的头颅铸形，甚至花钱请人铸造一个自己头部的模型。伦敦最成功的颅相学相关商品业者詹姆斯．德维尔（James de Ville）声称，他可以用不到七

分钟的时间帮客人做出精确的头部铸模，而且这个过程对客人造成的不适程度极低；然后他会据以制作头颅铸形，用于「颅相学研究，或当成家族纪念物」。

颅相学书籍经常成为畅销书。苏格兰颅相学家乔治．康布（George Combe）的着作《人类的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Man）到一八六○年的累积销售量达到十万册，超过达尔文（Darwin）《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的早期销售成绩—累计到十九世纪末为五万册。在《人类的构造》一书的销售高峰期，只有《圣经》、《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74及《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的销量超过它。罗伯．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75本人也曾提到颅相学于一八二○年代初期在爱丁堡受欢迎的情形：「法律系学生跟淑女们交际时，先聊拜伦（Bryon）的诗作和苏格兰小说，然后告诉她们他非常相信颅相学」—这则轶事的含意是说，颅相学知识有助于提升一个人在上流社会的地位。每个稍具规模的城市和许多小镇都成立了「颅相学学会」，会员聚会时会讨论罪犯、着名思想家或当地疯子的头。颅相学的题材具有娱乐性，同时又以学术研究自居，加上它发展出「动手做」的实务取向，因此成为一门极其强大的学问，深深吸引那些希望提升自己的社会阶级的人，许多参与者来自中下阶层，或者以商贸、手工艺为业。到了一八三○年代中期，在英国「三不五时就会看到机械工人在操作他的专业器具时谈论［颅相学］」。因此我们无须惊讶，当时讲师和「专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四处贩售各种训练课程、图表、课本、头颅解读等。

会像罗森鲍姆那样在三更半夜忍不住冲动跑去挖掘死尸的狂热爱好者很少，不过每个上道的颅相学家都需要收藏一些骷颅头。毕竟颅相学家视自己为科学家，而科学家当然必须处理物质证据。蒐集资料非常重要。

嘉尔对骷颅头的胃口逐渐变得人尽皆知，于是大人物们开始担心自己头骨的安全。十八世纪奥地利天主教神父、耶稣会士及诗人米迦勒．德尼斯（Michael Denis）为此修订遗嘱内容，以免他的头颅最后变成嘉尔的公开讲座里的展示物。有些颅相学家发现他们的头骨收藏让他们一炮而红。当乔治．康布开始对颅相学产生兴趣时，他决定从伦敦订购一些石膏铸造的头骨模型，其中每个都要能说明一种不同的性格类型。铸形被装在两个大型运糖箱里运来，康布急切地扳开木盖，取出铸形摆在客厅地板上，可是「它们看起来都那么白，而且样子一模一样」，他开始担心自己永远无法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他一边骂自己神经病，一边想赶快把那批一模一样的铸形藏起来，当这件事不曾发生，但这时已经

来不及了。他的朋友们早就知道消息，他们对这批货兴致勃勃，「成群结队地赶过来看」，并问他一大堆问题，他只好设法回答。不久以后，康布在阁楼展示这批收藏，而由于想一窥究竟的人很多，他不得不把展示活动限制为每星期两次，其他时间则请他的姊姊珍陪客人参观。康布的石膏铸形收藏使他获得瞩目，他很快就成为英国最有名的颅相学家。

颅相学之所以受到大众喜爱，大部分要归功于宣传者的技巧。最具说服力的颅相学家会在科学权威的表象和剧场表演般的戏剧效果之间取得平衡，无论是在台上向一群民众解说，或在头颅量测时那种比较私密的场合。

颅相学家经常不愿意透过通信方式，或根据某个人的头颅铸形提供性格量测结果，原因很简单，跟研究对象面对面时所能获得的资讯比较多，而且量度及触摸一个人的头颅对实测者而言确实是非常迷人的经验。解读头颅时，要用捲尺和测径器量度整体大小及形状，然后颅相学家会用指尖柔软部位测定头盖骨的「地貌」，手指滑过整个头皮，测量头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距离。每一个「器官」轮流受检测，同时颅相学家会一直跟客人说话，解释各种不同官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顾客有时可以另外花钱买文字报告，而且现场当然会准备一些图表、手册、瓷器上身像等，让顾客买下来留念。

颅相学的吸引力一部分来自它的新奇，因为大脑科学在当时依然是个无从解释的谜。嘉尔将人类的心智扎实地定位在人类的大脑中。他在这点上的坚持被传承了下来：今天，心理作用通常被认为发生在大脑内，大脑也早已被视为人类的情感中枢，与心脏、肠等内脏截然不同。其他脏器只是人体的部件，由反射作用所支配，并且可以跟人的自我分离，但大脑却成为心智的同义词。做为「感觉、想法、情感、激情的来源」，大脑被嘉尔大肆宣告为自我的根源，他的理论受到前所未见的广大民众支持。

嘉尔斩钉截铁地认为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一种有机物质，也就是大脑。大脑可以被视做自然界的一部分，透过观察进行实证研究。「人类性格的科学」是个革命性的概念。根据嘉尔的理论，心智是人体的一部分，若要有效揭开它的奥祕，必须仰仗的不是哲学家或神学家，而是乐于把手弄脏的科学家。这个意思是说，脑部那些看起来像是胡乱盘捲起来的迴圈完全不是偶然造成的结果。每一个迴圈都有它的特定功能。在这个面向上，嘉尔也为现代科学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因为自此以后，大脑功能定位（cerebral localization）确实成为神经科学的主流思维。大脑看起来或许像义大利通心粉，但那堆柔软的构造其实是「乱中有序」。

因此，大脑是理解心智的关键，而研究大脑最方便的方法—无论你的研究对象是活是死—就是找出心智在人的头骨上造成的冲击。人类的头骨比大脑容易研究。嘉尔是一名医师，在维也纳总医院接受训练期间，他有很多机会解剖大脑，后来他又到维也纳精神病院为病人进行类似的死后解剖手术。经过这些磨练，他的解剖技术已经非常高超，但大脑非常难缠，它在解剖过程中会解体，不容易维持形状。一旦大脑被移到人体外，它就变成软趴趴、不成形状的一团物质。相反地，骷颅头坚硬耐久，可说是无懈可击的研究对象。如同罗森鲍姆的实际体验，骷颅头可以随意搬动、长年保存，而且在视觉上比较吸引人。于是，像他这种头骨收集者阵容日益庞大。

十九世纪期间，人类头骨成为科学收集及科学探究的骨干。嘉尔和他的追随者将人类头颅褒举为人的智识、情绪、道德和社会中枢，现在如果有人想把这种力量归诸于人体的任何其他部位，似乎都是无法理解的事，无论心脏、胃脏或手部，它们扮演的都只是次要角色，陪衬着头部这个主角。颅相学将「人类心智」这个抽象概念带到新的高峰，无怪乎那些新兴专业阶层—中低阶级背景出身的年轻医生和律师—对颅相学这股运动趋之若鹜，因为人生能为他们提供的资源远不及他们的蓬勃野心所需，因此他们只能仰仗大脑的力量。这是一门带来憧憬的科学。人的头部含有一切重要而有意义的因素，没有任何东西被遗漏。

尤有甚者，这一切意义都被整理得服服贴贴，显现在头部表面。人类的天性清楚展现在那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它不再是深不可测的奥祕，而是立即可测可知的东西。颅相学似乎扬弃了盲目信仰及迷信，为人类自我的解析工作带来新的视野，建立在理性智识和实证观察之间的平等基础上。头颅涵括人类自我的各种官能，而正如颅相学家会仔细整理排列他们收藏的头骨和铸造品，这些官能也被井然有序地整理在头骨的表面。每一个官能都有它的相应位置，镶嵌在稳如泰山的阶层秩序中。

当时的研究结果非常容易预测而且令人莞尔，例如「爱慾」（Amativeness）—亦即性爱激情—的位置是在头部背面的头骨最底部，而「个体性」（Individuality）—与数字、秩序、比较等抽象推理有关的能力—则位于「高处」，在头部的正面中央位置，也就是前额里侧。比较「低级」的本能，例如好斗、鬼祟、破坏性、贪得无厌等，簇集在同一只耳朵附近。比较「高尚」的理想，例如希望、崇敬、慈善、灵性等，则又不出意料地被「提拔」到头骨顶端。勇气、友情、父母之爱的位置相对偏低，希望、惊奇、机智的位置则非常高。这套解释毫不暧昧地提倡智识及教养方面的人格属性，并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由于人类

的头颅在「种族外貌定性」（racial profiling）领域日益成为学术探究的核心要素，来自所谓「较文明社会」的人类被认为拥有比较大而且高耸的头颅，而所谓「较原始社会」的人类则被视为头颅比较低而且宽阔。后者几乎毫无疑问必然是「眉毛低」（lowbrow）的人—庸俗低粗、缺乏文化水准，对智识性的追求没有兴趣。

许多学术界人士对颅相学敬而远之，他们认为这门学问是披上科学外衣的算命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颅相学已经失去大众的公信力，但由于颅相学家不遗余力地推动人类头颅的研究，因此它的影响力依然继续发挥。从颅相学登上研究舞台开始，人类头颅就成为人类身分认同科学的基石，无论演化生物学或临床心理学，它在所有相关领域中都非常重要。十九世纪期间，由于数不清的科学家对颅相学提出的原则感兴趣（纵使他们可能不苟同它的实践方式），颅相学相关理论持续存在于学界后来对人类头颅的研究，特别是在「种族」这个敏感主题方面。

一八五○年代时，人类头骨已经成为人类演化及种族多样性的相关学术论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主流科学家并不将它视为头颅主人人格的物质印记，而是认为每个人类头骨，都是由众多类似头骨形成的广大种群中的一个特定变体。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探讨中，人类头骨逐渐成为种群差异的指标，而不再代表个体性格特徵的差异。有些头骨可能比其他头骨「典型」，但整体而言，同一种群的成员—无论这是指同一族群、同一性别，或同等的智识能力—会有大小和形状类似的头骨。

这里面的挑战是如何得到数量足够的头骨，以精确标定不同群体间的界线。墨西哥人的头颅通常是比阿根廷人的头颅大还是小？这些人的头颅跟来自印度尼西亚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头颅相比，又有什么区别？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需要大量标本。十九世纪末期出现大规模收集头骨的现象，因为数量大有助于做出有效的统计。包括美国法伍勒（Fowler）兄弟及英国的詹姆斯．德维尔在内，过去几位颅相学家曾经收集数以十计的颅骨，但到了这时，一个人如果自诩为专业人头科学家，收集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颅骨等于只是他的基本功。新一代「颅骨测量家」不仅如其名所示，从事颅骨测量工作，而且是测量数目庞大的颅骨。

十九世纪中期，颅骨学被捧为人类自然史研究的基石，所有「最好的」解剖学及自然史博物馆都有相当可观的人类头骨收藏，而且相关人士普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收藏。头颅依然是人的本质所在，但现在，随着科学家纷纷投入种族差异的歷史研究，每个人、每颗头颅，都在这个大规模分类作业中成为标本。

这里面的假设就它最基本的层面而言，与颅相学的假设类似，只是种族特徵被假定存在，而且取代了原来假定的人格特徵。头颅小，大脑就小，而大脑小，心智就比较原始，因此科学家在测量和整理头骨时，相信他们同时也在测量及整理不同的人类族群。颅骨学的基本前提是：人类在智识、文化及身体上的差异可以化约为一组测量数值，然后置于一个线性尺标中。人类头颅的隆凸凹陷方式依然有其重要性，但整体大小和形状才是这个架构中的真正定位标准。

一八五○年前后数十年间，「种族」的概念变得与人体的具体外观紧密相关，探讨人类外貌也成为科学研究中的显学。教育、宗教及气候只是人类多样性的「奇妙原因」，骨骼和身体才是铁一般的事实证据。若要确立一门「人类科学」—当时许多人确实非常关切如何让与人类有关的研究展现科学上的凭据—首先必须让它奠基于物质证据和够科学的调查方法。接下来几十年间，学界致力蒐集所需资料（也就是死人尸体的各个部位），为这门人类科学建立基础，并设法辨明资料诠释的最佳方式。

在找出世界各地人类之间的相似及差异时，所有人类骨头及身体部位都非常重要。胸部、肩胛骨、手部、脚部、腹部、骨盆的造形，以及皮肤色调、头髪质地，都必须仔细记录并比较。一代代的研究会拿到色调卡之类的色彩图表，做为旅行研究时的辅助工具，让他们能够设法将一个人的皮肤色调与手上的色卡进行比对。不过，这些色彩及大小方面的属性都不像人类头骨的特徵那样受强调。约瑟夫．巴纳尔．戴维斯（Joseph Barnard Davis）可能是收集过最多头盖骨的学者，他曾说：「人类的颅骨比起其他因素绝对是鹤立鸡群」—同时代许多其他学者都认同这个观点。过去，颅相学家为人类头颅打造了独特地位，并据以建立他们的学术名声；曾几何时，颅骨学家翩然登场，做着同样的事。

从实际观点来看，头骨拥有许多特质，使它值得推荐给有兴趣探究科学的人。一名维多利亚时代医生—詹姆斯．艾特肯．梅格斯（James Aitken Meigs）指出，头骨「易于处理及保存，能够方便地经手、测量，从不同观点衡量，并相互比较」。头骨非常适合当标本，因为它体积小，而且质地坚硬扎实。它比全副骨骼紧密，因此相对容易运送，同时它又比头部所含的组织成分持久，可以放在博物馆展示好几百年。头骨有惊人的耐压能力，原因之一是它的形状，但这也是因为头骨不同于长形骨骼，不含骨髓成分。此外，头骨被视为「最具特徵」的人体部位，因为不同头骨之间有各式各样的差别，足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它的各种缝隙、孔穴、隆凸、凹洞，都构成统计学家梦寐以求的资料。

人类头骨很容易供人做各种测量，因为它是一个中空的三维物体。它包含内部及外部，让人既可以量度骨骼本身，也可以研究脑部的容积和形状。眼窟、乳突、颧弓，以及形形色色的突出和开口，都是分析记录的绝佳材料。头骨的高度、深度、宽度有许多不同计算方式，因此，量度结果的关联性如何判定，成为颅骨学家之间不断争论的议题。

在那个年代，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是自然界必将臣服于他们的探究，他们相信地球上的生命是由一些法则所支配，而人类掌握了那些法则的钥匙；断定科学价值的标准是人是否能置身于他所测量的世界之外，不受任何既定成见左右，只观察手中拥有的证据。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骷颅头成为最完美的研究标本。骷颅头具有独特性，充满韧度，几乎从不变化，它让人类相信他们处理的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踏上一个探寻某种「规则手册」的旅程，设法藉由这套规则来解释头骨之间的惊人差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邀约。无尽的变异性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共同的样式，只等着世人走出去收集相关资料。

在一八五○年之前，欧洲地区已经出现一些规模非常大的人类头骨收藏。颅骨学鼻祖━一位名叫约翰．弗德利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的德国医生在十九世纪初期收集了两百四十五个人类头骨，这些收藏保存在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位于英国肯特郡查特罕（Chatham）的军医博物馆（Army Medical Museum）典藏了六百个来自七十个不同部落和民族的颅骨。乔治．康布于一八二○年成立的爱丁堡颅相学学会收藏了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民族头颅」。然后还有詹姆斯．德维尔和嘉尔的惊人颅相学收藏。前者包含一千八百个头骨及石膏铸形，不过一八四六年德维尔过世之后，这些头骨逐渐被瓜分，流失到不同地方。后者目前主要典藏在奥地利的巴登（Baden）和巴黎的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Homme），一共有三百五十个头骨和铸形。

医学界的收藏没有例外地包含人类颅骨。约翰．杭特（John Hunter）在十八世纪末建立了大规模的比较解剖学收藏，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医学典藏奠定基础。这个收藏包括为数众多的人类头骨，由杭特依据复杂程度加以整理。他鼓励他的医学学生照做，于是在十九世纪初期，解剖学校、教学医院、学术社团及大学开始更有系统地进行解剖学收藏，逐渐建立出一个人类骨骼及人体部位收藏网路，其中头骨占了一大部分。内科及外科医生经常在自家展示他们的医学收藏，但愈来愈多医学院和医院决定出资兴建专属博物馆，展示日益庞大的人体标本资料库，包括正常标本和病理标本在内。对十九世纪中期连番出现的许多新学术领域的研究人员━包括解剖学家、医生、动物学家、考古学

家、民族学家、自然学家等−而言，头骨深具探讨价值，因此无论研究者属于哪个国家或学术机构，收集头骨的风尚在整个学术界不断延烧。

人类头骨的美学特点相当突出，促使学者将它们排成线形序列。最初的颅骨收藏家，包括杭特及布鲁门巴赫，是以成排方式展示头骨。布鲁门巴赫稍微提过这种做法的视觉力量，他写道：「当头骨排放在同一平面，从上方及后方观看……头骨的种族特性……立即而清楚地跃然眼前，将这个观点称为一种垂直尺标并不为过。」杭特将颅骨按照从猿猴到人类骷颅头的顺序排列。虽然这些学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人种优劣的主张，但他们的头骨收藏似乎是按照线性方式排列，而且将头骨排成阶级、人种性质序列成为科学界的普遍做法。奥地利人体解剖学家约瑟夫．西特尔（Joseph Hyrtl）收集了一百三十九个骷颅头，后来在一八七四年由费城穆特博物馆（Mütter Museum）收购。今天这些头颅依然展示在那里，置于原有的木柜中，从地板到天花板成排整齐陈放，各色人类头骨在一整个墙面上露齿而笑，这个景象在当时的医学博物馆及大学想必非常常见。

西特尔把这些藏品运到费城时，货运车厢上的每一个箱子都置放于枕头上，而且整堆货物周围都设有护栏，足见他对他收藏的头骨非常自豪，而且非常关心它们的安全。事实上，西特尔的收藏只是欧洲地区众多收藏之一。颅骨成为收藏品的比例远大于人体其他部位，以巴黎人类学学会为例，一八八○年时，它一共已经收集到一百三十副人体骨骼，两千个经过干燥处理的人体部位，以及四千个骷颅头。这些科学标本以类似纳骨所的戏剧化方式陈列，彷佛在颂赞理性科学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力量，同时为人类战胜死亡的概念呈现新的观点。

收集骷颅头最早也最热衷的人士之一是美国的萨谬尔．乔治．摩顿（Samuel George Morton）。摩顿是宾州大学解剖学系教授，他在一八五一年去世以前，一共收集了超过一千两百个人类头骨。史蒂芬．杰伊．戈尔德（Stephen Jay Gould）76曾冷言冷语地指出：「朋友（和敌人）们把他那栋大藏骨屋称为『美利坚各各地（Golgotha）77』。」摩顿收集的头骨有些来自战场，有些是监狱和济贫院（workhouse）78管理人员送给他的，有些从美洲原住民的埋葬场劫掠而得，还有些出土于世界各地的考古挖掘场地。他的大量头骨收藏不但没有使他被认为是怪人而遭边缘化，反而在科学界为他带来名誉和尊敬。瑞士自然史学家路易．阿加西兹（Louis Agassiz）于一八四六年访问摩顿以后，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提起：「想像一个六百颗骷颅头的收藏，其中大都是印第安人头骨，来自过去及现在居住于整个美洲大陆的所有部族。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有这样的东西。光是为了看这个收藏，就值得专程到美国一趟。」

摩顿致力以立方英寸为单位，测量那些骷颅头的相对容积。一开始他是用筛滤过的白芥末籽充填骷颅头，后来改用直径八分之一英寸的铅粒，因为他认为铅粒比较可靠。他收到骷颅头以后，都会把它清洗干净，涂覆清漆，然后进行测量。碰到不寻常的骷颅头时，他会在书房里花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观察它。他的观察力据说近乎先知的程度：每当一颗没有任何辨识记号或标籤的古老头骨送到他那里，他会对着它冥思好几天，然后宣布结论。「先前他从没见过腓尼基人头骨，他也不知道这颗骷颅头来自哪里，但他认为腓尼基人头骨就应该是这个模样，所以它不可能是别的地方的骷颅头。」果不其然，六个月以后，他收到一封说明文件，上面写着：头骨的发现地点是马尔他的一处腓尼基人墓。

摩顿出版两本书介绍他的收藏，并详细说明他的头骨容积研究结果。不过即使是这么大规模的收藏，比起来自英国的另一位同好—约瑟夫．巴纳尔．戴维斯的收藏，还是黯然失色。摩顿和巴纳尔．戴维斯各

生于一八○○年前后一年，两个人隔着大西洋各自追随他们的热情，他们是歷史上最贪心的颅骨测量家。巴纳尔．戴维斯累积了数量惊人的头骨━高达一千七百个。他把这些骷颅头堆放在他位于史塔佛夏（Staffordshire）郡市集镇薛尔敦（Shelton）的住所。一八八○年间，他把这批收藏卖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因为这个学术机构感觉「这些收藏应该予以完整保存，不宜让它流向海外」。巴纳尔．戴维斯的收藏被视为「有史以来，以私人名义累积的头骨中最丰富也最有价值的收藏」。

巴纳尔．戴维斯拥有的头骨多到工作人员花了整整十二个月，才把全部头骨从薛尔敦运到位于林肯客栈原野（Lincoln's Inn Field）的皇家外科医学院。那些骷颅头在他的住所一路堆到屋椽。为了准备让骷颅头搬家，他开始进行整理分类，经常像个猎人般在阁楼中搜寻，设法找出被放错位置的头骨。他的阁楼里摆满橱柜，橱柜里装满人类骨骼，而且有时他必须把锁头撬开，因为钥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即使他这样卖力追踪，最后还是有一百颗骷颅头的来源无法考证。

与这个庞大的整理打包工程周旋一阵子以后，巴纳尔．戴维斯决定举白旗投降，花钱请一名瓷器包装业者来帮忙，确保每颗骷颅头都用纸包妥，并置于干草铺设的小窝中，然后才堆入木箱，由铁路公司派员收取，运到附近的火车站，装上开往伦敦的列车。最后一箱货品送走以后，巴纳尔．戴维斯感到无比孤单。他的房子想必忽然彷彿变成两倍大，感觉空旷寂寥。「现在我变得形单影只，不再拥有我的收藏，」他向皇家外科医学院典藏主任写道：「我觉得落寞，整个人彷彿解体了。」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刚挥别的那些骨头（除了数以百计的头骨之外，还有十四副带有关节的完整人体骨骼）在新家能受到妥善照顾，并获得详细建档管理。

身为一名医生，巴纳尔．戴维斯在收集头颅方面可说是不择手段。一名医师同侪约翰．贝铎（John　Beddoe）记得他「基本上就是把别人的头看成潜在的骷颅头」。根据贝铎的记述，有一次巡查医院时，他把巴纳尔．戴维斯介绍给他的一位病人。那是一名来自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79的船员，他差点溺毙，获救后被送到布里斯托皇家医院（Bristol　Royal　Infirmary），贝铎负责治疗那人肺部的坏疽。巴纳尔．戴维斯立刻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他告诉贝铎：「你很清楚那人恢復不了；他死的时候，请你记得帮我护好他的头，因为我还没有收集到来自那一带的头颅。」幸好巴纳尔．戴维斯的诊断太过一厢情愿，船员大难不死，后来完全恢復健康。松了一口气的贝铎事后不禁幽了一默：「他把头扛在自己肩膀上，回赫塞哥维纳去了。」

这就是头骨收集的真实写照。收藏家必须跟医生和护理员聊天拉关系，并安排从医院解剖室、市立殡仪馆、监狱或精神病院将头颅运出去的相关事宜。身为头骨收藏家，巴纳尔．戴维斯和摩顿都懂得运用工作上的广大人脉。别人印象中的摩顿「风度翩翩，使旁人不禁受他吸引，彷彿被兄弟之情的绳索所牵动」，而这种个人特质想必为他的专业成就带来关键性的助益。根据歷史学者安．法比安（Ann　Fabian）的统计，共有一百三十八人将人头或头骨贡献给摩顿的收藏，而且那些人来自许多不同社会阶层，有医护人员、政府官员、传教士、军人、探险家，甚至委内瑞拉总统。巴纳尔．戴维斯也如出一辙，他仰赖朋友或同僚寄（或卖）给他这些收藏品。其实在这个巨大累积工程的最前线，远远超过摩顿和巴纳尔．戴维斯的朋友圈的日常活动范围，有一些人在各种可疑情况下交涉人头和头骨的取得事宜。欧美各地博物馆收集了数以千计的人类头骨，但在几乎每一颗骷颅头背后，都有一个与交易、诈骗、压迫或耍花招有关的故事。

从「原始国度」收集头颅可能相当直截了当，因为地理和文化上的距离—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殖民官僚体系这个助力—使得无数灾厄几乎不受注意地发生。少数时候，当地人民会接受收藏家对人头的要求，例如一名俄国探险家在一八八○年代旅行到非洲中北部贊德人（Zande）居住区时，就这样顺利取得人头。他在收集当地动植物的过程中，决定把人类头骨也纳入收藏，于是他发布「一条指示，要求取得漂白头骨，只要出现恰当的时机」。他的运气不错，提出请求时，当地刚好发生邻近社群的冲突事件，因此很快就有人送来「恐怖礼物」：三大篮人头。他把人头短暂埋葬以后，就把它们运回俄国清洗。

比较常见的情形是，收藏家对死人尸体的兴趣会遭受当地人的反抗。在许多地方，民众开始举行祕密葬礼，使来自欧美的盗尸人莫可奈

何，有些搜寻头颅的收藏家甚至开始担心人身安全。摩顿的人脉网路中有一位名叫约翰．柯克．唐恩森德（John Kirk Townsend）的鸟类学家，他宣称有一次他在奥勒冈州的一处美洲原住民埋葬地盗墓时，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他写道：「在我们国家，要取得印第安人头骨是相当危险的工作。原住民对你非常嫉妒，你在他们的陵墓附近流连时，他们会非常仔细地观察你，要是可怜骑士胆敢干扰他们的神圣遗骨，很可能立即遭到血腥报復。」

当地人民抵抗贪婪的外来者时，头骨收藏者通常就只好在月黑风高时偷偷摸摸地行动。摩顿的一名友人是殖民地官员，他在埃及盗墓，并寄给摩顿一百多个头骨。他在信中提到，那带给他「一种卑鄙无赖的快感，我在让死人復活这行做的种种实验绝对可以让你捧腹大笑」。用这种方式把偷尸活动轻描淡写成蛮勇冒险不算少见，在许多故事中，旅行收藏家确实会在夜里偷袭战场或埋葬场，以盗取头颅。一八九○年代，剑桥大学的艾弗瑞德．寇特．哈顿—也就是第一章中提过的那位后来到婆罗洲和托列斯海峡收集颅骨的人类学家—住在爱尔兰西部时，有一次他在半夜造访一处废弃教堂。他的好奇心获得回报—他在教堂墙壁的某个凹处找到一些颅骨；但忽然间有两个人从附近走过，使他不得不将掠夺品藏起来，稍后他回到等着送他返回住处的船上时，也得在船夫面前躲躲藏藏。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和布兰达．瑟利格曼（Charles and Brenda Seligman）夫妇于一九一二年在苏丹东海岸进行研究，某天傍晚太阳下山时，他们前往一处古战场，然后开始「悄悄地用我们的枴杖把地面弄松，取出头骨」。他们不敢拿圆锹挖更多头骨，不过天黑以后他们返家时，手上还是提了十一个头骨。

人头可能在任何我们想像得出的情况下取得，其中有些情况合法，有些则是非法。巴纳尔．戴维斯的人脉会送给他被处决罪犯的头颅，或来自医院解剖室的头骨。他拥有一个女孩的骷颅头，是在庞贝古城的一处地窖中发现的，那女孩头上还戴着网纱。他也有十个万那杜（Vanuatu）80人的头骨，这些人在他们家乡的医院死于痢疾，后来主治医师把他们的尸体挖出来，切下他们的头颅，清理成头骨，贴上识别标籤，然后寄送到英国给他。他还有曼彻斯特济贫院住民的头骨，是当地外科医生送的。也有肯特郡建设新铁道时在开挖现场出土的古代头骨。这些头颅各个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诉说。骷颅头原来的主人还包括一名缅甸仰光的窃贼、一个在香港遭处决的中国海盗，以及一个澳洲塔斯马尼亚（Tasmania）居民，这人被怀疑在某天夜里偷羊，结果遭管理员开枪打死。

然后还有一些头颅出自沙场上阵亡的人。对十九世纪的收藏者来

说，军队显然是人体部位的丰富来源，摩顿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仰仗美军军官的程度远超过其他类型供应者。摩顿死后，美国印第安战争成为稳定的供应源，大量人头被用为建立种族理论的资料。一八六八年间，美国军医处长甚至发布正式备忘录，吁请军医为美军医学博物馆收集美洲原住民的头骨，以便建立更有系统的收藏。他非常强调「量」这个部分：头愈多愈好，因为这个收藏旨在「对大量北美洲原住民种族的头骨进行量度，协助人类学的进展」。

这是已知唯一一次美国政府正式参与人类颅骨收集工作，而且获得的结果相当惊人。美军医学博物馆在一九○○年时已经取得大约三千个头骨，其中两千两百个头骨在一八六九年间从史密森学会的典藏中心移送到那里，当时一辆辆马车运送颅骨通过美国首都的情景想必令人大开眼界。多年间，美国的军医在战场上取得头颅，在军营或医疗营帐中切下数以百计美洲原住民的头，有时他们也会直接从墓地挖出头骨。

在世界各地，军人最容易遇到原住民，也最有可能把他们杀害，因此不足为奇，所有重要的解剖学收藏一部分都要归功于军中的士官兵。这不是简单的工作，许多美国医生都抱怨过他们在抢夺尸体时必须承受的艰困和危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当地社群会想尽办法阻止他们做这件事。另一方面，军人心里知道他们做的事不应该，所以他们会对同袍隐瞒他们的行为。有个人描述过一个非常尴尬的情景：他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让部队知道他在营区伙房里煮人头。另外有一次，一名《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记者惊骇地看到营区的一个帐篷已经变成解剖室，里面有一张铺了橡胶布的桌子，一大桶水，琳瑯满目的外科器具—这些设备的目的是切下他们最近杀害的莫多克（Modoc）部落原住民的头，然后送到华府去。

无以数计的医生切下死人的头颅，清出头骨，解剖他们的遗体，清理他们的骨骼，然后把人体各个部位进行装瓶、防腐保存、贴识别标籤，就这样建立起人体收藏。他们通常是把这套程序应用在最贫穷、最没有权力的社会组成分子身上，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的家人没有钱或其他社会资源为死者举行安全的葬礼，于是遗体就很容易落入医生手中。

有时候中产阶级的人会把大体捐给科学研究机构。十八及十九世纪期间，要求死后验尸的情形逐渐普遍，这经常是为了让医生研究某个特定疾病，但他们会小心避免大体受损，做完检验后也会仔细修补，让死者体面地安葬。人体解剖是另一回事，而且在歷史上还带有刑罚的意味。被解剖的尸体做过医学检验之后，变得面目全非，然后被扔进没有标示的掩埋坑，或随着医院的垃圾丢弃。就算这些被解剖的尸体获得适当的安葬，通常也没有人会掩饰它们遭受的破坏。收藏家如果要仰赖私

人捐赠建立完善的人体部位收藏，他得等上很久很久，因为很少有人会同意在往生之后受到这样的对待，特别是当时多数人都认为大体完整是灵魂顺利过渡到来生的关键。

由于捐赠者少，医学院及科学收藏对尸体的需求又高，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选择阻力最小的途径，收集罪犯、疯子、穷人、敌人、叛徒、奴隶和外国人的遗体，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今天的研究性收藏中，这些类别的「无名死者」的数量依然有成千上万。

有史以来，死者如果看起来没有家人朋友，经常就会成为从事科学解剖及人体保存的藉口。一八三二年的英国人体解剖法案及接下来几十年间在美国通过的类似法案，允许对「无人认领」的死者进行医学解剖。于是，数以千计的穷人走上成为科学收藏的路，因为他们没有钱在他们的教区墓园买下安身之地。这些人不见得真的孤苦无依，但由于亲友付不出丧葬费用，所以还是等于「无人认领」。在许多情况下，有能耐让死者逃过解剖刀的终究不是家人，而是钱，因此这些没钱的穷苦人家往生后，往往被当做实验物品处理，受对待的方式彷彿他们全然无亲无故。十九世纪期间为医疗机构提供尸体的专业劫墓者为了避免尸体被辨认出来，会小心翼翼地把所有衣服和个人物品留在坟墓中，因为无名尸难以追踪，家属比较不可能认尸。

在美国，无名坟墓及「陶人田野」（potter’s field，即公家出钱埋葬死者的地方）是最受偷尸人青睐的目标，因为那里的「居民」至少在象徵层面上已经被家属和社会遗弃。其他可靠来源还包括自杀者的遗体，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葬在基督教墓园。基于相同原因，贫民所和济贫院也为科学研究提供数量稳定的死尸。非裔美国人的坟墓经常位于独立的墓园中，因此经常成为盗取目标。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中，黑人的遗体遭窃几乎不会引起中上层阶级的注意，而且他们的家属也几乎没有力量对抗。

当年许多学术界人士相信非裔美国人及所谓原始民族几乎不能算是人类。例如萨谬尔．乔治．摩顿就认为人类的不同种族是在上帝造物时建立的，因此他们构成个别的物种，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把外国人视为不同物种乃至次等物种的观念，不仅使他们成为科学分析的适合对象，而且也可能在某人对他所做工作的道德意涵有所犹疑时安抚他的良知。即便友谊的建立能够冲淡「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野，但最后做决定的还是「科学」。伊西（Ishi）就是一个绝佳的案例。

伊西是一名美洲原住民，一九一一年间，他在加州北部一处屠宰场园区内被人发现。他一身落魄，骨瘦如柴，听不懂一句英文，除了脖子

上围的一块车用篷布以外，全身一丝不挂。媒体把他报导成北美洲最后一位野人，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则进行研究，证实他是美洲原住民雅西（Yahi）族81的人。他的家人朋友已经全都死去，无依无靠的他最后在飢饿和绝望交迫之下，不得不离开家乡。他被暂时安置在位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等相关单位做出合适的安排。结果他继续在这座博物馆生活了几年，提供有关他的族人和语言的资讯，并以门房助手的名义赚取薪水，直到他在一九一六年去世。

伊西曾公开要求他死后不能让人解剖他的尸体。一名典藏专家在伊西往生前几天撰文表示：「……科学可以下地狱去。我们提议站在我们的好朋友这边。」他还说：「此外，我无法相信这里面会有任何实质上的科学价值……在他的例子中，最主要的好处恐怕属于一种病态的浪漫性质。」可惜他的信写得还是太晚了。在伊西生前宣称是他朋友的博物馆人员「在科学与情感之间做了妥协」，违背伊西的意愿，解剖了伊西的遗体。他们取下伊西的大脑，送给史密森学会。执行验尸的人自我安慰说，他们把侵入的程度降到最低，不会有一般解剖那种对大体缺乏尊重的状况发生：至少他的大脑被保留了下来，而且没有受到破坏。伊西遗体的其他部分获得完整保存，送到加州一处墓园火化。由此可见，验尸被视为一种妥协办法，尽管这么做违背了死者的意志。

伊西死后遗体遭到切割，正如他的身分在生前的分裂：他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科学样本。跟许多其他人一样，他被认为是所谓「部落的最后一人」，他显然没有任何在世的亲人，死后则被视为不可轻易丧失的「有价物品」。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某某男子或某某女子是「他们部落的最后一人」这种哀嘆之声经常出现。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经常被科学收藏者描绘成没有羁绊的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家族归属。这是某种挖苦式的赞美，它一方面使他们的所处地位洋溢一股浪漫情调，一方面却也影射了他们死时的社会孤立及全然无助。许多人相信原住民会在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下迅速绝迹。讽刺的是，这种想法使收藏者更积极热切地收集各种物件、衣服、骨骼，以供研究之用，结果反而导致他们的「抢救民族学」（salvage ethnography）变成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头骨收集的黄金年代是构筑在这样的信念下：头骨与长形骨骼及肩胛骨截然不同，它保留了一个人的本质精髓。然而，博物馆收藏的头骨中，绝大多数却完全被剥除个人身分与歷史的印记。这样的对比充满反讽。为达到理性探究的目的，那些骷颅头大都特意被处理得没有脸孔也没有名字。骷颅头是一种身分认同的具体标志，而不真的代表某一个个人，因为骷颅头同时独一无二却又不具人格。骷颅头依然是某个人的脸

孔，但是，由于它被剥除到只剩下骨骼结构，它显得遥远，彷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因此虽然骷颅头保有了它在眼前当下的即刻存在，它的力量却已经被「去人格化」（depersonalized）。骷颅头长期被视为来自来世的使者，因为它代表一个人，但那个人却不在场。他（她）已经转化成某种新的东西。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骷颅头对科学家那么有吸引力，因为它同时具有人性又不具人性。它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个人，不如说是一个群体，或一种「类型」。将皮肉从某个人脸上清除的做法不只创造出一个令人惊异的装饰品，它也是将一个独特的个人转变成一个泛型标本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博物馆的收藏家所做的工作有一大部分与「去人格化」有关。正如掘墓者把尸体卖给科学机构前，会小心地把所有具识别作用的物品留在坟墓中，博物馆典藏员对他们的「标本」的个人歷史也鲜少表现出兴趣。伊西的例子在这方面比较不寻常，因为他超越了「泛型标本」与「着名遗骨」之间的分野（无论如何，伊西的名气毕竟源自于他被视为他所属「类型」的最后一员的特殊地位）。其他对人类学或解剖学有价值的个体会被标上号码，但名字不会获得记录。所有送进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都会得到一个登录编号，透过几滴墨水的作用，被重新归类为研究物品，以科学之名抹去他们原有的自我。

摩顿在费城自然科学院（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的后继者悉心地用墨水在他收藏的每一颗骷颅头额头上标註号码和它被发现的地点，有时也标上收集者的名字。在博物馆中，收集者的身分经常比被收集者的身分更受瞩目。列出一串知名捐赠者的名字有助于强调该机构的声望。假如慷慨的捐赠者被遗漏，那会是个天大的错误，但如果没有人知道被研究的死人叫什么名字，那不但没什么关系，甚至也可说比较方便。相较之下，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原居地等资讯经常会被写在头骨上，因为这些资讯在探讨它的人口学价值时非常重要。约瑟夫．西特尔的做法比较不寻常，他为他收藏的头骨制作标籤时，会提供更详尽的资料，包括姓名、年龄、职业、死因等。今天，西特尔的标籤成为广受讨论的题材，正因为那些标籤非常特别，一般人只是把收藏的骷颅头当做研究物品来处理，不会把它视为人的头，而西特尔的标籤打破了这个倾向。

将一个人的名字消弭，改成一个数字—这是人类遗骨收集者为了把尸体抽离出它与活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採用的方法之一。失去了名字，死者就与亲友正式分离，亲人无法把他索回，因此他便成为研究用的物品。某个人的父亲或曾曾祖父就这样化成一九○一年以三十六岁之龄死去的一名澳洲男性。在许多案例中，这种社会抽离的程序—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贴标籤者」与「被贴标籤者」之间的权力游戏—其实只是一个更大的程序的延伸。如同我们先前所见，在某个人的骷颅头被送到博物馆之前很久，早在那个人的头不见的时候，他通常就已经算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家的「无名氏」。

在摩顿、巴纳尔．戴维斯之流领导十九世纪后期重要科学研究机构的年代，他们着眼的是以更有系统的方式累积头骨收藏，于是，成千上万的人类头颅被送到欧美各地城市，在那里让人贴标籤、研究，然后贮存起来。然而，虽然这些头骨收藏规模庞大，它们却鲜少造就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出版。在整个十九世纪后期，博物馆典藏员锲而不捨地加以登录建档，但出版详细比较研究的例子却少之又少，彷彿一旦那些头骨妥善收存在安全地点、摆进某个「负有文明使命」的机构以后，就不再有什么大用处。而且就算头骨获得摩顿、巴纳尔．戴维斯及其他人的详细测量与比较，所得结果也令他们感到挫折，因为要得到具体结论非常困难。

萨谬尔．乔治．摩顿陆续于一八三九年及一八四四年出版《美利坚颅骨大全》（Crania Americana）和《埃及颅骨大全》（Crania Aegyptiaca），巴纳尔．戴维斯则陆续在一八五六年和一八六七年出版《大英颅骨大全》（Crania Britannica）及浩瀚巨着《颅骨宝鑑》（Thesaurus Craniorum）。这些书籍列出数以千计的头骨、数以万计的头骨测量资料，其中光是《颅骨宝鑑》收录的测量资料就高达两万五千条。巴纳尔．戴维斯坦言：「我开始做这个工作时，想到必须用自己的双手仔细进行两万五千次以上的细緻测量，就觉得很有压迫感。」由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因为他在不断重复的动作中培养出某种免疫力，他在测量过程中逐渐觉得工作变得简单。他过世以后，一则讣闻指出他的「强项是在收集、记录标本时展现从不倦怠的过人精力，而不是深刻的观察、判断或归纳能力」。巴纳尔．戴维斯自己恐怕也会同意这点。他的主要目标似乎是建立一个可供参考的头骨形状资料库，而不是一个革命性的种族理论着作。

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可供进行上述庞大的工程。最初，巴纳尔．戴维斯用的只是简单的捲尺、两脚规（测径器），和装有固定钉的量尺，但随着时代演进，工具也变得愈来愈繁复多样。光看各种测量仪器

接连问世，就可以知道这个题材受欢迎的惊人程度：十九世纪末期，市面上有超过六百种不同款式的头骨测量仪器，有各种测角仪（goniometer）、颅位保持器（craniophore）、颅形描记器（craniograph）、弯角测径器（spreading callipers）、直角测径器（sliding callipers）、骨体测量板（osteometric board）、测力计（dynamometer）和人体测量器（anthropometer），还有颌部测角仪（mandibular goniometer）、立体测图仪（stereograph）、测颅器（cephalometer）、圆弧测定器（cyclometer）、眶轴计（orbitostat）等等。摩顿选用的是脸部测角仪、颅形描记器（用来画骷颅头）、颅位保持器（用来测量颅容积），以及比较基本型的颅测量器（craniometer）和两脚规。颅形描记器包含一大块木板（六英尺长、一英尺宽），一端有一个台座可供放置头骨，另一端是一个目镜，可让人以缩小比例观察头骨。不难想像，摩顿的办公室一定很像一座摆满码尺和直尺的工具森林。

一八八○年代，美军医学博物馆的一名典藏员只是拿头骨来实验新的测量工具，而不是据以进行研究出版，彷佛测量本身就是最终目的。每一颗头颅，无论那是窃贼、海盗或穷光蛋，都变成页面上的一连串数字，最后产出的只是无数大型表格，显示各种距离、角度和比例。

这种把人转换成数字的冲动具有某种权威性质。无论是摩顿或巴纳尔．戴维斯，乃至许多同时代的人，他们都倾向于相信种族差异自古即有，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巴纳尔．戴维斯曾在撰述中提到「人类种族在本质上无法妥协的多样性」，他们两人也都相信混血结合产生的下一代会没有生育能力，或至少生育力显着降低。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摩顿后来不得不考虑放弃将生育力做为人种分辨标准的做法，不过他依然坚持不同人种构成互不相容的生物群体。摩顿和巴纳尔．戴维斯彷佛将人类的多样性视为跟骷颅头一样坚硬而无法改变。他们广泛测量人体的作为代表某种将人类归位的企图，设法藉此在不同人群之间画上边界。问题是，在他们以为自己正在发现人种差异的过程中，他们其实是在促成这种差异的形成。

所有那些仪器和统计数字都为颅骨测量赋与一种科学的表象。把人转化成数字的做法使人变得可以预测，但测量结果却令当事者困扰，因为情况反而变得更混淆。资料中总是有例外、缺陷，而且总有一些个人或群体无法被纳入他们试图建立的拼图中。人类的头颅提供的终究是充满矛盾的资讯，导致种族阶层化的主流思考遭受掣肘。

摩顿出版的书籍中的有些文句，透露出他其实难以理解他试图描绘的人类图像有多复杂。例如他提到，他原本以为应该互不相同的族群，结果却难以区分，使他觉得「无所适从」。摩顿也坦言他决定不要为他收藏的高加索人种头骨计算平均大小，因为他知道其中含有大量体积较小的印度北部颅骨和埃及颅骨，会把平均值拉低。与此同时，他却把祕鲁颅骨纳入美洲原住民样本中，于是拉低了这个种族的平均头颅大小。但当他看到某些美洲原住民的颅骨特别大，他却完全把它排除在公布的结果之外。他没有把性别或身高体型纳入考量，因此，由于他的「黑种」样本含有大量女性颅骨，平均数值自然比较低。祕鲁颅骨和兴地（Hindi）82颅骨都比较小，原因是这些族群的人身材本来就比较小，但摩顿将祕鲁颅骨纳入计算，却把兴地颅骨排除。摩顿把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平均值往上进位，却把「尼格罗种」（Negroid，「黑种」）埃及人的平均值往下进位。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摩顿的所有测量统计结果都有这种基本问题，因为他的收藏算是杂乱建立起来的，是透过偶然的聚会和社交机会逐渐累积的结果，有些取样族群比较大，有些则比较小，甚至小到只有一两颗骷颅头；有些族群包含比较多女性样本，有些则以儿童为主。他的资料缺乏一致性，所有颅骨学家的资料也都如此，这种「材料」的本质使「系统性收集」的企图几乎完全无法实现。具代表性的样本是颅骨学家的梦想，但在现实世界中，他们只能透过手中握有的有限组合提出结论，结果当然站不住脚。

另外一个显着的问题与如何定义「种族」这个词的具体意义有关。在摩顿的收藏中，有些头骨的分类是根据宗教或族裔，例如阿拉伯人、塞尔特人、印度北部人、尼格罗人（「黑人」）；有些则是依据国家界线区分–阿富汗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等。更令人担忧的是，摩顿声称他把「白痴」和「混血人种」排除在计算之外，但这些指称不过强烈凸显出他企图界定的类别是多么难以捉摸。一个人什么时候应该被视为「白痴」到相当程度，必须予以排除，而做这个决定又是依据谁的权威？这种定义是绝对的不科学，而摩顿在这片乱局中勉强做出的决定，却为「种族」这一概念的发展歷史带来灾难，因为任何种族分类法都禁不起稍微细緻的审视。定义「种族」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是民族、地

区、村庄，甚或是信仰体系？坚持这种分类到最后，还是得想办法在某个地方画界线，而这么一画，必定有许多「相似」、「同类」的人出现在界线两边。

事实上，人种的指称在前述测量工作展开以前就已经被创造出来，因此实际上这个工作是在设法查出统计数字是否能呼应手中握有的头骨类别—柏柏尔、努比亚（Nubia）83、爱斯基摩、阿拉伯、印度北部、非洲尼格罗（即非洲黑人）、北美洲印第安、孟加拉等等。文献资料经常非常含糊笼统，特别是有关那些从坟墓中盗取、无意间挖出，或在战场上捡拾的头颅—收集到那些头颅的人通常对当时的重要智识性议题并没有兴趣。摩顿在一八四九年就曾写道，他「有时会收到欧洲人或非洲人的头骨，但它们被误认为是印第安人的头骨；这些头骨偶尔会在同样的墓地中被弄混是不难理解的事，不过透过训练有素的眼光，还是很容易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所以，他将人类分成不同族群的根据，其实是来源不明的头骨。

收藏者收到头骨时，通常顶多只能寄望会有国籍、年龄、性别等少许资讯，而罪犯的头颅经常是颅骨收藏中记录得最详尽的物件。不过，跟颅相学家一样，颅骨学家也耗费非常可观的时间说明那些不符合他们期待的样本。以法国人类学家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为例，他勤奋地测量了十二世纪、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的巴黎居民头骨，希望会发现头骨尺寸逐渐增加，结果他却发现十八世纪的头骨平均值最小，于是他只好设法证明那些头骨是收集自某个埋葬穷人为主的墓园，并表示这个结论可以解释测量结果为什么不符合原先的预期。

面对这么多头骨、这么多变数、这么多测量那些不同变数的方法，当然有可能从中整理出各式各样的论点，据以提出各式各样的种族分类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愈来愈多头骨持续累积，愈来愈多测量结果相继出现，指望透过更大规模的样本组合，获取更具统计学效力的结果。但是，无论他们拿到多少头骨，情况却不曾变得更明朗。头骨这个研究物品虽然吸引人，但愈是研究它，它却变得愈难以捉摸、无法分类。颅骨测量家试图进行野心勃勃的比较工作，却遭受被大量资料淹没的风险。

就巴纳尔．戴维斯而言，他或许稍微有意识到无止尽地追求数字，可能只会导致结果更加模糊。在他思索语言、艺术及统计是否可以在描述人类头骨形状方面带来相对助益的同时，他承认「每一种调查方法和表徵模式多少都可能不够完美、不够充分，无法让人全面认知到原有样本的变化性及特殊性」。尤有甚者，他后来审订自己的文稿时，做了「数以千计的修正」，以至于他不禁怀疑那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错误，使情况更加混沌不明。还有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是正确性。无论市面上出

现多少号称精密的测量工具，量度结果却经常无法吻合。一九一四年，美军医学博物馆典藏员阿雷许．赫德利卡（Aleš Hrdlička）公开指出，该馆出版于一八八○年的既有目录（包含两千份头骨测量资料）「多多少少不太正确」，因此用途不大。于是他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比较精确的新目录。

直到今天，依然有人继续设法取得更精准的测量结果。在摩顿和巴纳尔．戴维斯之后，像他们那样毕生致力挥舞捲尺和测径器的学者大有人在。阿雷许．赫德利卡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颅骨测量家之一，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他为估计高达八千四百个头骨分别进行十到十六种头颅测量。比赫德利卡年纪小四十岁的美国人类学家威廉．豪尔斯（William Howells）则为超过两千五百个头骨分别进行高达八十种不同测量。豪尔斯和他的夫人退休以后，在一九七○及八○年代期间依然继续测量人类头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大多数头骨都已经用一种特殊照相机拍照建档，这种相机可以使扭曲达到最小，然后将影像在一些特定的点上进行数位标示。有了这个方法，研究人员就不再单单比较个别的测量结果，而可以针对头骨上不同点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整体比较。有些头骨获得扫描建档。最具野心的扫描计画称为「开放研究扫描档案库」（Open Research Scan Archive），它的目的是为穆特博物馆、宾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典藏的所有颅骨建立一个高解析度三维电脑断层扫描资料库，其中包括摩顿收藏的一千两百个头骨，以及约瑟夫．西特尔收藏的一百三十九个头骨。这个资料库目前正在持续壮大中，该档案库将可让研究人员比较各个收藏中来自世界各地包罗万象的骨骼，且自始至终不必亲手碰触那些典藏品。现在，数学软体可供计算容积、比对不同头骨的几何特徵，并检测过去所做测量的正确性。

与此同时，颅骨测量学这个研究领域在应用于祖源或人种方面的探求时，依然在其有效性这个议题上不断受到争辩，学者们也陆续发表论文，检测他们自己所做测试的精确度。目前，学者试图估量个别头骨的血统时，最广泛使用的是豪尔斯建立的颅骨测量资料库。这个资料库构成电脑程式「CRANID」的基础，这个程式使用统计学的方法，为任何一个已经根据制式程序做过测量的头骨指定某个可能的地理来源。另一项领导性计画—称为「FORDISC」—也企图以豪尔斯的统计资料为基础，预测任何一个头骨的来源。不过最近有人研究指出，这两项计画的预测正确性都非常低。威廉．豪尔斯或许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自己针对头骨形状所做的研究结果使他相信，人类做为一个物种，具有惊人的均质性。他指出，种群内部的变异性显着高于不同族群间的变异性，而

任何研究如果企图将一个特定的形态学特徵指定为种群归属的明确标记，它的有效性必然值得商榷。

我们很难想到有什么比这个更全面的谴责，尤其是它出自一位毕生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口中。将颅骨测量当做预测工具的做法无疑困难重重。科学家比较的不是头骨本身，而是比较头骨的测量结果；而且，即使我们忽略那么多测量工作中必然出现的错误，从事这个测量工作的不同专家选定的执行方式也因人而异。最近一项针对赫德利卡和豪尔斯的测量结果所做的比较研究显示，只有五项结果可以互相比较，并适用于整个资料库。此外，赫德利卡自己的测量结果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也有所改变。每个人进行测量时都可能导入误差或不一致的因素。然后，如同豪尔斯所言，若想在人类变异性与颅骨形状之间寻找对应关连，会遭遇一些非常真切的问题。

头颅形状的变异性一方面受到气候、健康、食物等因素影响，一方面也与父母、祖父母是谁有关，而后者跟一个人现在生活在哪里几乎毫无关系。全球范围内的颅骨测量变异性大约有九成会出现在特定的在地人口内部，除此之外，「地理区域」这个概念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有某些问题。假如说「种族」是一个不具生物学基础的文化建构，那么「祖源」、「地区性」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也会遭遇相同的问题，因为科学家首先必须定义出他们所研究的地理区域，然后透过测试，断定头骨跟他们定义的区域之间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的吻合。不同文化会用不同方式画分世界地图，因此地理区域跟种族一样，也有它自己的文化歷史。可是，尽管存在着这么多「异常值」，以及这么广泛被接受的理由可供怀疑在头型与血统之间建立关连的做法是否有效，这个事实却依然无法阻止一些人企图透过测量头骨，预测它的来源。

当然，合理的问题会带来合理的答案。如果我们仔细界定标准，并使用不同测试方法互相支持，而且如果我们能设法结合来自头骨测量的资料以及其他资讯—例如骨骼的考古学背景或基因组成等—颅骨测量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此外，头骨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探悉人类处境的重要观点，因为，就像人体内的所有其他骨骼，头骨的形成也牵涉到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的健康、营养、环境、家庭照顾，以及我们受到过的任何身体创伤、损耗和医学介入。但是，比起任何我们现在可能针对一个人的死因或他的主食而提出的特定问题，过去的科学家对头骨产生强烈兴趣的理由却更加深邃。

过去一代代颅骨收藏家们的「祕密成就」不仅只是一种夺取战利品的表现。在他们企图将世界人类进行分类的宏大野心中，他们经常威吓了世人，而现在我们的博物馆中那些规模庞大的人类遗骸收藏，无疑是

以一种令人汗颜的方式，提醒我们正视存在于歷史中的压迫和不平等。

过去三十年来，愈来愈多原住民社群要求让他们死去的祖先回归故土，他们希望为那些祖先举办适当的葬礼，使他们能永远安息。英国及美国已经实施一些新的法律，规制人类遗骸在博物馆中的处理方式，而无论在全国或机构层级，相关指导原则也获得修订，以便促成人体样本典藏机构与死者后代之间的协商。同时，基于尊重死者的考量，有些博物馆已经将许多人体遗骸移出展览厅，并以不同方式为其举行「葬礼」–包装在不含酸的纸和泡棉中，存放在凉爽、黑暗、寂静而肃穆的环境中，远离公众的刺探目光。

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死人头颅、骨骼、身体部位陆续被归还给那些人的后代。在此举出少数几个实例：头骨从伦敦被运回托列斯海峡，从伯明罕送回加州，从爱丁堡回归澳洲。一名迦纳国王在一八三八年遭荷兰殖民者处死，他的头颅长期保存在荷兰莱顿（Leiden）的一座医学博物馆，但已在二○○九年归还给迦纳。二○一一年九月，柏林医学歷史博物馆收藏的二十个头骨被送回纳米比亚。这些头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运到德国时，被完整保存在甲醛中，皮肤、头髮都完好无损，但一九二○年代陆续进行的解剖实验导致最后只剩下头骨部分。史密森学会在二○○○年把伊西的大脑交回给他原属部落的远房后代，让大脑跟骨灰重聚，一起安葬在故乡。那个地区是现在的雷定村（Redding Rancheria）和彼特河部落（Pit River Tribe），居民决定不公开伊西的最后安息地，让它成为永远的祕密。

多年前，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祖先开始被做成「标本」时，他们失去了与活人世界之间的连结。现在，他们的后代子民重新建立起那些连结。数以千计罪犯和济贫院住民的头骨目前大都维持原状，因为没有性质类似的活人社群可以认领它们。不过在义大利的杜林，许多人开始吆吁让隆布罗索博物馆（Lombroso Museum）典藏的罪犯头颅和头骨获得合宜的安葬。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是一位十九世纪义大利医生，在他设法为犯罪行为建立生物学理论的研究生涯中，他一共收集了四百个头骨、大脑及头颅蜡像，其中许多是从监狱太平间取得，而且没有经过死亡罪犯家属同意。隆布罗索博物馆的决定是让这批收藏保持原样，藉以见证它的建立者在科学史方面的贡献，但这项论辩或许象徵着一件事：无论人类遗骸的来源为何，世人对它的态度正在转变。

纽西兰的毛利人已经展开非常大规模的运动，设法让经过防腐保存的祖先头颅回归故土。二○○三年迄今，超过七十个「妥伊摩科」（经过防腐保存的纹面头颅）已经分别从瑞典、瑞士、英国、丹麦、澳洲、苏

格兰、阿根廷、法国、夏威夷、荷兰、爱尔兰、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的展览地点被送回威灵顿的蒂帕帕博物馆（Te Papa Museum）。目前蒂帕帕博物馆已经收藏了一百二十个妥伊摩科，但据估计，还有至少一百个妥伊摩科流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

在奥克兰博物馆和威灵顿蒂帕帕博物馆，毛利人的遗骸不像其他馆藏文物那样获得编号或入藏登录，因为馆方没有将它们视为博物馆文物。它／他们是祖先，做为祖先，他们被存放在博物馆的一个独立区域，安置在受过祝圣的贮藏库—「瓦希塔普」（wahi tapu）中，只有「卡依提亚齐」（kaitiaki）管理员—可以进入那个管制区，而且参拜那些死者时必须遵守适当的仪式。今天，博物馆典藏人员会按照原住民社群的希望，在这些故人的安放区域中谨守礼仪，例如要跟死者说话，穿合宜服装，只在特定时间拜访，或请附近办公室的同僚保持安静等。随着世人开始获得礼敬故人的空间，博物馆的定义本身也开始产生变化。

72　译註：奥菲斯是由阿波罗与掌管史诗的缪思女神卡利俄珀（Calliope）所生，音乐天资超凡入化。小女仙欧莉蒂丝倾醉于七弦琴音，投入少年怀抱。婚宴中，女仙被毒蛇噬足而亡。痴情的奥菲斯冲入地狱，用琴声打动冥王哈得斯，欧莉蒂丝再获生机。冥王告诫少年，出地狱前不可回首张望，但奥菲斯忍不住转身确认爱妻是否跟随在后，结果欧莉蒂丝堕回冥界。奥菲斯死后，七弦琴化成苍穹中的天琴座。

73　译註：梅雷斯河流经小亚细亚古城斯密纳（Smyrna，即现在的伊兹密尔［Izmir］），因与古希腊吟游诗人荷马的生平及创作紧密相关而闻名。

74　编註：英国基督教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着作，是一首寓言诗，曾被翻译为两百多种文字。

75　译註：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一八五○至一八九四年），苏格兰小说家、诗人与旅行作家，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举世闻名的着作包括《金银岛》（Treasure Island）、《骑驴旅行赛凡山》（Travels with a Donkey in the Cévennes）等。

76　译註：史蒂芬．杰伊．戈尔德（一九四一至二○○二年），美国古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及重要科普作家。

77　译註：各各地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也称Calvary，意译为「髑髅地」。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在那里被钉上十字架。

78　译註：济贫院也称劳动救济院，是英国于十七到十九世纪期间用来救济穷人的设施，穷人在那里从事低粗的工作，换取免费食宿。

79　译註：亚得里亚海岸着名港都，位于今天的克罗埃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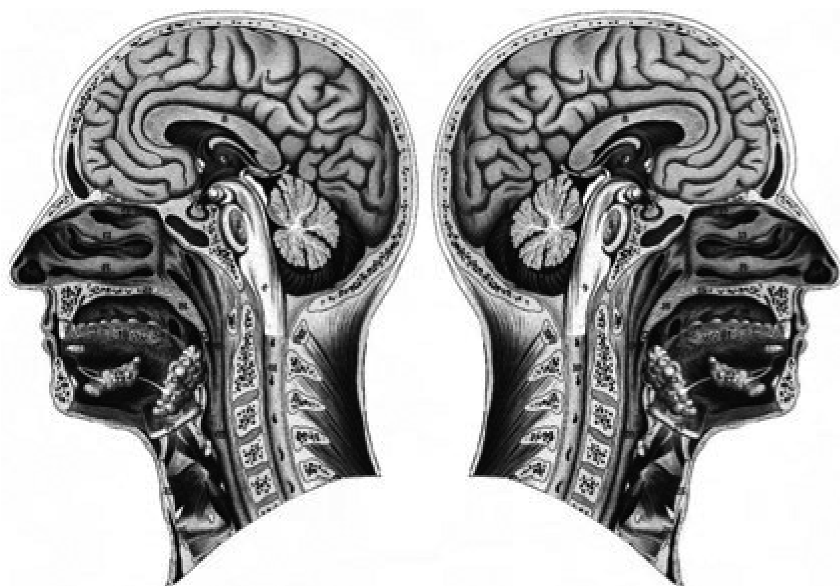
80　译註：一九八○年建国的太平洋西南部群岛国家。

81　译註：雅西族是雅纳（Yana）族的四个分支之一，「雅」（Ya）在其语言中意为「人」。雅纳族原居地是加州北部内华达山脉中段地区，雅西族位于最南部，与白人接触得最早。加州淘金热导致殖民者侵略他们的土地，使他们失去传统食物来源，并在暴力侵略过程中人口锐减，从初期估计的四百人，到一八六○年代伊西出生时，只剩一百人左右，随后继续在外来者攻击压迫下凋零。

82　译註：兴地人即前述的印度北部高加索种民族。

83　译註：努比亚是一个歷史上的区域，相当于现在埃及南部及衣索匹亚北部的尼罗河谷地。

第七章
解剖头颅
DISSECTED HEADS



比尔．海斯（Bill Hayes）在为一本书做研究期间，曾经参加一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解剖课。某个时候，一位授课老师从一个溼答答的特百惠（Tupperware）容器中取出一个「半头」。海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达娜把带了手套的手伸进去，拿出一个我只能用『恐怖』来形容的东西：一颗被切断然后在中间剖成两半的头颅，一个内侧外露的人头侧影。」达娜取出那个半头，清澈的防腐液沿着那死去男性外露的大脑、喉咙及切断的颈项往下滴流，这时两名学生把头转开。达娜把头摆在桌面的一条毛巾上，脸部朝下。

那堂课上的是人类如何吞嚥食物。海斯听着学生们讨论舌头、吞嚥机制、作呕反射（gag reflex）等人体复杂精细的结构特性，开始觉得那颗半头阴森恐怖的程度逐渐降低，最后他甚至发现它有某种属于它的美感。「比起我们在腹腔部分经歷的冒险，半头显得干净俐落，几乎没有油脂，看起来彷佛经过仔细的包装处理。每个部分都有专属自己的小空间。很难想像那里面怎么还容纳得下头痛这种东西。」

课堂结束时，海斯甚至自愿把半头放回保鲜盒。他边放边用片刻时间凝视那人的脸，思索着他的长相，以及他可能拥有过什么样的人生。那人有着浅色的浓密眉毛，看起来应该是八十多岁。「或许他曾经是个罪犯，也可能是个医生的。」海斯发现他在探索那个死人的头颅结构时，可以不必否定尸体的人性成分。他不需要把那头颅完全「客体化」，一样可以把它当成物品（「客体」）来处理，将它包在纱布中，摆回它专属的保鲜盒内。「我忍不住产生一股敬畏之情，心想：『这曾经是一个人呢！一个会思考、会做梦的人。』」

解剖人的头颅是相当费劲的工作，必须非常细腻且精准。我们得用锯子把脖子锯断，把皮肤从脸部翻开，在双眼之间把头剖成两半，在头盖骨四周凿挖，然后把它锯开，取出大脑。这个过程又臭又脏又复杂，而且很难辨识脸部和颈部的所有微小结构，更不用说还得应付以这种方式处理人体所带来的情感考验。有些学生觉得噁心、惊恐，彷佛经歷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有人很生气自己必须做这件事。尽管如此，许多学生却体验到一种极其强烈的惊奇感，即使面对如此残酷的屠宰景象，依然不禁赞嘆人体之美。

人体解剖课教学生透过触觉感受大体的肉体性。学生学习人体造形的质感、形状、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连。他们学习骨骼、筋腱、肌肉、神经的机械作用。他们探索特定条件如何影响身体的不同部位—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啕吸系统、免疫系统……等等。这些都是人体解剖课的教学目标，但这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功课。学生也要学习如何不带情绪地执行情绪性的任务。他们会说，要设法「对看到的东西耸耸

肩」表示不在乎，要「去除敏感度」，要跟手中的工作「保持距离」。他们必须学习如何管理尸体（或说病人）的双重性质—既是人也是物体。一名学生这样说明：「把一个尸体的头颅切成两半时，你不能去想他曾经是一个人的事实，他曾经活过、爱过，曾经有性行为、跟别人亲吻、他的舌头曾经吻过某人等等，你必须把自己隔绝在这种想法之外。」

人体的某些部位使人很难不去想到自己正在对尸体做的事。头部、手部、生殖器经常被认为是特别具挑战性的解剖部位，而研究也显示，学生上这些课时，感受到的压力倾向会增加，因为这些是人体中最具人性、最个人、最私密的部位。它们更容易提醒学生，他们在做的事具有破坏性，而且他们眼前的大体在解剖实验室以外的世界中具有其他的意义。在这些时刻，尸体重新变成了一个人。头部、手部和生殖器几乎是在邀约学生透过一具死尸的物质形态，看见自己的敏感，看见自己的脆弱人性。面对死去捐赠者的个人特性，他们发现自己的人格被投射回自身，于是他们明白自己也「只不过是个人」而已。

人体看起来不像人体时，情况就比较简单。通常大体会被包裹在保护性的纱布和寿衣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供人操刀，因此学生一次只需要处理一个已经「去身体化」的部分。切穿腹部或手臂的皮肤时，「它看起来就开始像解剖课本，不再像人」，这种感觉可以带来心理上的舒缓。解剖这类地方比较直截了当，也因此，大部分医学院都会把「头颈部」的课留到整个课程最后才上。

心理医师克莉丝汀．蒙特罗斯（Christine Montross）写到她在解剖室的经验时指出：「解剖时最令人心情拉警报的不是那些怪异、未知的东西，而是熟悉的东西。」而最让人感到熟悉的莫过于一个人的脸部。许多人会说他们觉得头部「太真实」或「太像人」，很难轻易解剖。一名必须在解剖课堂上把人头剖成两半的学生写道：

今天，当我看着同学们从电锯换成真正用手拿的锯子，勐力设法锯穿剩下的头骨和脸部骨骼，我唯一想到的是，这件事太可怕了……这是哪门子的入门程序？我知道我是在医学院，没有人说这会是简单的事，可是老天啊，我真希望头部和颈部能採用示教解剖（prosection）的方式［按：即预先由专人解剖好标本，以供演示说明］。这些部分太私人了。头部、脸部、颈部太有人性了。当我必须朝一个女人的头砍嚇下去，我无法把这两件事完全分开。

这也罢，但头部却又是人体结构中最难解剖的部分，因为它最精细，在技术上最具挑战性。操刀解剖的人同时必须残暴而温柔，他得锯

穿头盖骨，把它切削下来，可是又得小心翼翼，不要损坏底下的任何柔软组织。头骨内侧的薄膜紧紧黏在骨头表面，必须用力扒下来。取出大脑时，解剖者必须把手伸进拥挤黑暗的颅腔中，把它稳稳握住，然后切断下方的嵴柱。这还不打紧，接下来必须用事先无法预期的力量，在一阵组织撕裂的声音中把它拉出来。解剖师探索头部时，忙着挥舞电锯、铁鎚、凿刀等工具，但头部也含有一些特别精细的组成部分，例如眼睛和耳朵，它们非常细微而挑剔，需要用很小的解剖刀和镊子处理，而且手指必须非常稳固。解剖头部无论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都非常累人。

学生们发现用锯子锯一名死者的头部是很困难的事。他们说做这件事感觉很「残暴」，彷彿他们是在「攻击它」。他们把锯穿头部描述为「恐怖」、「令人极为不安」、「带来心理创伤」，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违反正常规则」，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这时他们距离死者脸部很近，他们更明显像是在切割一个人。另一方面，就像研究「半头」的比尔．海斯，心理创伤会跟惊奇、不可思议的感觉交织在一起。一名学生用锯子从大体上砍下一颗头颅，然后挖出大脑，捧在手上。他这样描述那个经验：

……刚做完你所做的事以后，你会发现言语无法形容那种奇异而感动的经验，你握着那个东西，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产生如此亲密的连结，他的身体彷彿是个礼物，而他让你成为受赠者。时间停止了，你会进入你自己内心的歷史，以及还等着你自己谱写的未来。你有办法这么无私吗？有办法像他一样成为大体老师吗？当我们这部身体机器停止运转时，我们会去哪里呢？转瞬间，你又回到现在，你转身面向一个满脸写着惊愕和敬畏的同学，然后温柔地、小心翼翼地把大脑放进他手中。

无论如何，大部分来到「头颈部」课堂的学生都已经算是解剖老手。他们设法学习将他们的情绪反应区隔化。海斯这样描述他努力解剖大体颈背的情形：「早晨的咖啡才喝完一小时，我却已经在参与一个很像砍头的行动，像得简直吓人。」头部终究不过是解剖课上必须学习的人体一部分。

「去人性化」和「再人性化」的活动在解剖室中奇异地融混在一起。去人性化效应大抵都是其他必要程序—例如维持安全无毒的环境—的副产品。穿工作袍、戴口罩，彻底洗涤，在一排排不锈钢桌上处理仔细包装好的大体，四周是成排工具和贴有标籤的箱盒，房门紧紧上锁，随处可见警告标示。这些东西都让你眼前的人体看起来彷彿失去了一些人性，更不用说这些大体本身早已在防腐过程中有所变异。这些人看起来不像活人。他们的皮肤灰藁、坚硬，彷彿动物皮革；他们的鼻子、脸颊

和胸部经常已经被压扁；他们的头髮已经剃除。如果不露出生殖器官，大体的性别很难分辨。学生从来不会知道解剖对象的名字，他们只知道它的辨识号码。

解剖人员很快学会用更暴力的方式对待大体，而且在某个程度上，是他们的老师鼓励他们这么做。他们面对大体时一开始可能显得畏缩，但有人会告诉他们要切下去、撕下去、扯下去，必要时还得把肌肉和脏器推过来、拉过去。随着日子过去，学生变得比较大胆，态度也变得比较轻松，同时，大体的寂静却传递出一个强烈讯息。如同一名学生所言：「大体老师从来不会抱怨哪里痛。」在已经死亡的「病患」帮忙下，学生们逐渐学会以坚定而具社会特权性质的方式处理人类的尸体。

尽管有这些做法，或说一部分因为这些做法，现在的医学院会把学生和大体之间的接触界定为人与人的关系。把大体视为学生的「第一个病人」，这个概念愈来愈受欢迎，而且有些老师会把大体捐赠者的完整病歷发给学生看，让他们可以开始探讨解剖对象的死亡因素、生活方式、习惯等。欧美地区的医学院学生经常被鼓励要向他们的捐赠者写证言，或透过诗文、艺术等创意方式，表达他们对人体解剖的感受。学校每年会举办一次纪念仪式，邀请学生和捐赠者家属参加。同时，学生会发现自己以令他们惊奇的个人方式，跟大体之间产生了关连。虽然他们学习跟自己的情绪反应做切割，以便能够冷静执行「砍头」或把头剖成两半的惊人动作，但他们经常会自己给大体安上名字，并与它发展出强烈的互动关系。

克莉丝汀．蒙特罗斯在美国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医学院上课时，把她处理的大体唤作「夏娃」。虽然大体的头部通常会被盖上，但克莉丝汀和她的同学第一天到实验室时，就决定要看看夏娃的脸，因为「如果不事先知道她长什么样子，要切割她的身体感觉实在不好，」她解释道。后来他们在解剖桌上把她的身体翻面时，设法保护她的脸部。「把大体的下巴握住对于保护整个身体形状而言，似乎没有太大的帮助，但随着我们的行动使她愈来愈不完整，尽一点心力稍微为她保存身体形状似乎有某种重要意义。」

与直觉相反的是，切割死人身体的动作可能引发对大体人性的强烈敬意，甚至是关切。身体上的暴力与一些温柔的片刻交织在一起。学生会用心把大体盖住，请求他们允许，把他们当做活人那样握持、移动他们。解剖室中有很多漫长而安静的时刻，让人省思刀下那具身体曾经鲜活的生命。

我们很容易假设医生需要把一个人的人性面搁在一边，这样才能执

行一些比较侵入性的任务，但情况不尽然如此。相反地，当外科医师向帕金森氏症患者进行深层脑部刺激手术时，事实上他们一边切进病人脑部，一边也会与他们互动。大脑中没有疼痛感受器，医生只要在头皮部分进行局部麻醉，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就不会有不适感。为了在病人头顶钻出一个直径一．五公分的小洞，医生必须为他们做全身麻醉，但他们醒过来以后，在接下来两小时中，手术团队会跟他们说话，请他们帮些小忙，协助找出电极的正确放置方式，减缓他们的症状。然后他们让病人重新进入麻醉状态，将电极锚定在头骨上，接着就可以重新缝合头顶的切口。清醒脑部手术也用于治疗肿瘤及癫痫，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外科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不会损伤大脑中控制视力、语言或运动的其他部位。

解剖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也是可能出现的情况。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伦理讲师丝凯．葛罗斯（Sky Gross）写过文章，描述她目睹朋友接受脑部手术的经验。她在做研究期间结交了一位朋友，名叫欧梅尔。欧梅尔罹患脑癌，必须动手术。葛罗斯陪他进手术室，看到医生把他头上的皮肤切开，拉到两侧固定，在这个伤口中间开出拳头宽的洞穴。她写道：「我站在那个洞口上方，很惊讶自己没有太多惊愕或噁心的感觉，反倒似乎有一股强烈的好奇感紧紧攫住了我。」医生将颅骨一块块移开时，欧梅尔同时是注意力的焦点，却又完全不在场。葛罗斯在手术室中发现，虽然她不像身边那些医生那样受过临床情感分离（detachment）的训练，但她居然可以跟欧梅尔的大脑单独建立起某种关系，彷佛欧梅尔的大脑跟他这个人是两个分开的个体。

我知道大脑长什么样子，但心里还是把欧梅尔的大脑想像成会是欧梅尔的样子。毕竟那并不是解剖课堂上看到那种无名人士的脑－我跟这个脑之间有你－我关系存在，有互为主体的交流。那应该是一个会哭、会笑、会说故事的大脑。可是做为一个没有人可以为它赋与人性的脑，它就只是一块肉，一块令人作呕的肉。我深深感到幻灭。

葛罗斯原本以为她会有不同的感觉，因为欧梅尔是她的朋友，但手术室的特殊仪式－彻底洗涤、穿戴消毒手套及手术袍等复杂的例行公事；欧梅尔受到全身麻醉，一动也不动，而且身体大部分地方都覆盖在手术铺单底下；灯光、仪器、工具；手术室中严谨的阶层分工和动作安排－这一切都把欧梅尔从一个人转化成一个「可开刀体」。被麻醉的人体跟尸体一样，行为方式都不像正常的人，因此要把它当成物体看待并不是太难。

当然，旁观朋友接受脑部手术跟在自己亲爱的人身上做身后解剖非常不同，特别是在身后解剖包含截断或解剖头部的程序时。不过，这种

情形虽然令人无法想像，但听到实际发生的故事以后，我们却会觉得它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如同蒙特罗斯所言，所有死人的尸体都会跟人还在世时的样子愈来愈不一样，我们所爱的人也不例外。在一些罕见的例子中，医生会解剖他们自己的家人。苏格兰颅相学家乔治．康布解剖过他弟弟84的脑部，十七世纪解剖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则解剖了他父亲和姐姐的大体。二○一○年，印度南部卡纳塔卡（Karnataka）的一名医生遵照他父亲的遗嘱，在一群学生面前解剖父亲的大体。他说：「无论我有什么情绪，我都把它控制住。」其他家人不但完全支持他做的事，甚至因为他们意识到印度缺乏大体捐赠者，他们全家人都打算把身体捐给医学研究使用。

刚开始上解剖课的学生之间会流传一个经典的「大体故事」，内容是说一位解剖菜鸟在大体头部的纱布被拉开以后，发现他刚「让自己的母亲碎尸万段」。这个骇人的笑话是在玩弄学生在情感上的脆弱性，并考验他们是否有能力在自己跟他们的「第一位病人」的人性之间拉开距离（另外，这个笑话也再次凸显我们习惯认为一个人的头在某方面就等于他们的身分，而他的身体却不是）。医学院学生实际上并不是怕自己必须解剖某位亲人，他们害怕的是他们解剖的大体会使他们想到某个人—如果不是他们认识的人，那么就是「人类形体」这个笼统的人。

学生对解剖感到的各种焦虑，主要源自于他们恐惧自己在看到或切割死人尸体时会出现的反应。解剖新手害怕自己会昏倒、呕吐、哭泣，而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反应可能导致同侪对他们当医生的能力产生怀疑。对大多数新生而言，实际的经验并没有他们想像中的那么令人却步，而且经过第一堂解剖课以后，所有学生的焦虑感都会显着降低。巴黎某大学有一群学生第一堂课就解剖了头部和颈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他们难以忘记的却不是大体脸孔的样子，而是那股味道。此外，几乎半数学生不是觉得没有被这个经验惊吓到，就是认为受到的惊吓低于他们的预期。

绝大多数学生觉得解剖算是个相当享受的经验，并且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训练。许多学生选择到某个特定的医学院求学甚至就是因为那里有开设解剖课程。解剖可能造成心理创伤，但一般年轻人还是有办法熬过这个考验，而且觉得这种工作引人入胜。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其实倒也可能是恐怖感的来源之一。

令医学院学生感到困扰不安的，除了必须切下死人头颅这个可怕前景以外，还有他们「居然做得出这件事」这个事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珍妮佛．卡斯登（Jennifer Kasten）记得她接受医学训练时的情景：「我们担心自己身上可能有某种缺失，导致我们居然能够那么轻

易就用有条不紊的方式，不带感情地把一个人切成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跟所有其他医学院学生一样，卡斯登知道「我们这种新的正常其实非常不正常」。某些外科程序—例如在手术台上把人的身体剖开或取出他们的肠子—也可说是同样的情况，外科医师不但早就对这种事司空见惯，甚至会觉得无聊。社会学家哈利．柯林斯（Harry Collins）指出：「可怕的是，有些东西看在局外人眼中是例行性的残酷，但对圈内人而言却只是例行公事。」这又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下，人可以执行一些残暴的程序，就像他们可以观看血腥的处决，或将人头煮熟以清除皮肉。令人惊骇的不只是医生必须在人的身体上做些什么，还有做这些事变得稀松平常这个冷酷的事实。

蒙特罗斯上的解剖课程结束时，她必须解剖夏娃的头。在「头颈部」的课堂上，一位同学因为过度惊恐而离开解剖室，原因不是他害怕他所做的事，而是因为眼前景象的穷凶恶极使他无力招架：

[他]产生恐惧感是因为他所处的房间里充满平常算是相对正常的人—不是朋友就是同侪—而所有人都忙着除去死人的脸孔。有人用手术刀切掉嘴唇。有人把面具般的皮肤拉掉，于是手里拿着一块椭圆形物体，上面明显可以看到鼻孔、留有鬍鬚的脸颊、眉毛……。

恐怖感来自于看到平常人可以那么轻松地做这种事，可以在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并尊敬的大体老师身上动刀，透过砍、切、挖空等动作，把他们变得无法辨识。脸部比任何其他部位更能代表一个人的身分，但就连这个部分也可以被解剖掉。

上最后一堂实验课时，蒙特罗斯和她的同学们必须绕着夏娃的头部画线一圈，然后用骨锯锯开她的头骨。他们用铁鎚和凿刀打开头骨冠顶。然后他们得休息片刻，因为他们不但累，而且神经紧绷。接着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先前切出的裂缝中扭动凿刀，慢慢撬开头颅顶部，骨头则发出呻吟声来回应。骨头移除以后，老师把他们唤进另一个房间，但他们没有机会喘气，因为他们马上就得面对一个示教解剖标本—已经由专家解剖好并保存起来的样本：那是一名男子的头颅，其中的两个大脑半球都已经被移除。老师把男子头顶上硕果仅存的长条头骨当成握柄，用它举起头颅，然后向学生指出各个不同结构。接着他们又回到原先的大体那里，把夏娃的脑部移除。虽然所有动脉和神经都已经被切松，他们还是得用力拉扯脑部，才终于把它取出来。蒙特罗斯用「超现实」一词来形容那个经验。后来她还得把夏娃的头部切下，纵向将它锯成两半，创造出海斯在他上的解剖课中看过的那种「半头」。

移除夏娃的脑部以后，蒙特罗斯回家用滚烫的热水冲澡，设法洗掉

骨锯的味道。她觉得羞耻。但她羞耻的不是她做的事本身，而是她在做那件事时感受到的嫌恶。「我觉得很羞耻，因为我明明知道我获得难以想像的礼物，它值得我好好珍惜和尊敬。但我却感觉嫌恶，我为此感到羞耻，真的羞耻。」

丝凯．葛罗斯很失望她朋友欧梅尔的大脑在手术室里变成不过是一团「噁心的肉」，克莉丝汀．蒙特罗斯则羞愧于她在解剖夏娃的头部时情绪不稳。有人希望自己更悲悯，有人则宁可自己少几分同情。无论我们处在人类／物体这个分野的哪一边，要想在医学专业的情感地图上顺利航行是极为艰鉅的任务。在解剖室中，大体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物体。学生学习把它当成物体来研究、搬弄，但它也驻居在其他不同的世界中。「客体化」是一个不断进行的程序，不是一个固定状态，而学生必须努力设法让自己能把大体当做无生命的客体来处理。所幸这是一个特定的环境，平常的暴力活动在这里被规范得像是合理的例行公事，但总有一些时候，学生们的努力会失灵，造成他们难以持续用不带情感的目光注视刀下的大体。

解剖一个人的头颅在体力及情绪上造成的负荷超过任何其他人体部位，因此自然会带来更大的挣扎，不过它也能提供某些乐趣。或许痛苦的挣扎是获得这些乐趣的必要条件，因为切穿一个人的头颅之所以感觉像是无以復加的人身亵渎行为，而探看头颅内部却引人入胜，这两件事的起因其实是一样的。人类的头部塞满为数众多、种类繁多的细緻特徵，有眼睛、耳朵、舌头、神经、血管、腺体、肌肉、骨头、牙齿，而这些都还只是脑部以外的部分。种种元素紧密并存、高度整合。一名学生表示：「光是眼睛四周那些让我们能眨眼或瞇眼的机制，就已经令人嘆为观止。」

今天的人体解剖跟一百年前的人体解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关于解剖桌上的尸体身分。二次大战以前，在英国被解剖的人体几乎都是穷人的遗体，这些遗体是从精神病院或依据穷人法设置的医疗院徵收而来。不过二十世纪期间，遗赠大体的数目稳定增加，一九六一年英国通过的人体组织法（Human Tissue Act）更裁定，所有供医学研究使用的人体部位都必须按照同意程序加以管制。被解剖的人体是来自一个自主决定把自己的身体捐给科学界使用的人，还是来自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人，这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

今天的医学院学生深深感激大体捐赠者，他们也有义务以尊敬和钦佩的态度对待这些「大体老师」；但在过去，情况并不见得如此。早期解剖台上的人体除了它的身体特性以外，对医生而言没有什么其他意义，因此经常受到毫无敬意的对待。

歷史学家露丝．理查森（Ruth Richardson）指出，关于维多利亚时期解剖室中的作业情形，医学文献中几乎没有资料记载。就连那些给即将在解剖台前初试啼声的学生阅读的解剖教科书，也没有提到解剖这个活动的性质及它在道德上所牵涉的议题。可是当年的医生承认那是个「骯脏污秽的知识来源」，而且许多医生不特别喜欢做这件事。工作空间经常拥挤而充满恶臭；「大量废弃物，以及它所散发的腐臭气体」导致鼠辈肆虐；标本保存所用的化学物质充满危险性。穷人的遗体经常受到恶劣的对待，有时医学作业方式会遭受媒体抨击，但医学界本身在这个议题上几乎完全保持缄默。就像弗兰肯斯坦那可怕至极、受人憎恶但却又引人入胜的「污秽创造工坊」，解剖人员的世界基本上都掩藏在世人的耳目之外。

由于早年解剖室的作业环境污秽不堪，里面进行的活动难以入目，因此当时的医生无不尽最大可能确保自己死后的大体不会遭到解剖，这点绝非偶然。民众厌恶解剖，他们将它视为一种残忍、缺乏尊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极不公平的处罚。死者的身体及灵魂遭受全面破坏，无异于「比死亡更糟的命运」。解剖人员经常被描绘成粗鄙、无情、骯脏，而且满口污言秽语。一名医师在一八四○年提到：「喝酒、抽菸、打架在解剖室中非常合理［按：这是他自己强调的］的活动。」这句话意味着一件事：纵使那些「令人反感的研究对象」基本上只是被当做科学标本看待，那种工作却可能惹人非议。

医学标本经过洗刷擦亮、装瓶保存后，从这种脏兮兮的工作场所脱身，在博物馆展示架上展开新生命。收藏家为腐尸到晶亮骨骼之间的转化过程赋与了某种价值。颅骨学家经常以华丽词藻描述他们的收藏：「绝美」、「精緻」、「无与伦比」。在约瑟夫．西特尔眼中，他的骷颅头收藏是充满美感的事物：「完美无瑕的雪白色，完整无缺的牙齿，具有弹性操纵绳线、可以移动的下颔骨。未来再也不可能建立这么一个收藏。」从剖开去脏的尸体到装瓶保管、精心典藏的文物，这种转化工作所需的技术获得可观的评论报导。最精美的骷颅头呈乳白色，但不会碎裂；坊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方法，供人以最佳方式清理人类头颅。

十六世纪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流斯（Andreas Vesalius）建议用石灰及滚水去除人类骨骼上的肉，这样不会损及骨骼本身。不过也有一些其他做法。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尸体封存在水中数星期，并定期换水，但这个方法经常使骨头变得油腻、失去颜色，因此收藏家会用明矾水或珍珠灰达到所需的「细緻、洁白、象牙般的容貌」。也有收藏家只是把尸体掩埋起来，等它自然腐化，甚至利用昆虫清洁骨骼。教导过乔治．摩顿的美国费城解剖学家理查．哈尔兰（Richard Harlan）宣称，

蝌蚪透过细緻「吸嘴」的运作，可以造就出美丽的骨骼。他也建议把尸体放在蚂蚁窝附近，因为「这些勤劳的工作者会迅速将肉质部分从骨骼上移除」。法国自然学家乔治．库维耶（George Cuvier）在十八世纪末期的撰述中建议旅行家把人头放在苏打水或苛性钾中，以清洁骨骼；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使用腐蚀性昇华物溶液保存肉质部分。他还补充强调，万一「在这种以促进科学进步为宗旨的远征探险」中，有船员反对「这种看在他们眼中显得野蛮的作业方式……上司有责任让自己以理性为唯一依归，并激励全体船员发挥理性精神」。

约瑟夫．巴纳尔．戴维斯在一本名为《热带气候区颅骨制备註解，主要适用于印度》（Notes on the preparation of Crania in hot climates, and chiefly applicable to India）的练习书中写下他对这个议题的想法。收藏人员应该「在头颅还新鲜时」移除「柔软部分」，然后把这些部分腌在大量冷水中，水则最好装在有排水口的啤酒桶中。脑部应该事先打破并透过枕骨大孔予以移除，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难以忍受的臭气」，另一方面可以增进「制备品的美感与白皙」。法国人类学家保罗．布洛卡在一八六五年所做的说明显得更若无其事：「［解剖人员要］刮骨头，把它放进去泡，然后取出暴露于新鲜空气中，不久之后，它就会变得美观大方而且毫无臭味」—彷佛这种转化过程类似于变魔术。

相反地，根据巴纳尔．戴维斯的说明，将骨头从人类头颅中移除似乎鲜少有乐趣可言。收藏家抱怨人体在热水中煮时会散发「最令人不快的恶臭」。切除头部所需的体力付出也相当可观，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一名患有结核的苏格兰医生为英属哥伦比亚哈德逊湾公司工作，他想在科学界留名，于是他挖开一名当地酋长的坟墓，但切除尸体头部的工作令他难以招架，导致出血。鲜血溅在地面上，当然那不是出自已经死去三年的酋长的尸体，而是从医生的肺部呕出。但他不顾一切奋力不懈，终于把战利品带回去，并迅速装箱运给一名在英国的同僚。

在维也纳偷了海顿头颅的那位颅相学家约瑟夫．罗森鲍姆从个人经验知道，清洁头骨是非常不舒服的事。一八○八年十月，他将他的解剖功力发挥在一名死于难产的年轻维也纳女演员伊莉莎白．罗瑟（Elizabeth Roose）身上。罗森鲍姆很可能认识罗瑟，至少他对她的表演天赋赞誉有加，但这并没有软化他要解剖罗瑟的决心。甚至可说他因此更坚定地做这件事：优秀人才的头颅是唯一值得冒这种险的理由。于是，在罗瑟去世后十天，晚间八点钟，罗森鲍姆、他的朋友约翰．彼得（Johann Peter）及当地的掘墓人在墓园碰头，把罗瑟的遗体挖出来。掘墓人花了两个小时才挖出棺木，把它撬开，并取下死者头颅。「那股

臭味真的是笔墨无法形容，」罗森鲍姆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其实非常关切掘墓人的安全。她的尸体已经腐败得好严重。」

隔天，罗森鲍姆把罗瑟的腐臭头颅藏在大衣底下，拿到彼得的家，放进一缸水中，设法消除臭味。罗瑟的肉已经肿胀，变成绿黑色及黄色，浮肿的嘴巴张开下垂，露出牙齿。彼得花钱请一名医生把罗瑟的肉和大脑切除，然后丢进桶子里，埋进花园；两个朋友则疯狂地烧薰香，设法掩饰那可怕的恶臭。然后他们把她的头骨和下颚放进石灰水，置于花园中四个月。四个月之后，它已经「长出斑点，略呈绿色，模样粗野」，而且还长出水藻。他们犯了一个错，骨头浸泡得太久，结果变得又干又容易碎。后来他们处理海顿的头颅时，因为事关重大，他们决定每一道程序都请专业人士来进行。

专业人士或许能够提供比较优质的产品，但他们的处理方式一样令人悲嘆。多数头骨收集者，甚至包括从医院太平间徵集死尸的医生，他们都习惯在背地里工作，以非法方式偷盗、走私人体。这个现象对他们的技术也带来了影响。本身是执业医师的约瑟夫．巴纳尔．戴维斯发展出一种取下头颅的方法，他能在不损坏尸首外观的情况下，顺利把头骨取出，这样就不会被人看出来。他的建议是：在耳朵背后沿着头颅侧面切开，把脸部皮肤拉开来，然后颅骨可以透过这个开口取出，再植入一个假的头骨，掩饰「真品」被偷的事实。最后把脸部皮肤小心翼翼地摆回定位，伤口仔细缝合，让一般人完全看不出破绽。巴纳尔．戴维斯有一次在澳洲塔斯马尼亚向一位熟人描述了这个程序。他夸言道：「假如我住在殖民地这里，从死尸身上取出头骨对我来说是毫无难度的事，而且完全不会破坏原有的面容。任何医学界人士我都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后来他又强调：「途中一定会出现困难，但困难一定可以克服。」

这些「困难」无疑与一件事有关：这种勾当并不合法，都是在未经死者近亲同意下进行，万一被发现，几乎一定会成为公众丑闻。至少有一名医生在十三年后按照巴纳尔．戴维斯的指导办事，结果遭致灾难性的下场。那人名叫威廉．克罗瑟（William Crowther），在塔斯马尼亚当外科医生。一八六九年三月五日星期五晚上，他进入霍巴特总医院（Hobart General Hospital）。克罗瑟是该院的荣誉医务主任，那晚陪在他身边的正是在当他学徒的儿子宾汉．克罗瑟（Bingham Crowther）。两个人走进医院解剖室，那里有一个被检验过的老人尸体还留在解剖台上。他们在烛光下安静作业，克罗瑟拿出一把刀，把头颅从大体上切下来，拿到医院的停尸间。另一个人的遗体在那里等着他们，而这才是他们此次夜袭的真正目标：一名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威

廉．蓝尼（William　Lanney）的遗体在葬礼举行以前被安放在那里。克罗瑟立刻开始在蓝尼的尸体上展开行动。

就像巴纳尔．戴维斯所描述，克罗瑟在右耳后边沿着脸部侧面切割，然后把皮肤翻起，拉出蓝尼的头骨。他把先前在解剖室偷的白种男性老人颅骨放进去，然后把蓝尼的脸部拉回原位。接着克罗瑟缝合切口，带着塔斯马尼亚人的头骨消失在暗夜中。

巴纳尔．戴维斯或许有理由批评克罗瑟的技术，因为他的行径很快就曝光，但这也导致威廉．蓝尼的遗体遭到进一步亵渎。院方决心阻止小偷回去偷其他身体部位，于是命令驻院外科医师切除蓝尼的手脚。第二天，蓝尼的葬礼公开举行，但那大约只能算是做做样子，因为天黑以后，蓝尼的坟墓就被人掘开，他的残坏尸体又被带回医院。隔天，驻院外科医师在一间隐蔽的房间里解剖蓝尼的遗体，移除剩下的骨骼，并加以清洗。

然而，盗墓者做事非常不小心。他们让蓝尼的空棺材露出地面，周边的泥土上留下血迹，白人的头骨则被弃置在附近。不多时，当地报纸就爆出关于医院可怕作业方式的种种指控，质疑科学活动的道德性。在塔斯马尼亚这个遥远的罪犯流放地，殖民定居者是否已经沦入野蛮，成为「杀人犯，甚至更糟」？

蓝尼的骨骼之所以那么有价值，首先就是因为他是所谓的「野蛮人」。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名「血统纯正」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但他的实际生活跟别人认为他应该体现的野蛮本能没有什么关系。他成长在一家孤儿院，住过政府经营的原住民营区，在捕鲸船上讨生活。尽管如此，相较于科学界及多数大众媒体一厢情愿加诸于他的身分，蓝尼的生活实况变得无足轻重。正如伊西及其他无数人，他无法摆脱被归类为「原始人」的命运。塔斯马尼亚人很不幸地享有一个头衔—全世界既存种族中最古老的一支。所有塔斯马尼亚人的骨骼都很有价值，但是，做为他所属种族的最后一名成员，蓝尼的死使他的骨骼变成倍受珍视的科学标本，而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他的头骨。

蓝尼的颅骨在学界勐力追求种族理论的过程中成了俘虏。克罗瑟本来答应把它提供给伦敦的皇家外科医学院，但霍巴特医院当局却要把它送给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殖民书记下令调查医院里发生的事以后，克罗瑟对充满敌意的舆论感到错愕，反而决定私下保存蓝尼的头骨。今天，蓝尼大多数的骨头已经去向不明。克罗瑟的一名同僚拿他一部分的皮肤做成菸草袋，他的耳朵、鼻子及一部分手臂则成为科学界的收藏品。后来他的手和脚在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被人发现。

蓝尼从一个「人」被转化成一系列「伪科学产品」（要说菸草袋具有科学价值实在很困难），而公众对此一事件的回应足以说明科学研究事业中固有的紧张矛盾。在一方面，医学界专业人士对一名无辜死者的遗体进行非法亵渎，导致社会各界一片譁然，而这无疑构成国家性格上的一个污点。在另一方面，这起事件也让人质疑为何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原先未能採取「相关步骤……以满足科学界利益」，确保当地博物馆能「获得完美无瑕的塔斯马尼亚男性原住民全副骨骼」。正如那些光亮的头骨收藏，方法也许可恶，但结果却可能是值得称许的。

受到众人批评的是蓝尼被解剖的方式，而不是他被认定的价值。解剖过程–肆无忌惮的医生在阴暗而令人作呕的解剖室中工作–令人无法承受，但最终结果却值得艷羡。有些医学标本，特别是人类头骨，几乎可以说是艺术品，医学史学家萨谬尔．亚伯提（Samuel J. M. M. Alberti）把医学博物馆比喻成艺廊，那里展示着来自解剖室的「工艺作品」，是一代又一代在解剖室中工作的解剖人员和医学技师发挥创意天赋的成果。无论在从前或现在，好的医学「制备品」可能是花费许多小时的工作投入，加上耐心和技艺所得的结果。专业人士的作业环境或许不是特别健康，但当公众的目光能被礼貌性地转移–这是通常的情形–他们会自豪于他们的成就，持续精进相关技术，并对工作内容保持祕密。让有机物质能够对抗腐化是一件带有神奇魔力的事。

在把人变成标本的过程中，解剖人员将自己的个人性铭刻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各自都有最喜欢的工具和自己的风格。一八○○年代初期于伦敦执业的外科医生汤玛斯．波尔（Thomas Pole）把干燥的豌豆泡在水中让它膨胀，然后用它来「柔和地」分开人类颅部的骨头；他也会拿铜制茶柜铰链来接合颅骨顶部。解剖人员经常採用木工和铁匠的工具。骨头可以用铁丝、锡板或马鞍皮革连接；湿标本可以用鲸鱼骨、头髮或牙医师的丝线悬吊在玻璃瓶缸中。由于最好的制备品都能成功掩饰制造方法，可想而知那是将技术与价值导入精密组装工序的结果。跟任何艺术创作一样，这些成品被人依据当时的美学规则评价。波尔曾指出，骨头不应该「出现一种令人不舒服的黑色」，因为那会让人联想到城市生活的骯脏污秽；它也不应该失去「骨骼最伟大的装饰─精美、洁白，宛如象牙的容貌」。他这番话既可以用来描述置放在他的工作台上那些骨头，也可以用来描绘某个美丽摄影棚模特儿的肌肤。解剖人员在他们的制备品中投入非常可观的情感劳力，以至于当博物馆标本出现损坏时，可能导致相关人员极度悲痛。

解剖人员的技术逐渐为众人所知，新的技术则带来愈来愈惊人的效果。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于林肯（Lincoln）执业的外科医师约瑟夫．史万（Joseph Swan）发展出一种让人体部位干燥的方法，可以有效保存手部和脸部最微小的神经网路。他用这种办法制作能够显现「脸部及颈部表层神经及动脉」的「雕塑」。有些特别惊人的结果可见于「腐蚀铸形」，周边肉质及器官被腐蚀掉以后，只会留下所剩血管的印记。这种方法被视为「所有方法中最高雅者，必须极为用心」。这种成品非常脆弱，经常被保存在特殊的玻璃容器中；有些人批评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展示而展示。工匠对自己的技艺感到自豪无可厚非，但企图把人体提升到艺术品的境界就超过了品味的界线。

根特．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的塑化人体创作展「人体世界」（Body Worlds）就受到这种批评。这个展览在全世界吸引超过三千万人次参观。创作者透过特殊程序，用塑料取代人体中的水分和脂肪，将人体做成干燥、坚硬、干净、没有味道的物品，可以安全地碰触。冯哈根斯这项特展之所以大举成功，一部分是因为展出的大体被摆置成栩栩如生的姿态。冯哈根斯指出，「具有美感的姿势有助于驱除嫌恶感」，而且他相信，虽然他表明展览宗旨属于教育性质，但假如展览以教学性质比较强的方式布置，能吸引到的参观人数会比较少。展览宣称能让参观者以货真价实的方式接触真正的尸体，但当然，这并不是参观民众得到的东西，因为真正的尸体会腐败、变臭。真正的死人不会打篮球，也不会骑脚踏车；况且，展览中那些人物生前可能从来不曾打过篮球或骑脚踏车。「人体世界」的美学思维将人类转化成某种新的东西

—「非死人」。

假如「人体世界」展出的尸体没有被做成艺术品，它们会令人作呕。与此同时，许多参观者认为艺术家所做的美学决定—姿态、化妆—「令人不安」、「缺乏品味」。正如马克．奎恩之类的艺术家透过将有机物质导入创作，挑战了我们的既有假设，冯哈根斯之类的解剖家也透过对人体进行的美学转化，使我们感到心神不宁。

教育体系促使一代又一代的医学技师在实验对象身上尝试使用各种工具及化学物质，而美学冲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断激发研究人员往不同方向探索。今天，经过塑化处理的人体部位—可以保持原有形状，长年存放，而且无需有害化学物质即可保存—被用于世界各地的医学院校中，而冯哈根斯成立的塑化处理中心（Plastination Center）每年生产数以百计的解剖标本。防腐保存工作的实际操作面向为理论带来支撑，而在研究心灵与物质之间的神秘关系方面，情况同样是如此。

二十世纪期间，头骨逐渐失去它做为人类身分首要实体标志的地位，改由大脑成为科学界瞩目的焦点。在此之前，大脑从来不曾像头骨那样成为博物馆典藏，因为泡在酒精瓶中的大脑远不如重量轻的干燥头盖骨那么便于运送。纵使解剖人员在解剖室中会切下大体的脑部，但多数十九世纪收集者以石膏铸形和蜡制模型为满足，用它们取代「真品」。不过大脑一直让人企盼着能够为人类的天性提供终极的物质主义解释，而在二十世纪降临之际，愈来愈多人的脑被拿来秤重、测量、比较、装瓶，摆上博物馆置物架供未来参考研究之用。

对于有兴趣将人们的大脑与他们的个性进行比较的科学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拿到最好、最聪明的大脑。医院太平间中有许多社会低层人士的大脑可以解剖，但优异的大脑数量相对少，因为优异人士有办法保护自己免于这种有失身分的身后命运。解决方法是以身作则，开启潮流。在一九○○年前后十年间，科学家开始互相捐赠大脑。餽赠大脑风气之盛，俨然成为一种「家庭产业」。在慕尼黑、巴黎、斯德哥尔摩、费城、莫斯科、柏林，正式和非正式「大脑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德高望重的会员同意将自己的大脑留给解剖界同侪，后者表示感谢的方式则是在对所获大脑完成调查研究后，向所属俱乐部其他成员宣读结果。有一个极为着名的例子是一八七二年成立的巴黎互惠验尸解剖学会（Paris Mutual Autopsy Society），该机构会员一辈子狂热地进行他们那乌托邦式的科学计画，然后会含笑离开人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死后留下的大脑将成为那个计画的核心要素。

大脑俱乐部解决了两个收集其他人头颅的根本问题：首先，它提供高教育程度的大脑供研究，因此有助于抵销过去样本严重倾向较低社经群体的情形；第二，它意味着研究人员可以在对大脑提供者的性格有所

了解的情况下，对大脑的本质进行检验。如果头颅、头骨及大脑是透过不合法方式取得，科学家对研究对象的个性通常将一无所知，因而不可能以任何细緻方式将性格与生理连结起来。相形之下，巴黎互惠验尸解剖学会的成员都必须写一篇文章，详细介绍自己在健康、心智、感觉、能力等方面的状况，以便后续与他的大脑进行比较研究。问题是，实际调查结果总是无法带来具体结论，因此最终不具任何科学价值。

巴黎互惠验尸解剖学会产出的第一份验尸报告，展现许多研究人员可以达到的细腻程度：人类学家、巴黎市议员路易．阿斯林（Louis Asseline）的头颅解剖结果显示他的大脑特别重，内含厚实的脑迴，对负责解剖的人而言，这是一件「相当不得了的事」，因为阿斯林的聪明「精巧细緻，几乎可说细腻幽微」。在学会后来发表的报告中，就连这种过于简化的推理都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单纯的大脑描述。由于每个人的大脑在具体外形和质地方面差异极大，而且这些差异极难定义，要把这些东西连结到本身就很难定义的特定性格特徵上根本不可能，因此大脑俱乐部到后来基本上只不过是另一种悼念死者的方式。他们的研究结果鲜少被纳入大脑解剖结构的综合性研究。反之，他们成为新型纪念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资格限定的团体中，成员对大脑进行检验，透过这个工作表达他们在心智上对死者的敬意，然后他们会把这些「圣人」的「遗骨」保存在合适的博物馆收藏中，做为崇敬的对象。在巴黎人类学学会博物馆，有些巴黎互惠验尸解剖学会的大脑被置于标示「知识分子」字样的瓶缸中，跟为数众多的大脑铸形和头骨陈列在一起。

在源自那个时期的现存大脑典藏中，最早获得制备保存的系列藏品是由伯特．格林．魏尔德（Burt Green Wilder）所建立。魏尔德在上纽约州的康乃尔大学担任解剖人员，他在一八八九年仿照巴黎互惠验尸解剖学会的模式，成立规模较小的康乃尔大脑学会，做为他做解剖研究所需的大脑来源。他收集到超过六百个大脑，保存在装满福马林的玻璃瓶缸中，并贴上标籤。跟大多数其他大脑收藏一样，魏尔德的收藏在二十世纪期间被人遗忘，因为尖端医学研究早已从博物馆转移到实验室。一九七○年代末期，他的大脑收藏被冷落在康乃尔大学生物系馆地下室，直到一名认知科学教授芭芭拉．芬雷（Barbara L. Finlay）发现了这个收藏，并产生怜悯之情。芬雷认为这个收藏在神经科学史研究领域深具价值，因此组织了一个学生团队，将装在玻璃瓶缸中的两百个大脑从地下室窗户传出来，移到街道对面的新家。目前大约有七十个大脑安然存在，大部分存放在一个地下室的柜子中，不过芬雷表示：「它们经常有机会看到附近各个小学的活动情形。」她不是把这些大脑当做研究对象，而是把它们当成教具，带引学生思考大脑做为物品的相关问题，并设法探讨：「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所有像魏尔德的收藏那种在一百年前以科学资料的名义收集的大脑，到了今天就只是人类的大脑，不具任何公认的科学价值。至于使魏尔德产生收集动机的深层问题—心灵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本质何在—至今依然没有答案。神经科学家仍然在设法找出大脑的物理结构与人格之间的对应关系。多数神经生物学家应该会同意大脑是科学中的一个巨大谜团。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神经科学家理查．温盖特（Richard Wingate）写道：「无论我们对心智的丰富与复杂有多少直觉上的了解，大脑本身几乎没有透露出任何讯息。做为一个孤立物体，大脑的内在运作完全深不可测。」

今天，研究人员采用来自大脑库的样本，设法进一步认识阿兹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多重硬化等病状，藉以探索治疗这些病状的可能方法。典型的大脑库—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纽约大脑库（New York Brain Bank）□包括办公室、解剖室、实验室、样本贮存室（样品以福马林保存），以及冷冻室。捐赠者的大脑在太平间切下以后，跟其他捐赠器官一起送到大脑库。大脑运抵以后，大脑库人员会加以检查、摄影及秤重。他们用注射器采集一个脑嵴髓液样本，并切出小部分的大脑，例如视觉神经或松果体，然后把它们放进有个别条码标示的瓶缸。接着他们会把大脑分成两半，其中一半保存在福马林中，另一半则切成块状，置入有条码标示的容器中，以液态氮冷冻到摄氏零下一百六十度。数以百计这种脑块就这样保存在大脑组织冷冻柜中，直到有人需要拿来做研究。

跟魏尔德的玻璃瓶缸或用来烫煮大脑的啤酒桶相比，这一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约瑟夫．巴纳尔．戴维斯曾经建议把脑部切除并丢弃，「以便透过浸渍方式将所有血液［从头部］排除」，确保获得更白皙的头颅。除了头骨，他对其他东西不屑一顾。解剖讲求优先顺序：有些部分要切除，让其他部分更明晰可见。头骨会被切穿，以便达到脑部，然后脑部被拉出来，以取得头骨。在这个过程中，人被转变成一系列物品，其中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类型归属：头骨、大脑、头部半球、松果体、视神经。每个类型的物品都有它对社会的特定价值，而这个价值会因为智识潮流演变、各个时代的技术设施，乃至更大的文化环境等因素而起落。从原本应该丢弃的人体部位倒变得格外受眷顾，大脑在解剖学中的「崛起」与化学、防腐剂的发展史，以及相关科学家陆续提出的理论有同样密切的关系。

在歷史上的不同时期，头骨和大脑都曾被用来代表整个人，于是原有的整体便被化约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对多数人而言，有朝一日我们可能「变成」我们的头骨或大脑是一个令人坐立难安的想法。千百年

来，无数面带狰狞微笑的骷颅头意象触动着我们的意识，使我们不安地想到自己的骨头将在人生结束后继续存在。在二十世纪，做为物质主义时代的符号之一，「缸中之脑」的意象成为科幻小说的刻板元素。去除身体的大脑悬浮在充满泡沫液体的容器中，它依然活着，在身体缺席的状态下依然具备意识。这样的东西既可以用来展现无比乐观的愿景，也可以成为恶梦般的地狱情景。科学具有向死亡挑衅、为我们带来永生的力量，但它也可以让我们成为某个邪恶玩笑的牺牲品，使我们的意识被禁锢在自己的无助大脑中。如同科学史学家凯西．吉尔（Cathy Gere）所写：「『缸中之脑』是人类技术治理的象徵；科学家自许为赋与不朽的神祇或制造幻觉的恶魔，祭出这般奇异景象。」

恶魔也好、神祇也罢，科学的力量来自于操弄部分与全体之间的界线。在解剖室中将完整人体肢解成部分，这是非常真实而脏乱的工作，反之，重新为某些人体部分赋与生命的能力属于比较奇幻的范畴（至少目前是如此）。但是，这两者都因为逾越了社会准则，因而能带来某种权威。肢解人体不是合宜的事，然而对那些可能既勇敢又低粗的极少数人而言，它却俨然像是一种入行仪式，让他们能够进入拥有专业权威与社会名望的全新世界。这些解剖人员透过多年的辛苦训练，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宰制别人身体的主权。

对许多解剖人员而言，把一个人的头颅切断—即使那是个生前知情的匿名捐赠者死后的头颅—无疑是最大的身体及情感挑战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无可否认的刺激与震颤感。医学院学生在探索人与物之间的边界时，即便觉得恐怖，却也经常感受到这种魔法般的蛊惑力。假如我们在解剖时不是把人切开成头颅与躯体，而是尝试让那些头颅和躯体起死回生，那么是恐怖感会更大，抑或是魔力将更加甜美？尽管「缸中之脑」依然是个属于未来的幻景，但总是有人企图使这个幻景成为真实。

84　译註：安德鲁．康布（Andrew Combe，一七九七至一八四七年），也是医师、颅相学家。

第八章
有生命的头颅
LIVING HEADS



在罗阿德．达尔（Roald　Dahl）一九五九年的短篇小说《威廉与玛丽》（William　and　Mary）中，一名女子发现她已故丈夫的头颅「在一个大小约如洗脸槽的白色搪瓷大盆里」被维持住生命。玛丽的丈夫威廉生前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他死后一个星期，玛丽收到他的信，他在信中说明了他的决定，并请她到医院看他。她一边读信，一边很享受地抽菸，这是威廉生前严厉禁止她做的事。当她看到威廉的头颅在盆子里，用仅存的一只眼睛往上凝视她，她感受到拥有权力的震颤。她深深吸了一口菸，把菸气吹向威廉的眼睛，叫他一声「达令」，然后要求知道她什么时候能把他带回家。达尔在此玩弄的元素是一名男性的疯狂，他高估了自己的大脑，却低估了他的妻子。威廉的白色珐瑯盆是一个终极禁闭所。他赤裸裸的大脑既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没有了身体，它纵使非常强大，却也同样脆弱。

在达尔的这篇故事中，威廉与玛丽之间的权力游戏构成情绪张力上的高潮，但当达尔描绘威廉的大脑从头骨被取出的过程时，那种就事论事的淡定口吻同样显得阴森可怖，也同样令人感到惊奇。威廉的医生有条不紊地在背景中工作，他鉅细靡遗地遵守既慑人又骇人的临床作业规则。二十世纪期间，「缸中之脑」的意象成为创作者在探索科学的惊奇与恐怖时常用的一种虚构机制，但达尔的故事距离真实到底有多远？两百年前，科学家似乎能透过电流探针的碰触，让断头恢復生机。时至今日，人体冷冻学的信徒会付钱让人把自己死后被切断的头颅拿去冷冻，并相信未来某一天他们将能復甦，享有新的生命。长久以来，一直有人相信这种幻梦有朝一日将成为真实。倘若存在于人类脑部的力量能让我们透过「断头」的形态规避死亡，或使移出人体的大脑得以维持生命存续，它是否会让人类的身体变得多余？身首分离的状态能不能成为一个人生命中的另一个阶段呢？

圣人遗骨和死人的身体部位一直被认为具有某种「死后的生命」，但它们的力量必然是神祕的。它们所含的生命与其说是透过死亡获得延续，不如说是在死亡之后被重新塑造。防腐保存的头颅或许具有某种持续发生的力量，但那不是人还在世时驱动着他的力量。死亡是成为某种新东西的那一刻。但假如俗界的生命能在死后获得延续，而切断头颅这件事不再像从前那么无法挽回，那会发生些什么事？或许圣人捧着自己头颅诵经的故事在自然法则中终究不是毫无根据。

在十八世纪迈入尾声之际，不少人开始研究如何让人起死回生。一七八○年代，在义大利波隆纳，路易吉．加尔瓦尼（Luigi　Galvani）在偶然的情况下拿起钢质手术刀及铜钩，将青蛙的腿解剖下来以后，以电荷进行肌肉收缩实验，结果颇为惊人。加尔瓦尼发现电荷能让死亡的动

物恢復生机，使牠们的身体在金属探针触动下抽搐、抖动，甚至拍打跳动。他把这种能量称为「动物电能」，并且相信那是源自动物体内的能量。85换句话说，加尔瓦尼认为他可以透过一些工具，在几秒钟或几分钟时间中在死尸上重新点燃生命力。这项实验引发一股研究热潮，其他科学家很快就开始对小型哺乳动物的肢体进行实验，探讨他们可以透过静电装置（后来也用早期电池）对死尸发挥多少力量。与此同时，医生们也开始将摩擦式发电机产生的微弱电击施用于病患身上，治疗局部瘫痪、忧郁症等各式各样的疾患。

加尔瓦尼的外甥乔凡尼．阿尔蒂尼（Giovanni Aldini）是最热烈追随加尔瓦尼的门徒，在整个一八○○年代初期，他带着锌铜板组成的大型电池巡迴欧洲各地，演示动物电能的现象。阿尔蒂尼的表演令当时的人感到非常惊奇，把兔子、羊、狗和牛的尸块摆在桌上，只要他稍加碰触，就会跃动起来。有时阿尔蒂尼会在观众眼前斩下狗的头颅，然后用流电探针为它恢復生机，于是观众会看到牙齿开始打颤，眼睛在眼眶中转动，观众则忍不住好奇那狗是否还活着，而且正在那种折磨中受苦。

一八○三年，阿尔蒂尼在英国引发一股骚动。杀人犯乔治．佛斯特（George Foster）在伦敦的纽盖特监狱被处以绞刑后，阿尔蒂尼在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一群观众面前对佛斯特的遗体进行实验。当阿尔蒂尼开始施展魔法，群集的观众无不瞠目结舌：

电流程序第一次应用于脸部时，死亡犯人的下颚开始颤动，周边的肌肉严重扭曲，有一只眼睛甚至张了开来。在接下来的程序中，右手抬起握拳，小腿及大腿也动了起来。看在不知科学原理的旁观者眼中，那个可怜人彷彿即将起死回生。

在这么撼人心弦的证据下，许多人对「动物电能」的理论深信不疑。某些人甚至因为这种现象太有说服力而在震撼之余感到不适。一八一八年，一场类似的公开演示活动在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举行时，观众看到一名遭处决的杀人犯胸部重新隆起，彷彿他在呦吸，而「他身体结构中的每一块肌肉都同时出现吓人的抽动状态。于是，怒气、恐怖、绝望、焦虑，以及阴森可怖的笑意，在观众脸上交织成丑恶的表情」。数名观众受不了这种情景，不得不离开现场，一名男子甚至当场昏厥。

阿尔蒂尼在波隆纳对人类头颅进行实验，有一次他把两颗断头在脖子位置连接起来，然后让电流通过这个组合体。在当时的欧洲，罪犯被砍头之后的遗体被用来进行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十九世纪初期，流电收缩实验在德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结果当局最后只好立法禁止将被斩首后的罪犯头颅用于实验。

这个新法律想必使许多医生在工作上忽然受到掣肘，而布雷斯劳（Breslau）的温特（Wendt）医师是其中之一。一八○三年，温特做了一项人头实验。他跟两名助理前往一个处决现场，犯人的头颅被利剑斩断以后，助理迅速把它拿起来紧紧握住，温特则用电流探针碰触被切断了的嵴柱，结果头颅的脸部出现栩栩如生的收缩状态，使温特相信它可以感觉到疼痛。当温特把手指伸向一只眼睛，或助理把头颅朝太阳方向举起时，眼睑会闭起。他们对着头颅的耳朵喊犯人的名字，结果眼睛居

然睁开，视线慢慢往旁边移动，而且嘴巴打开，彷佛他试着想说话。斩首之后一分半钟，犯人的头颅虽然已经变得比较没有反应，但探针深入碰触嵴柱时，依然会导致脸部剧烈收缩，眼睑紧紧闭上，脸颊发胀，牙齿紧紧钳住某个人的手指。围观群众不禁大叫：「他还活着！」

由于人类天生会对其他人的脸部动作产生即时、迅速而无意识的生物性反应，因此当我们看到被切断的头颅滚动眼珠、咬牙切齿的模样时，我们的恐怖感是一种身体上的本能反射。当一个脸孔看起来彷佛在表达不适感，或努力设法与周遭沟通，我们的大脑会自动起反应：沮丧的脸孔使我们感到焦虑，痛苦的脸孔使我们觉得同情。而当那个人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头颅，我们的所有反应–包括情感、身体、理性等层面的反应–想必是一片混乱，因为我们的情感本能与那个人必然已死的逻辑结论产生冲突。因此，当观众看到一颗被斩断的头颅表现出某种试图沟通的迹象，他们会惊叫、呕吐、晕厥，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尽管被肢解下来的手臂和腿部也可能在演示人员的台桌上扭甩、摆动，但一个死人的头颅带给观众的感受绝对远超于这一切，因为它的动作似乎不只是源自身体反应，而是来自一个有知觉、有意识、有感情的生物，而这个生物正在遭受的苦难既令人惊恐，又扣人心弦。

科学家为了探索身体对电流的神经性反应所做的实验和演示虽然骇人，但亲眼目睹这种景象的人属于相对少数。断头台做为一种剥夺生命而非恢復生命的机器，它在公众想像中反倒更能召唤出「活死人」这种幽灵般的形象。断头台在十八世纪末的欧洲成为主要的处决方式，使民众忽然面对一种极其突然而且意象鲜明的生死过渡程序。断头台上的死难者不会挣扎至死，也不是像在绞死刑台上那样坠入无意识状态。相反地，头颅是以惊人速度从身体上被斩断。断头台的运作机制快得令观察者不禁怀疑，死亡是否真能发生得如此快速？或许在致命一刀落下之后，生命依然在可怜的头颅中持续存在？由于没有人在被断头后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让活人的好奇心获得满足，因此从来没有人能知道断头台大刀下的死亡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假使被断头者真能感受到任何东西。

断头台杀人速度之快，使死亡那个神祕瞬间在旁观者的想像中彷佛获得放大。在那个无限小的时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断头台只是使死亡显得像是立即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机器的效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一个人的死亡事实上并不可能那么快，那么断头台或许能够让死者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失去了身体的头颅或许能明白它的命运，成为歷史学家丹尼尔．阿拉斯所描述的那个无以言喻的怪物–它喃喃自语着：「我思，但我不在」，彷佛笛卡儿的名言也被砍得面目全

非。

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谣传头颅没有了身体之后还会继续存活。其中一个故事是说，国会中的两名敌对人士被砍了头以后，刽子手把他们的头颅放进同一个袋子里，结果其中一个头紧紧咬住另一个头，使人无法把它们分开。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与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七日谋杀激进派政治人物马拉的刺客夏洛特．柯尔岱．达尔蒙（Charlotte Corday d’Armont）有关。夏洛特．柯尔岱上了断头台以后，刽子手向民众高举她的头颅并加以拍打，结果她脸颊发红、显出生气模样。一名在场医生指出：「当可恶的刽子手把那颗平静而美丽的头颅拿在手中打巴掌时，有谁会没看到夏洛特．柯尔岱的脸颊禁不住愤慨之情而涨红？」

无以数计的故事描述断头上的眼睛会眨、牙齿会磨、嘴唇会动，头颅还会在篮子里抖动。有些故事的确是真的。断头确实可能具有移动能力，问题是：这种移动代表的是什么？假如断头移动了，我们是否就可以说它是活的？如果可以，那么它是否能体会它所受的恐怖命运？那时的人无法知道，那种移动究竟是证明了人类的意志正在努力伸张自我到最后一刻，或者只不过是复杂的生理程序仍然在死尸中运作。法国、义大利及德国的许多医生决定亲自探究这件事。

其中一人是法国解剖学教授赛居雷（Séguret）医师。他在一颗被斩断的头颅上把眼睑拉开，然后把头颅举起朝向太阳，结果他发现「眼睑会立刻自行闭合，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既突然又令人吃惊」，然后「整张脸出现强烈的痛苦表情」。赛居雷的学生拿刀刺另一颗头颅上软趴趴的舌头，结果舌头忽然往回收缩，脸部彷佛因为痛苦而皱成一团。赛居雷的团队也曾指出，有个名叫特西耶的杀手在断头台上身首分离以后，经过十五分钟，他的眼睛居然转向一名正在说话的男子。在义大利，科学家则发现每次他们把手术刀切进断头前额的柔软组织，断头的脸部肌肉就会收缩。

虽然这些医生致力研究断头是否还有生命这个主题，但他们无法取得共识。有些科学家记录下脸部的运动，有些科学家则没有看到这个现象。一八○三年十一月，德国曼茨（Mainz）的一个团队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两名学生在断头台正下方就定位，设法在人头落地后立刻检查断头上是否会有意识存在的迹象。一名学生紧紧握住断头，密切观察它的脸孔，另一人则凑近断头的耳朵边喊道：「你听得到我吗？」他们轮流做对方的工作，前后这样检验了七颗断头，结果没有观察到任何反应。研究团队达成结论：身首分离之后，意识可以说是立即消失，而且无法挽回。曾经目睹大约一百二十个断头场面的行刑助理

乔治．玛丹（George Martin）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也认为死亡是立即发生。他说，死亡后几秒以内，眼睛就会僵住，眼睑固定不动，嘴唇发白。

然而事实真相依然无法完全确定。无以数计与身体断离的头颅被观察到出现眨眼或做鬼脸的现象，令人匪夷所思。一八三六年，恶名昭彰的杀人犯皮耶─法兰索瓦．拉斯奈尔（Pierre-François Lacenaire）86答应帮忙为斩首后的意识存留问题提供佐证（拉斯奈尔后来成为俄罗斯大文豪杜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作品《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的主人翁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拉斯奈尔在比塞特尔的监狱医院答应乐吕（Lelut）医师，他被处决以后会把左眼闭上、右眼保持睁开。拉斯奈尔身首分离以后，乐吕观察他的头颅好一段时间；他等了又等，但什么事也没发生。问题在于，无论头颅被斩下以后是会动还是完全不动，这都无法证明它到底是否具有意识。会动的断头绝对可能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因为动作的存在本身并无法证明头颅还有意识，或对周围环境有所知觉。同理，不会动的头颅不无可能还具有意识，只不过已经完全失去移动能力，也无法表达出它所感受的痛苦。

由于所谓证据并不是真正的证据，因此当时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一切，但这个事实无法遏止一群人热情投入研究被斩首罪犯尸体的工作。直到十九世纪末，科学家们依然不断在犯人死亡后在他们的断头上东捏西戳，用火烧、拿刀割，设法引发某种反应。他们用阿摩尼亚把毛刷泡湿，然后插进断头上的鼻孔；他们也会把点燃的蜡烛凑近眼珠，在耳朵里喊名字，但并没有任何可供採信的证据显现出来。

十九世纪末期，少数意志坚决的科学家开始进行更大胆的实验。拿东西在断头上刺或戳是一回事，但如果把新鲜血液输进死人头颅中，设法为其维持生命，结果又会是什么情形？两名法国医生在一八八○年代研究了这个问题。尚─巴普提斯特．文桑．拉波尔德（Jean-Baptiste Vincent Laborde）设法用鲜血让断头恢復生机，并在头骨上钻孔、把针刺进大脑，企图触发神经系统的反应。有一次，他想办法把一颗人头颈部一侧的动脉连接到一条活狗身上，结果他发现眼睑、额头、下颚的肌肉出现收缩现象。在某个时候，他记录下那人的颔部忽然啪一声闭上。达希．德里尼耶尔（Dassy de Lignières）医师也曾从活狗身上汲取血液，灌入被斩断的人类头颅。德里尼耶尔的观察结果是，断头脸部发红，嘴唇膨胀出现血色，五官也变得比较明晰。在大约两秒钟时间里，嘴唇略为出现结巴地想说话的模样，眼睑抽搐痉挛，「脸部整个甦醒，呈现某种又惊吓又惊奇的表情。」这名医生的结论是：「我非常确定，他的大脑在两秒钟时间中可以思考。」不过想当然耳，他根本不可能证实这件事。

这些实验让德里尼耶尔相信断头台处决的「酷刑」成分。他写道：「当大刀大功告成，当人头滚入锯末尘埃……这颗已经断离身体的头颅

会听到群众的声音。被斩首的受刑者可以感觉自己在篮子中逐渐死亡，他可以看到断头台以及白昼的光芒。」德里尼耶尔提出衷心的建言：刽子手应该立即把头颅举起来在空中甩，确保所有血液迅速流出，以减低犯人最后的痛苦。

尽管有了这些调查研究结果，但长年运作的断头台仍然不断制造一颗颗抽动的头颅，使医学界持续在断头是否会受苦这件事上争论不休。到最后，科学家在他们所做的实验中观察到什么已经不再真正重要，因为所有人都同意，人在死亡之后，被分离的头颅和身体确实可能继续移动和起反应。此外，加尔瓦尼的实验明确显示被切下的身体部位可以继续对物理刺激产生反应，而且当时学界也普遍认为，大脑可以从截断的肢体获得感觉，因此，或许大脑也可以继续感觉到被截断的身体。

问题在于如何诠释身首分离后尸体各部位产生的移动。十八世纪末期，三名医生━萨谬尔．汤玛斯．索梅凌（Samuel Thomas Soemmerring）、尚━约瑟夫．苏（Jean Joseph Sue）及查尔斯．厄尼斯特．欧斯纳（Charles Ernest Oelsner）□成为反对断头台的言论领袖，他们的论点是这种处决方式非常残酷。他们强调被切断的头颅会感受到痛苦，因此他们相信断头台的残暴程度超过绞刑，更不用说窒息、毒药等处死方式，因为据倖存者表示，这些方式感觉跟入睡相当类似。相较之下，断头台的快速和血腥使这些医生相信它一定比其他处决方法带来更大的痛苦。关于身体对斩首产生的反应，这些专家各有不同见解，但他们都同意头颅被切断以后，即使已经完全不会再动，它还是会有感受力。他们相信，就算不再有血液流进大脑，大脑依然能继续运作。索梅凌指出，「感觉、个性和自我意识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因此犯人在接受颈部的致命一击之后依然会感到疼痛。他非常确定，如果人头被切断后空气还能流过声带，断头将可以说话。根据索梅凌的说法，人类的头颅「圆满而厚实」，它比其他身体部位保留更多热量，因此感觉可以在大脑中持续存在整整十五分钟。

这些见解背后的意涵非常可怕。倘若真是那样，受刑者可能会在一种痛苦万分，既未完全死亡、也称不上活着的临界状态中，实际经歷到自己的暴力死亡。假如你是一颗被切断的头颅，被迫在十五分钟时间中思索自己必然的最终命运，那可以说是漫无止境的经验。尽管断头台的设计宗旨是提供有效而人道的处决方式，但它却有可能为受刑者带来苦不堪言的酷刑折磨，无论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都是如此。尚━约瑟夫．苏表示，被断头台斩断的头颅不只能够感觉到它的命运，还可以思考这件事，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在感知到自己被处决之后，还必须事后思考自己被处决的事实，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恐怖？」

大多数关于「断头后生命」的讨论重点在头，而不在身体。有趣的是，只有苏相信生命既会在头部，也会在身体中继续存在，他这个论点意味着灵魂或意志不单仅由大脑乘载，而且在本质上也不是单一的。苏认为「生命力」分为道德性、智识性、动物性三种，这三种生命力虽然统合在头部，但当断头之类的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它们可以独立存在一段短时间。对苏而言，断头台之恐怖一部分即在于它所扮演的角色：在死亡那段短暂时刻将这三种力量残酷地剥离开来。

其他医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断头台是不良手段中最可取的一个。在某些人眼中，死刑是不应该的事，但倘若非得把人处死不可，那么最好是靠这一台。一位名叫皮耶．尚．乔治．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 Cabanis）的法国医生和哲学家支持断头台死刑犯不会受苦的理论，认为他们没有足够时间感受痛苦。卡巴尼斯提出的证据是那些在战场上受伤，但在伤后瞬间没有感觉到痛楚的士兵。他的论据是，假如受伤士兵在受伤后的短暂时间中没有经歷痛楚，那么断头大刀在刹那间让人身首分离，必然也不会带来痛苦。切断速度如此之快，不但不可能放大任何不适感，更应能确保死亡的痛苦达到最低。卡巴尼斯曾指出，颈背是可以使动物及人类瞬间死亡的地方（不过有些人不同意这点，他们认为由于那个区域充满神经，因此在断头台上被处决是特别折磨人的死亡方式）。

卡巴尼斯也注意到被切断的头颅和身体会出现令人担忧的痉挛现象，但他提出瘫痪的例子，藉此证明肌肉运动可能在没有感觉的状态下发生。这些例子支持了卡巴尼斯的理论，他认为那些在断头上观察到的眼珠滚动、牙齿打颤等现象只是单纯的机械运动，不含任何相关感受。他臆测，意识需要大脑和神经系统其他部分之间的连结才能存在。意识不是位于任何一个特定身体部位，例如大脑，而是仰赖整个人体的合一。一旦嵴髓被斩断，使这种合一性被毁，意识就停止了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格和感觉都在断头那个瞬间，在嵴髓断开、人体合一性粉碎那一刻遭到根绝。当然，根据卡巴尼斯的说法，有意识的断头绝不可能存在，它不过是人想像出来的东西。虽然他承认大刀落下未必代表生命立刻结束，因为部分生物功能可以继续存在，但他认为有意识的痛苦确实是立即结束。

这些医学和哲学辩论具有一种明显的政治底蕴。那些跟索梅凌一样认为断头台死刑犯遭受残酷折磨的人，倾向于批判整个法兰西共和国的野蛮。欧斯纳将那些在巴黎聚集观看同胞在刀下丧命的人称为「一群嗜血的贱民」，他觉得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不会需要採取这么极端而卑劣的措施。断头加诸于个体的混乱令人联想到革命后社会秩序崩解所导致

的混乱。卡巴尼斯虽然称不上是共和体制的死忠信徒，但他具有某些共和倾向，因此在探讨「头颅」和身体—或者「元首」和国家—孰轻孰重时，他的判断自然染上特定色彩。对卡巴尼斯而言，头颅和身体互为平等，而且缺了另一部分就不再有意义。

断头台虽然让死亡的时刻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但这个时刻依然扑朔迷离，令人百思莫解。死亡到底在什么时候确实发生？生命的定义又是什么？动作、意识或感觉是否能够单独构成生命？这部大型死亡机器使这些问题更形尖锐，但直到今天，医学伦理界对断头与死亡的关系依然未达成定论，各种议论只是证明死亡这件事跟以往同样神祕。

研究人员于一九九○年代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进行一项实验，证明断了头的动物可以成功生育后代。他们将一头怀孕的母羊连接上维生系统，然后将牠断头，结果小羊在母羊的头断落三十分钟后出生。母羊分娩时是「活着」的吗？这要看我们怎么定义生命。专家对此事至今依然莫衷一是，这点并不令人惊讶。母羊的心脏在跳，牠的血液在循环，牠透过嗯吸器嗯吸，牠维持恆常的体内环境。纵使牠不再真的完整，但牠确实在运作。这项实验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促进关于脑死的当代辩论，以怀孕无头母羊替代怀有身孕的脑死女性，进行研究。有人认为，被宣布脑死的女性并没有死，因为她能成功妊娠，生下健康宝宝。

研究人员认为他们透过砍断羊头，证明了死羊可以生育，因为，有谁能否认，断头不就是死亡的定义？断头是终极的，没了头的人不可能被认为还活着。但是，类似先前那些人头实验，这项对羊所做的实验依然无法带来定论，有些人说它确实证明死羊可以生育小羊，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不过证明，「死」羊在被断头后的确可以被维持在生命状态一段时间。或许这项实验只是证明，失去头颅终究不会使身体运行戛然而止，至少在广泛动用医学科技并动员一群高度专家的情况下，让身体维持三十分钟的运作是可行的。

脑死的概念已经主宰医学界对死亡的临床定义，而它本身就是个深具争议性的议题。如羊和无数医院病患的案例所示，一整套身体功能可以在脑死后获得成功维持，因此某些人相信脑死病患绝不应该被视为死亡。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旧不清楚大脑完全死去到底要花多少时间。过去一般认为大脑在缺氧状态下可以存活四分钟左右，但一些对猪只所做的实验却显示，大脑可以在心跳停止十五分钟后恢復生机，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明显损害。索梅凌医师假使在世，无疑将乐见这些实验结果支持了他当年所提的理论，也就是头部能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存活十五分钟。死亡时刻究竟何时降临，这个生理学乃至哲学上的谜题至今依然难以捉摸，我们愈是想仔细探查，它就愈是模糊难辨。

当然，现在人头不再被用于这类研究，但在超过一个世纪期间，欧洲的学者不断戳刺被切断的人头，以满足他们的好奇。那些实验都带有某种黑暗的反讽性质：为了证明断头会带来痛苦，科学家却在有可能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对象身上施加痛楚测试。假如意识能够存在于断头中，那些医生的行为等于是执意要延长它的存在，而且经常是用最折磨人的手段、实施尽可能长的时间，同时对于假设获得证实却不能抱任何真正的希望。

十九世纪末，大约在德里尼耶尔利用狗血及人头进行实验时，愈来愈多人对这种研究工作感到愤慨。一名反对人士指出：

那些用火烧人、拿钳子施虐、转动死亡轮的残忍至极的刽子手，跟拿血淋淋的人头来把玩的科学家相比，简直成了小白鸽。法律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在任何犯人身上使用酷刑。立法者显然不可能预想到生理学家竟然会将他们的才干用于凌虐死人。人的头已经砍了，他的债已经还了，没有人有权利要他再还债一次。

针对人头的研究被愈来愈多人视为侮辱而且不合伦理，他们认为与其如此，不如让死亡时刻这个神秘问题继续无解。

在二十世纪，这种研究变得日渐稀少，不过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一九五七年，法国的医生还下过这样的结论：「所有生命要素都在断头后存活……［予人的］印象是一个恐怖的经歷，一种谋杀式的活体解剖，然后是过早举行的葬礼。」断头的感受如何？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在法国以断头台为处决人犯首选方式的年代，社会上一直有一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冲动。

人头研究于二十世纪期间式微，但有些科学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动物的头上。查尔斯．加斯利（Charles Guthrie）是一名美国生理学家，血管外科鼻祖之一，一九六三年去世。他在一九○○年代初期与阿雷希斯．卡瑞尔（Alexis Carrel）合作研究静脉移植及缝补，成功开启一条道路，使器官移植手术在二次大战后迈向成功。加斯利试图移植四肢断块，把肾脏缝进下腹，他也做了头颅移植实验。

一九○八年五月，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加斯利成功将一条狗的头颅移植到另一条狗的喉咙下侧。他把血管嫁接起来，让血液从一条狗身上流通到另一条狗的头部。被这样移植的头展现出基本反射动作：瞳孔收缩，鼻孔抽动，舌头移动。手术完成七小时以后，併发症出现，加斯利只好让狗儿安乐死。

在一九五○年代的苏联，弗拉迪米尔．德米柯夫（Vladimir

Demikhov）在许多可怜的狗儿身上进行了类似的程序。据说德米柯夫是个「活力充沛、果断坚决的人，具有坦率而开放的态度」—这或许并不令人讶异。二十世纪中期，除了骨头、血管和眼角膜，移植身体其他部分依然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冒险，而德米柯夫却企图证明软组织，甚至是细緻无比的大脑组织，可以在移植后成功存活。在每次操作中，德米柯夫的团队将一条狗的头部、肩部、心脏、肺脏和前肢接到另一条狗的颈部上。虽然这样造出来的双头狗大部分在几天内就会死去，但有些存活了几个星期，因此他的实验在当时被视为成功。这些「器捐狗」不仅维持意识，而且会喝水、咬人手指。

随着器官移植在二十世纪后期日益普及，移植头部的动机出现了转变。被捐出的器官可以在受赠者身上存活已经无需证明，但有一位医生依然想证明人头—做为承装人格（personhood）87的有意识、有感觉的容器—能够独立于身体之外存活。德米柯夫已经证明经过移植的狗头可以保留大脑功能。一九七○年代，一名执业于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企图证明头部移植在猿猴身上为可能，因此理论上在人类身上应该也可能。身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怀特研究大脑的化学及生理现象，以及深度低温（deep hypothermia）对大脑的影响。深度低温是一种保护性技术，用于外科手术期间血液循环中断时。怀特相信，他的实验或许可以让四肢瘫痪人士（他们的瘫痪状况导致器官功能比较容易丧失）有朝一日能接受捐赠者提供的新身体。

在怀特的早期实验中，他会取出动物的大脑，但维持动物本身的血液供应；然后他开始设法将独立出来的大脑连接到不同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随后在一九七一年，怀特和他的团队经过不只十二次失败以后，终于将一只恆河猴的头部成功移植到另一只恆河猴已被切去头部的身体。手术一共进行了八个小时。当这只新的合体猴重新恢復意识时，怀特将牠描述为「危险、好斗、非常不快乐」。经过移植的猴子头部处于麻醉状态，因而免于痛楚的感觉，但它有效维持意识和警觉。它会追踪人和物体在房间中的移动，会咬人的手指，也会咀嚼并设法吞嚥食物。

怀特用猴子和狗重复做了许多次这种实验，「配制品」（preparation，这是工作团队为他们的混合创造物取的称呼）的存活时间从六小时到三天不等，最后会因为失血或免疫反应排斥而死亡。到了一九八○年代，怀特的团队已经让实验程序更细緻，使「配制品」无需辅助就可以呼吸。怀特也开始在死人大体上做研究，记录下对人类受术者执行这种移植实验时理论上必须完成的操作步骤。他研究出一种机械心脏，这种心脏能向流进颈部的血液供氧并加以调节，为成功移植人头

铺路。

怀特于二○一○年过世。他在生前经常带媒体记者参观他的实验室，那里俨然是一座展示他的研究成果的博物馆，而他一直相信人头移植是可能的，尽管他承认这里面包含的各种实务和伦理障碍可能都难以克服。其中的一道重要障碍是成本：无论就费用面或消耗珍稀捐赠器官的角度而言，做这种手术的成本都令人望而却步。但这类反对论点与执行这种移植程序的哲学意涵相比，还是显得微不足道。

怀特不理会任何比较广泛的伦理议题。他坚决相信先前所提的「人格」唯独位于人类的头部之内。他在受访时指出：「心智（mind）不仅包含所有使人类具有人性及个体性的元素，它也代表着人类心灵或灵魂的某种物质意义。」他的论点是，捐赠的身体不会有神经功能，因此可与四肢瘫痪者的身体相提并论，而他认为四肢瘫痪者非常适合成为这种手术的接受者，因为他们的预期寿命在四肢瘫痪后经常会缩短，而获赠与的新身体会以相当类似于原有身体的方式运作。「我向来都会回归到同样一个基本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保存大脑、心智和灵魂这三者。尽管有一些物质上的侷限存在，但假如你是透过颅部神经在运作，那么似乎就没有什么限制。」

关于捐赠者及受赠者之间肤色和性别的搭配，怀特比较没办法回答。「我真的还没想清楚这个部分，不过这些确实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怀特认为神经外科的进步有朝一日势必将使捐赠者和受赠者的神经能够顺利连接起来，逐渐达到移植手术后某种程度上的身体移动及感官知觉。有鑑于这个可能发展，创造上述那种极端形式的混合人类个体将难以避免夹带更尖锐敏感的意涵。

对怀特而言，身体大抵不过是一部有机维生机器，它的运作只是为了维持人类生命，而这个生命真正存在的地方限于头部。怀特的理论及学术实践令人感到震撼，因为它否定了我们在我们的身分认同中感觉到的某个固有部分，也就是说：头部与身体两相依属。断头这件事之所以蕴含强大力量，是因为它具有终极性，断头就代表死亡。然而，歷代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普通百姓却无法接受这种终极性，而怀特是其中最晚近的代表人物。他将断头视为人类生命的一个潜在可能阶段━一个人类可能可以熬过的事件。而假如一个人能在头颅被截断后存活，并且与另一个身体重新结合起来，要是那身体正是自己的（而且还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活力），而不是一具从前属于别人、曾经成为死尸的肉身，那该有多好！

人体冷冻机构真的肩负起照管「缸中之脑」的任务，只不过被装进

容器的其实是整颗人头，而容器则是一种大型金属真空保温瓶，称为「杜瓦瓶」88，里面充满液态氮。规模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之一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那里有超过一百二十名「受疗者」被冷冻贮存起来，其中三分之二採用「神经暂停」（neurosuspension）程序，也称做「截头」（decapitation）程序，其他则是「全身型受疗者」（whole-body patient）。人体冷冻术的理论基础是，心跳停止之后有一个「赦免期」，在这段大约八分钟的时间里，人体细胞维持完好无损。当活细胞被冷冻到摄氏七十九度以下，所有生物化学变化都会减速到近乎休止甚至完全停止，使活细胞能无限期被保存在冰冻状态中。人体冷冻专家相信，如果人体可以用足够快的速度冷却保存起来，未来的科技—例如复制、奈米科技—将可用来修復大脑和身体，于是「受疗者」就可以在数百年后甦醒过来，并发现自己又洋溢青春与健康。对人体冷冻专家而言，死亡只是在我们找到办法让人类重新恢復生命之前，一个必须好好管理的阶段而已。

「神经暂停」或「截头」依据的前提是，大脑是人体中唯一一个绝对必须保存的部位。阿尔科基金会一名前总裁史提夫．布里吉（Steve Bridge）曾经写道：「所谓『大脑移植』是不存在的；大脑被移植到一个新的身体应该称做『身体移植』才对。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些人的论点是，其他脏器都可以被更换，移植完成以后不会对一个人的身分认同造成威胁，但如果受损的是脑部，当事人的身分认同可能无可挽回地丧失。假如不保存大脑，未来的人体冷冻专家将必须创造一个全新的人；但如果不保存身体，他们将只需要创造一具新的身体。复制之类的技术隐约告诉我们，科学家有一天将能在实验室中培养新的健康组织，甚至新的肢体、新的身体。人体冷冻专家认为，既然我们都曾经在卵子受精之后从一个单一细胞长成一个完整的身体，在正确的条件下，我们当然可以再这么做一次。

如果你考虑在死后做人体冷冻，「截头」这个选项有许多优点，首先就是费用部分。保管一个人的头部比保管整个身体便宜很多，因为需要的氮比较少，贮存容器和所需空间也比较小。人体冷冻技术在一九六○年代出现时，大家很快就知道，高昂的开办费和经常费用，以及复杂的物流作业，都会使全身型保存充满高难度。他们必须「直捣人体冷冻的真正核心意义—个人存续，而个人存续的最根本元素就是大脑」。在那个年代，冷冻保存的发展状况衍生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效应，使这种断头形式成为一种道德责任。人体冷冻运动创建人之一麦克．达尔文（Mike Darwin）这样忆起当年：

阿尔科和我走上神经暂停这条路，因为那是一个合乎理性和道德的志业。它让我们有机会挽救我们所爱的人的生命，这是我们无法用其他方法做到的。假使未来的歷史告诉我们，从「政治」或「较大利益」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件不该做的事，我希望我们不会受到太严厉的评断。因为事实是，那真的是在维持人类本质的条件下，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事。事情的发展很奇妙。谁能料想到，砍下自己母亲的头颅会成为终极的关爱行为、挽救她的生命的最好机会？

「神经暂停」目前依然相当受欢迎，因为花费相对低廉：全身保存服务的最低费用是十二万美元，仅保存头部则可低达五万美元。神经暂停这种保存方式也代表「冷冻暂停服务队」在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的关键时刻，可以把注意力聚集在你的脑部，而不必忙着设法保存你的所有器官。这样一来，防腐化学物就可以更快地灌注到你的脑部，脑部冷却得也就更快，使你—或者至少是你的大脑—更有本钱面对未来的挑战，而且由于你是被保存在比较小的容器里，运送工作也会比较简单。

致力于这个专业的人体冷冻专家们同意，神经暂停面临的最大挑战属于社会或「美学」层面。被截断的头颅看起来实在太恐怖，一般人很难相信，把自己的爸爸或爱妻的头切下来会是一个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新生活的办法。有些人体冷冻机构拒绝提供神经暂停服务，因为这对公共关系会造成不良影响。阿尔科的一名前任总裁对考虑接受冷冻的潜在受疗者提出这个建议：「现在立刻就开始跟家人和朋友谈人体冷冻和细胞修復，让他们慢慢熟悉这个概念。然后等到你跟他们提到冷冻人头的事，他们可能就不会把它看成是那么奇怪的想法。」在人体冷冻专家眼中，做神经暂停的道理很简单：在唯一替代方案是死亡的前提下，这可能是你手中握有的最佳选项；而且无论如何，当你从你长期茧居的膳魔师真空瓶出来重见天日时，所有辛苦工作早已有人为你打点完成，长出新的身体将是轻而易举的标准程序。

毫无疑问，人体冷冻专家之所以偏爱使用「神经暂停」和「头部隔

离」这些听起来科学而且令人心安的新式词汇，是因为「断头」、「砍头」这类字眼的老派含意让人不舒服，不过人体冷冻的实务面依然是心灵脆弱者难以承受的。阿尔科允诺会在接到受疗者临终的消息时，立即派出冷冻运输团队，在现地二十四小时待命。受疗者一经宣告法定死亡，他们会把他的身体放进冰水浴中，并连接到一部心肺復甦机，不过目的不在设法让死者恢復生命，而是要维持他的血液循环。同时，团队会以静脉注射施打多种药物，维持受疗者的血压，并减少脑部的氧气消耗。心肺復甦机由可携式心肺机取代，透过股动脉与身体连结，可以快速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然后身体在冰冻包装的状态下，被运到阿尔科机构进行外科手术。

在阿尔科，受疗者的血液逐渐被一种「冷冻保护点滴」取代，使保存效果达到最优化。全身型受疗者必须让人切开胸部，以处理心脏部分的血管，但在神经暂停受疗者身上，阿尔科用的是嵴柱内部的动脉。工作人员把受疗者的头髮剃光后，在他的头上钻两个小洞，以便能在点滴施用过程中，以视觉方式对大脑进行监测。点滴施用完成后，手术团队开始用经过彻底消毒的板锯执行「颅部隔离」（cephalic isolation），也就是「截头」，再把受疗者的头颅放进它专属的杜瓦贮存瓶，然后头颅在两星期期间中，逐渐冷却到摄氏一九六度以下的低温。

在神经暂停这项业务中，人体冷冻专家只是单纯地把受疗者的整个头部切下来，因为如果要取出他的脑部，不但耗时费工，而且会造成太多损害。把脑部贮存在它原有的天然保护容器中还是比较简单而安全的做法。不过，受疗者的脑部在这整个程序中受到的损害依然相当可观，而低温冷冻保存的脑部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或更久—将继续处在无法克服的损坏状态中，因为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修復的方法。人体冷冻专家相信，未来他们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为人培养出新的身体，而是如何找到办法为他们修復受损脑部，因为把人脑放进冷冻库确实会造成伤害。

人体细胞被冷冻时，细胞中的水分会渗出来，形成微小的冰晶，刺破周围的细胞。有些奈米技术人员认为，未来可望出现大小如细菌的机器，在人体内部穿梭移动，修復其中所含的大约十兆个破损细胞，但就目前而言，这种机器完全属于幻想的范畴。现阶段的科学不可能妄想对这么深层的细胞损坏进行修补。除了重建破裂细胞难如登天，另一个艰鉅的挑战是如何逆转老化过程，以及如何治疗老年痴呆、癌症，或任何其他可能导致一个人死亡的退化性疾病。就算以上所有医学条件终于都获得满足，一般人想到自己将以百分之百人造工程产物的形式重生，将是在独立于自然法则之外的实验室中「组装起来的一堆移植体、植入物

和微小发动机」，还是会对「人体冷冻转世重生」这种东西望而却步，不敢贸然下这种赌注。你的大脑要是没了身体—在此我指的当然是你呱呱坠地时那副躯体—它在任何可识别的意义上还能算是你的大脑吗？你的心智—你的人格和身分认同—应该不只包括你大脑中那些会发射讯号的突触所组成的网路，或者说，它应该不只是你的脑袋里装的那堆东西吧？

人类个性与身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复杂得无以復加，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但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应该避免将所有功劳归诸于大脑，也不应该低估人体在形塑想法上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大脑的形成与我们所做的事有关。研究显示，持之以恆的运动习惯可以改善一个人后半辈子的记忆力、注意力持续时间和学习能力，因此，当我们让身体运动时，我们也让大脑得到锻鍊的机会。

除了我们的身体安适状态会形塑我们的心智生活，脑部的具体大小也可能因应心智训练而增长。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一群认知科学家所做的一项长期研究显示，伦敦计程车司机的海马体会扩大，而这要归功于他们的「知识」，也就是他们那种穿梭在伦敦大街小巷的传奇导航能力。海马体主控记忆及空间意识，在特别密集的训练中，它会扩大。在钢琴调音师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效应，因为他们不断学习如何在复杂的声响地景中穿梭自如。海马体的大小与它的使用程度密切相关：一个人退休以后，他的海马体会缩小。这些发现让研究人员能够把大脑描述成一种会对运动起反应的肌肉。

「导航」（navigation）同时是一种身体和心智上的能力。一般人经常难以将某个路线概念化，或用言语描述它，但他们却无须做出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就可以沿着那条路线走。心智上知道怎么做一件事不同于身体上知道怎么做这件事，这两者间的界线很难描绘。运动员和音乐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演奏钢琴家能够记得数以万计的乐句及复杂指法，而且完全不会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件事。足球员的身体在不断移动的同时，能够判断复杂的角度、球的速度和重量、天气状况、对方球员的行动，而这种情况绝对是理性思维不可能掌握的。这些身体上的技术超越语言或心智思考的范畴：职业运动选手可能很难精确地说明，他们在比赛时是如何执行他们想做出的行动，只知道他们的身体自然而然就把它完成了。

以上只是几个特别显而易见的例子，用来说明人体如何形塑心智和大脑。天晓得将这两者分离开来会牵涉到哪些更幽微的意涵！经歷过中风的人有时会排斥瘫痪掉的肢体，这种病症称为病感失识症（anosognosia），意指病人无法承认他们的肢体障碍，或否认与受损的

那个身体部分有任何关连。比如他们可能说，他们的左半部不属于他们。一名病感失识症患者「不满一条别人的腿占据他的病床空间，气得把那东西抬起来丢出去，结果很讶异地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一名女子失去使用左手臂的能力，所以否认拥有左手上的戒指，但当戒指被换到她的右手上时，她却高高兴兴地说起那些关于戒指的各种故事。我们不清楚这种病状源自脑部损害或身体损害，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心理应付策略，或者会不会是以上三种情况的结合。病感失识症通常会在两三星期后消退，但它足以显示人类这个具有身躯的心智有多复杂。假如我无法以相同方式感知我的身体，那么或许我已经成为另外一个人。

心脏移植病人的经验也许是这其中最惊人的。这些人经歷人格上的改变是相对普遍的情况。一项针对三十五名以色列心脏受捐者所做的研究发现，几乎半数病人感觉到自己有了捐赠者的人格。一项在维也纳所做的调查显示，有两成病人出现人格改变的情形，其中有些人把原因归于几乎濒临死亡所造成的创伤，有人则认为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新心脏。有人在做了移植手术以后表示，他们的性情、吃的东西、音乐品味、日常作息、睡眠模式，甚至他们的性偏好，变得跟以前不同。偶尔某个病人的故事会成为新闻头条，他们声称还不知道捐赠者是谁，就有了对方的人格。一名男子说他忽然变得热爱古典音乐，后来才发现他的心脏捐赠者生前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一名女子宣称她在移植手术后不知何故对啤酒和鸡块产生渴望，后来她得知她的年轻男性捐赠者生前最爱这些食物。

这些病人有可能是在住院期间在下意识状况下吸收了某些资讯，而这构成形塑新身分认同的因素。此外，人格上的改变很可能不只涉及接近死亡的经验所造成的试炼，也可能与病人在整个后半辈子都必须服用的强力免疫抑制剂有关。无论如何，人格改变的现象早已获得普遍认定，而且研究人员开始提出其他各种理论。例如有人认为，心脏会制造激素，而且拥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可以透过类似大脑的广大神经元和突触网路，把讯号传递到身体各部。这个系统被称为心脏的「迷你大脑」。肠胃拥有更神通广大的「迷你大脑」，以超过一亿个神经元控制一部分情绪反应机制。因此，当我们觉得「肚子里有蝴蝶」（to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忐忑不安」之意），其实代表肠胃中的大脑正在跟头部的大脑沟通。胃肠的神经元或许不会影响意识思考，但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而这个事实多多少少模糊了我们以为存在于心智与身体之间的界线。

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在生理层面上可能产生的反应无疑引人入胜，但心理层面的反应更令人震撼。高达三分之二的心脏移植接受者在手术

后感觉痛苦无助，三分之一的人在有生之年一直无法摆脱这种痛苦。一小部分病人企图把自己切开，设法逆转已经做完的手术，因为身体遭到侵入的事实使他们备受折磨，寝食难安。对这些人而言，他们的新心脏不只是个「替换零件」，而且是一个入侵者，或说「第二个人」，彷彿一个他们不得不收留在体内的客人。接受者会把他们的新心脏描述为一种类似胎儿的生命，感觉像是一个不同的人在他们内部成长，而这种感觉可能很特别，也可能很险恶。他们会说「那个心」，而不说「我的心」；他们会害怕「那个心排斥我」。他们可能感觉自己彷彿同时在过两个人的生活，所以当某人问：「今天怎么样？」他们会回答：「我们还行。」只有一小部分接受者提到这种非常特别的感受，不过在心脏移植手术后觉得必须将自己的人格拉扯、撕裂、复制的人比比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导致精神病及严重心理问题。医生眼中的「成功手术」可能不见得像他们看到的那么单纯。

人类对器官移植产生的反应都已经如此复杂，头部移植的可能性当然少不了让人想拉警报。二○一○年以来出现为数不多的全脸移植案例（第一个局部脸部移植手术于二○○五年完成），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资料可供了解这种手术造成的心理效应。大部分的伦理争议着重在讨论脸部移植使原本健康的病人必须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事实，以及这种手术衍生的感染、排斥、疾病等问题。至于在一个人的脸部装上另一个人的脸，这涉及什么样的心理意涵？评论家一致认为，我们对人脸真的所知不多，因此无法预测后续影响。

做为一种「具有表达力器官」，脸部在所有器官中显得非常独特。跟心脏、肺脏、肾脏等没有人看得到的脏器不同，我们的脸能将我们与形塑我们身分认同的其他人（及物体）连结起来，透过这个作用，脸部有助于不断重新定义我们。我们的脸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创造性相互依存关系提供中介。「我们将自己视为全然的人类，也就是说一个具有尊严与道德价值的人，这种自我感知方式并非一个既与项（given），」哲学家黛安．沛皮契（Diane Perpich）在论述脸部移植的伦理面向时写道：「那是一个脆弱得不可思议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e）的成就。」脸部移植不只是用捐赠者的脸替换接受者的脸，它还把两个人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脸。外科医生也许可以在病人头部标出一个身体结束、另一个身体开始的地方，但在两张脸孔共同打造出来的新人体内，界线在哪里、该怎么画，这是极难釐清的事。

移植人头和它所含的所有内容物会是更极端的事。罗伯特．怀特的团队将他们做过移植手术的猴子称为「配制品」—这跟《科学怪人》[89]中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医师将他起死回生的可怜怪物称为「可

怜鬼」（the wretch）是类似的道理—彷彿他们承认，他们的创造物完全不再是猴子，而是在变成一种新的东西。怀特和人体冷冻界的领导专家们偏好将整个程序称为「身体移植」。为什么移植身体比移植头部容易让人接受？长久以来，头部一直被认为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主宰身体。头部能够观看、聆听、嗅闻、品尝它周围的世界；它所含的肌肉比所有其他肌肉结合起来更富于表达力；它为神经系统中枢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在长久的歷史中，人类对自己的头部有着近乎偏执的兴趣，这里面从实际面到美学面、从生物到哲学，可说有数不清的原因。头部具有属于它的存在，它拥有表面上的自主性。或许有一天，我们将有能力进一步使这种自主性成为具体的真实，然后我们将必须决定，我们是否真的想知道，我们的头到底能不能被一劳永逸地赋与宰制身体的能力。

85　译註：这种现象以加尔瓦尼的名字命名为「galvanism」，即「直流电作用」或「流电收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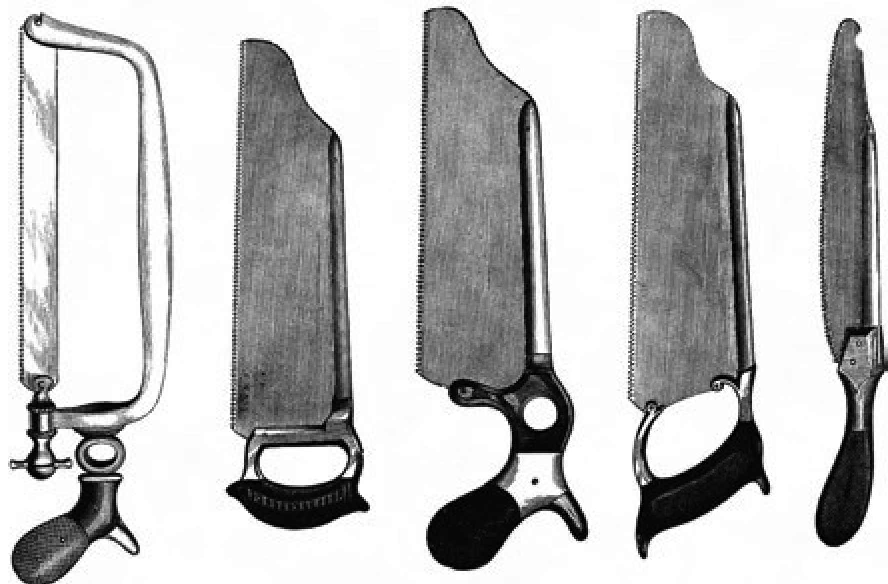
86　译註：皮耶．法兰索瓦．拉斯奈尔（一八○三至一八三六年），法国里昂人，虽因杀人谋财罪被判处死刑，但其布尔乔亚出身及诗人身分使他备受瞩目，并获媒体偏袒。法国文豪波特莱尔（Baudelaire）称他为「现代生活的英雄人物之一」，哲学家傅柯（Foucault）则认为他在巴黎社会中的名气象徵「布尔乔亚浪漫罪犯」这种新型人物的诞生。

87　译註：此处的「人格」是指做为一个人（person）的状态。

88　译註：一八九二年，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杜瓦（James　Dewar）在低温物理学研究中发明了这种储存液化气体的真空夹层容器，被人按其姓氏称为杜瓦瓶。一九○四年，德国膳魔师（Thermos）公司制造第一个商用保温瓶。

89　译註：《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是英国作家玛莉．雪莱（Mary Shelley）出版于一八一八年的小说，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母。玛莉．雪莱是英国文豪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妻子。

别人的头
OTHER PEOPLE'S HEADS



撰写一本关于断头的书，俨然是一种针对它所描述的各种策略所做的练习。个人从未观看过任何人被砍头，也不曾见到刚被斩断的头颅。书本将断头的恐怖收纳在扉页间，就像解剖室中的裹尸布或博物馆中的玻璃柜。这些东西提供了一个外在框架，让我们隔着它检视其中内容，并应许保护我们的人格不受侵害。它为我们制造出安全距离。本书各部分的叙事之间虽然存在无尽的差异，但某种「断离」的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所能释放的力量，却将不同叙事连成一气。

在人头实质断离之前，犯行者和受害者之间经常早已出现假定的社会断离。这种社会断离经常具有种族主义形态，例如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事期间的人头收集，或早期人类学家致力于量度人类头骨差异，都属于这种情形。在某些情况下，种族主义色彩可能强到受害者几乎被视为低等人类。阶级偏见也是类似的道理，这种偏见让最初几代的解剖家能跟贫穷的「病患」保持距离。在这种情况中，穷人被异化的现象使他们的无名尸体比较容易转化成「临床材料」，让医生在医院解剖室中加以肢解。

关于天堂与地狱的宗教信仰形塑出另一种社会距离。这种信仰将某些人−圣人或罪人−置于正常社会的范畴之外，使他们的身体比较适合被肢解。从前罪犯的身体在他们死后被剥夺了保持完整的权利，解剖成为他们所受的永恆惩罚的一环。另一方面，神圣的身体超越所有自然法则，具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它经常会被切成小块，以圣髑的形态散布于凡间。罪犯的身体与圣人的身体被独立出来，以不同于一般人的方式处理。

今天，世人透过一个精心规范的专业匿名体系，打造出一种断离的意识，例如医学院建立的制度把人的身体转化成带有号码的标本，以使检验工作更容易进行。现在的人刻意制造社会距离，做为医学界与选择献出自己的身体供科学研究的人之间，所签立的合约的一部分。

无论是哪种特定状况，通常拿取头颅的人会认为自己跟头颅被他们拿走的人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拿取的目标客体化。我们很容易看出切断人头的行为如何让那个人成为一个特别强有力的客体−某种可以被切开、传递、公开展示的物品−但这种客体化程序经常早在第一刀落下以前就已经展开。换句话说，鲜少有人会切断自己熟识的人的头颅（虽然已知有些解剖家曾经解剖他们的家人或朋友的遗体）。最可能挨刀的对象还是「敌人」、「捐赠者」、「标本」，或神圣人物的「不朽肉身」。这种社会断离的意识很可能在人死以前，就先将他转化为物品。

社会距离经常与物质上的距离并存。切断头颅的行为及其衍生物不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人在街头、家中或处理日常事务时被斩首是极为罕见的事，因为断头行为发生的场所通常与日常活动的空间迥然不同。这种地理上的遥远性可以让犯行者披上替代性的身分、进驻替代性的真实，正常的道德规范因而得以被颠倒。

战场是说明这点的最好实例。二次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岛屿的丛林中犯下残酷暴行的士兵回顾当年经歷时，经常彷佛像在看别人的事。他们会说：「那不是我，我出了意外状况」；不然就是「我忽然就开始胡乱杀人。它就那样发生了，我不知道自己身体里会有那种东西」。异域的风景，以及他们与原有平民生活完全脱节的事实，都有助于维持这种道德秩序的错乱。当一个人处身在不同的世界中，他比较容易成为另外一个人。在这种远离家人和朋友的替代性真实中，当事人被鼓励做出暴力行为，杀人成为受赞赏的事。

在一个由倒置的规范所治理的遥远象限中，新的人格会出现，造成「双重人格」的效应。这种效应也明显反映在处决仪式中。刽子手和受刑犯都从一般社会被区隔出来。死刑台为他们标示出独立的空间，那个特别空间由不同的规则所主宰，而他们在那里为大众祭出一场「表演」。有时受刑者会逾越那道界线，向群众呐喊，或请求他们赦免，但即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也已经永远成为化外之物，命运无法再改变。今天，民众会在网路上观看罪犯斩断被害者的头。观看者的角色受到摄影机的中介，同时摄影机确证影片中发生的事件已经结束，而且是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种切割一方面把观看者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另一方面却也可能促使他们摆脱迟疑、决定观看，或为他们透过观看所实现的参与行为提供藉口。

人类有可能驻居于不同世界但却进行互动，这样的概念或许是支撑殖民主义的背景因素之一，而殖民这件事本身当然是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进行的。像詹姆士．詹姆森这样的人物不仅认为自己在时空上与原住民距离遥远，他们也因为身处遥远异域而觉得获得赋权，可以在那个遥远时空中实验新的人格，而不会受到惩罚。

就医学领域而言，一些在外面的街头会被视为惊世骇俗、踰越伦常的事，关起门来却变成解剖室或手术室中的惯行程序。医疗人员驻居的世界跟一般人也不一样。医学系学生学习的是一种执业所需的「必要性不人道」，在他们完成学业之际，他们经常会反思他们抛在身后的那个遥远而不求理解的行外文化，以及他们如何远远地脱离了原先的身分认同和参考框架。支撑这个新认同的因素之一是专业生活的例行公事。清洗消毒、穿戴手术袍和面具、在关闭的房间中作业，这些都让医生得以

用完全不同于日常的方式行动。

同理，斩首的产物—头颅—经常拥有异于寻常的生存空间。今天，人头不是被保管在博物馆或教堂的玻璃容器中，就是被锁在众人目光所不及之处。我们与它们的互动受到严格行为规范的制约，只有很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能够实际碰触到它们。当根特．冯哈根斯之流的「展示者」决定「拿掉展示框架」，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争议。另一个情况也类似，当战利品头颅或干制首级忽然又出现在居家环境中—例如在许多年后偶然在阁楼或地下室被发现—通常它们的存在会令民众感到不舒服。由于这些物品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扮演任何约定俗成的角色，基本上它们会一直显得「人间失格」。

防腐保存的头颅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这种头颅当年是在死尸无数的地方被创造出来的。环境因素不仅可能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生存象限，那里经常也是活人的生活与死人紧密交织的地方。现在的我们生活在与死人几乎没有交集的世界，但在战场、医学院、医院，乃至博物馆等特殊环境中，死尸却可能比比皆是。当一个人每天目睹死亡—直白说就是看到很多尸体—他会对死亡习以为常。

军人和医学院学生能够以相当惊人的速度，让自己适应面对死亡、甚至必须解剖尸体的处境。人会发现他们有能力差不多像面对任何动物尸体般，切割、撕裂人类遗体，去除上面的皮肉。从医学院学生很少提到任何深刻的个人创伤这个现象看来，解剖尸体的恐怖并不在于一个人有办法对别人的身体做出什么事，而在于他必须做那件事的情境。短兵相接时那种融合恐惧与愤怒的情景，跟医学院学生解剖自愿捐赠者的大体时那种仔细探究的态度或许地别天差，但在这两种情况中，最初令人惊骇的东西却都可能变得平凡无奇。

尽管如此，犯行者在他的行动过程中经常服膺某个更高的权威。那个权威不只为他们处理死尸的行为提供架构，也为他们消除个人责任。教授、士官、法官甚至上帝都可能鼓励、引导或命令别人犯下残暴的行为，而其背后的默契是：这是为了成就某个更高尚的目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社会利益」。一旦那种行为成为某个社会制度的一环，它就不再需要被谴责为个人精神失常的证据。反之，那种行为会被赋与文化价值。这种价值可能具有争议性或令人不安，但它仍旧为我们对一些恐怖事件的态度提供了某种框架。在许多生活领域中，骇人的斩首情景已经成为人类文化脉络，乃至人类集体遗产的一部分。

如此暴力的行为可能引发种类多的惊人的情绪反应。伤心、反感、羞耻是可以预期的感受，但与这些负面反应相呼应的，却经常是亲密和

惊奇的感觉。把一个被截断的头颅握在手中，甚至直接斩断别人的头颅，这可能带来极大的震颤感。拥有别人的头颅可能是一种引人入胜而且深刻动人的经验。那可能是一种尊敬的表现或凌辱的行为，也可能两者皆是。人类总是把断头视为宝贵的资产，因为这些东西几乎从来不会是平凡无奇的物品。无论是做为宗教圣物、伪科学标志物、艺术家的灵感缪思，或士兵的死亡纪念物，无数人类头颅已经被转化成崇敬的载体。尽管斩首会造成创伤—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断头保留了某一部分的活人精神，因此可能触发怜惜、照护的本能。从奥利佛．普兰基特的头颅会发出「甜美的香气」，到二次大战的士兵用帽子和菸斗装饰敌人的骷颅头，别人的头可以成为出人意表的亲暱物品。有些人死后以骷颅头形式享有的社会存在，比他们生前的社交生活更多采多姿。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脉络中，当一个人亲眼面对一颗被切断的头颅，他经常会觉得五味杂陈，各种正面和负面情绪在内心交织冲撞。许多人之所以选择透过幽默感，在自己和那种怪异感觉之间拉开距离，这或许是其中一个理由。这也可能是头颅如此动人心弦的原因之一：头颅会在我们内心激起一种不寻常的纠结情绪。它让我们觉得怪异而不同，而这是它的一部分力量所在。

虽然被切断的头颅经常看起来恐怖而令人难过，而且象徵着极大的人身不公，但它却以复杂而矛盾的方式迫使我们注意它。断头既熟悉又彷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它不断提醒我们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它引领我们探看自己的内在，邀请我们检视自己的人性疆界何在。我们或许不喜欢我们眼前所见，但这件事本身不是转身不看的理由。

志谢

在此我要感谢山姆．艾尔伯蒂（Sam Alberti）、肯恩．阿诺（Ken Arnold）、克里斯．哥斯登（Chris Gosden）、萝拉．皮尔斯（Laura Peers）、艾莉森．佩区（Alison Petch）、艾芙琳．泰兰尼（Evelyn Tehrani）以及珍米．泰兰尼（Jamie Tehrani）阅读本书早期草稿，并赐与宝贵意见。汤玛斯．库奇（Thomas Cucchi）及乌娜．斯特兰德．维达斯多提尔（Una Strand Viðarsdóttir）为我阅读了个别章节。欧菲莉．勒布哈瑟（Ophélie Lebrasseur）及多明尼克．福吉欧尼（Domenico Fulgione）分别为我提供法文及义大利文翻译方面的协助。萝丝．巴奈特（Ross Barnett）是饱含资讯的矿脉。

萝拉．佛格森及乔伊丝．卡特勒–萧（Joyce Cutler-Shaw）与我交流她们身为艺术家的工作经验，艾里斯泰尔．杭特（Alistair Hunter）慷慨提供宝贵时间，协助我了解解剖室的世界。

温蒂．摩尔为这本书开了个头，促成本书诞生，我将永远感谢她。派崔克．瓦尔许（Patrick Walsh）是本书的强力支持者、笔者的良师益友。我也要感谢菲利浦．贵恩．琼斯（Philip Gwyn Jones）、马克思．波特（Max Porter）、安．梅多斯（Anne Meadows）和Granta出版社团队，以及鲍伯．怀尔（Bob Weil）和W. W. Norton出版社团队，谢谢他们在本书创作的所有阶段提供协助、支援及谘询。

蕾秋．图法诺（Rachael Tufano）超乎职责范围，热心提供空间让我安心研究、写作，而且永远笑容满面。我的父母为这整个创作计画付出的精力，实在难以估量。最后，我用满腔的爱和感谢，将本书献给我的丈夫葛雷格。

插图提供来源

图1 剑桥大学席尼．萨塞克斯学院院长及院士。

图2 牛津大学皮特．里佛斯博物馆。

图3 伦敦威尔康图书馆。

图4 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物件编号072837。

图5 劳夫．摩尔斯（Ralph Morse）摄影。时代生活摄影（Time Life Pictures）/盖提影像（Getty Images）。

图6 劳夫．克雷恩（Ralph Crane）摄影。时代生活摄影/盖提影像。

图7 侯杰-维欧雷（Roger-Viollet）影像公司/影像工厂（The Images Works）。

图8 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Musée Carnavalet），吉洛东（Giraudon）艺术影像/布里吉曼艺术图书馆（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图9 法国国家图书馆。

图10 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立博物馆。

图11 达米恩．赫斯特与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版权所有DACS 2014。

图12 乔伊丝．卡特勒-萧。

图13 德罗赫达圣彼得教堂。

图14 兰西尼影像公司（Foto LENSINI）/锡耶纳圣多明我大教堂。

图15 苏黎世瑞士国家博物馆。典藏编号NEG 33904。

图16 《伊普斯威治星报》（The Ipswich Star）/雅昌特萨福克（Archant Suffolk）新闻影像。

图17 伦敦威尔康图书馆。

图18 乔治．怀尔德曼（George Wildman）摄影，二○○九年。费城穆特博物馆医师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图19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杭特博物馆（Hunterian Museum）。

图20 史蒂芬．米尼柯拉（Steven Minicola），宾州大学。

图21 摄影典藏：密里安及瓦拉克（Miriam and Ira D. Wallach）艺术处；印制图像及摄影作品部：纽约公共图书馆，阿斯特（Astor）、雷诺克斯（Lenox）及提尔登（Tilden）基金会。

图22 伦敦威尔康图书馆。

图23 伦敦威尔康图书馆。

图24 乔安妮．蜜勒（Johanne Miller）。

图25 伦敦威尔康图书馆。

图26 雪拉．泰利（Sheila Terry）/科学影像图书馆（Science Photo Library）。

图27 穆瑞．巴勒德（Murray Ballard）。

资料来源

这本书是一部综合性着作，仰仗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我要谢谢他们每一个人。由于这本书旨在提供通俗的撰述，我在本文中尽量不援引人名。详细註释请参考www.franceslarson.com/Severed。在此我要特别提下列学者的贡献：赛门．哈里逊、保罗．弗利德兰、妮娜．阿塔纳梭格鲁−卡尔麦尔（Nina Athanassoglou-Kallmyer）、丹尼尔．阿拉斯、柯林．迪奇（Colin Dickey）、海伦．麦克唐纳（Helen MacDonald）、玛丽．罗契（Mary Roach）以及芭比．泽利瑟。以下按章节及主题列出完整书目，首先是依据作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作品，然后是作者不详的作品，按标题排列，最后是未出版手稿及／或网站名称。

序幕：克伦威尔的头

C. Donovan, ‘On the Reputed Head of Oliver Cromwell’, Phrenological Journal, vol. 17, 1844, pp. 365-378.

Jonathan Fitzgibbons, Cromwell’s Head, Kew: National Archives, 2008.

Henry Howarth, ‘The Embalmed Head of Oliver Cromwell’,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911, pp. 237-253.

Karl Pearson and G.M. Morant, ‘The Wilkinson Head of Oliver Cromwell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Busts, Masks and Painted Portraits’, Biometrika, vol. 26, no. 3, 1934, pp. 1-116.

Sarah Tarlow, ‘The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Oliver Cromwell’s Head’, in D. Boric and J. Robb (eds.), Past Bodies: Body-Centred Research in Archaeology, Oxford: Oxbow, 2008.

引言：令人难以抗拒的头颅

Lesley Aiello and Christopher Dean,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volutionary Anatomy,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0.

Daniel Arasse (trans. Christopher Miller), 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9.

Sean Coughlan, ‘Museum offered head for shrinking’, BBC News website, 22 May 2007. http://news.bbc.co.uk/1/hi/6679697.stm

Basiro Davey, Tim Halliday and Mark Hirst (eds.), Human Biology and Health: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Graeme Fife, The Terror: The 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France 1792-1794, London: Portrait, 2004.

Antonia Fraser, Mary Queen of Scots, London: Mandarin Paperbacks, 1989 (1969).

Anna Gosline, ‘How does it feel to die?’ New Scientist, no. 2625, 13 October 2007.

Elizabeth Hallam, ‘Articulating Bones: An Epilogue’,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vol. 15, no. 4, 2010, pp. 465-492.

Daniel E. Liber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Hea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ichael Marshall, ‘Death Rattle of a Decapitated Brain’, New Scientist, no. 2799, 9 February 2011.

Laura Peers, ‘On the Treatment of Dead Enemies: Indigenous Human Remains in Britain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Helen Lambert and Maryon McDonald (eds.), Social Bodies,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9.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cranial collections is taken from a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ites to the University Hebdomadal Council, 3 March 1939, p. 103, held by Oxford University archives, reference UR 6/PRM/1, file 1.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cranial collectio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British Museu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一章：干制首级

皮特．里佛斯博物馆的干制首级

Coughlan, ‘Museum offered head’, 2007, op. cit.

Andrew Ffrench, ‘Should shrunken heads stay in museum?’, Oxford Times, 14 February 2007.

Melanie Giles, ‘Iron Age Bog Bodies of North-Western Europe. Representing the Dead’,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vol. 16, no. 1, 2009, pp. 75-101.

Laura Peers, Shrunken Heads, Pitt Rivers Museum information leaflet, 2011.

Laura Peers, ‘Considerations for the display of shrunken heads’, unpublished report for the Pitt Rivers Museum, 2009.

Kate White, ‘Museums and Ethical Trade’, Journal of Museum Ethnography, vol. 13, pp. 37-47.

See also the Pitt Rivers Museum website at www.prm.ox.ac.uk and the online catalogue at www.prm.ox.ac.uk/databases.html

The accession numbers of the Shuar shrunken human heads at the Pitt Rivers Museum are: 1884.115.2, 1911.77.1, 1932.32.92, 1923.88.363, 1936.53.42 and 1936.53.43. The accession numbers of the shrunken animal heads at the Pitt Rivers Museum are: 1884.115.1, 1923.88.364, 1936.53.44 and 1936.53.45.

舒阿尔人的猎头文化

Jane Bennett Ross, ‘Effects of Contact on Revenge Hostilities Among the Achuarä Jívaro’, in Brian R. Ferguson (ed.), Warfa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Academic, 1984, pp. 83-124.

Michael J. Harner, The Jívaro: People of the Sacred Waterfalls, London: Robert Hale and Company, 1972.

Michael J. Harner, ‘Shrunken Heads: Tsantsa Trophies and Human Exotica by James L. Castner (book review)’,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s., vol. 107, no. 1, 2005, pp. 144-145.

Rafael Karsten, The Head-Hunters of Western Amazonas: The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Jibaro Indians of Eastern Ecuador and Peru, Helsingfors: 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1935.

Steven Lee Rubenstein, ‘Circulation, Accumulation, and the Power

of the Shuar Shrunken Head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2, no. 3, 2007, pp. 357-399.

Steven Lee Rubenstein, 'Migrants and Shrunken Heads Face to Face in a New York Museum',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0, no. 3, 2004, pp. 15-18.

Daniel Steel, 'Trade Goods and Jívaro Warfare: The Shuar 1850-1957, and the Achuar, 1940-1978', Ethnohistory, vol. 46, no. 4, 1999, pp. 745-776.

F.W. Up de Graff, Head Hunters of the Amazon: Seven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Adventure, New York: Duffield and Company, 1923.

毛利人的猎头文化

J.B. Donne, 'Maori Heads and European Taste', RAIN, no. 11, 1975, pp. 5-6.

Joseph D. Hooker (ed.), Journal of the Right Hon. Sir Joseph Banks Bart., K.B., P.R.S.: During Captain Cook's First Voyage in HMS Endeavour in 1768-71 to Terra Del Fuego, Otahite, New Zealand, Australia, the Dutch East Indies, E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6 (2011).

Wayne D. Orchiston, 'Preserved Human Heads of the New Zealand Maoris',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vol. 76, no. 3, 1967, pp. 297-329.

Wayne D. Orchiston, 'Preserved Maori Heads and Captain Cook's Three Voyages to the South Seas: A Study in Ethnohistory', Anthropos, 1978, pp. 798-816.

H.G. Robley, Moko; or Maori Tattooing, London: Chapman Hall, 1896.

科学界的头颅收集及其遗留影响

Joseph Barnard Davis, 'Preserving Specimens', in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874, p. 142.

John Beddoe, 'Constitution of Man: Form and Size', in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874, p. 4.

Vicki Cassman, Nancy Odegaard and Joseph Powell (eds), Human Remains: Guide for Museum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ltamira Press, 2008.

John George Garson and Charles Hercules Read (eds.),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2nd ed., London: Harrison and Sons, 1892, p. 5.

Liz White, Giving up the Dead? The Impact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Human Tissue Act and the Guidance for the Care of Human Remains in Museums, doctoral thesi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ultural and Heritage Studies, Newcastle University, 2011.

The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Human Remains, London: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3.

Early additions to the Pitt Rivers Museum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issues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 vol. XX, no. 677, 13 May 1890, p. 397; vol. XXIV (supplement), no. 806, 12 June 1894, p. 575; vol. XVI, no. 558, 22 June 1886, p. 635.

Cambridge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online catalogue, http://maa.cam.ac.uk/maa/category/collections-2/catalogue. Artefact accession numbers: Z6854, E 1893.149, Z 11206, Z 11207, Z 11208 1916.20, Z 7086, 1886.66.

詹姆士．詹姆森丑闻案

Raymond Corbey, ‘Ethnographic Showcases, 1870-1930’,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8, no. 3, 1993, pp. 338-369.

Felix Driver, ‘Henry Morton Stanley and His Critics: Geography, Exploration and Empire’, Past & Present, no. 133, 1991, pp. 134-166.

Laura Franey, ‘Ethnographic Collecting and Travel: Blurring Boundaries, Forming a Discipline’,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29, no. 1, 2001, pp. 219-239.

Roslyn Poignant, Professional Savages: Captive Lives and Western

Spectacl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 Richardson, ‘James S. Jameson and Heart of Darkness’, Notes and Queries, vol. 40, no. 1, 1993, pp. 64-66.

Sadiah Qureshi, Peoples on Parade: Exhibitions, Empire and Anthrop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The late Mr. Jameson’s trophies of travel’, The Times, 29 November 1888, p. 8.

《泰晤士报》读者投书

Assad Farran, ‘Our life at Yambuya Camp, in Africa, from June 22, 1887, to June 8, 1888’, The Times, 14 November 1890, p. 9.

C.G.,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19 November 1890, p. 4.

Percy White,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he Times, 19 November 1890, p. 4.

‘Mr. Bonny and the cannibal story’, The Times, 14 November 1890, p. 10.

‘Mr. Jameson’s own story’, The Times, 15 November 1890, p. 11.

艾弗瑞德．寇特．哈顿、查尔斯．荷兹和太平洋的收藏品

A.C. Haddon, ‘Stuffed Human Heads from New Guinea’, Man, vol. 23, 1923, pp. 36-39.

A.C. Haddon, Head-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 London: Methuen & Co., 1901.

Charles Hose, Fifty Years of Romance and Research in Borne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27).

Mercedes Okumura and Yun Ysi Siew, ‘An Osteological Study of Trophy Heads: Unveiling the Headhunting Practice in Borne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vol. 23, 2011, pp. 685-697.

Robert Pringle, Rajahs and Rebels: The Ibans of Sarawak Under

Brooke Rule, London: Macmillan, 1970.

J. H. Walker, Power and Prowess: The Origins of the Brooke Kingship in Sarawa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东南亚地区民众对外国猎头者的观感

R. H. Barnes, ‘Construction Sacrifice, Kidnapping and Head-Hunting Rumors on Flores and Elsewhere in Indonesia’, Oceania, vol. 64, no. 2, 1993, pp. 146-158.

Richard Allen Drake, ‘Construction Sacrifice and Kidnapping Rumor Panics in Borneo’, Oceania, vol. 59, no. 4, 1989, pp. 269-279.

Maribeth Erb, ‘Construction Sacrifice, Rumors and Kidnapping Scares in Manggarai: Further Notes from Flores’, Oceania, vol. 62, no. 2, 1991, pp. 114-126.

Gregory Forth, ‘Construction Sacrifice and Head-Hunting Rumors in Central Flores (Eastern Indonesia): A Comparative Note’, Oceania, vol. 61, no. 3, 1991, pp. 257-266.

Gregory Forth, ‘Heads under Bridges or in Mud: Reflections on a Southeast Asian “Diving Rumor”’,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5, no. 6, 2009, pp. 3-6.

Janet Hoskins, ‘On Losing and Getting a Head: Warfare, Exchange and Alliance in a Changing Sumba, 1888-1988’,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6, no. 3, 1989, pp. 419-440.

Janet Hoskins, ‘Predatory Voyeurs: Tourists and “Tribal Violence” in Remote Indone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9, no. 4, 2002, pp. 797-828.

第二章：战利品首级

二次大战期间婆罗洲的猎头行为

Judith M. Hiemann, The Most Offending Soul Alive: Tom Harrisson and His Remarkable Lif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Gavin Long,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39-1945, Series One: Army,

Volume 7: the Final Campaigns, Canberra: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963, p. 490.

Malcolm MacDonald, Borneo Peopl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6.

James Ritchie, The Life Story of Temenggong Koh, 1870-1956, Sarawak: Kaca Holdings, 1999.

Jim Truscott, Voices from Borneo: The Japanese War,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clarsys.com.au/jt

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及战利品夺取：日记及回忆录

Richard Aldrich, The Faraway War: Personal Diar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Doubleday, 2005.

James J.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1942-45: The Secret Diary of an American Soldier, New York: First Mariner Books, 2003 (1963).

Arthur Goodfriend, The Jap Solder, Washington, DC: Infantry Journal, 1943.

John Hersey, Into the Vall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Sy M. Kahn, Between the Tedium and the Terror: A Soldier's World War II Diary, 1943-45,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Dean Ladd and Steven Weingartner, Faithful Warriors: A Combat Marine Remembers the Pacific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Thomas J. Larson, Hell's Kitchen Tulagi 1942-1943, Lincoln, NE: iUniverse, 2003.

Charles A. Lindbergh, The Wartime Journals of Charles A. Lindberg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Mack Morriss, South Pacific Diary 1942-1943,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Bruce M. Petty, Saipan: Oral Histories of the Pacific War,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2009.

E. B.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London: Ebury Press, 2010 (1981).

‘Hunting License Issued by U.S. Marines’, New York Times, 1 April 1942, p. 8.

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及战利品夺取：歷史分析

Joanna Bourke,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Face to Face Killing in Twentieth-Century Warfare,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Ben Cosgrove, ‘Life Behind the Picture: “Skull on a Tank”, Guadalcanal, 1942’, Life magazine online.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Paul Fussell, Wartime: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u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Jonathan Glover, Humanity: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imon Harrison, ‘Skull Trophies of the Pacific War: Transgressive Objects of Remembra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vol. 12, 2006, pp. 817-836.

Simon Harrison, ‘War Mementos and the Souls of Missing Soldiers: Returning Effects of the Battlefield Dead’,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n.s., vol. 14, 2008, pp. 774-790.

Simon Harrison, ‘Skulls and Scientific Collecting in the Victorian military: Keeping the Enemy Dead in British Frontier Warfa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0, no. 1, pp. 285-303.

Simon Harrison, ‘Bones in the Rebel Lady’s Boudoir: Ethnology, Race and Trophy-Hunting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vol. 15, no. 4, 2010, pp. 385-401.

Simon Harrison, Dark Trophies: Hunting and the Enemy Body in Modern War,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2.

M. Johnston, Fighting the Enemy: Australian Soldiers and Their Adversaries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Yuki Tanaka, 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James J. Weingartner, 'Trophies of War: US Troops and the Mutilation of Japanese War Dead, 1941-1945',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1, no. 1, 1992, pp. 53-67.

James J. Weingartner, 'War Against Subhumans: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German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merican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Historian, vol. 58, no. 3, 2007, pp. 557-573.

The Pacific War Online Encyclopedia at http://pwencycl.kgbudge.com

《生活》杂志每週照片丑闻

Weingartner, 'Trophies of War', 1992, op. cit.

'Letters to the Editors', Life, 12 June 1944, p. 6.

'Picture of the Week', Life, 22 May 1944, pp. 34-35.

越南

James Adams, interviewed in Mark Lane,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0.

Arthur E. 'Gene' Woodley, Jr., interviewed in Wallace Terry, Blood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by Black Vetera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二次大战战利品首级的鑑识研究

W.M. Bass, 'The Occurrence of Japanese Trophy Sku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vol. 28, no. 3, July 1983, pp. 800-803.

Simon Harrison, 'Skull Trophies', 2006, op. cit. Paul S. Sledzik and Stephen Ousley, 'Analysis of Six Vietnamese Trophy Skulls',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vol. 36, no. 2, 1991, pp. 520-530.

第三章：人头落地

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期间的斩首影片

Lisa J. Campbell, ‘The Use of Beheadings by Fundamentalist Islam’, Global Crime, vol. 7, nos. 3-4, 2006, pp. 583-614.

Deborah Fallows and Lee Rainie, ‘The Internet as a Unique News Source’,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8 July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pewinternet.org/Reports/2004/Internet-as-Unique-News-Source.aspx

Martin Harrow, ‘Video-Recorded Decapitations - A Seemingly Perfect Terrorist Tactic that Did Not Spread’,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Copenhagen, 2011.

Ronald H. Jones, ‘Terrorist Beheadings: Cultur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report, US Army War College, Carlisle, PA, June 2005.

Evan Maloney, The Brain-Terminal.com blog, at www.spectacle.org/0604/evan.html

Jay Rosen, Pressthink blog, at archive.pressthink.org/2004/05/16/berg_video_p.html

Lynn Smith, ‘Web Amplifies Message of Primitive Executions’, Los Angeles Times, 30 June 2004.

Duncan Walker, ‘Who watches murder videos?’, BBC News Online Magazine, 12 October 2004. http://news.bbc.co.uk/1/hi/magazine/3733996.stm

Gabriel Weimann, Terror on the Internet: The New Arena, the New Challeng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Barbie Zelizer, About to Die: How News Images Move the 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Beheading videos fascinate public’, Washington Times, 18

October 2004.

'Italian hostage "defied killers",' BBC News website, 15 April 2004.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3628977.stm

Nick Berg top ten search terms are listed at http://pjmedia.com/instapundit/ 45844/

关于国家处决现场观众的歷史研究

Paul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The Age of Spectacular Capital Punishment in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V. A. C. Gatrell, The Hanging Tree: Execu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 1770-186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David Johnston, 'Ashcroft calls seeing McVeigh die a way to help victim's kin', New York Times, 13 April 2001.

Sara Rimer, 'A City Consumed in Plans for McVeigh's Execution', New York Times, 19 April 2001.

Robert Shoemaker, 'Streets of Shame? The Crowd and Public Punishments in London 1700-1820', in S. Devereaux and P. Griffiths (eds.), Penal Practice and Culture, 1500-1900: Punishing the English, Palgrave, 2004, pp. 232-257.

Christopher Wren, 'McVeigh is executed for Oklahoma City bombing', New York Times, 11 June 2001.

Jim Yardley, 'The McVeigh execution: Oklahoma City; execution on TV brings little solace', New York Times, 12 June 2001.

中世纪的处决及叛国者的头颅

Andrew Fisher, 'Wallace, Sir William (d. 1305)',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8544

Clark Hulse, 'Dead Man's Treasure: The cult of Thomas More', in David Lee Miller, Sharon O'Dair and Harold Weber (eds.), The Production of English Renaissance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90-225.

Patricia Pierce, Old London Bridge: The Story of the Longest Inhabited Bridge in Europe, London: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2001.

Katherine Royer, ‘The Body in Parts: Reading the Execution Ritual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 vol. 29, no. 2, 2003, pp. 319-339.

Richard Thomson, Chronicles of London Bridge by An Antiquary,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27.

Alexandra Walsham, ‘Skeletons in the Cupboard: Relics after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ast and Present, supplement 5, 2010, pp. 121-143.

Danielle Westerhof, ‘D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on the Scaffold: The Execution of Hugh Despenser the Younger, 1326’,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33, 2007, pp. 87-106.

Barbara Wilson and Frances Mee, The City Walls and Castles of York: The Pictorial Evidence, York: 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 2005.

法兰西斯．唐恩利的头颅

Leo Gooch, ‘Towneley, Francis (1709-1746)’,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line edition, May 2006.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7603

Katharine Grant, ‘Uncle Frank’s Severed Head’, Guardian, 25 January 2014.

The story of Towneley’s head at Drummond’s bank is also reported online at http://www.1745association.org.uk/a_day_out_in_london.htm

刽子手

Richard van Dülmen, Theatre of Horro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0.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2012, op. cit.

Gatrell, The Hanging Tree, 1994, op. cit.

Peter Spierenburg, The Spectacle of Suffering: Exec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Repression: From a Preindustrial Metropolis to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断头台

Arasse, The Guillotine, 1989, op. cit.

Fife, The Terror, 2004, op. cit.

Friedland, Seeing Justice Done, 2012, op. cit.

Daniel Gerould, The Guillotine: Its Legend and Lore, New York: Blast Books, 1992.

Regina Janes, Losing Our Heads: Beheading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Allister Kershaw, A History of the Guillotine,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93.

Camille Naish, Death Comes to the Maiden: Sex and Execution 1431-1933, London: Routledge, 1991.

脸书及斩首影片

Adam Withnall, ‘David Cameron calls Facebook “irresponsible” for allowing users to upload decapitation videos’, Independent, 22 October 2013.

Adam Withnall, ‘Facebook removes beheading video after David Cameron comments’, Independent, 23 October 2013.

‘Cruelty and the crowd: beheading videos on Facebook’, Guardian, editorial, 22 October 2013.

第四章：画框里的头颅

马克．奎恩

Mark Brown, ‘Artist’s frozen sculpture goes on show’, Guardian, 10 September 2009.

Priscilla Frank, ‘Marc Quinn discusses self-portraits made of his own blood’, Huffington Post, 6 August 2012.

Alfred Hickling, ‘Marc Quinn’s bloody beauty’, Guardian, 1 February 2002.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Shows Marc Quinn’s Frozen “Blood Head”’,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ews release, 10 September 2009, at http://www.npg.org.uk/about/press/marc-quinn-press.php

Wellcome Trust, ‘Big Picture: Question and Answer with Marc Quinn’, interviewed by Chrissie Giles, at www.bigpictureeducation.com/marcquinn-interview

死亡面具

Iris I. J. M. Gibson, ‘Death Masks Unlimited’,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Clinical Research Edition), vol. 291, no. 6511, 1985, pp. 1785-1787.

M. H. Kaufman and Robert McNeil, ‘Death Masks and Life Masks at Edinburgh Universit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98, no. 6672, 1989, pp. 506-507.

摄影及社会「类型」的创造

Arasse, The Guillotine, 1989, op. cit.

Elizabeth Edwards, ‘Introduction’, in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17.

Christopher Pinney, ‘The Parallel Histories of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in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4-95.

Roslyn Poignant, ‘Surveying the Field of View: The Making of the RAI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in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2-73.

Joanna C. Scherer, ‘The Photographic Document: Photographs as Primary Data in Anthropological Enquiry’, in Elizabeth Edwards (ed.),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2-41.

莎乐美、友弟德，以及艺术作品中的斩首想像

Andrew Graham-Dixon, Caravaggio: A Life Sacred and Profan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0.

Udo Kultermann, ‘The “Dance of the Seven Veils”: Salome and Erotic Culture Around 1900’, Artibus et Historiae, vol. 27, no. 53, 2006, pp. 187-215.

Karen Kurczynski, ‘Edvard Munch: The Modern Life of the Soul’, Nineteenth Century Art Worldwide, vol. 5, no. 2, 2006.

Linda Nochlin, The Body in Pieces: The Fragment as a Metaphor of Modernity,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4.

Patricia Phillippy, Painting Women: Cosmetics, Canvases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Nanette B. Rodney, ‘Salom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n.s., vol. 11, no. 7, 1953, pp. 190-200.

Nadine Sine, ‘Cases of Mistaken Identity: Salome and Judith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1, 1988, pp. 9-29.

西奥多．杰利柯

Nina Athanassoglou-Kallmyer, ‘Géricault’s Severed Heads and Limbs: 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the Scaffold’, Art Bulletin, vol. 74, no. 4, 1992, pp. 599-618.

Nina Athanassoglou-Kallmyer, Théodore Géricault, London: Phaidon Press, 2010.

Klaus Berger, Géricault and His Work, New York: Hacker Art Books, 1978.

Charles Clément, Géricault étude biographique et critique avec le catalogue raisonné de l’oeuvre du maitre, Paris: Didier, 1868.

Lorenz Eitner, Géricault’s Raft of the Medusa, London: Phaidon

Press, 1972.

Lorenz Eitner, Géricault: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Orbis Publishing, 1982.

Stefan Germer, ‘Pleasurable Fear: Géricault and Uncanny Trends at the Ope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t History, vol. 22, no. 2, 1999, pp. 159-183.

Marie-Hélène Huet, ‘The Face of Disaster’, Yale French Studies, no. 111, 2007, pp. 7-31.

Christopher Kool-Want, ‘Changing of the Guard’, Art History, vol. 22, no. 2, 1999, pp. 295-300.

Jonathan Miles, Medusa: The Shipwreck, the Scandal, the Masterpiece, London: Pimlico, 2007.

Vanessa R. Shwartz, Spectacular Realities: Early Mass Culture in Fin-de-Siècle Pa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uguste Raffet is quoted in an unsigned article (possibly by P. Burty) in Gazette des Beaux-Arts, vol. 6, 1860, p. 314.

达米恩．赫斯特

Nick Clark, ‘Dead serious? Photo of Damien Hirst with severed head riles Richard III academics’, Independent, 12 July 2013.

Damien Hirst and Gorden Burn, On the Way to Work,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1.

‘Transcript of interviews: Damien Hirst 360 private view’, Channel 4, 2012, at www.channel4.com/microsites/H/hirst/transcripts.pdf

艺术、人体结构及解剖室

Patricia M.A. Archer, ‘A History of the Medical Artists’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 1949-1997’, PhD thesi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998.

Lucy Bruell, ‘The Artist in the Anatomy Lab’, interview with Laura Ferguson on the Literature, Arts and Medicine Blog at New York

University, 2012, http://medhum.med.nyu.edu/blog

Joyce Cutler-Shaw, ‘The Anatomy Lesson: The Body, Technology and Empathy’, Leonardo, vol. 27, no. 1, 1994, pp. 29-38.

Michael Malone, ‘Abandon’, Agora: Medical Student Literary Arts Magazine, Spring 2010, p. 24.

Johanna Shapiro et al., ‘The Use of Creative Projects in a Gross Anatomy Class’, Journal for Learning through the Arts, vol. 2, no. 1, 2006, pp. 1-29.

Leonardo da Vinci (trans. Charles D. O’Malley and J.B. de C.M. Saunders), Leonardo on the Human Bod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3.

Louise Younie, ‘Art in Medic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Dialogue Case Study’, in Victoria Bates, Alan Bleakley and Sam Goodman (eds.), Medicine, Health and the Arts: Approaches to the Medical Human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85-103.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with Laura Ferguson and Joyce Cutler-Shaw.

杜莎夫人

Étienne-Jean Delécluze, Louis David, son école et son temps, Paris: Didier, 1855.

Pamela Pilbeam, Madame Tussaud and the History of Waxworks, London: Hambledon and London, 2003.

Madame Tussaud (edited by Francis Hervé), Memoirs 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Lea and Blanchard, 1839.

第五章：力量强大的头颅

圣奥利佛．普兰基特的头颅

Francis Donnelly, ‘New Shrine in Honour of St. Oliver Plunkett’, Seanchas Ardmhacha: Journal of the Armagh Diocesan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7, no. 1 (1996-97), pp. 244-247.

Tomás Ó Fiaich, Oliver Plunkett: Ireland's New Saint, Dublin: Veritas Publications, 1975.

Desmond Forristal, Oliver Plunkett in His Own Words, Dublin: Veritas Publications, 1975.

Siobhán Kilfeather, 'Oliver Plunkett's Head', Textual Practice, vol. 16, no. 2, pp. 229-248.

Deidre Matthews, Oliver of Armagh. Life of Blessed Oliver Plunkett, Archbishop of Armagh, Dublin: M.H. Gill and Son, 1961.

John Francis Stokes, Life of Blessed Oliver Plunkett, Archbishop of Armagh, 1625-1681, Dubli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of Ireland, 1954.

Sarah Tarlow, 'Cromwell and Plunkett: Two Early Modern Heads called Oliver', in Mary Ann Lyons and James Kelly (eds.), Death and Dying in Ireland, Britain and Europ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2013, pp. 59-76.

Visitor reactions to the relic can be found on www.tripadvisor.co.uk

圣艾德蒙及布莱恩．勃鲁的不腐化尸体及头颅

Caroline Walker Bynum,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200-133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rk Faulkner, 2012, '"Like a Virgin": The Reheading of St. Edmund and Monastic Reform in Late-Tenth-Century England', in Larissa Tracy and Jeff Massey (eds.), Heads Will Roll: Decapitation in th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Imagination,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p. 39-52.

锡耶纳圣加大利纳的头颅

Gerald A. Parsons, 'From Nationalism to Internationalism: Civil Religion and the Festival of Saint Catherine of Siena, 1940-2003',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vol. 46, no. 4, 2004, pp. 861-885.

Gerald A. Parsons, The Cult of Saint Catherine of Siena: A Study in Civil Religion,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8.

捧头圣人、圣物匣，以及波维的圣儒斯特

Barbara Drake Boehm, ‘Body-Part Reliquaries: The State of Research’, Gesta, vol. 36, no. 1, 1997, pp. 8-19.

Bynum,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1995, op. cit.

Caroline Walker Bynum and Paula Gerson, ‘Body-Part Reliquaries and Body Parts in the Middle Ages’, Gesta, vol. 36, no. 1, 1997, pp. 3-7.

Hulse, ‘Dead Man’s Treasure’, 1994, op. cit.

Scott B. Montgomery, ‘Mittite capud meum . . . ad matrem meam ut osculetur eum: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the Reliquary Bust of Saint Just’, Gesta, vol. 36, no. 1, 1997, pp. 48-64.

被斩首的罪犯以及人类头骨和头颅的治疗力量

Ken Arnold, Cabinets for the Curious: Looking Back at Early English Museums, Aldershot: Ashgate, 2006.

Karl H. Dannenfeldt, ‘Egyptian Mumia: The Sixteenth-Century Experience and Debat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16, no. 2, 1985, pp. 163-180.

Karen Gordon-Grube, ‘Anthropophagy in post-Renaissance Europe: The Tradition of Medicinal Cannibal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s., vol. 90, no. 2, 1988, pp. 405-409.

Karen Gordon-Grube, ‘Evidence of Medicinal Cannibalism in Puritan New England: “Mummy” and Related Remedies in Edward Taylor’s “Dispensatory”’,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28, no. 3, 1993, pp. 185-221.

P. Modenesi, ‘Skull Lichens: A Curious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hytotherapy’, Fitoterapia, vol. 80, 2009, pp. 145-148.

Louise Noble, ‘“And Make Two Pasties of Your Shameful Heads”: Medicinal Cannibalism and Healing the Body Politic in “Titus Andronicus”’,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 70, no. 3, 2003, pp. 677-708.

Mabel Peacock, ‘Executed Criminals and Folk-Medicine’, Folklore, vol. 7, no. 3, 1896, pp. 268-283.

墓园、纳骨室及死人尸体的力量

Philippe Aries (trans. Helen Weaver), The Hour of Our Dea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1981).

Bynum,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1995, op. cit.

Paul Koudounaris, Empire of Death: A Cultural History of Ossuaries and Charnel Hous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11.

Ruth Richardson, Death, Dissection and the Destitute,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988).

圣约翰．费雪的头颅

Richard Hall,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Renowned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 Who was Beheaded on Tower-Hill on 22d of June, 1535, London: P. Meighan, 1655.

John Timbs, Romance of London: Strange Stories, Scenes and Remarkable Persons of the Great Town,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65.

赛门．萨德伯里的头颅

Adrienne Barker, Simon of Sudbury: Slaughter of a Saint? MSc thesis, University of Dundee, 2011.

Simon Walker, ‘Sudbury, Simon (c.1316-1381)’,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ition, January 2013.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6759

W. L. Warren, ‘A Reappraisal of Simon Sudbury, Bishop of London (1361-75) and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375-81)’,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10, no. 2, 1959, pp. 139-152.

列宁的防腐遗体

Katherine Verdery, 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莫札特、贝多芬及舒伯特的头骨

Peter J. Davies, Mozart in Person: His Character and Health,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9.

Colin Dickey, Cranioklepty: Grave Robbing and the Search for Genius, Columbia, MO: Unbridled Books, 2009.

汤玛斯．布朗的头颅

M. L. Tildesley, ‘Sir Thomas Browne: His Skull, Portraits, and Ancestry’, Biometrika, vol. 15, no. 1/2, 1923, pp. 1-76.

Charles Williams, ‘The Skull of Sir Thomas Browne’, Notes and Queries, 6 October 1894, pp. 269-270.

第六章：骷颅头

海顿的头颅

Dickey, Cranioklepty, 2009, op. cit.

Karl Geiringer, Haydn: A Creative Life in Mus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1946).

法兰兹．约瑟夫．嘉尔及颅相学

Fay Bound Alberti, Matters of the Heart: History, Medicine, and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ger Cooter,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Popular Science: Phrenolog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ns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James De Ville, Outlines of Phrenology, as an Accompaniment to the Phrenological Bust, London, 1824.

Charles Gibbon, The Life of George Combe, Author of “The Constitution of Man”,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8.

David Stack, Queen Victoria’s Skull: George Combe and the Mid-Victorian Mind,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8.

Madeleine B. Stern, Heads and Headliners: The Phrenological

Fowler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1.

John van Wyhe, ‘The Authority of Human Nature: The Schädellehre of Franz Joseph Gall’,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35, 2002, pp. 17-42.

John van Wyhe, Phrenology and the Origins of Victorian Scientific Naturalism Aldershot: Ashgate, 2004.

颅骨测量

Joseph Barnard Davis and John Thurnam, Crania Britannica: Delineation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Skulls of the Aboriginal and Early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Islands: With Notices of Their Other Remains, vol. 1, printed for the subscribers, London, 1865.

Thomas Hodgkin, ‘The Progress of Ethnology’, 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 1848, pp. 27-45.

Lucile E. Hoyme, ‘Phys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Instruments: An Historical Study’,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9, no. 4, 1953, pp. 408-430.

James Hunt, ‘Introductory Address on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Review 1, 1863, pp. 1-20.

Paul Jorion, ‘The Downfall of the Skull’, RAIN, no. 48, 1982, pp. 8-11.

James Aitken Meigs, ‘Hints to Craniographers’,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 vol. 10, 1858, pp. 1-6.

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A Manual of Ethnological Inquiry’, 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3, 1854, pp. 193-208.

早期颅骨收藏

E. H. Ackerknecht and H. V. Vallois, Franz Joseph Gall, Inventor of Phrenology and His Colle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edical School, 1956.

Samuel J. M. M. Alberti, Morbid Curiosities: Medical Museum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trans. Thomas Bendyshe), The Anthropological Treatises of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1865, Boston: Longwood Press, 1978.

Nélia Dias,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Collections of Skulls and the Cult of Bones’, Nuncius, vol. 27, 2012, pp. 330-347.

Sara K. Keckeisen, The Grinning Wall: History, Exhib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Hyrtl Skull Collection at the Mütter Museum, MA thesis, Seton Hall University, 2012.

Meigs, ‘Hints to Craniographers’, 1858, op. cit.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 London: Bantam Press, 2005.

萨谬尔．乔治．摩顿

Barnard Davis and Thurnam, Crania Britannica, 1865, op. cit.

Ann Fabian, The Skull Collectors: Race, Science and America’s Unburied Dea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2nd ed.,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1981.

S. G. Morton, Crania Americana: Or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kulls of Various Aboriginal Nations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1839.

S. G. Morton, Crania Aegyptiaca: or, Observations on Egyptian Ethnography, Derived from Anatomy, History and Monuments, Philadelphia: J. Penington, 1844.

S.G. Morton, Catalogue of Skulls of Man and the Inferior Animals, in the Collection of Samuel George Morton, Philadelphia: Merrihew and Thompson, 1849.

The Open Research Scan Archive website at http://plum.museum.upenn.edu/~orsa/Specimens.html

约瑟夫．巴纳尔．戴维斯

Barnard Davis and Thurnam, Crania Britannica, 1865, op. cit.

Joseph Barnard Davis, Thesaurus Craniorum. Catalogue of the Skulls of the Various Races of Man, in the Collection of Joseph Barnard Davis, printed for the subscribers, London, 1867.

John Beddoe, Memories of Eighty Years, Bristol: Arrowsmith, 1910.

'Joseph Barnard Davis, M.D., F.R.S., Hanle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1, no. 1066, 1881, p. 901.

'The Barnard Davis Collection of Skull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990, 1879, p. 996.

'Catalogue of Human Crania &c in the Collection of Joseph Barnard Davis', manuscript catalogu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archives, MS0283/1, The Joseph Barnard David Papers.

Letters between Barnard Davis and Sir William Flowers, the curator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archives, RCS_MUS//2/4/92, Museum Letter Book, Series 2, Volume 4, 1878-1883.

战场上的头颅收集

Andrew Apter, 'Africa, Empire and Anthropology: A Philological Exploration of Anthropology's Heart of Darknes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8, 1999, pp. 577-598.

Harrison, Dark Trophies, 2012, op. cit.

Elise Juzda, 'Skulls, Science, and the Spoils of War: Craniological Studies at the 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Museum, 1868-1900',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 40, 2009, pp. 156-167.

A.H. Quiggin, Haddon the Headhunter. A Short Sketch of the Life of A.C. Had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James Urry, 'Headhunters and Body-Snatchers', Anthropology

Today, vol. 5, no. 5, 1989, pp. 11-13.

The Seligmans' experiences are recorded by Brenda Seligman in her field diary for 18 and 19 March 1912, kept in the archives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Seligman collection, file 1/4/5.

解剖与穷人

Zoe Crossland, 'Acts of Estrangement. The Post-Mortem Making of Self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vol. 16, no. 1, 2009, pp. 102-125.

Fabian, The Skull Collectors, 2010, op. cit.

Megan J. Highet, 'Body Snatching and Grave Robbing: Bodies for Scienc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 16, no. 4, 2006, pp. 415-440.

Keckeisen, The Grinning Wall, 2012, op. cit.

Richardson, Death, Dissection and the Destitute, 1988, op. cit.

伊西

Crossland, 'Acts of estrangement', 2009, op. cit.

Robert F. Heizer and Theodora Kroeber, Ishi, the Last Yahi: A Documentary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Stuart Speaker, 'Repatriating the Remains of Ishi.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 in Karl Kroeber and Clifton B. Kroeber (eds.), Ishi in Three Centuries, Lincoln: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2003.

'The Repatriation of Ishi, the last Yahi Indian',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ebsite at anthropology.si.edu/repatriation/projects/ishi.htm

人类遗骸、身分，以及博物馆典藏

Dias, 'French Collections of Skulls', 2012, op. cit.

Kirsten Grieshaber, 'German Museum Returning Namibian Skulls', Associated Press, 30 September 2011.

Laura Peers, 'On the Treatment of Dead Enemies', 2009, op. cit.

Peter Popham, 'Bring Us the Head of King Badu Bonsu, said Ghana - and the Dutch said yes', Independent, 25 July 2009.

'Homes for Bones', Nature, editorial, Vol. 501, No. 462, 25 September 2013.

www.nolombroso.org

www.tepapa.govt.nz/About us/ Repatriation/toimoko

赫德利卡、豪尔斯，以及二十世纪颅骨测量

Marina Elliott and Mark Collard, 'Going Head to Head: FORDISC vs. CRANI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ncestry from Craniometric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147 (S54), p. 139.

Jonathan Friedlaender, William White Howells 1908-2005: A Biographical Memo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

Lauren Kallenberger and Varsha Pilbrow, 'Using CRANID to Test the Population Affinity of Known Crania', Journal of Anatomy, vol. 221, 2012, pp. 459-464.

John H. Relethford, 'Race and Global Patterns in Phenotypic Vari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139, 2009, pp. 16-22.

Christopher M. Stojanowski and Julie K. Euber, 'Technical Note: Comparability of Hrdlička's Catalog of Crania data based on measurement landmark defini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146, 2011, pp. 143-149.

The William W. Howells Craniometric Data Set is available at http://web.utk.edu/~auerbach/HOWL.htm

第七章：解剖头颅

有关解剖人类尸体的个人记述

Lindsey Fitzharris, 'Mangling the Dead: Dissection, Past and Present', Lancet, vol. 381, no. 9861, pp. 108-109.

Bill Hayes, The Anatomist: A True Story of Gray's Anatomy, New York: Bellevue Literary Press, 2009.

Christine Montross, Body of Work: Meditations on Mortality from the Human Anatomy Lab,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Medical student's blog at http://ahyesplans.wordpress.com/2012/09/17/inwhich-i-became-scarred-for-life-tales-from-the-anatomy-lab/

Medical student's blog at http://sudden-death-academic.blogspot.co.uk/2010/03/once-again-anatomy-lab-is-coolest.html

关于医学院学生经验的研究

Anja Boeckers et al., 'How Can We Deal with Mental Distress in the Dissection Room? An Evaluation of the Need for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nals of Anatomy, vol. 192, 2010, pp. 366-372.

N. Leboulanger, 'First Cadaver Dissection: Stress, Prepara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European Annals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Diseases, vol. 128, 2011, pp. 175-183.

Heidi Lempp,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 Transition from Medical Student to Pre-Registration Dcotor', doctoral thesis, 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4.

Heidi K. Lempp, 'Perceptions of Dissection by Students in One Medical School: Beyond Learning About Anatomy. A Qualitative Study', Medical Education, vol. 39, 2005, pp. 318-325.

Helen Martyn et al., 'Medical Students' Responses to the Dissection of the Heart and Brain: A Dialogue on the Seat of the Soul', Clinical Anatomy, vol. 25, 2012, pp. 407-413.

R. E. O'Carroll et al., 'Assessing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Cadaver Dissection on Medical Students', Medical Education, vol. 36, 2002, pp. 550-554.

Thelma A. Quince et al.,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 Cadaveric Dissection at a UK Medical School', Anatomical Sciences Education,

vol. 4, 2011, pp. 200-207.

Daniel A. Segal, ‘A Patient so Dead: American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ir Cadaver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61, no. 1, 1988, pp. 17-25.

手术室文化

H. M. Collins, ‘Dissecting Surgery: Forms of Life Depersonalize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24, no. 2, 1994, pp. 311-333.

Sky Gross, ‘Biomedicine Inside Out: An Ethnography of Brain Surgery’,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vol. 34, no. 8, 2012, pp. 1170-1183.

Stefan Hirschauer, ‘The Manufacture of Bodies in Surger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21, no. 2, 1991, pp. 279-319.

解剖家族成员

Habib Beary, ‘India doctor to dissect father’s body’, BBC News website, 8 November 2010. http://www.bbc.co.uk/news/world-south-asia-11710741

Frederic W. Hafferty, ‘Cadaver Stories and the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ur, vol. 29, no. 4, 1988, pp. 344-356.

Lynda Payne, ‘“With Much Nausea, Loathing, and Foetor”: William Harvey, Dissection, and Dispassion in Early Modern Medicine’, Vesalius, vol. 8, no. 2, 2002, pp. 45-52.

Stack, Queen Victoria’s Skull, 2008, op. cit.

人体解剖的歷史

Alberti, Morbid Curiosities, 2011, op. cit.

Helen MacDonald, Human Remains: Dissection and Its Histor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ichardson, Death, Dissection and the Destitute, 1988, op. cit.

Ruth Richardson and B. Hurwitz, ‘Donors’ Attitudes Towards

Body Donation for Dissection', Lancet, vol. 346, no. 8970, 1995, pp. 277-279.

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1818).

准备人类头骨及医学标本

Alberti, Morbid Curiosities, 2011, op. cit.

Samuel J. M. M. Alberti, 'Anatomical Craft: A History of Medical Museum Practice', in Rina Knoeff and Robert Zwijenberg (eds.), The Fate of Anatomical Collections, London: Ashgate, forthcoming.

Robert E. Bieder, 'The Collecting of Bones for 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s',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 vol. 16, no. 2, 1992, pp. 21-35.

Dias, 'French collections of skulls', 2012, op. cit.

Dickey, Cranioklepty, 2009, op. cit.

Fabian, The Bone Collectors, 2010, op. cit.

Hallam, 'Articulating Bones', 2010, op. cit.

A.G. Harvey, 'Chief Concomly's Skull', Orego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40, no. 2, 1939, pp. 161-167.

Jorion, 'Downfall of the Skull', 1982, op. cit.

约瑟夫．巴纳尔．戴维斯、威廉．克罗瑟及威廉．蓝尼

Helen MacDonald, 'The Bone Collectors', New Literatures Review, vol. 42, 2004, pp. 45-56.

MacDonald, Human Remains, 2005, op. cit.

Helen MacDonald, 'Reading the "Foreign Skull": An Episo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Human Dissection',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6, no. 125, 2005, pp. 81-96.

Lyndall Ryan, The Aboriginal Tasmanians,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1.

根特．冯哈根斯及「人体世界」

Uli Linke, 'Touching the Corpse: The Unmaking of Memory in the Body Museum',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1, no. 5, 2005, pp. 13-19.

Tony Walter, 'Plastination for Display: A New Way to Dispose of the Dead',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10, no. 3, 2004, pp. 603-627.

大脑做为科学研究对象

Peter Edidin, 'In search of answers from the great brains of Cornell', New York Times, 24 May 2005.

Cathy Gere, 'The Brain in a Vat',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 35, 2004, pp. 219-225.

Gould, Mismeasure of Man, 1981, op. cit.

Jennifer Michael Hecht, The End of the Soul: Scientific Modernity, Atheism and Anthropology in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ius Kwint, 'Exhibiting the Brain', in Marius Kwint and Richard Wingate (eds.), Brains: The Mind as Matter,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2, pp. 8-21.

Jean Paul G. Vonsattel et al., 'Twenty-First-Century Brain Banking. Processing Brains for Research: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Methods', Acta Neuropathol, vol. 115, 2008, pp. 509-532.

Richard Wingate, 'Examining the Brain', in Marius Kwint and Richard Wingate (eds.), Brains: The Mind as Matter,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2, pp. 22-31.

第八章：有生命的头颅

直流电疗法

Roald Dahl, 'William and Mary' in Kiss, Kis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2.

Stanley Finger and Mark B. Law, 'Karl August Weinhold and His "Science" in the Era of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Experiments on

Electric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Lif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3, 1998, pp. 161-180.

Iwan Rhys Morus, 'Galvanic Cultures: Electricity and Life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deavour, vol. 22, no. 1, 1998, pp. 7-11.

André Parent, 'Giovanni Aldini: From Animal Electricity to Human Brain Stimul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s, vol. 31, 2004, pp. 576-584.

Charlotte Sleigh, 'Life, Death and Galvanis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 29, no. 2, pp. 219-248.

对被处决罪犯的断头所做的实验

Gerould, Guillotine, 1992, op. cit.

Kershaw, History of the Guillotine, 1993, op. cit.

Jack Kervorkian, 'A Brief History of Experimentation on Condemned and Executed Human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77. no. 3, 1985, pp. 215-226.

Mary Roach, Stiff: The Curious Lives of Human Cadaver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hilip Smith, 'Narrating the Guillotine: Punishment Technology as Myth and Symbol',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20, no. 5, 2003, pp. 27-51.

关于断头台及生命持续的辩论

Arasse, The Guillotine, 1989, op. cit.

Albert Camus (trans. Justin O'Brie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3.

Gerould, Guillotine, 1992, op. cit.

Kershaw, History of the Guillotine, 1993, op. cit.

Ludmilla Jordanova, 'Medical Mediations: Mind, Body and the Guillotin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 28, no. 1, 1989, pp. 39-52.

关于斩首及脑死的辩论

John P. Lizza, ‘Where’s Waldo? The “Decapitation Gambit” and the Definition of Death’,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vol. 37, no. 12, pp. 743-746.

Franklin G. Miller and Robert D. Truog, ‘Decapita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Death’,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vol. 36, 2010, pp. 632-634.

查尔斯．加斯利及弗拉迪米尔．德米柯夫

Igor E. Konstantinov, ‘At the Cutting Edge of the Impossible: A Tribute to Vladimir P. Demikhov, Texas Heart Institute Journal, vol. 36, no. 5, 2009, pp. 453-458.

Roach, Stiff, 2003, op. cit.

Hugh E. Stephenson and Robert S. Kimpton, America’s First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or Physiology: The Story of Guthrie and Carrel, Boston, MA: Midwestern Vascular Surgery Society, 2001.

Edmund Stevens, ‘Russia’s two-headed dog’, Life magazine, 20 July 1959, pp. 79-82.

罗伯．怀特

David Bennun, ‘Dr. Robert White’, Sunday Telegraph Magazine, 2000, online at http://homepage.ntlworld.com/david.bennun/interviews/drwhite.html

Roach, Stiff, 2003, op. cit.

人体冷冻

Steve Bridge, ‘The Neuropreservation Option: Head First into the Future’, Cryonics Magazine, 3rd quarter, 1995.

Mike Darwin, ‘But What will the Neighbors think? A Discourse on the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Neurosuspension’, Cryonics Magazine, October 1988.

Bronwyn Parry, ‘Technologies of Immortality: The Brain on I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vol. 35, 2004, pp. 391-413.

Heather Pringle, The Mummy Congress: Science, Obsession and the Everlasting Dead,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1.

Alcor Procedures, 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online at http://www.alcor.org/procedures.html

心灵–身体关系

A. Dregan and M.C. Guilliford,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Late Mid-Adult Years: A Cohort-Based Investig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vol. 43, no. 11, 2013, pp. 2447-2458.

A.J. Marcel et al., ‘Anosognosia for Plegia: Specificity, Extension, Partiality and Disunity of Bodily Unawareness’, Cortex, vol. 40, no. 1, 2004, pp. 19-40.

Michael Mosley, ‘The second brain in our stomachs’, BBC news website, 11 July 2012. http://www.bbc.co.uk/news/health-18779997

James Shreeve, ‘The Brain that Misplaced Its Body’, Discover Magazine, May 1995.

Sundeep Teki et al., ‘Navigating the Auditory Scene: An Expert Role for the Hippocampu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vol. 32, no. 35, pp. 12251-12257.

Katherine Woollett and Eleanor A. Maguire, ‘Acquiring “the Knowledge” of London’s Layout Drives Structural Brain Changes’, Current Biology, vol. 21, no. 24, pp. 2109-2114.

Ed Young, ‘How acquiring The Knowledge changes the brains of London cab drivers’, Discover Magazine online blog, 8 December 2011, 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notrocketscience/2011/12/08/acquiring-the-knowledge-changes-the-brains-of-london-cabdrivers/#.Ussfa_Z3TIq

器官移植及受赠者身分

George J. Agich, ‘Ethical Aspects of Face Transplantation’, in M.Z. Siemionow (ed.), The Know-How of Face Transplantation, London:

Springer-Verlag, 2011, pp. 131-138.

B. Bunzel et al., ‘Does Changing the Heart Mean Changing Personality? A Retrospective Inquiry on 47 Heart Transplant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vol. 1, no. 4, 1992, pp. 251-256.

Christina Godfrey et al., ‘Transforming Self -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With Another’s Hear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Evidence on Adult Heart Transplantation’, JBI Library of Systematic Reviews, vol. 10, no. 56 (supplement), 2012.

Diane Perpich, ‘Vulner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Facial Tissue Transplantation’, Bioethical Inquiry, vol. 7, 2010, pp. 173-185.

Jennifer M. Poole et al., ‘“You Might Not Feel Like Yourself”: On Heart Transplants, Identity and Ethics’, in Stuart J. Murray and Dave Holmes (ed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Ethics of Healthcare: Challenging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in Bioethics, Farnham: Ashgate, 2009.

Nichola Rumsey,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Face Transplantation: Read the Small Print Carefully’,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vol. 4, no. 3, 2004, pp. 22-25.

Catherine Waldby, ‘Biomedicine, Tissue Transfer and Intercorporeality’, Feminist Theory, vol. 3, no. 3, 2002, pp. 239-254.

结语：别人的头

Glover, Humanity, 1999, op. cit.

Hafferty, ‘Cadaver Stories’, 1988, op. cit.

Harrison, Dark Trophies, 2012, op. cit.